

孫中山先生傳

于右任敬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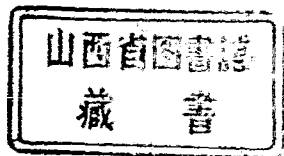


姜啟菱

26.12676

孫中山先生傳

高良佐著



劉啟炎

近芬書屋印行

11651

第一卷 少年時代

——紀元前四十年（一八七二）至紀元前廿二年（一八九〇年）——

第二卷 革命發軔時代

——紀元前二十一年（一八九一年）至紀元前十年（一九〇二年）——

第三卷 革命猛進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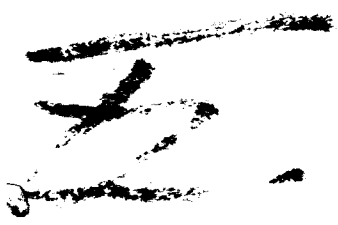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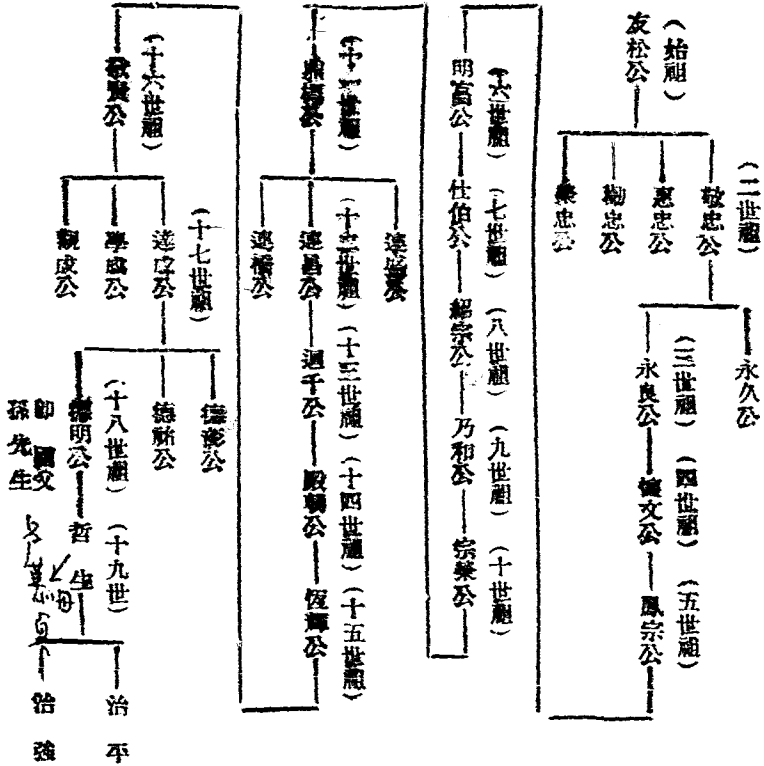
——紀元前九年（一九〇三年）至民國元年（一九二二年）——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
 四十年其目的在求
 中國之自由平等積
 四十年之經驗深知
 欲達到此目的必須
 喚起民眾及聯合世
 界上以平等待我之
 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
 凡我同志務須依照
 余所著建國方略建
 國大綱三民主義及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
 會宣言繼續努力以
 求貫徹最近主張開
 國民會議及廢除不
 平等條約尤須於最
 短期間促其實現是
 所至囑

世系表



黃季陸序

二十年來：我時常不能忘懷一件極重大事情——寫一部比較有系統的 中山先生的傳記。這是我決心編撰而始終還沒有完成的遺願。

傳記本來是不易執筆的，除了要充分了解傳主的生平，他的思想和他的事業，以及許多有關他人格上，精神上的發揚以外，還要能夠澈底明白傳主所居的時代環境的特徵，而把一些影響於他和他所給予的影響，扼要的整價的提示出來。傳主如果只是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的人，那還容易，若被傳的主人乃是一位不世之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建樹，牽涉的範圍既寬，包羅的內容的更廣，資料浩繁，頭緒紛雜，要能處理得恰如其當，那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中山先生是一個時代的偉人，世界的望傑，可以說，他乃是現代史的創造者。他的一生，雖只短短的六十年，而其影響所及，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有極大的深度。因而要給他寫一個比較合於理想的傳記，就須涉及極多的方面，幾乎等於是整理一部綜合性的現代史。這樣艱鉅的工作，本非一時可就，或許還不是一人所勝的。

這件涵存重大意義的工作。使我不能忘懷；為其艱鉅的緣故，又使我不敢草率，而且無法輕易執筆。

十三年的春天，我剛從美國回來，在廣州見着 中山先生，便打算替他做一部傳記。那時和 先生見面的機會較多，先生又很樂於和青年同志接近，我便開始蒐集傳記的材料，並希望由 先生的口中，得着許多珍貴的逸史。先生告訴我遇不少的軼事，都是未曾刊布過的材料，有些看來，雖似無關重要的瑣事，然而却足以表現一個偉大人物的特徵來。所以我不敢有所遺漏，事無鉅細。完全將它筆記下來，以備參考。這些材料，經過若干次的流離奔走，一直帶在我的身旁，不敢讓它稍受損失。二十七年入川時，交通不便，只得暫時寄存 在柳州的朋友處。去年湘桂戰起，柳州淪陷，這些珍貴的筆記怕難免於浩劫，每次想起，往往使我心痛。

從和 先生的時常接觸之中，我開始驚異着 先生的修養，遠非世人所及。先生人格上、思想上的修養，固屬偉大，其學術上的修養，尤非世人可說；即是拿辭令來說，其優美的程度也是並世無偶的。先生說話，無論演講和對談，都是親切、誠懇之至，且能雅俗共賞，有時，也頗富於幽默感。記得 先生曾經告訴我：「幼年的故事、事雖平常，他却說得非常有趣。」

先生的哥哥德彰先生，是檀香山的畜牧大王，家裏自然有很多的馬匹；但這些馬多是來來馱物的，並不慣於被騎。先生小時會去過檀島看他的哥哥，有一天，見着馬快牽着馬來，他便天真的爬上無鞍的馬背上去了。這馬既是不慣被騎，立刻就受驚而亂跳起來。先生這時自然是非常危險，却又無法下來，便只有用力將馬抱緊，口裏不斷的「一、二、三、四……」的數着，用機械的動作來緩和緊張的場面。先生說：「當我數到七八下的時候，我便不知道了！」我聽了這話，莫名其妙，爲甚麼數到七八下就會不知道了呢？他說：「當我能夠知道事的時候，我已經躺在醫院的床上了。」原來 先生不久即從馬背上被拋下地，跌昏了，失去知覺，一直到醫院裏施診後才醒轉過來。這個故事本來是極其平常的。可是因爲先生善於辭令的緣故，却把它說得娓娓動聽。至於他正學術方面的修養，真可說是學究天人，無書不讀，大家却不十分明白。有一個故事，就可以充分證明先生的好學用功。

我從美洲回國的時候，在紐約買了兩本最新出版的書，一本是 Roger and Mc. bain 合著的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government 一本是 Roger and Willoughby 著的 New Constitution of Europe 在廿幾天的旅途中，無事時，便略爲瀏覽了一下。到廣州見着 先生，他問我說：「你新從美國回來，他們最近新出版有甚麼好的書嗎？」我當時便將這兩本書說了出來，並說乃是最新最好的出版物。他說：「這書裏面講的甚麼呢？」我以爲這接近才出版的新書，先生當然沒有看到，便把書內的要旨，大概的說了一番。先生聽過之後，即從書架裏拿出一本書來問我說：「你所說的，是否就是這本書呢？」我接過來一看，真是我所說的那本書。在書裏面，先生已用紅藍鉛筆加注了許多的記載，可見他不只有了這極極新的書籍，而且已是精讀完了。

由這樣看來，先生的確是無書不讀，而且讀無不精。他在學術上的條貫如此，其它各方面亦無不如此。一個偉大人物的成就，自有他的獨到之處，而我們所應效法的，也即在此。

忽忽二十年來，我這一索願還未達到，時常引為生平的一大憾事。而同時環顧國內，也始終沒有一本系統的傳記產生，尤使我非常焦慮而難過。最近高良佐同志撰成本書，不獨我個人為之興奮，想來大家也會引為欣慰的。

高良佐同志研究黨史有年，對於先生的生平尤其留心；若干年來，便在苦心孤詣的搜集材料，從事整理，因為他不願意過於草率的緣故，直到今天才將全稿完成。我早已很明白而且很欽佩他的忠忱與毅力，更早早希望他能及時完稿，尤盼其能早日問世。當他以原稿見示時，我心中真有無窮的滿足，同時也不禁引起了無限的感歎！原稿我會匆匆一讀，便決心設法使能出版。以高同志的修養來說，寫一部好的傳記是毫無問題的，不過先生的傳記太難着手了，其間自然難免也還有些不能十分周到的地方。在這裏，我不願多說，讓讀者去細細品味。但我可以說，這本書的內容，大體上是毫無問題的，而且還有它的精到之處，不致辜負讀者們期切的厚意。同時，我們今天能夠讀到這樣一本有系統的中山先生傳記，無論如何，也是值得特別滿意的！

黃季陸序於國立四川大學，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孫中山先生傳

四

自序

寫作傳記，雖一傳最要緊的工作，中外各國傳記作品的數量，並不算小，但查得越所屬不肖之工作者，越有窮乏。這是因為傳記本身挑動的困難，是加有許多寫作者的能力短長。譬如史記：史才須有三長，才者，事也，識也，而寫作傳記，不僅具備這些條件，還須要能從史料傳記注入新的生命。查事蹟對傳記寫作，最難得是體。他說：「寫人遺物與遺事，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這所謂無定中之一定，則對事蹟，說主人敘東博的意見，四五章對吳爾美夫人麻她傳記的藝術一文中，也說：「藝術家，不論是詩人，戲劇家，小說家，繪畫家，雕刻家，都有其創造的自由；他不變什麼束縛，也沒有什麼束縛——除了他自己給自己束縛。傳記總不能叫他沒有自由；他有無束縛的束縛，他的情感，想像，思想，只能在這無束縛的束縛中活動。傳記寫作的不容異議功，這恐怕是主要原因之一。傳記家史爾美基也有其一篇完美的傳記，與這一個先賢的生命同樣難得的感慨。

國父 孫中山先生不但是中華民國的開創者，革命的導師，並且在近代世界史上是一位劃時代的偉大人物。他一生事蹟，包括革命運動的經歷，革命思想的開展和同時代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思潮等的變動，以及種種伏，事應萬殊。是一個最好的傳記材料，但也是一部最難寫的傳記。我服膺 國父主義出世幾年，雖不自換其揮筆寫這一部傳記，動機很久了。當 國父逝世後三年——民國十五年春天，由同學鍾玉璽君的引導，到寶山居住去訪問居覺生先生，因而被留，在覺生先生的樓書房中，看到許多革命事蹟的照片和報章，時一夜之力，盡量翻閱，不覺引起了蒐集 國父傳記資料的興趣。十七年在廣州，先師郭翼如先生手訂 孫中山先生傳目錄大綱，命我執筆編寫，但當時材料十分缺乏。就寫了十分之二，又因他事所阻，從此擱置，原稿也歸廢棄。十八年在上海，讀切莫如先生編印建國週刊，以整理孫先生歷史為目的，先生手訂之一，因此努力蒐集材料。裏面有

所或各種珍貴史料，都給我利用，按期發表。同時又常到徐家匯天主堂圖書館，瀏覽各種已經絕版的革命書籍，對於傳記的寫作，因此更感興趣，但始終不敢動手。十九年春天，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成立，有顧維鈞工作，從此更加深了我對於革命史料研究的興趣；同時也更感到寫作國父傳記的種種困難。因為我那時輔助編輯國父年譜，及補編國父全書，對於材料的蒐集，雖然比較便利，但愈求愈廣，愈感材料用而不夠；無知幾說得好：「學者欲博聞彞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禮之素句，直守禮記之紀傳，亦何所能自致於此乎？」我們寫國父傳記，就不能專著於局部的材料，必須廣及同時代其他有關材料，才能獲得一個完整的概念。但是材料蒐集得多了，還須加以審慎的去取，嚴密的鑒別，即所謂「學者博聞，貴在擇其而已。」因此我從二十一年起，曾經費了相當塊的時間，從事史料的考訂工作。寫過許多有關革命史中重要事實的考訂文章，在連開月刊上發表，如國父先世世系，與中會創立地點和時間問題等，都會加以詳論。我最初的計劃，是想對於每個革命史中的重要問題和史實，加以徹底瞭解，然後才可以用融會貫通的方法，寫成一部比較完整的紀傳。但深感自己學力才識不夠，因此雖然抱了這種熱情，始終不敢下手。直到二十四年，才開始試寫第一章高歲以後，自己看，終不滿意，雖是不斷地往下寫去，卻從不輕意示人。二十五年，曾以函泥之稿，請示翼如先生，不幸是年先生在陝殉國，原稿尚留置在他的書房內，未加手定，從此失掉了。修稿以後，我也興趣索然，不想繼續寫下去了。

抗戰以後，我把這部稿子，在雜亂生活中，帶到後方，但為恐敵機炸毀，常常保藏在鄉間，同時工作極其艱難，更無法繼續寫作。許老師友每以此責我，使我感到萬分惶悚。尤以吾師黃季陸先生之督責最嚴，現雖復又得黃大白、羅振騰兩兄老助力，才能續成行印。這一本我既困難，歷時甚久的稿子，現在雖然才告問世，我的反因此情緒不安。因為國父的偉大事蹟，在我這平庸的筆底下，祇是一堆沒有消化，沒有結構的材料而已。

這部傳記的體例，在此不能不作簡單的說明：當我動手時，首先抱定了質樸重實的態度，因此有許多在革

命進程中誤事敗事的黨人，並不掩飾；當時很努力而現在萎靡的人，還是根據事實，加以記敘。歷次革命運動，此與彼仇，都有派系可尋，因此特別注重整體性連續性的描寫，而尤於國父策動領導的關係、處處關照，以厚著主。我並不忽略國父生活動態及實際行動的描寫，我更企圖在這實際行動背後所隱藏的革命動力，加以發掘。爲要了解國父思想的演進，人格的成長，內心的變化，常常不惜篇幅來引用國父自己的話，更用各種事情事實加以旁證，有時，意境遙遠，恍惚身臨其境，我會流過熱淚，也會歡欣而笑。有時，我也會以旁觀者的態度，來觀察衡量當時事實的經過。雖然爲了材料的缺乏，和自己能力的限制，不能暢所欲言，但我卻企圖使這部傳記能夠成爲國父生活之體系化。全書因寫作時環境一再變動的關係，許多引用的材料，大都未加標註；現在大部份的材料，且多散逸，更難查明記註，這是很大的缺憾。但全書所記一事一言，都有根據的。現在據記境所及，曾經參考的重要材料，尚可舉出的：關於國父遠祖遷徙的地點，和家世的源流，我過去雖曾做過許多考察的工作，但現在完全接受羅香林先生的意見。國父故鄉的一切情形，我在中央黨史會時，曾請羅主任先生加以實地調查，而王玉斧先生的再度調查，更給我不少材料。現在王玉斧先生已歸道山，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紀念。關於國父在檀香山的求學情形，太體是根據美人利斯特力區 *Miss M. Roberts* 的孫逸仙傳，因爲他曾在檀島教書，關於這奧爾尼學校的情形，再沒有比他更詳盡的記載了。倫敦廢雜的事實，一方面根據國父原著的英文本，對現行的譯本，有相當校正；一方面又根據羅志希先生的考訂及其所附偵探社的報告原文。與中會方面的事實，主要的參考材料是陳少白先生的與中會革命史要，少白先生此書，作於民國十八年他南下參加國父奉安的時候，當時係羅志和先生的邀請，替我們建國月刊社同人講述的。至於美人利白克先生的孫逸仙傳，美人羅德黎先生的孫逸仙與新中國，及日人宮崎的三十三年落花夢，孫逸仙傳，田野橋次郎的中國革命史等，都是重要參考材料。民國二十二年平岡小太郎也曾從荷島寄來一爐回憶，我請程萬里先生加以翻譯，現在程先生也已作故，不勝人琴之痛。與中會及同盟會時代關於南洋及美洲華僑參加革命的許多寶貴材料，應謹感謝的一位是張永福先生，他給了我一本南洋與創立民國，一位梅壽林先生，承印印刷

孫中山先生傳目次

遺像

遺囑

世系表

實序

自序

年表

第一卷 少年時代

第一章 革命的聖地	一
第二章 孫先生的家庭	六
第三章 在村塾中	一〇
第四章 翠亨村裏的風波	一四
第五章 海外的哥哥	一八
第六章 太平洋上所見	二〇
第七章 在檀島的生活	二四
第八章 從檀島回來以後	二七
第九章 立志革命之始	三一

第一卷 終

第十章 因革命而準備………三五
第十一章 兩軍幻滅的夢境………四〇

第二卷 革命發軔時代

四四一—二二三

第十二章 最早的最見………四四

第十三章 創立興中會………五〇

第十四章 第一次廣州起義………五八

第十五章 亡命………六六

第十六章 倫敦使館被難………七一

第十七章 完感三民主義………八一

第十八章 邱樹志士的活動………八八

第十九章 革命黨與保皇黨的對立………九四

第二十章 援助菲律賓獨立與革命形勢之重振………九八

第二十一章 聯合李鴻章運動的失敗………一〇二

第二十二章 惠州起義………一〇八

第二十三章 惠州失敗後的革命大勢………一一三

第二卷 革命猛進時代

一一〇—一二七

第二十四章 檀香山的論戰………一二〇

第二十五章 廣東革命………一二七

第二十六章	在歐洲的活動	一三五
第二十七章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	一四二
第二十八章	革命的宣傳與南洋黨務的開拓	一四七
第二十九章	法國武官的活動與南洋黨務的擴展	一五二
第三十章	革命方略	一五八
第三十一章	民報週年紀念與萍瀏起義	一六三
第三十二章	日本放逐與南方革命的再起	一七三
第三十三章	防城起義與汕尾逐械	一八三
第三十四章	鎮南關起義	一九二
第三十五章	被迫離安南後的革命運動	二〇一
第三十六章	革命重心的新加坡	二〇二
第三十七章	內 闕	二二〇
第三十八章	革命運動的復興	二二六
第三十九章	庇能會議	二三三
第四十章	三月二十九日	三三八

年表

- 一歲 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公歷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丙寅）。
- 是年於癸卯十一月十二日（即農曆十月初六日），先生誕生於廣東香山縣雙亭村。
- 二歲 民國紀元前四十五年（公歷一八六七年）（清同治六年，丁卯）。
- 三歲 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公歷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戊辰）。
- 四歲 民國紀元前四十三年（公歷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己巳）。
- 五歲 民國紀元前四十二年（公歷一八七〇年）（清同治九年，庚午）。
- 六歲 民國紀元前四十一年（公歷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辛未）。
- 七歲 民國紀元前四十年（公歷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壬申）。
- 八歲 入學時射鵰讀書，聞鄉人談洪楊故事，潛抱革命大志，輒以洪秀全第二自命。
- 八歲 八歲國紀元前三十九年（公歷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
- 九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八年（公歷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甲戌）。
- 十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七年（公歷一八七五年）（清光緒元年，乙亥）。
- 十一歲 轉入高第街宗祠私塾肄業。
- 十一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六年（公歷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丙子）。
- 十二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五年（公歷一八七七年，（清光緒三年，丁丑）。
- 仍在村塾讀書，學業漸進。
- 十三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公歷一八七八年，（清光緒四年，戊寅）。

年表

一五、年 國海軍提督黃海之役，始為海軍之權，遂為海軍之心，窮天地之想。

清光緒二十三年，公歷一八七九年，（清光緒五年，己卯）。

一六、年 八國聯軍之義舉，窮形學術，野蠻。

一七、年 清光緒二十三年，公歷一八八〇年，（清光緒六年，庚辰）。

一八、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一年，（清光緒七年，辛巳）。

一九、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二〇、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二一、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二二、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二三、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二四、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二五、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二六、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二七、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二八、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二九、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三十、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三十一、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三十二、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三十三、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三十四、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三十五、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三十六、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三十七、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八年，癸巳）。

先生年譜：先生年譜，以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年，丙戌）。

先生年譜：先生年譜，以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年，丙戌）。

先生年譜：先生年譜，以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年，丙戌）。

先生年譜：先生年譜，以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年，丙戌）。

先生年譜：先生年譜，以清光緒二十一年，公歷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年，丙戌）。

二十三年 民國紀元前二十四年，公歷一八八八年，（清光緒十四年，戊子）。

二十四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公歷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己丑）。

連成公薨世。

二十五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二年，公歷一八九〇年，（清光緒十六年，庚寅）。

二十六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公歷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辛卯）。

二十七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年，公歷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先生以全校第一名畢業於雅禮氏學校。在校五年，每於課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與陳少白、尤少鈔

、楊鶴齡三人，往返尋密晤夕談革命，港澳間親友呼爲「四大寇」。畢業後，懸壺於澳門，聲名鶴起，然爲葡

書所忌，乃遷至青洲。

二十八歲 民國紀元前十九年，公歷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癸巳）。

時粵中函傳孫少師先生獨以西醫名，尤精解剖術，故城診者戶戶爲穿，營業甚盛，常與鄧士良、陸皓城

、陸奎光等數人，聚議革命。

二十九歲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公歷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

借陸皓城北遊京師，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至大津時，以李鴻章說爲時務之大

員，因作長函遺之，不納，乃回上海。時中日戰爭正劇，先生以爲時機可乘，乃遣卮檣島，以反清復漢事商

諸舊日親友，創立興中會。然是時華僑風氣尚極閉塞，應者寥寥。是年冬，返香港，欲聯合各地同志，襲取廉

州以爲根據地。聞知仁文社首領楊樹德、謝讚泰等有志長濟，乃與高組黨大計，楊等欣然聽從，於是廉滬會

併。

三十歲 民國紀元前十七年，公歷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擴天之與坤會，成立於香港，乃商議採取廣州計劃，陳維寬提議用青天白日旗，亦於是時決定。創設農學會於廣州，為革命機關。定九月九日（公歷十月二十六日）重陽發難，乃以連城不懼，為海關搜獲，事機乃洩，陸皓東等殉難。此為中國有史以來國民革命第一次之流血，亦為先生第一次之失敗也。事敗後，先生由閩道般險至香港，應與鄭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極盡同志，成立興中會公會，舉命士良為總，收拾餘衆，神機而動，少白留京，考察東邦國情，而已剃髮改裝，遠遊美洲，與華僑籌餉，為掩土重來之計。

三十一歲 民國紀元前十六年，公歷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先生抵嶺南後，復集同志以推廣興中會，進募款為第二義舉。但當時新股，應者寥寥，進行遲滯。因念美洲多華僑，應與聯絡，遂決計赴美。瀕行，偶於市郊遇康德黎，握手甚歡，先生告以將赴美歐，康亦以即赴英倫敦。四月，先生離嶺赴美，自三藩市，橫過大陸，至紐約，所遇常有洪門會，惟考其實際，僅為工商等聯絡感情，絕無政治意味。先生既至，乃辨認反清復明宗旨，並購其聯絡內地會友，共策革命進行。當時領事署，每處不過十數人，或僅數人耳。先生以在美無可活動，乃決赴美。時清廷已下令通緝先生，故由美洲南蘇維敏，即被清廷駐英公使嚴照環緝捕。幸梅康等竭力營求，始能脫險。

三十二歲 民國紀元前十五年，公歷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先生仍居倫敦，出入圖書館中，日夜不息。以考察歐洲政治風俗之心，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革命建設之標的。是年秋，京回日本，從事實際運動，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劃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頗歡迎先生。而日本志士華後助先生者有田兄弟，宮崎兄弟及菊池實野等，大半在此時期相識。

三十三歲 民國紀元前十四年，公歷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先生在日本。八月，清廷設變禍作，康有為、梁啟超逃命日本。日人宮崎平山等以先生與康梁俱志在救國，欲居間調停，使兩派聯合，乃有為像以帝師孤臣自擬，堅不納，後且創保皇會與革命黨對抗焉。

三十四歲 民國紀元前十三年，公歷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

先生仍在日本，努力革命運動。是年七月，日政府取消治外法權，先生乃貧。橫濱山下區一百二十一號爲機關，與清領事爲隣，公然向其敵人挑戰。時康黨之保皇黨已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清廷尤甚。先生以大無畏之精神，作不間斷之努力。知欲喚起國民，必須創立宣傳機關，乃命陳少白回香港，籌辦中國日報。復命史堅如深入長江，聯絡會黨，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同志，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併合於興中會之事。

三十五歲 民國紀元前十二年，公歷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先生仍居日本，力助革命獨立未成。五月，近畿義和團起，時局騷動。粵督李鴻章納港督卜氏之言，擬合黨人倡廣東獨立，既囑劉學詢函請先生，旋派艦駐港待之。先生至港，即依同志決議，派宮崎爲代表，乘艦赴粵路學詢，知李尚無決心，先生以事已無望，乃積兵籌備軍事。以惠州爲難全權，授鄭士良、命史如回廣州，組織響應。已期以水師監視，不獲登陸，偕宮崎返日，尋復轉上海赴台灣。士良在惠州苦戰致月，彈藥告竭，事復不濟，是爲先生第二次之失敗。廣州史堅如謀炸粵督，毀撫署被執，亦遇害。英年殉國，先生倍痛惜之！是年梁啓超抵港，賴先生先介紹於檀島同志，自是保皇黨遂獲寄跡檀島，且設保皇報爲餘

三十六歲 民國紀元前十一年，公歷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惠州失敗後，先生由台灣至橫濱，盡從事籌款及宣傳，以圖再舉。時距離和團聲震，聯軍攻陷北京年先矣。清廷方賠鉅款，與八國媾和，海內外志士，憤其竄敗，知不足與圖存，遂多數傾心革命。即向日進視。生者，至是亦亦同情，而日本留學界思想言論，尤集中於革命問題，時梁啓超亦在日本，與先生同爲失敗之人，朝夕過從；而持議終不相合，梁改清議報爲新民叢報，鼓吹君主立憲，反對民主革命。

三十七歲 民國紀元前十年，公歷一九〇二年，（清光緒廿八年，壬寅）。

安南總督稻美，屢託日京法公使，約先生往晤。至是以河內開博覽會，遂行。抵安南，稻美已離任，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內結識華僑多人，而安南興中會以立，厥後欽廉河口諸役，深得其力。

三十八歲 民國紀元前九年，公歷一八〇三年，（清光緒廿九年，癸卯）。河內博覽會告終，先生乃再作環球漫遊，取道日本而赴歐美，秋間抵日。時上海發生孫報案，先是車燒、郵船等情，蘇報以鼓吹革命，言論激烈，實重斥清帝之名，呼為小醜。郵容著革命軍一書，排滿最烈。清吏乃控諸租界當局，封閉蘇報，章、郵被捕，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後清廷經勝訟，而章、郵僅囚禁二年而已。

三十九歲 民國紀元前八年，公歷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甲辰）。

先生抵滬後，以保皇黨之勢力方張，排斥革命，異常激烈，乃改刊黨報，並親撰論文，向保皇黨大張撻罵，聲勢為之大振。又鑒於前次游美之失敗，知非列精洗門，不能得其助力，乃毅然加入致公堂。尋由檀赴美，保皇黨運動關吏，禁先生於木屋，不使登岸。經教友及致公堂同志奔走，始得保出。及登岸，大受洪門歡迎，與前次迥異矣。先生以旅美致公堂會員雖衆，而主張分歧，團體渙散，乃提議舉總辦註冊，手訂致公堂憲章，與董三籌出遊各埠，鼓吹革命。在紐約時，撰告歐美人書，題為中國問題之真解決，獲得美人之贊同。

四十歲 民國紀元前七年，公歷一九〇五年，（清光緒卅一年，乙巳）。

是年春，先生由美赴歐，是時留歐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先生乃揭發生平所懷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比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乃由德返英，轉道法國，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在巴黎時，謁前安南總督稻美，因以權交於法京政黨各要人，與商協助中國革命事，甚為得手。尋取道南洋，重回日本，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除甘肅無留學生外，十七省人皆與焉。中國革命同盟會，遂正式成立。以一層除穢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一為誓詞，頒布會章。發表革命方略，選舉孫先生為總理，而空前之革命黨報民報，亦於此時創刊焉。是年冬，赴西貢。

四十一歲 民國紀元前六年，公歷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是年春，先生由南洋過香港，將往日本，法國武官布加畢譚先生於舟次，置於天津法軍參謀部派武官七人，歸先生調遣。先生命廖仲凱、黎仲實、胡毅生等，偕法武官赴天津、兩廣、川滇、南京、武漢等處，成立機關，或從事調查，而南京、武漢之新軍，皆大歡迎。十月，同盟會員劉道一等，自動起事於萍鄉，隨與清兵二十餘戰，相持匝月，卒以衆寡不敵，復失，劉道一等被害。

四十二歲 民國紀元前五年，公歷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正月，日政府向清公使攝權之請，令先生出境；先生乃偕胡漢民等赴安南，設機關於河內，籌劃進行，旋命許雲秋、余既成等，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此爲先生第三次之失敗，繼又命鄒子瑜、黃業於惠州，亦不利，此爲先生第四次之失敗也。無何，欽廉兩府有抗捐之事發生，命黃克強、胡毅生二人囑結清軍郭人漳、趙伯先、以爲內應，會東京本部黨員忽起風潮，賄賊運餉之計劃破壞，郭、趙又失約，全軍遂敗逃十萬六山，此先生第五次之失敗也。旋又親率黃克強、胡漢民襲攻鎮南關，扼據三砲台，與清兵龍濟光、陸榮廷等致千人之衆相抗，後以軍火不繼，乃退入安南，此先生第六次之失敗也。清廷與法政府交涉，令先生出境，遂往星洲。

四十三歲 民國紀元前四年，公歷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先生在新加坡成立南洋支部，自兼部長。令黃克強再入欽廉，率同志二百餘人，大小數十戰，前後四十餘日，所向無前，清兵聞而生畏，克強之威名太著，後以彈盡糧絕退出，此先生第七次之失敗也。又命黃明章聯絡清兵爲內應，率同志百餘人襲河口，繼以孤立無援，清兵四集，卒以不守，此先生第八次之失敗也。

四十四歲 民國紀元前三年，公歷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己酉）。

先生以連遭失敗，安南、日本、香港等地，皆不能自由居處，因往美洲專籌用款，將國內一切計劃，盡之黃克強、胡漢民二人。

四十五歲 民國紀元前二年，公歷一九一〇年，（清宣統二年，庚戌）。

先生從美東行，時黃克強、胡漢民發動廣州新軍舉義，事敗，倪映典死之，此爲先生第九次之失敗。先生聞敗耗後，就程東返，過日本、潛行登陸，隨爲警察偵悉，遂避往新加坡，約賴伯先、黃克強、胡漢民等往晤，以商捲土重來之計。時新敗之餘，精銳已喪，衆皆傾視無言，先生勵勉再四，並招集當地華僑會集，以集資金，一夕之間，得八千有奇。各同志分頭勸募，數日之內，達五六萬元，先生又親赴南洋英荷各屬，所至輒受其政府之驅逐，遂轉赴美洲，向華僑竭力募捐，於是乃有辛亥廣州之役。

四十一歲 民國紀元前一年，公歷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

先生在美籌款，進行甚利。黃克強、趙伯先等遂暫離粵割廣州舉義，三月二十九日，克強率衆登臺，應戰不克，殉難者七十餘人。是役也，集各省革命之精英，與清廷爲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死事之烈，已震動全球，國內革命之勢，實以之造成矣。此 先生第十次之失敗也。廣州革命雖不成，然黨人曾不因此少懈，至八月十九日（公歷十月十日）復又舉義於武漢，而 先生廿餘年所企圖之種族革命，竟得以實現。先生在美聞耗，遂決意致力外交，以絕清廷之援力。首至英國，停止清廷向四國銀行之借款二萬萬元；復請制止日本援助清廷，與取消放還令，以便回國，皆得英政府許可，乃由法東歸。十七省代表選舉 先生爲臨時大總統。

四十七歲 中華民國元年，公歷一九一二年。

一月一日，先生在南京宣誓就職，發表對國內外宣言文告，採用陽歷，改元爲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而 先生願覆清廷之志，於是乎實現。翌日，提出辭職書於參議院。四月一日，頒解職令，繼之者爲袁世凱。在任三月中，促迫南北統一，頒佈臨時約法，樹民國之規模，立法治之基礎。 先生之辭職，雖曰稱慶袁氏，促漁統一，而革命方略之不行，實爲其主要原因。自是周游各省，宣傳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並從事實業教育，旋任全國鐵路督辦。

四十八歲 民國二年，公歷一九一三年。

先生欲實現其鐵腕政綱，乃東渡日本，視察其工商情況及鐵路現狀，並聯絡其時野名士，實爲鯁子，以爲

進行之勤，尋即回滬。時袁世凱野心日熾，屢爲民國總統，而實專心帝制，日蓄裁制革命勢力，廣植其心腹。三月，遣大樞載宋教仁於上海，於是舉國同然。先生致書袁氏，數其罪狀。命李烈鈞回江西，佔領湖口，宣佈獨立，舉兵討袁，事、湘、皖、閩、粵等省響應之，即所謂二次革命也。袁竭力壓迫，各省獨立先後取銷。先生至是不能安居國內，乃重赴日本。

四十九歲 民國二年，公歷一九一四年。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氏即解散國民黨，國會遂不足法定人數，陷於消滅狀態。隨又郊天祀孔，議及免職。先生以袁氏反形已具，帝制自爲之心，躍然如見，乃在東京集合同志，組織中華革命黨，重立誓約，增訂新章。任命各省中華革命軍司令，命鄧鏜舉兵於廣東，范鴻仙、夏之麟舉義於江浙，均不克，范夏死焉。然各地同志此仆彼繼，再接再厲，討袁之成功，實基於此。

五十歲 民國四年，公歷一九一五年。

先生以袁氏帝制運動，日見鮮明，乃命居正赴山東，陳其美赴上海，朱執信赴廣東，于右任赴陝西，運動起兵，並發布宣言，聲討袁氏，遂有陳其美上海肇和兵艦戰役，以武器不支而退，此反對帝制之第一聲也。十二月十三日，袁氏稱帝，並改明年爲洪憲元年，先生艱難締造之共和，從茲中斷。時前雲南都督蔡鍔解職在京，陰圖反對，陽表贊同。旋設計脫身回滇，說將軍唐繼堯以反對帝制，唐同意，遂通電各省，宣布獨立。

五十一歲 民國五年，公歷一九一六年。

滇省舉義，各省響應，袁氏迫於情勢，取消帝制。先生於五月初由日回滬，即發表宣言，主張規復約法。及袁致，復電申前旨，並電令各省兩府停止軍事行動，維持地方秩序，政法問題，靜候與黎商決。時黎元洪依法繼任總統，徇先生之主張及軍務院之要求，恢復民元約法，召集國會，組織正式內閣，懲辦帝制罪魁。於是南方撤消軍務院，各省亦取消獨立。八月間，黎電先生北上，共謀國是；先生以黎爲帝制包圍，不赴，惟勉其速解制紛，及請釋放政治犯而已。

五十二歲 民國六年，及歷一九一七年。

先生仍在滬，完成民權初步。黎氏繼任後，與內閣總理段祺瑞積不相睦；對德宣戰問題之起也，祺瑞又志不能得志於國會，陰召各省督軍之附己者入京，以威脅之。何無祺瑞免職，雖使督軍兩叛，促顧冲宜宣布獨立，各省響應。時海軍總長程璧光不直其所爲，因率海軍抵滬，備國家之緩急，並向先生表示服從。及張勳入京復辟，國會解散之變繼作，黎氏被迫退位，先生命各省革命軍人出師討賊，東南各省，相繼並起。祺瑞亦嘗登馬廐，收復北京，迎副總統馮國璋入京，代理大總統職，已則復任內閣總理。先生疊電祺瑞，以擁護約法，誅勳叛逆爲言，卒不之省，遂于七月二十二日與程璧光及國會議員赴粵，宣言護法。國會議員開非常會議，議決組織軍政府，舉先生爲大元帥，九月十日，先生宣誓就職；通電否認段政府，下令各路進攻。

五十三歲 民國七年，及歷一九一八年。

先生以護法號令西南，諸將雖不敢顯持異議，而首鼠兩端，不受約束者，比比皆是，尤以陸榮廷、莫榮新二人爲甚，騁悍濇狀，遇事掣肘。先生以大局爲重，隱優容之。莫更無忌憚，竟擅捕殺軍政府衛隊，先生乃於一月三日，命周安、豫章二艦，砲擊軍署，以示懲戒。莫知理屈，且恐滇、粵軍，起而臨其後，遂終不敢還擊，且前請罪，先生宥之。時一部份國會議員，倡議改組軍政府，莫榮新復遣人暗殺海軍總長程璧光於海珠對岸，先生憤議員之被殺，桂系之兇橫，乃於五月四日向非常國會辭職。七月，改組之軍政府成立，先生以彼雖號爲軍政府，無異群枝機關，乃於二十一日離粵赴滬，雖被舉爲總裁，未嘗發表意見也。

五十四歲 民國八年，及歷一九一九年。

先生仍在滬。時南北進行和議，爭持數月，迄無結果。先生以雙方各挾私圖，構建民意，乃於八月七日正式向軍政府辭總裁職，命朱執信、廖仲愷、胡漢民等，創辦建設雜誌，努力建設之宣傳。是年，著英文學說，創行易知難之學說，並完成實業計劃。十月十日，改組中華革命黨爲中國國民黨。

五十五歲 民國九年，及歷一九二〇年。

先生仍在滬。是時桂系把持之軍政府，內訌發生衝突，各總裁已相宣佈脫離。五月，桂軍議會開會，選舉溫宗堯等以逼補之，先生與唐繼堯、唐紹儀等通電反對，申言政府總裁，不宜決定人數，廣州軍政府無效。八月，粵桂戰起，陳炯明奉先生命，率師回粵，與張敬堯領出，岑春煊亦於十月二十日，宣佈辭職，相率西歸。先生以莫等智勇勢弱，投降北方，因借伍廷芳、唐紹儀及國會議員返粵，重議政府會議。

五十八歲 民國十年，公歷一九二一年。

一月六日，先生集唐紹儀、伍廷芳等發表宣言，希望南北繼續和平統一之議。四月七日，國會非常會議，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先生為大總統。五月五日東職，發表對國內外宣言，以地方自治，和平統一，開放門戶，發展實業，昭告中外。北方政府以合法政府年粵誕生，大起恐慌，張使陸榮廷、陳炯明出兵擁護，先生以寇氣甚熾，命陳炯明、李烈鈞等，分三路進攻桂林，七月十五日桂林悉平。先生仍親率大軍北伐，時稱桂林，組織大本營。陳炯明已降曹錕志，不肯接濟餉械，陸榮廷催促，置若罔聞。

五十七歲 民國十一年，公歷一九二二年。

先生以陳炯明把持後方，不與接濟，乃改道北伐，將大本營於韶關，復率師西粵，以陳炯明專軍總司令暨省長各職，旋命辦理兩廣軍務。五月六日，督師開關，軍行順利，直抵贛州，陳炯明與唐鈞結日張，即以所部葉舉等，還集廣州，謀應北方之約。先生因逐省坐鎮。六月十六日，陳炯明發亂，作圍攻總統府，先生冒險出行，登永豐艦，親率海軍截亂，以待北伐軍之運籌轉難。既而各軍散耗至，不得已，於八月十三日抵滬，發表宣言，布告粵變結束，表示統一意見。十月，北伐軍許崇智克復福州，先生任廣東路討賊軍總司令，以規復廣東。

五十八歲 民國十二年，公歷一九二三年。

自陳炯明叛據廣州，倒行逆施，人民不堪其苦，函請先生剷除之者，已非一日。先生乃令閩軍許崇智等部進潮、汕，其德溪、桂、粵各軍，亦響應進軍。一月，肇慶、三水、河口，相繼克復，粵省悉歸。

轉，在廣州響應。陳炯明遂散走東江，二月，粵軍齊集，其迎先生建專，復任大元帥職。無何，沈鴻英引北軍犯廣州，先生率各軍討平之。時東江陳炯明殘部，猶未肅清，北伐之舉，卒被牽制不克進展，先生仍命滇、桂軍進攻惠州。命譚延闓率師伐湘，不克而還。

五十九歲 民國十三年，公歷一九二四年。

一月二十日召集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通過黨綱章程，並發表宣言。四月十二日，孫有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命蔣中正任實地創立軍官學校；於軍事外，灌注三民主義，加以政治訓練，以養成真正革命之黨軍，遂後軍事之成功，基於此焉。時西錫炳竊，先生會首先聲討。八月，奉軍入關，亦討伐附選，浙江繼之。先生至是遂決定北伐，出發韶關，命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職權，任譚延闓爲北伐軍總司令。無何，浙江敗挫，直奉戰起，而馮玉祥、吳景翼等忽返師回京，顛覆曹、吳、馮、胡等總理詛瑞張作霖電請先生北上，解決時局。先生爲謀中兩統一與建設，遂允其請；由廣州出發赴滬，發表宣言，主張開國民會議，與廢除不平等條約。抵滬後，繞道日本而至天津。沿途勢頗，已感不適，及見段政府答覆使團，有外崇國信之語，知北上目的，終不能達，太息久之，而風疾復發矣。然仍力疾入京。

六十歲 民國十四年，公歷一九二五年。

先生抵京後，病日加劇。段政府對先生主張之國民會議，迄無進行誠意，且復召集善後會議，先生乃決不肯加入其會議，而於國民會議，及裁兵統一辦法，仍日夜思籌，病益以劇，百藥罔效，遂於三月十二日逝世。留遺囑二函，一致同志，於民國前途再三致意；一關於處置資產事。先生畢生盡瘁國事，所得僅衣服、書籍、居宅而已。

第一章 革命的聖地

大約在民國紀元前四十年的光景，廣西香山縣一個山明水秀的小村莊，是那樣的靜寂和清幽，百餘家坐西向東的村舍，前面和右邊是蔥蘢的樹木，左邊的高多叫做鑽頭尖，後面隱約可見的一抹橫峯，就是五桂山的崗巒。右邊一帶樹木之下還有一條清溪，清溪之外又是幾個青山，青山之外便是渺茫的九洲洋西岸了。這樣有山有水的地方，真是像一幅絕妙的圖畫。這裏住的都是質樸的農民、漁民，和幾個從外國經商回來的僑民。

這時候，雖是距離歷史上有名的太平天國的覆亡，還是很近，政治的震動和社會的騷亂，還是在繼續發展中，但是在苟安偷懶的人們，依然度着他們平靜的生活，沒有覺醒到新時代的到臨。

農村裏的居民，向來是在勞動中去消磨他們的時間。有時候，我們看見他們很愉快的閒談着古往今來的事情，才知道這是他們工作停歇的當兒，也就是他們享樂的時候。這是某一天的傍晚，田野裏的事情，已經完畢，蒼鶯叫聲漸漸的籠罩着全村，村裏的人們，照舊大家聚坐着閒談起來。有一個額上滿堆着白髮的老頭兒，正他們前面振出勁的像演說家一樣滔滔地說着，坐在旁邊的人，也很聚精會神的去聽他的言詞，因為他們都想從這個老頭兒身上去找一點關於太平天國的故事，做他們的消遣。他是這個村莊裏男女老幼都認識的太平天國的老兵，同時也成了全村最歡迎的活話匣子了。

這老頭兒的話完了，大家也就漸漸的散去，但這時候，有一個小孩子，站立着不動，兩隻神采奕奕的黑眼晴，對着這老頭兒發出奇異的注視，老頭兒也很奇怪的看他，並且很懇切的說：

「孩子！你是很好的，你將來一定能擔當這個大任！」

「我不能明瞭你所說的大任，如何要我擔當，又怎樣擔當到我的肩上來？」

「你可知道中國現在的操權者，還是滿洲人麼？」

「知道的，是滿洲人。」

「你不是漢人麼？」

「豈然是漢人。」

「我們都是漢人，怎麼還要做滿人的奴隸呢？」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疑問，只是沒有人替我解說，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甘心受滿人統治？」

「滿人用種種壓迫而禁錮的手段，置漢人於萬劫不復之地，便是不甘心也只有隱忍啊！」

「難道就沒有人起來反抗麼？」

「只看誰做洪秀全第二。」老頭兒很感慨的說。孩子聽了，不覺鼓舞奮發的說：

「這樣我一定擔當這個大任，我做一個洪秀全第二。」

老頭兒愉快的聽了這孩子的回答，他慢慢的走回去了。

這孩子約摸有六七歲的樣子，穿着很整潔的衣服，有很端莊的舉止，要是我們從他的外表看來，會當他是十歲以上的大孩子呢；他就是未來的偉大革命領袖，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孫先生的家族，住到這可愛的村莊裏，只有四代的光景，在這時期以前，他的祖代，因為受了戰爭的紛亂，生活的壓迫，不斷地遷徙。他們從遠代的友松公在廣東紫金忠壇公館背村立下了家庭的基礎，才開始做了廣東人。孫先生在少年時代，曾經在火奴魯魯住過相當時期，因此很多人對他的籍貫不甚清楚，他有一次答覆林百克(Paul Linaker)說：「我和我的幾代祖，的確是在翠亨村裏的。不過我家住在那裏，祇有數代，我們的宗廟，都在東江的一個張公村(King's Kun)裏。」這張公村三字，到最近經過了多方面的考證，才知道就是紫金縣忠壇的公館村(見羅香林著 國父家世源流考)。

到了明末清初，粵東義士輩起了反清復明的火炬，抵抗清兵入粵，忠壇為琴江都小盆地，東西南三面，羣山環抱，威燄天然屏障，易守難攻，是茶家必爭之地。因此在這裏由於鍾丁先的領導曾經展開了劇烈的民族血

數，不少的漢人在清兵壓成之下，遭受殺戮的慘禍，剩下來的是有流離失所。孫家的人，也有不少參加過元末的農民。事變過後，他們就從紫金遷到增城，那就是十二世祖連昌公，這是孫族向廣東中部遷徙的開始。

但當時紛亂的局面，還是不斷地發展着：滿清政府雖乘明室內訌而奪取了統治權，四方志士，依然到處發動義師，抵抗到底。如鄭成功張煌言等的據廈門、金門、會師金陵，前仆後繼，壯烈奮鬥，堪爲滿清政府所頭痛。他們到了最後無辦法，還是退保孤懸海外的台灣，作爲復興的根據地。滿清政府爲要根除這民族鬥爭的大患，就對台灣採取嚴密封鎖的辦法，下令遷移沿海邊界，爲堅壁清野之計，企圖困滅成功，於是閩粵浙等省瀕海居民，老弱轉死於溝壑，少壯流離於四方，虛舍盡燬，膏沃廢棄，造成了空前慘劇。但滿清政府對這種殘酷的政策，並沒有阻遏了鄭氏的獨立，反使戶口虛耗，物力減損，使東南各省的經政，蒙受嚴重的影響。因此過了不久，那些比較有肝膽的疆吏，不忍坐視，先後奏請復界，移民開墾，於是廣東北部農民與昔年抗清義民的遺散者，都漸漸地向瀕海一帶去移殖。連昌公也在這時，又從增城遷到中山（舊稱香山）縣港口門村，度着他們的殘餘生涯。這是大約在清初康熙中葉的時候。一直到孫先生第十四世祖耀勳公，才又從港口門村遷到這小小的村莊來住。我們不要忘了這個將永傳不朽的聖地的名稱，它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叫做翠亨村。嶺南的這它和孔子的曲阜，耶穌的耶路撒冷，同樣的受到後世的追慕和尊敬。

中山縣是在廣東灣的粵江口，前面臨江，後面出口處有一個淇澳島，形成了一個灣勢，叫做金基灣。地處廣州香港澳門三商埠之間。這翠亨村距離縣城大約有五十多里，從翠亨村到澳門約有七十里的路程，到廣州省城也有一百三十多里的路程，香港便在它的東面，處處相對。這金星港口，因爲有淇澳島做爲屏障，是一個避風的良好港，那時滿清政府不准外國船隻停泊，特指定金星港爲外國輪船停泊之所，所以那時當面商業成興中葡和南洋交通的樞紐。從歷史上的地勢來看：古代東西交通的孔道，向來是一面有北方陸路，由小亞細亞，經帕米爾高原，下塔木里河，從新疆由廣等地通到中國；一面由南方海路，由波斯灣，阿拉伯海，經印度洋，入從廣東以入中國。自六朝時起，是海路的繁榮，幾千年來，北方陸路，是爲了交通而繁榮，南方海路，是爲了交通而繁榮。

一個使人補足生氣的冬天，並且或者也可以看見一些細微的霜雪，因此它具備着溫帶和熱帶的優點。孫先生就是在這一起的氣候，這種體魄的農村生活中，長成了一個強壯的靈魂，獨立不羈的雄辯和靈敏。他們在本少時同鄉海外去冒險工作和經商的，尤其是僑居美洲的最多。他們愛種族愛國家，更有團結互助的精神。所以廣東人的足跡，幾乎踏遍全球，而他們的團體都是非消滅不。孫先生在長期奮鬥中，在海外的廣東僑民，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會替他盡過力的。而從孫先生的家世和故鄉的歷史來說，孫家的遠祖，曾經參加反清復明的民族運動，並且在滿清政府的壓迫之下，受盡屠戮流離的痛苦，因此民族的意識和反清的思想，在孫家歷代相傳下來的子孫腦海中，都留了很深刻的印像。孫先生的祖姑姊四姑太太，曾經告訴人家說，她家的先人，在清代從來沒有人去應舉覓官，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孫家從增城遷到中山，又在中山的港口再遷到翠亨，住在這些地帶的農民，和孫家同樣的曾經參加抗清義師而遷居的，或從沿海各地反清復明的天地會（又稱三合會或洪門會），也挾與俱來，雜跡而居，各懷身世，影響所及，就和東南沿海各地反清復明的天地會（又稱三合會或洪門會）發生了共鳴的作用，而中山縣瀕海會被遷居的鄉林和島嶼，更演為天地會在廣東的樞紐。據同治香山縣志記載，道光時代三合會再起的首領，就是翠亨村毗隄的石門甘秀。這是初期的中國民族運動的祕密組織，對於以後孫先生的革命運動，也有很大的關係。

在時間的進展上，已經安排到了另一階段的新局面。這像萬萊爾（F. H. Carr）所說，「一堆乾柴死寂而然料，等待着（上天）放下來火焰把牠燃燒起來（Ignited the powder）」。在火燭開演前四十六年（建都）的翠亨村，誕生了中山先生，舊時代開始沒落下來，他就是一種火種，準備了幕布，到光明之路。新時代的世界史上，孫先生是永遠佔着極重要的地位，誕生孫先生的廣東，也永遠被人家所紀念。

第二章 孫先生的家庭

孫先生是誕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清同治五年丙寅，即公歷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四點鐘，即夏曆十月初六日寅時，名文，字德明，又字逸仙，外人也通以孫逸仙(のび)と云々稱呼生。先生初生時，因為父母特別鍾愛的緣故，曾取翠亨村北帝廟神像的名字，各孫先生爲象，字日新，又曰帝象，這是希望神明保佑，速其成長的意思，也是一種風俗的表現。中山一二字是先生三十二歲亡命日本時，爲避人耳目所用的別號，但後來就成爲舉世共知的大名了。此外，先生爲便利奔走革命，也有好幾方隱姓埋名，我們打算暫在後面再提，這裏不必細說了。

孫先生的父親達成公，名觀林，號道川，他是嚴毅公的第四世孫，是一個最和平忠厚，公正廉明的鄉民，待人很慈祥和藹，在那里中是很受人敬愛的一位老人家。他和孫先生的祖父敬賢公具有同樣的性格，善能辨難解紛。現在翠亨村中的長老，幾能清晰的記憶，他們說，那裏的住民都是在很早以前由各地方遷來的，常常爲了源流不同而引起爭執，達成公和敬賢公，總是出來公平調息，決不偏袒那一方面，因此身爲鄉中各派所愛悅。他在早年時候，曾經到澳門去做裁縫工，有時也充當鞋匠，每月工錢四元，一年統共四十八塊錢。當時澳門在葡萄牙人經營之下，他們利用了窮的中國人的勞力，富的中國人的資本，建築了這個樂園。有設置彩色的建築，深綠色的海水就像做了邊綠，點綴得五光十色，富麗異常。那裏有淫蕩的妓院，富人的酒館，賭場煙窟，滿佈着街道，絃管笙歌，通宵達旦。多少年輕的中國人，一到這繁華靡麗的地方來，都沉溺在酒色煙賭之中而墮落了。但這個將來要做一個全時代改造家的父親的少年，他始終認澳門是一個可怕的羅網，他厭恨這淫蕩腐化的環境，本着他純粹的自愛心，他毅然離開這些繁華的娛樂場所，跑去享受那卑賤勞苦而潔淨的鄉村

生活。

達成公回到故鄉以後，仍舊從事農田的操作。有時也替人家鑿籬，來補救農耕的不足，雖是僅有二三畝的田園，但種菜養豬是儘夠的。他常說：「無豕不成家，要造成一個家，是離不了養豕的。」總之，他是極滿足他的農村生活的。過了幾年，他和楊太夫人結婚，便是孫先生的母親。她是生長在離翠亨村不遠的隔田鄉，楊騰輝公的女兒，是一位慈祥端莊而賢淑的夫人，她的下頰稍尖，眉清目秀，雖到老年時代，還是很健康的。她小達成公十五歲，這時才有十八歲，達成公已經有三十歲了。他們結婚了九年，才生下了孫先生的大哥德彰公，名眉，字壽屏，接連着又生長女金星，次子德祐，名典，次女妙西，差不多中間都隔了三年才生。金星和德祐，都是幼年夭亡。當孫先生誕生的時候，距離妙西姑姑太太也有三年，那時正當達成公五十四歲，楊太夫人三十九歲。孫先生的祖母黃太夫人也在，大約是七十四歲。

楊太夫人持家教子，是達成公的賢內助，她對孫先生的教養，影響甚大。據妙西姑姑太太的回憶，孫先生生幼年時，最歡喜和人打架，他看見其他小孩子給人家欺凌，就大抱不平，奮勇攻打，到衆寡不敵時，也不退却。因此常常扯破其他孩子的衣服，楊太夫人一面嚴責孫先生，一面就替他們補好衣服。孫先生自小就反對賭博，有一次，許多小孩子在祠堂裏大賭博，其中有一個年已十七歲的大孩子楊帝卓，正在那裏呼盧喝雉，孫先生去拉他的辮子，勸他不要賭，楊帝卓認爲拉辮子是要敗賭運的，很不滿意，後來果然大敗，就捉住了孫先生，把他的頭向壁上猛撞，撞得孫先生財痛氣絕，不省人事，經許多人勸止，並塗以藥粉，才蘇醒過來。楊太夫人知道了這件事，親自來帶着孫先生回家。在平時，孫先生和人家孩子無理毆打，必定喚回去鞭責一番，這一次因爲曲在楊帝卓，沒有責罰孫先生。

達成公有兩個弟弟，一名學成公，曾經在上海做工，在孫先生出世前的三年，就在本鄉死去了。一名顯公，是翠亨村裏到加利灣尼亞探金區去最先一批人中間的一個，但當孫先生出世後一年，他死在異國的暹羅，耗使得到他們家裏，使他們情緒上受了極度的刺激。達成公便開始與担着他們兩個已死兄弟所遺下來的遺產的

生活。孫先生在幼年時代，就和祖母、父親、母親、姊姊以及兩個可憐的叔母同居。他們是極其和愉快和愉快的家庭。姊姊與姊姊之間，極其友誼之義。但是因為兩個叔母的妒忌，他們都一病一死。他們的小孩子再到洋人危險的地方去；他的叔叔常常流着淚，像說故事一樣的說起洋人可怕的事情。這些外國人穿的衣服，很是奇怪。最奇怪的便是他們頭上都沒有髮辮，有幾個竟一絲兒頭髮也沒有。但是有幾個人一般紅的鬍鬚。據人說，那些外國人是用鋒利的刀子來吃東西的。她並且說，她曾經親眼看見有幾個外國人用的槍裏出來。因此她見了那些洋人，心裏實在害怕，她主張善良的孩子，應該遠遠的離開他們。因為那些洋人十分暴躁，是不好惹的。她永遠紀念着她那冒險而死的丈夫，因此總是警誡年幼的孫先生不要和洋人接近。孫先生的父母，自然也同情她們的主張，但他們夢想不到，這一個年幼的小孩子，終究在中國找到一種覺悟，使中國脫離數千年的專制政體。他那時實在並不因兩個叔母的冒險的失敗，而阻撓了企慕用洋人的覺悟將來一定到洋人危險的地方去，勇敢地去做成成功的冒險，並且無論如何，總要想出一個法子來，使得全家的人贊許他的冒險。

一直到他的大哥德彰公到距離利福尼亞一半路程的夏威夷的火奴魯魯 (Honolulu) 他才預伏到了外國去的機會。這火奴魯魯因為出產檀香木最多，後來通商就改稱為檀香山 (Shanghai)。那時他只有六歲，眼望着他哥哥的遠行，真有許多說不出的羨慕和幻想。德彰公這時歲年紀，才有十八歲，他的性格，聰慧的頭腦；但是自小不肯念書，一天到晚，總是吞外面嬉笑頑皮，所以父親是很討厭他的。那一年，他那在火奴魯魯與他的母親，剛剛有事回國，遂成公因為家裏很窮，兒子又沒有長進，就氣呼呼的請他的母親帶他到外國去。遂成公的意思差不多是不要再看見他的兒子了。所以德彰公的出洋，原不是出於父親的同意，不過是母親會來勸他的進失。但是後來的事情竟出乎他若人家的意料之外，年幼的孫先生到底應酬了他的在海外轉哥哥的力量，造成了他偉大的歷史。

孫先生家裏的房子，原來只有幾間很狹窄的小屋，前面有廣大的曠場，幾棵巨大的榕樹，和幾株老榕樹。古樹，做了他們前面的屏障。曾經見過孫先生父親的老輩說：連成公在沒有事辦的時候，常常坐在榕樹下石凳上坐着。手拿旱煙袋，煙吸。他的臉龐長長地，兩鬢鬍鬚，綉眼臨人有神。他的鬚眉很長，而且是復白。穿的是粗布衣裳，有時足登木屐。他總是有事在心似的沉思，有時愛講故事給我們聽。他是終老在這故鄉的。直到孫先生二十七歲做了醫生，才把賺來的錢，改進了現成的房子。七間軒敞的洋樓，圍着短小的圍牆，大榕樹便依然保存在圍牆之內。他是一座向西的房子，在全村一帶向東的屋子中，是最顯着而易於認的。

他們的祖墓，便在翠亨村前面長沙埔的黃草岡，零落殘破的甯夢中。就是孫先生高祖毅公和曾祖恆公的長眠地。墳是向東的，面對着汪洋萬頃的大海，平靜的波浪，明麗如鏡，海濤逐浪浪食。白鷺羣立在沙灘上，我們站在那邊，正是像走進了一幅美麗的圖畫，他們村裏人，常常唱着這樣的一首山歌：（見王玉著《總理故鄉調查記》）

十名黃草崗，大海作明堂。

鯊魚遊北海，旗鼓鎮南方。

金星龜水口，燕石江中央。

誰人葬得寶，黃金大斗量。

歌中的旗字應作棋，就是棋澳島，旗鼓古，就是古鶴島，金星和燕石都是海中小嶼的名稱。他們這裏這秀麗雄偉的坯土，將把他的遺蔭來產生出一個震古爍今的偉人來。不，這也許是太傑絕靈吧！孫先生的故居和孫先生先代的葬地，都留得我們思念和留戀的。

孫先生的祖母，在孫先生回國的時候就死去了，享壽七十餘歲。那時年幼的孫先生突然丟了一個慈愛的祖母，就從他的天性上流露了無限的哀痛，在出殯的那天，母親欲抱着他去送，他不肯，想拿綢帶來背着

他，他也不要，他竟用他小小的兩只腳，跟着大家很悲痛的走送；他這種孝親的至性，便激動了絕全家人的注意。達成公也是很小心孝敬他的母親，很忠貞熱誠的對着他的朋友。家雖不豐，他却一面教水承歡，一面曾經奉養過一個朋友，有十八年的長時期，他從沒有懼色和怨言，這樣一個備具着優美德性的家庭，對於孫先生的身心和品性，會永遠留着極深切的影響，這是無疑的。

第三章 在村塾中

幼年的孫先生，有七年的時期，在卑陋的鄉村學校中受教育。那學校不是現在的新式學校，它是相沿千餘年來的一個不分班次，沒有授課標準的村塾。孫先生走進了這個村塾的時候，才有七歲，在翠亨村裏的小孩子，他是算受教育最早的一個了。廣東人平時都歡喜搗木屐，但孫先生每天到村塾去上學時，總是穿了一雙藍底的布鞋和整潔的衣服才去，這是他衫身諷刺的起點。孫先生家裏的人，天才亮大家就起身，到田裏去工作，這是鄉村中很普遍的生活，孫先生每天到村塾，是很早的，回家後，有時也到田野裏做些勞力的工作。他幼時雖是勞苦些，但是很快樂，也常覺得有新奇的興趣。他也願意快樂和知足，終身過那清幽的鄉村生活，只要像翠亨村的幼年時代就夠了。他何嘗天生就願意去做一個革命的領袖，受革命生活中種種的危險；也並不喜歡做那大政治革命的工具，去造成那種革命流血的慘劇，但是責任的命令督促他，終於不准他回復他那翠亨的鄉村生活了。

那時翠亨村地方，雖是沒有什麼能夠發揚志氣的事情，但是孫先生從母親是很賢慧的，父親是很正直的。孫先生曾經告訴人家說：「我的母親很慈愛的，我的父親也是很好的；家庭中雖是守舊一些，但是古樸可風，另有一種美德存在着；這種美德，是適合於人生道德的。我因為要博得他們的重視，所以一心上進。我的母親希望我讀書，對我的信仰，和全村人的敬禮，使我自己得以身心愉快。」確然的，孫先生的優美的德性，

大字是得之於他的健全的家庭。孫先生的母親，雖也免不了中國古代遺傳的迷信，但是他的有力的心靈，終能証明感導。孫先生，養成他領袖的天才，引伸他的同情心，到中國的全民衆，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我們在這裏可以說：世界上決沒有比真理更大的宗教，也沒有比賢母更大的感導力。

村塾中，對於年幼的孩子照例的誦教他們高聲朗誦三字經，這就和現在的小學教科書是一樣的算作學童的課本，但那時是用機械式的方法強迫他們背誦記憶。孫先生過了一個月以後，他幼稚的頭腦，已覺悟到這種教授的不合理，於是大胆的起來向教師反對道：

「我一點不懂，儘是這樣唱有什麼意思，我唸它做什麼？」

教師驚駭的站起，拿了一根夏楚，在手中掂量，但不一回他的手放下來了，因為他正在思索，文是全塾中最於背誦的，打他似乎不能使人心服；而且文的父親，是村中的長者，恐怕也不便如別人一樣對待他。於是教師揮動他的夏楚，可怕的喊道：

「什麼！你反叛經訓嗎？」

「不是，我並不反對經訓，但是我一些不懂書中的意義，為什麼要天天這樣無意識地唸呢？」孫先生的敏捷的回答。

「這就是大不敬，就是反對先聖賢之教，」教師可怕的说。

「但是我到學塾裏來，是要先生教我的，而我竟不明白我所讀的。」孫先生仍然抗命回答，教師不勝震驚。

那時，孫先生比較別的事更有進步，所以他也已有所知先聖賢者學問的心理，因又說道：「可否請先生明白告訴我，使我知道書中講的是什麼？」

教師的心軟下來了，他以為這是例外的事情。但是年幼的，孫先生又對他解說：「世界上無論什麼事情，都有理由的，為什麼這種文字沒有意義呢？」教師沒有耐性了，孫先生揮鞭反駁，竟把他深入經書的意義

得性，便時時去打，未了還那二人打出傷長庚，做勝敗的決斷。破甘肅是先把甘肅扶孀立地，心手一歸，乘他沒有着地之前用神靈方術變去，變得甘肅最大的心便算勝利。孫先生在各種遊戲中，常常做了孩子們的領袖，有時着了魔，幾乎廢寢忘食，但是他們的老師，常常教訓他說，勤有功，嬉無益，他是不主張學生們玩法濃的遊戲的。

孫先生也很喜歡游泳和騎馬的，距離孫宅不遠的地方，我們看見綠葉茂密的兩岸，清澈晶瑩的水流，他曾經在這裏很愉快的遊水，妙西施未至全還是積，孫先生少年時期的善於泅水，她說：孫先生像一隻入水的青蛙，翠亨村中的任何孩子，都比不上他。真的，他是一個多麼活潑而精強的孩子？騎馬的機會是比較少些，因為依照那時，孫先生的家境，買一匹馬是辦不到的，孫先生祇是看見人家騎着馬在他面前走過，表示非常羨慕。偶然從朋友方面借來騎一下，但當孫先生初次試騎的時候，就驚穩貼自知，縱橫馳騁，氣概英武，神色怡然，儼然是一位少年將軍了。

他在許多學業中，是最有思想而英敏的一條，經過幾年書本的誦讀，他的智慧顯然的進展了。因為常常聽到年長的親戚總是表示極贊的稱讚，是用以稱頌皇帝的，他有些奇怪這樣的稱頌，就要求他母親解釋，他問得很高深是怎樣長久？」

「這是極長的時間，沒有二個人知道的。」母親的解答。

「既沒有人知道這樣的長久，那稱頌皇帝為萬歲，不是一句騙人的話麼？」孫先生從幼小的腦海裏，道銳利的判斷了這問題，心便逼着問着他母親的話。

這有三次他問母親道：

「青天無色，難道新皇帝麼？」

「這是青天無色，難道新皇帝的飯碗麼？」

「但新皇帝的上面還有別的東西麼？」他更進一步的問他的母親，他母親不能回答了。

他又問：

「人死了以後怎麼樣？」他母親聽了，連聲說：

「死了種種事情都完結了！文！」

「但是我死之後，不要我的生命就此完結。」孫先生十分肯定的說。慈祥的母親很奇異她的兒子的答覆，她撫摩着他的頭，很愉快的說：

「你讀書很長進了，文呀！」

亞里斯多德說過：「哲學起於懷疑」。大思想家的幼年，都是經過一個對於宇宙和人生的懷疑時期。笛卡爾充懷疑一切，才建立他的哲學系統。希臘的比羅（Pytho）和法國的巴斯噶（Pascal）都是澈底的懷疑主義者。朱子幼時，曾問他的老師說：「天外爲何物？」老師囁然不能回答。從前印度有人問他的父親：「人生在地上，地在什麼東西上？」父親說：「地在鳥龜上。」又問：「鳥龜在什麼東西上？」父親使不能回答了。這種懷疑好問的精神，是大思想家的基本精神。幼年的孫先生在靈敏的思想發展過程中，和其他大思想家一樣的進入了懷疑時期，於是正開始探索如笛（Pytho）所說：「人類傳說中所遺留下來的諸問題，任何時代的男女，都曾加以詢問」的問題。

第四章 翠亨村裏的風波

孫先生任村塾中教讀千餘年來的經驗，也覺得自在，但年紀漸漸長大起來，智識也跟着增加了，他很想在本村以外去找一些新問題。尤其是關於政治的問題，以滿足他的智識的飢渴。但當時在滿清皇朝之下，人民和政府關係，只是那「嚴刑重罰」，此外人民便絲毫沒有參加政治的機會，翠亨村的人，只有看見滿清兵士的威嚇，和官員的暴虐，他們不知道政治是怎樣一回事。因此，孫先生除了讀書以外便無從知道政治的機會。他

看見他的父親，處理家事，井井有條，所以他以做父親的天才，自信這一個大家庭，只要各人互尊各人的權利，接受家長治家的規則，便可以各人的自治，維持家庭的治安。如果在這樣許多家庭之上，有了一個政府，也只要各家庭各尊各的權利，也就能夠治理得井井有條。這是他幼年時認識政治問題最早最粗淺的雛型，他是從孔孟學說中懂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所以從治家體認到治國的道理，是那樣的簡單而易。但只有這些，已經可以知道他是怎樣向富於政治天才。他那時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教他懂得政治的，雖有人講述太平天國的故事，也是很含糊的。所以他只有從家庭政府與滿清統治兩相比較，使完成他的獨立思想。

一直到翠亨村上海盜的事情發生，才做了他的實物教課。

那天，孫先生正在村塾裏唸書，忽然外面起了極大的賊殺聲，伴着玻璃窗碎石碌，震動着全村；直到曉得了水盜劫掠一個由美國回來的僑商，大家才驚魂略定。廣東的水盜，是最狂惡而殘忍，那僑商從外國發了財回來，也知道這些水盜的兇惡，所以建築了堅固的住宅，水泥的牆壁，鋼鐵的大門，以為就有水盜到臨，也攻打不進，可以高枕無憂了。但是這班水盜，這一回竟然得到很不容易的成功。他們用了極粗的硬木，把繩子繫在一座三脚架子上面，十幾個彪形大漢，將垂下的粗木的一端，向那高大堅固的牆壁上，一些不放鬆地猛撞，砰然的聲浪，震動着耳鼓。那僑商的笨拙思想，倒底被水盜這樣兇猛的方法所打破，堅固的牆壁隨着粗木的猛撞一塊塊粉碎下來，他們踏着頹垣殘瓦，蜂擁而進，將他辛苦掙來的錢財，完全劫去了。

水盜用粗木猛擊的巨聲，把翠亨村的人都陷入了恐怖之窟，震恐的母親們亂嚷亂找着他們的孩子東藏西匿，村塾裏的教師和學生也都四散了。但是年幼的孫先生勇敢的不為所動，一步步往前走，毫不遲疑地到水盜搶劫的地方去，他的臉上，沒有一些驚慌之色，他站着，不怕水盜的兇猛，不怕紛飛的木片，也不怕雨點般的碎石。前後牆垣倒了，水盜掠過了他的身旁，衝到裏面去搶劫，他們歡呼着出來。他一幕幕看着，幼小的腦中，激起了不平的波浪，他覺得這種橫暴的行爲，決不是合於正理的。他目送水盜揚長而去，臉上起了一種鄙夷不屑的神氣。

過了一周，這僑商哭喪有臉，亂髮蓬鬆的奔出來，大喊着：

「我完結了！我在外國所積聚的，都被萬惡的水盜搶去了！如果我不回來，那外國有法律保護我，就不會遭這劫大劫！唉，我悔恨不及了！」

幼小的王先生聽了這僑商的呼喊，很奇怪的回想：「外國有法律，難道中國就沒有法律麼？這僑商冒了生命的危險掙到金錢，帶回中國，爲什麼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村裏的人們對於這樣的悲劇，一向認作和不能避免的禍害像蝗蟲水旱一樣，除了主張把錢收攬起來，免得強盜覬覦以外，再沒有比這更積極的議論。悲劇過去了，把愛忍的人心鎮定了，就像夏天的陣頭雨，雲散雨歇以後，會無絲毫影響這世界。但這年小胆大的孫先生，從這被擄的屋子回到村塾時，心裏浮起了一種嚴重的感覺，他反覆的暗想道：「外國有法律，難道我們中國就沒有法律麼？」

這一幕悲劇發生了不久，第二次的實物教課又來了；這便是官吏壓迫富人的一回事，使孫先生更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

這事情是發生於一家兄弟三人的花園裏，他們三弟兄在聚亨村裏是受到全體村人的尊敬的。他們幼年很窮，後來到加利福尼亞去做了許多年採金的工人，也就積聚了很多錢，回到聚亨村來，便是富翁了。他們三人很友愛。待人也很忠厚和藹。他們成了全村的模範人物，許多家長教導他們的子弟要效法他們。孫先生在村塾教學後，常常到他們花園去玩，那裏有燦爛的花木，悅耳的鳥鳴，很能引起孫先生的興趣。達成公和他們三兄弟是很親熱的，所以孫先生對於這三兄弟也很尊敬。他常常留連在這花園裏。

有一天，孫先生正在園裏玩耍的時候，忽然來了數十名滿清的精兵士，還有許多衙役，與佩刀的軍官，將這住宅和花園，包圍起來，把他們兄弟三人一齊拘住，上了手鐐腳鎖，像押着稅宰的豬一般，解去受訊。孫先生弄了，從正義發出的不平的憤怒，是一種本能的衝動，他說：「他們三兄弟是受有全村人尊敬的，他們都是好人，他們不會犯什麼罪的；就是犯了罪，也不該用這種殘酷的手段！」義憤填胸了胸臆，他竟鼓着勇氣，

一無畏懼，向一個軍官責問：

「這三個人爲了什麼罪名，要將他們上起刑具來押了去？」

軍官沒有回覆他的話，跟他來的如狼似虎的兵士，却么喝起來：「誰家的小孩子，搗開些！」

三兄弟被押了去，幾個軍官竟留在那裏，估量了他們的財產和家宅。後來聽說三兄弟中的一個，竟在廣州被斬決了；還有兩個，也呻吟憔悴於獄中。這些軍官對於三兄弟這樣的暴行，目的是在掠奪他們的財產，就不惜把他們殺害了！寒亭村的人，沒有一個不痛恨這些貪官污吏的毒狠，却沒有一個敢說出口。孫先生不平的心，從沒有平靜過；倘有一個不能答覆他自己的疑問，便去問達成公：

「爲什麼官員就有這種無上的權力，能夠拘人殺人，奪人財物，而不顧誣陷善良？」達成公只有嘆息着，搖搖頭，也不能答覆。

他目視了這兩幕大惡劇，幼稚的腦海裏，常常盤旋了有什麼似的，他想解決自己的疑問，但沒有一個適當的答覆，他所受的教育，是不能使他了解一切的。金村的人，只有對極的憤恨，和暴力的不能防止，這些都是毫無疑問的，是永遠不能指示可他一條正當的路，他是煩悶極了！這煩悶，直待到他智識所能了解時，便成了他革命的種子。

達成公是一個善良而守本分的農民，他雖是負擔了很多不應繳納的賦稅。但自始終抱負納稅等於納捐海盜以求全的見解，每年按明繳納。可是他們這些納稅的地田，早在好幾代以前賣給他人了，因爲當時怕到官廳去轉受刑罰，便繼續負擔了付稅的責任。但時代的變遷很快，人事也不同了，這些地田已經又變換了許多主人，他們再不能去追求真正的地主的賦稅，這樣達成公是負了一個龐大負擔，這困苦的情形，是像被惡毒毒果一樣，全家人的心裏，都覺得非常寬厚，除了納捐繳稅的苛重以外，沒有別的方法，比較永久補救的辦法，就是到官廳去換新契，那便要費一筆龐大的家產，是他們家裏經濟狀況所不能辦的。孫先生從達成公憂愁的臉容上，知道他有這樣一件心事，屢次自己勸他：「爲什麼那些官員對於人民地產的轉移，要這小動家重費

，而數人家做這種白契的權宜方法，使已喪失了田地的人，要負了復舊的納稅責任？這種不公平的法律，為什麼竟能容許它存在？」他想要有一個澈底補救的方法，他向孫說：「根絕切的高着。」

「沒有的，文！沒有補救的方法，因為這是一條死路。」

「皇帝麼！他的權力是怎樣的？他為什麼能稱這國家的統治，簡潔的官吏，和不公平的法律呢？」孫先生這時反覆的在心中默想，但沒有說出來。他漸漸地想通了，他知道中國的皇帝是滿洲人，他想這一切問題，也許就是因為不是中國人自己操權，所以塞留了這許多罪惡，他似乎找到了一個滿意的答案。他安慰了年高勢苦的父母以後，面上現出了愉快的笑容。

滿清政府是腐敗的政府，是應該要反抗推翻的；孫先生經過了這許多深刻的教訓以後，是堅決的認定了，但是把他推倒之後，有什麼可以替代他呢？因為他完全不知道開明的國家是怎麼樣的，他從來沒有同外國人接談，也不知道外國的事情。他承認改造的進行，必須要尋求較現在更好的方法，才能使人滿意。他從他叔母所述的洋人事情和他哥哥在海外的生活，他便懂得有外國的一切美妙景象，他到外國的意念，這時候更堅決而迫切了。也像飢渴者的需要飲食一樣，很迫切的需要新生命的獲得，做將改造的準備。

第五章 海外的哥哥

現在我們應該說到在海外的孫先生的哥哥孫彰公了。這位彰公自那一年到檀香山以後，到現在已經有整整地七個年頭了，在這長時間中，他竟已有出乎意料之外顯著的發展了。他從香山到華埠村的路途沒有別。德彰公去後快了一年了，才從一個月內，便成了信問來。他從香山到華埠村，安到了檀香山，並且很是得意。這便造成他對外國的熱忱，因為他兩個已死的弟弟，都成了外國的僑民。孫先生知道哥哥的平安，使他對於出洋的企

隻三寸長的輪船開着法號，記姓裏明停泊着準備着。在這無窮的蒼茫中，草草地在遠處的海面上，一切在頭。這倒像有神的指示一樣。這道符號，在海面上，他得聽着那大兒子在海上的一切。她慈愛的懷念中，她決定要到嶺南山去，看一看她大兒子的靈魂，才安穩了老人的心。孫先生終於得到了這個絕好的機會，於是很有理由的要求他母親帶他同去。他這公是沒有話可以阻止了，這久抱宏願的孫先生，因此開始離開了故鄉，走出了關門，而奔涉南洋了。

這是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公歷一八七八年）的事情，是正當 孫先生十三歲的時候，他從水道到澳門；這是祖父親早年做過的地方，他見到繁華的景緻，差他的氣氛。雖然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但他從天才的感觸，和經驗的培養，他便和他父親一般的要感這一切，他竟不顧上岸去觀望。就這一步走上海峽，去輪船。這是他第一回的難家；在連汪洋萬頃的大海止，尤其是見所未見；浩蕩的白雲，蒼藍的天空，海水與天空相連，茫茫地一望無邊。輪船很快的開行，掀起了白沫的浪花，那浪花衝到船上，發出拍擊聲，像巨獸的吼，和着海風聲中不斷地傳送，這偉大的景象，切實展了他的胸襟，他對於未來的無量，像這輪船鼓着輪子一樣的不畏地前進。正如他後在理想國（Utopia）中所說，一個大從小，踏踏遠方的地方，長大成人，忽然一天，有人家標到了高空中去，日出。他這怎樣的高奇！他的感覺像嬰孩般自由。無奈。他的知識卻像成人般的成熟，孫先生就有這樣的情形。他在這航行中，那船上精巧的機械和奇異的汽鍋，自然引起了他的注視和探索的興趣；但使他越觸越深的，便是船上的帆索；這是極其精巧的構造，使船更加堅固的。在他看起來，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想這麼重的一個帆，要多少火機可以把他裝配好？他又想到發明帆索的天才，和應用機械的方法，都發現了外國人的聰明，他立刻覺得中國像一隻停滯的鐘，應當急修修理，而使這隻鐘為適時的進動。他這還沒有看到我們本國長城的偉大，古代工程的奇偉，所以驚異於這幾個鐵架，但是他在幼年的腦海中，已經深深地覺到中國文化的停滯狀態，正需要新的推動的機軸，因此那船上幾個平常的鐵架，也不能選擇他的注意，他的感覺是怎樣的銳敏啊！

但是第二個奇異的印象，又觸動了他的感覺了，這就是海葬水手的一回事情。這一天有一個船上的水手，忽然病死了；在他的屍體剛冷的时候，他們已經把他懸在一只很粗的帆布袋裏，放在甲板上，再把鐵錘在裏頭，以增加他的力量，又把一面顏色鮮明的旗包着這布袋。裹殮好了，船主從一本聖經中讀了幾句，悻然一聲，水花四散，這水手的遺體已到海中去了。

他那時因為不知道船主所誦讀的是聖經，又因為不能說英語，不知道這是一種英國的風俗。他看見他們對於死者這樣的殘忍，心裏很覺得反對。這船主有什麼權力可以把屍體拋入大海中呢？他這樣的在暗想。依照他的宗教觀念看起來，這樣的對於死者輕忽，是有損神明的，是野蠻的舉儀。他開始發現外國人和中國人不同的道德觀念，而外國人是這樣的殘忍而野蠻，他覺得他將要到一个與中國理教不同的地方去了，在憧憬的希望中，不免有些惘然了。

船上滿載了中國僑民，但是在他們的中間，找不着一個親密的朋友，他只有和慈愛的母親講話。可是嚴厲的教訓壓在他的心頭，他老是不斷的獨自思索着。他從奇巧的機械的應用上，贊歎外國人的好處，但以傳統的道德觀念來判斷，他又反對外國人的殘忍野蠻，這樣矛盾複雜的思潮，充滿了他幼小的腦海裏，他那時不想有一個具體的解答，他想在未來的實際事物的研究中，必定能夠發現一個真理的。在這二十餘天的航海行程中，他除了陪着母親瀏覽着海洋的風景，或者在甲板上玩遊以外，他大部份的思想，就浸潤在這樣重大的問題中了。

太平洋上的大小島嶼，正像星羅棋佈，一個個都好似在歡迎着輪船的開來，從船上遠望，都可以隱約地映到帆簾。帝國主義的列強，為要拓展他們的勢力，正在這許多島嶼上演出演好客的把戲。火藥的氣味，已蘊藏在海水的波浪中。但一個個剛從村叢中走出來的少年，他沒有博學的智識，不瞭解世界的形勢，他的注意力所及的，只在他所處的輪船上，這是圍着他的年齡和智識所限，誰都能料想的。然而他這一次出洋，是他一生最艱難變化的起點，是無可變換的。據愛德華（Edward）說：「這番變遷是增加生命運動發展的一種因素，他說

「紐約人到過德國的威斯巴頓 (Wiesbaden) 以後，就寫批評本地的薩刺知如納德森 (Sarrasin) 傳聞人見過紐約城的夜景，對於柏林夜間的幽暗，便表示不滿。美國的面會議員，在英國下議院訪問期間 (Question Hour) 旁聽以後，便開始對其本國政府在憲法上行政與立法部的分離，表示懷疑。英國人在美國的平等社會中經歷了以後，便先揮出的幾分對上議院的尊敬。因為一個社會的制度，在遠處看，或在另一民族當中看，總有些不同的。」(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chap. III) 這是很對的，一個人走出了自己的國門，回顧本國的情形，總是有很多感觸的，況且那時滿清政府的一切設施，在一孫先生早有不滿意的感覺，所以一到外洋以後，當然增加他革命的決心，豈止是一些輕微的批評概念。此後孫先生在太平洋往來的次數，不知有多少，簡直是從游歷而變為飄泊 (Tramps)，他自己說過：「約計每二年繞地球一週，到武昌起義以前，大概繞過了地球六七遍。」但是他偉大的抱負，就在這生涯中展開。中外歷史上因游歷而影響他的事業和思想傳播的例子很多，就以近代論，法國哲學家福祿特耳 (Voltaire) 的游歷，在法國革命前政治思想的發展，是有顯著的影響。盧梭的懺悔錄 (Confessions) 是在英國著作的。俄國人在一九一七年大革命前一批紀，革命黨領袖，也都是足跡遍全球。列當當未執政前幾月還僑寓在瑞士；同時托洛斯基的運動，是美國的布隆克斯 (Bronx)。五十年前，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游蹤，也踏遍了全歐。就拿馬克思來說吧，他是一個猶太人，他的生活，就完全消耗在亡命裏面，時而甲國，時而乙國。所以偉大人物的遊戲，決不是偶然的，但他們好像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從極曲折的生活中磨練出來，尤其是像流蕩的游歷生活，對內們都是很有益的。因此，孫先生這一次出國，在他生活史上是最重要的。他此後每一次走遍太平洋，遙望着點滴衰落的祖國，和虎視鷹睜的列強，我們相信，一定有每一次不同的感覺，他偉大的抱負，革命的志願，也許在這太平洋上幾次往還中更堅決而確定起來的，但這一個初次見面的印象，當然永留在他的腦海裏，這是他偉大生活實踐的紀念！

輪船直向南方開行，很迅速的前進，孫先生偉大的無憂，也漸漸發勇的進展。他到達檀香山的時間，大

清是宣統元前三十四年五月，正在廣東初夏的季節，但那邊已在籌議護法之計了。

第七章 在檀島的生活

楊太太人在檀島住了不多時候，就回祖國去了，孫先生因此跟着德彰公開始過驕奢的生活。他在島上博覽了幾處風景，都覺得出乎他意料以外的奇異，豐富而瑰麗，和平的秩序，街道的整潔美麗，人民的安適愉快，在那裏的深亭村裏，都不能容見到的。他這清新而安靜的環境裏，有想難得的感覺，觸動了他幼年的心靈。因為這是他的天賦的一部份，他只覺得要從實際的觀察中去追求真理。所以他自己並不覺得有什麼野心。林白克 (Carl Linbarger) 說得好：「為什麼大家都公認孫先生為領袖呢？那均看政治主權的中國人去或者將說，因為他的人格，他的主義。但還是說因為孫先生的意志，不是為的自己個人，來得親切一點。I can see you and his Chinese Revolution) 這是一句確確的，孫先生在檀島的生活，就是靜觀的觀察，但他自己並不覺得是一個銳敏的觀察家，並且還不明瞭自己的前程遠大。他既沒有領悟到也沒有懸揣。他惟心裏對於種種的勢力，無論是善的惡的，都是開放着儘量的收受。這是他在早年學印幼學時所為的。在當時的象徵，但是他只是安靜的，他到處靜默的觀察，便發生了改造中國的宏願，終究因為他所處的環境，展開了領袖的靈神。所以他不是一個野心家，但是他這種救民救族的志願，潛伏在他的意識之內，有一種壓力似地在壓迫着他不斷地努力，不斷地前進，他是一個不為自己只是為國的大英雄啊！

德彰公對於這一位將在未來領導中國革命的幼弟，始終是盡了愛護的責任。但是他正忙於經營他的事業，沒有機會來親自教導。在最早的時期內，他就把孫先生送到阿胡島 (Oahu I.) 去，在他所開設的一所商店裏去習業。孫先生很刻苦的學習了幾個月，就精通了記賬的方法和算盤的應用。商店中的一切，他都知道了。德彰公很驚奇他的聰明，他才知道這種生活，不能發展他幼弟的天才，他就決定要了孫先生去受以英語德語

的教育，因為在夏威夷英語是最重要的。

那時在檀香山各校中，容許少數中國學生進校的，只有基督聖理會牧師韋利斯（Willis）主辦的堂奧蘭屬學校（Iolani School），這是一堂純粹的教會學校，創辦於一八六二年十月，一八七二年選到白脫斯荷（Bates Street），由夏威夷王卡麥哈麥第五（King Kamehameha V）改換現在的名稱。孫先生在紀元前三十二年（一八七九年）的暑假以後，進了這學校。他是五個中國學生中的一個，是寄宿在校裏的；這是德彭公的黨思，因為他相信住在學校裏面，對於求學是為方便的。

在這學校裏，教授孫先生基本英語的教師名叫蘇羅門米海拉（Solomon Mehalia）。全校的教師都是英國人，祇有他是夏威夷人。他是一個有名的著作家，對於英語的教授也很有名的，韋利斯也常常幫他教孫先生的英語。

這是孫先生從事實的觀察轉變到思想影響的時期了，他很努力於他的學業，民治主義的思潮，開始湧現在他的心頭。但這是很特別的，他在美國的教育之下，却感受英國的精神。在學校中，周圍的環境，都表現着很強烈的英國色彩，所受的功課，只有英國史，而沒有美國史，一切譯本，都用英語，就是算學罷，也不講元角，分，而講鎊，先令，辨士。在高級的英語中，還夾雜了很少的拉丁文。總之，一切的一切，都是十足的表現英國的色彩。孫先生因為是一個寄宿生，很少和校外的人接觸，尤其是美洲人。那時夏威夷是一個君主政體的國家，就是孫先生的一個夏威夷教師，也是一個君權下的國民，他當然也希望他的學生像他一樣的去尊敬他的王國。在這樣的環境中，竟能產生偉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家，這不是一個詭語麼？所以韋利斯於紀元前十六年（一八九六年）在他的教員雜誌（Dicoeani Magazine）也這樣很驚奇的說：

『在可能的回憶中，帝象在學校的時候，沒有什麼顯著的特徵，足以指示着他的未來的生涯。他是無異於一個沒有精畫圖樣的因襲的習識，而從事於推翻威嚴時權力的工作。誰能料到，他這樣愛好民主政治而希望在中國帝國之內發生革命，造成像夏威夷共和國的模型一樣，是意奧爾尼學校中教出來的；而這些』

却正在朝向未來的路上走。」（見孫逸仙，中國的解放者 Henry Bond Patrish Sun Yat Sen Ltr. of China）

他這個話，大概是聽到了孫先生在倫敦蒙難以後說的。其實孫先生的變成一個民主主義革命家，決不是偶然的事情。因為孫先生始終是在靜默中觀察，他看到夏威夷國王的專制，同時也看到一部分夏威夷人民的反對君主專制和美國的宣傳民主主義，他於是從正反的事實中探索一個真理。這樣深沉的態度，和蘊藏着熱烈的企圖，而不暴露於外表，誰能瞭解他心坎的最深處呢？總之，孫先生不是一個暴燥驕奢的人，他是很以靜面和氣的，這是在少年時的學校生活中已經表現了。

孫先生在以後回憶中，對於這個時期的印象，也不十分清楚了。民國元年在廣東留學演講時，曾經這樣說過：「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種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這雖是幾句簡單的演講，但我們可以知道，在意大利蘭尼學校的時代，對孫先生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

夏威夷王國到底在紀元前十九年（一八九三年）廢去王政而立共和國。但韋利斯還是一本初衷，口誅筆伐，反對這種革命的行動，死力的擁護利路克拉克尼（Lalukalaki）的權力，而排斥和美國合併。他和孫先生思想的距離是這樣的遠；但不管這些反面的和正面的事實，當孫先生在夏威夷求學的時代，是正當夏威夷在轉變的時代，這是確實的，因此孫先生在這時代，却瞭解了自由平等鬥爭的意義。他常常聽到美國人勸告夏威夷政府，要有公平的司法制度，要教工人利用物質養茶養菸工業，他就很深刻的印在心上，暗暗地和中國比較。他那時是不是祇是看到民主主義而沒有看到民族主義，這是很難推想的，但在後來他主張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並行，也許就因為夏威夷祇得了民治的虛名而被併於美國的一段歷史的緣故吧！總之，孫先生在意奧蘭尼學校時，對於民主主義的認識，是很有影響的，無論在那一方面。

談到孫先生在學校的功課，對於英語的學習是最努力了，因此進步得非比迅速，這也許是和環境有關

，因為全校的夏威夷小孩子，除了用英語以外，不許用土語。紀元前三十年（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七號，是夏威夷王國（Kingdom of Hawaii）的獨立日。孫先生得了英文文法師第一名獎賞，並給獎賞的是卡拉羅王（King Kalakoua）。這是根榮譽的。一個三年前對於英語完全不懂的學生，竟獲得了這樣的成功。

不久，孫先生就離開這學校，轉入美國人設立的柯胡學校（Oahu College），它是全島的最高學府，孫先生想在這學校畢業後，就可到美國去進大學了。但那時，孫先生已變成一個基督教的信仰者；德彭公是篤守中獨篤道的，他深怕他的幼弟在海外住久了，沾染洋氣，是有背他父親的教訓的，因此，他對於孫先生窮氣仰耶教，很不以為然，結果，他以大哥的權力，命令孫先生回國了。

第八章 從檀島回來以後

孫先生在檀島前後住了六年，他現在又回祖國來了。但這次從海外回來重遊國門，他的感想比出國前更深刻而有意義了。他從夏威夷坐輪船直抵香港以後，就改乘了一只小輪船回向翠亨村。這輪船離開了香港口岸，必須經過一個小島上的幣捐局，於是苛稅煩擾的印象，便最先留在他的腦海裏，做了他回國後的第一個見聞。在船還沒有到達這地方以前，船主已本其經驗，勸告全體乘客說：「你們對幣捐局的人員要忍耐些，不要觸怒了他們。」果然，乘客們都接受了這個勸告，在幣捐局人員來檢查的時候，他們都忍耐着任檢查員翻箱倒篋，並且也有把禮物獻給他們的，孫先生也跟着他們一樣的忍耐。但孫先生的箱子剛鎖好，第二批的檢查員又來了，孫先生說：

「我已經檢查過了，為什麼又要檢查呢？」
「上次是收本地的海關稅，我們才是收釐捐的。」檢查員不耐煩的說。

孫先生聽了這句話，沒有回答，只靜靜地把行李打開，他們靜靜地一籌而去。他以為沒有事了，但過了一回

竟，第三批的檢查員又到甲板上來了。對着，孫先生厲聲說道：

「打開來！」

「我已經過兩次檢查了。」

「他們不過是收本地的海關稅和釐捐罷了，我們是查禁私運鴉片，保護百姓的官員。」

於是他們把孫先生的行李又搖搖擺擺的翻一下，他們才大踏步的去了。孫先生以為經過三次的檢查，當然可以過去了。可是第四批的檢查員竟又來了，這是一個軍官帶了兵士上來檢查的，別的乘客都忍氣吞聲的服從，孫先生却覺得忍無可忍了，他毅然向他們抗議說：

「我們已受過三次檢查，怎麼還要我們受第四次的麻煩？」

「我們是查禁私運軍火的，不要遲延，快把行李打開來！」軍官很兇惡的回答。

孫先生不理會他的話，決心反抗，到第四次檢查，軍官恐嚇他，要他服從，但孫先生始終是拒絕，許多乘客都勸他再忍耐一息，他仍舊不肯。

船主的願慮，不幸成爲事實了。因爲軍官受了孫先生的抗命，覺得太難堪了，於是命令他的部下，把這隻船扣留起來，不准開行。以洩他的私忿。經過船主幾次哀求，又納了些賄賂，作爲開款，才得放行，但是已耽擱了一天的路程了；全體乘客，都憤恨那軍官時帶盾，一時怨聲盈耳，孫先生趁這機會，就把他感觸所及，向乘客們盡量宣傳中國政治有改革的必要，竟獲得了一部分人的興味和同情，這是他第一次公開宣傳他的主張。

久別的家鄉，依然無恙，孫先生已經安然回來了，他們全家的人真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然而孫先生還受到新的教育，他看見故鄉的人依然比保守和愚昧中度日，和他幼時所見的一些沒有變動，他憤慨地失聲了。憤慨從馮氏宗祠前走過，那些小學生正在把三字經一句一句的高聲朗誦，他恍惚地走進了兒時的夢境。

，心頭雖然，有些不堪回首了。

他後滿心的想把故鄉改造，他不斷地向全村的人宣傳講政治的意義，尤其是黨最攻擊的貪污和腐敗，所以引起他們的注意。俄源時已經知道運用階級力量，曾經向賣水果的小販，給他同治或處豐的制錢，他不愛，因為他祇認識康熙和乾隆幾備漢字，因此祇要康熙的制錢。孫先生就把這些制錢的背面，拿來問他認不認識？他搖搖頭說：「不認識。」孫先生於是把握了這個機會，向他解釋道：「這就是康熙和乾隆的制錢，滿洲人奪了我們的江山，做了皇帝，他們不是我們中國人呀！」那人便恍然大悟。孫先生接系統宣傳民族思想，凡是聽到他的滔滔雄辯，沒有不感動的。有時也和鄉人們講地閭之理，灌輸他們新的智識，他那時已經做了一位有力的宣傳家了。

他在全村公共事業上，因為年齡的關係，沒有發言的力量，但他也會盡心竭力的做了許多規劃，如關於教育，防盜、守燈、清道、防疫等事，都算他在魏島所見聞，貢獻到本鄉來。然而村中父老們，都以爲他是被外國所誘惑而背叛祖國聖訓的狂徒，他們一致的議論他，指摘他。孫先生真像陷入重圍中的一支孤軍，他開始向老伍的故鄉苦鬥了。

在這時候，他幼年的唯一同志陸橋東，也從上海回來了，這才成了他有力的同伴。結東八年前在馮氏宗祠的村塾中，讀了不多時候，就跟着他父親到上海去，現在他父親死了，才從上海扶柩回來。他攜是主張革命的，常常帶了許多村中的小孩子，演說太平天國的革命史，和華盛頓拿破崙的故事。現在他們別後重聚，志同道合，自然格外的親熱愉快，他們於是大規模的向村中宣傳了。

這大概是翠亨村北帝廟裏北帝的生日，翠亨村金林以及附近兩男婦老幼，都紛紛的到這神像前，焚香跪拜，真是盛極一時。孫先生爲要破除迷信起見，他演說了陸東也到那邊去。他站在北帝神像前面，向頂禮膜拜

那你們看麼這老向這泥塑老廟的偶像來尋福，儘管怎樣的神力，能操縱幸福給你們，它是一塊無靈鐵塊

的木偶，我們明知他是木偶，而拿神一樣的虔敬他，這不是迷信麼？迷信就是代表人們的愚昧，是我們要求進步的一個障礙。我們希望真正的幸福，必須要把這些神像毀掉；同樣的，我們還要毀掉那高坐在北京城裏的滿清皇帝，因為他是有知識的會把這害禍我們的木偶。」

那些頂禮焚香的人，聽了這少年這番話，大家驚驚的實他是一個瘋人，許許多多驚奇的情緒的日光都集中到他和暗東的身上。孫先生不慌不忙的笑說：

「你們還相信它能保佑你們麼？它要是遇到有人搗毀，試問它有怎樣的方法來抵禦呢？它不是祇有自身喪失了保祐的力量，而歸於毀滅麼？這樣一個無知無識的木偶，還值得我們人的禮拜麼？現在我們就存大衆前面，把它毀掉，看它有沒有抵抗能力？」

他說着就朝暗東一彈走上北帝像的神座，動手把它搗毀。焚香的人都慌懼起來了，他們以為這樣的毀壞神明，將有大禍降臨他們身上，於是都逃出了北帝廟。

這是翠亨村上空前的大風潮，他們散到外面去一致咒詛。孫先生中了洋教的毒，老成的人主張把這孩子要受公衆的懲戒，於是大隊的人都擁擠到孫先生的家裏，要達成公把孫先生交出來。這年老的父親，爲了兒子闖禍，當然也很傷心，但爲面子起見，還是要維護他的短處，他向大衆這樣的說：

「這事應當算重些，神像如果真我的兒子搗壞了，當然由我負責修復；如果沒有損壞神像，是不應該責罰他的。」

後來村人就引導達成公去調查北帝像的面部，確已毀壞了，達成公要平村中父老的氣，立即把它修復。他也是向來主張敬重神聖的，他對他的兒子的蔑視，覺得再不能寬宥了，因此他很憤怒。孫先生這種行爲，孫的母親，雖然也覺得驚訝是不對的，但她在街談中還有憤憤的意味。孫先生爲求避免他父母的受累起見，他就悄悄離家了。

孫先生從檀香山回來，一直到他離開翠亨村，祇有幾個月的光景，他現在又要走到異鄉去了。什麼地方是

他的去路呢？他走出了他的奮鬥的門，他是不敢再繼續下什麼苦功的。他知道中國的革命工作，再不能隱遁了，他必須要進一步的準備他的學問和知識，他於是決心到香港去，再求高深的學問。

第九章 立志革命之始

這一次，孫先生從翠亨村被迫出走，是他一生轉機關頭。自覺是少年人的天性，因此他所受的種種刺戟，就是造成他奮鬥的第一步。

他到了香港，就進拔粹書院 (Cultured School) 肄業，同時又認識了幾個香港有名的基督教宣教師，一是馬鳳墀，他曾在德國柏林大學担任漢文教授，長於文學，孫先生就拜他為老師，發奮學習國文。其次是美國算數師喜嘉理博士，他來華多年，足跡走遍了廣東各縣，對於孫先生特別器重。據說孫先生和基督教正式發生關係，就在這時候，施受洗禮者就是這位喜牧師。

香港是中國民族恥辱的標誌，孫先生在這裏看見盎格魯撒遜民族的飛揚跋扈，富麗的洋房，建築在山巒上，有嚴密的市政組織，有經過訓練的巡警維持治安。從山巒可以俯瞰他做鄉裏的河流，恰是像一只蹲踞在中國大門外的猛虎，他開始覺得要改造中國，不但要排除滿清的勢力，並且要把香港以及其他的中國領土內，所有外國人的勢力一律排除，才能造成獨立自由的民族。

但是香港給他也有不少便利，因為這裏是滿清政府勢力所不能到達的地方，他可以以在英國法律底下自由自在。這裏是國際交通的重要商埠，海面上航行的輪船都設了空世界各國的國旗和消息。真他史地提供了他的智識範圍。巨大而莊嚴的英國電線，停泊在海中，很靜寂的，似乎在聽候英帝國政府的命令而動。他觀察了國際環境，他就不禁驚異莫爾斯國的資格，竟然得享這樣的尊嚴，於是他就深深地感到改造中國不僅是要

種經濟政府，並且還須培養龐大的民族力量。用民族的力量造成一個新的中國。

在按律監禁不過幾個月，他又轉入皇家書院（Royal Academy）他依然很努力於他的學業，這學校的教師，都是英國的上流人物，他們英語的發音很準確，因此，孫先生的英語，更得長足進展。這時候，孫先生十九歲了，變成公自他無家後，雖是爲了儲蓄價值，不免有些氣憤，但是骨肉的情誼，沒有絲毫動搖；當孫先生已經到結婚年齡了，因此，就招婿回來。紀元前二十八年（一八八四年）四月十三日，孫先生就在蘇鄉的家裏和盧夫人結婚了。盧夫人名惠貞，是香山縣登瀛羅耀先生的女兒，是一位很賢淑的夫人，她在思想上，雖比較孫先生似乎守舊些，但是歸在以後，孫先生革命時期內對於孫先生的學業，也有很多幫助的。

不久，德彰公突然來信要孫先生到檀香山去。原來德彰公爲防止孫先生沾上外國習氣而要他回國，但他在故鄉又鬧出段神的醜事，他爲要揮退孫先生的銳氣以鼓勵他前邊的神，他從前分給孫先生的財產，已經變讓給他人了，現在必須要孫先生親自回去執行。孫先生接到這消息，毫不疑遲的就到檀香山。德彰公竟直了他的不別年歲的兄弟，很慌慌的憔悴中流露了憂鬱的態度。當他們互道別語的經過以後，德彰公開始還責孫先生污蔑北帝神像的事情，因爲在他看來，這是累及父母的不逆行爲，敬祖和敬神，是同樣的重要，在人生的大事上。最後他說：

「到外國來和外國人共同工作，是好的，得到他們的尊敬也是好的。但倘使我們失去了中國遺傳的寶貝，我們不遵守禮教的遺訓，在外國所徵的遺產本什麼樂趣呢？」

孫先生很瞭解他大哥的意思，他毫無怨言，絕對服從德彰公對他財產的處置。德彰公在這事辦理完畢後，就要孫先生到檀香會經習業的阿胡島店中去，他想借這個機會來磨勵孫先生的志節。孫先生在手足友愛的愉快之下，對於大哥的命令，是絕對服從的。可是心懷裏害怕了，他雖然在檀香島店裏的勤勞所苦，條件似乎都已具備了他別項的願望，但是他學業進步，他對於德彰公的遺訓，是更覺得重要。

孝廉給慈愛的老媽，做他這次漫遊的紀念品；這是他一種孝思的表現，但也是很有風趣的一回事。

孫先生經過了許多波折，他已有更廣博的常識，闊大的胸襟，但現在又回到故鄉來了，他憑什麼才能抒展他的抱負呢？他只有無聊的在豪華的翠亨村裏，重溫兒時的舊夢。世界正在跟着時代不斷地轉變前進，但中國還停滯在中古的狀態。孫先生經過這一次漫遊，他更瞭解西方近代的文風。現在伏處在這蔽蔽的故鄉，不免有些煩悶了，在無可如何中，忽然想起了中國古代的文化，便悠悠地追慕我們祖先黃金時代的燦爛光輝，他相信我們自有傳家的寶貝，我們要改造國家，還須要恢復我們固有的優美文化，才能吸收西方新的智識。因此他在鄉居生活中，就埋首鑽研中國的歷史，這是最有意義的一件事，一個他受了西方教育的少年，重運了他祖國文化的研究。所以這時期內，在孫先生未來的思想上，是有很大影響的。雖是孫先生自己追憶起來，說這是浪費的年頭，實際上，是絲毫沒有浪費的。

這是在歷史上永遠刻着的一個時期，孫先生具體的決志革命的時期到了。正當紀元前二十七年（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的時候，孫先生在故鄉很關心戰事的消息。這戰事的起因，是爲了法國人想奪我粵屬安南，在這戰事中，滿清政府的弱點開始暴露，謹慎的廷臣，始終是和戰不定；當法國海軍艦隊長孤拔（Courbet）率艦到福州企圖在福建拋錨時，滿清的官吏，還沒有知道他的陰謀，很熱烈的歡迎他，但結果這孤拔的孤拔，却乘清廷不備，破攻馬尾，擊沉了南洋艦隊，焚燬了船政局及福州馬尾各廠臺。到這緊迫的時候，清廷才吞聲吐吐的向法國宣戰，但是法國的海軍，已經開進黃海，佔領旅順、威海衛等地了。在安南方面，馮子林、蘇元春等却正在奮力抗戰，已經克復了諒山；漢普岑練英同時也大破法軍於臨洮，聲勢很壯。法國政府受了這橫衝直撞，因此發生了政潮，如果乘勝連連，中國不是一定戰敗的。但是滿清政府突然在這時候和法國言和，派李鴻章在天津簽訂和約，竟把安南許給法國做保護國，前線戰敗的將士，還在奮勇的前進，他們都不曉得他們所爭的疆土，早已被滿清政府獻給敵人，這不但不可恥的，却表現政府的愚昧。孫先生知道和約簽訂了，他傷心已極，他痛恨滿清政府到了極點。

這是最明顯而具體的事實，給他一個很強烈的刺激，他從這時期起，掃納了過去許多複雜的思想，激起了更顯著的意識，在他的腦海裏，開始永遠的活躍着下面幾個字：

「革命！」

「排滿！」

自孫先生從察亨村農神出走到現在，是他少年時代在思想上行動上最複雜的時代，但是終於由時勢的造成，他開始發現了他真正的出路了。他從少年的煩悶時代，突進了積極的革命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他的革命前意識愈見明顯而堅強。所以孫先生自己也承認：「予自乙酉（紀元前二十七年公歷一八八五年）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這是在歷史上永遠不能磨滅的一個重要時期。

第十章 因革命而學醫

革命，不但是孫先生個人思想上，事業上的出路，也是整個中國民族的出路，偉大的孫先生，開始踏看革命的大道而前進了。但是革命不是空洞的口號，應當從什麼地方着手呢？他經過詳密的考慮，決定要有一種可以憑藉的職業，以為藏身的地步。他曾經想學一個軍人，但是滿清政府下的陸軍學校，是不許漢人進去的；福州的海軍學校，也剛在中法戰事中被法國人毀壞了。又想做一個律師，但那時還沒有法律學校，最後他毅然定學醫學，因為醫生與社會接觸的機會最多，可以在醫生的名義之下秘密的進行他的計劃，也可以憑藉醫業以終身從事於革命的事業。

這是孫先生少年抱負實現的開始，他在檀香山時候，曾經和一位華僑杜南山討論過關於良相與良醫的問題。杜南山是廣東順德人，和孫先生交誼很厚。有一天孫先生看見南山的書架上，放着翻譯的醫書，很是奇怪，因此問南山道：「譯這種書有何用處？」南山道：「從前范文正公曾經說過：『不為良相，當為良醫。』

「這種話聽起來，就是這意思。」孫先生聽了，起初也很佩服，後來却對南山道：「以前你說范文正公的話，我以為不十分妥當。因為凡是讀書的人，不是馬上可以從政的，從政的人，也不是馬上可以當權的。倘使專心竭力以求作相，等不到成功再去做醫生，不但醫術不容易做，就是努力去做，恐怕也太晚了。據我看起來，應該一方面努力政治，一方面努力醫術，這樣定了目的，向前進行，才可以有一方面的成功。」南山聽了非常敬佩。現在孫先生果然依照當年的遠大見解，應用到實際事實上了。

孫先生的計劃決定了，他就離開翠亨村，直到廣州。由喜嘉理牧師的提議和介紹，進了博濟醫院附設的醫學校。這學校是由院長克爾博士(Dr. John Kerr)主持的，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外科醫生。孫先生對於醫學，也特別注意外科，因為這比較有興趣的一門科學，因此他在克爾博士教導之下，很用心的學習；讀書是孫先生一生最大的嗜好，他對於這新奇的科學，尤其是要格外細心的研究了。

博濟醫院是英美傳道會設立的，創立於一八三五年，當時遠東各國還沒有西醫西藥，這醫院可說是開風氣之先。一八五五年，克爾繼任院長時才附設了這個醫學校。一八七九年又兼收女生。當孫先生肄業時，這學校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當時學費非常低廉，每年僅納二十元。孫先生寄寓在醫院內哥利支堂十號宿舍，就是現在的四十八號病房。

在這學校裏，同學並不很多，但孫先生却發現了一個同志，就是紀元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在廣州返美的士良，他是廣東客家人，生長在離香港淡水墟。在學校的名字，叫做鄭安，號野臣。廣東的客家人，大都是三合會會員，士良也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為人豪俠尚義，孫先生一見了就很賞識，於是漸漸地和他接近，他也很敬佩孫先生，他們友誼一天天地深起來，於是在密談中，孫先生向他說出了也要革命的心事，士良聽了，就非常佩服。孫先生的意見。他們興奮極了，就滔滔的談論起來：

「你是一個純粹的學生，要革命必須靠武力，還須要共同起事的人，這些必須要顧及的。」士良說。

「但是我所想像的革命，是不像古代英雄的亂起草莽，第一必須要嚴肅的宣傳革命的主張，然後集合廣大

約同情於革命的羣衆起事。」

「那末，我們三會會員就是革命破壞黨了，因為我們的宗旨是『反清復明』，不過會員因為歷史太久，連了『都』已忘掉，他們的宗旨現在是要革命了，他們還是可以爲革命出死力的；這個責任我一定可以擔當，爲你幫助的。」

孫先生聽了快樂得幾乎要跳起來了，他渴想了幾年的革命事業，居然到現在才遇見了一個真實的同志；士良也很滿意，因爲孫先生竟能引他爲同志，於是他們密切的聯絡起來，他們在同一的革命目的之下，深深地樹立了友誼的基礎。但是全校的同學，只有這一位鄭士良是做了孫先生的同志，可以和他暢談革命，其餘的就都是話不投機了。

不久在一個很巧合的機會中，又認識了尤烈。尤烈，字少執，廣東順德人，自幼好與洪門會黨的人交遊，他的族人尤裕堂是博濟醫校的畢業生，在順德鄉間行醫，他常常到省城來採購藥品，每次總是到母校探訪舊友。有一天晚上，他和尤烈正走向博濟醫院去，經過十三行果攤，看見幾個人正在紛喧不已，仔細一看，原來就是孫先生和鄭士良等兩三個人，因爲他們想買荔枝，但大家都沒有帶錢，要求果攤老闆明天到博濟去收錢，果攤老闆不答應，就這樣爭論起來了。裕堂見是熟人，就拿出半元錢，代爲解圍。於是他們回到校裏，大吃大談。尤少執對於孫先生的革命主義，尤其傾心悅服。從此孫先生和士良少執三人，常常密談革命。那時博濟醫院中有一位化學教師何啟然喜談佛偈，他常說：「不有而有，有而不有，兩句話，孫先生聽了覺得很有趣，於是每天無事時，也學他說幾遍。當孫先生和士良少執三個人議論風生的時候，許多同學漸漸地注意起來，如果問他們所談何事，孫先生就高語：「一有而不有，不有而有，」使他們不得要領。這兩句神祕的佛語，竟遮飾了當時孫先生的心事。

一年以後，香港新設了一所規模較大的醫校。這醫校的起源，是一位何啟博士爲要紀念他的英籍妻子雅麗氏，就創立一個雅麗氏紀念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這醫校就設在醫院裏，叫做 Y. J.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以便實習。孫先生因爲在香港鼓吹革命比較自由些，並且雅麗氏醫校的功課，都比較完善，因此在這醫校成立時，就從博濟醫校轉學過來，這時孫先生已二十一歲了。

雅麗氏醫校教師，是有：康德黎 (Jones Canllie)，王維 (Patrick Manson)，醫生 (G. E. Thomsen) 和何啓等，他們對於孫先生的革命，都會有過幫助的。孫先生在這學校裏，還是繼續研究外科。他那時是很刻苦的，在廣州博濟醫校時，由家中每月寄六元爲膏火之資，還可以勉強夠用，但在香港却不行了，他只得一面要求朋友幫助，一面自己刻苦的節省。但是他在廣州時，祇是和鄭士良密談，現在他放言無忌了，他盡其洩露他革命的懷抱。在課餘放學的時候，他最歡喜聚集幾個比較親熱的同學，到酒店去高談豪飲，直到他認爲痛快了爲止。錢用盡了，他就很勤奮的讀書，不出校門一步，好像一個與世無關的人，因此同學們都有些奇異他。他有時獨自關着房門，專心研究中國地理，他的臥榻旁邊，掛了一張大地圖，常常對着注視，竊思何處宜攻，何處宜守。有人進去了，就指着地圖很感慨的說：「如此江山，付之異族，安能忍與終古！」這嚴肅而沉重的話，果然能夠令人動容，但是還沒有促起大家的猛省。那時鄭士良還在廣州博濟醫校，他常常從廣州到香港來，和孫先生等談。

德彰公知道孫先生很努力求學，他很悔恨從前把他財產分讓，就常常寄錢回到家裏，要造成公諱。孫先生，以助成他的學業，但不幸，達公在孫先生到雅麗氏醫校後不到一年，就因患了沉重的病症，看不到他兒子偉大功業的成就，就與世長辭了！享壽七十有六歲。他遺留給孫先生的，就是仁慈樸實的性情，和公平正直的美德，他雖沒有親見孫先生的成功，他的精神是永遠不朽的。孫先生自遭成公臥病以後，就請假回家，德彰公也從檀香山趕回來，他們兄弟二人，都親侍湯藥，一直到喪葬事情完了，才各自分散。他們經過這一次會面，過去的事情，都不提了，他們相互的敬愛，永遠不變。孫先生從此得到德彰公更進一步的助力，對於革命事業的奮鬥，因此更一往直前的邁進。

孫先生在雅麗氏醫校，讀了兩年，在香港認識的朋友，漸漸多起來，鼓吹革命的熱情，也一天高漲一天。

孫對於同情革命的人，格外親熱而且竭誠的尊敬，有一件事年時同志叫孫少白，就是由他親手拉進雅麗氏學校的，在事前，連少白本人都沒有知道。他在革命的意思之下，只有一種真摯的心，他需要真正的同志，所以凡是同情於他的人，都要想方設法結合起來，於是竟把陳少伯拉進雅麗氏校了。自少白到了雅麗氏校後，他就住在博濟學校得到李士良一樣的可以談心的人了。不久，由少白介紹，孫先生認識楊鶴齡。楊原是與尤烈同學，那時尤烈並且也到香港來做事情，因此常常在一塊兒的。楊鶴齡也是中山縣翠亨村人，但因為生長在澳門，孫先生從來沒有和他見面。他家世富豪，在香港歌賦街，有一所先代遺業的商店叫做楊耀記，他在這店內獨一樓，專為朋友們聚談話的地方，於是，孫先生和少白等常到他的家裏去，四個人在一起總是暢談革命。他們都以洪秀全比擬為理想的革命人物，因為，孫先生曾經這樣的說過：

「洪秀全是一個失敗的英雄，或者為王，或者為寇，因為他是失敗者，所以滿清政府把他加上一個寇字，人們也就說他是寇了！」

他們議論到這裏，大家相對歎歎，於是，孫先生就用談諧的辭令，笑着說：

「成敗是不能預期的，現在我們也許就是滿清政府心目中的四大寇了！」

大家聽了都笑起來，他們的議論也格外的緊張！孫先生在那時因為同情他的人，漸漸的多起來，他鼓吹革命的精神，也愈見與奮，簡直是隨時隨地都要說革命，不是這樣，就覺得不舒服了，這是少年真摯的熱情表現，也是，孫先生對於革命認識的真切，而急切希望革命實現的表現。然而，在當時風氣閉塞的時代，許多不瞭解他的親戚朋友，却都說他是一個怪異的瘋狂少年，他們知道，孫先生和陳、楊、尤、三人是相依為命的。談革命，他們就真的叫起「四大寇」來了。

情主義的宣傳，從這兩方面事實中，他已深感着民治思想的興趣，因此從不懷疑着帝王的迷夢。據楊鶴齡告訴人說：當時四大寇在香港，曾經有一位很健旺的人對孫先生說：

「事成當以帝王屬君。」

「帝王豈可爲哉，子孫求死所而不可得矣！」孫先生聽了這一句話，就很莊重而沉痛的回答他。在這一節回答中，孫先生少年時期的憤激和遠大的見解，已經充分的表現了。

帝王思想在另一種意義上說，是以迷信思想做基礎的，尤其是相信風水星相組織的中國社會，可以說二者是相伴而來的一種產物。在革命言論時代的孫先生，他雖有遠大的懷抱和見解，能夠擺脫歷史的傳統思想，但還打不破個帝王思想根源的迷信社會，不是一件很輕易的事情。因此四大寇中的其他三位同志，雖然經過孫先生一度鄭重的說明，但他們多少還是迷戀着這虛榮的帝王幻想，由幻想而演成了飄渺離奇的夢境。

這真像神話一般的故事，也是四大寇中一位同志說出來的。

當孫先生和四大寇熱烈談論革命的時候，在晚上，他們談得高興了，常常留宿在一起。有一天晚上，孫先生和四大寇中兩位同志就住在一個地方。第二天早上，孫先生已經醒了，但還在靜靜地躺在牀上，疑神思想革命的問題。有一位沒有住在這裏的同志很匆忙從外面進來，走到孫先生牀前，把帳子揭開，看見他閉着眼睛，以爲酣睡未醒，便不敢去喚醒他，於是走到另外一個牀前，毫不客氣的把那人推醒了，並且很興奮的說：

「我告訴你一件事！」

睡在牀上的那位同志說：「人家正好好自睡着，給你一早跑來吵醒，有什麼故事？你講吧。」

於是那位進來的同志就開始講他的故事：

「昨天晚上，我父親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一個白鬚的神人，叫我父親跟着他走，我父親問他：『走到什麼地方去呢？』那白鬚神人說：『不必多問，你跟我走就是了。』於是我父親便跟着他，走了一會兒，忽然

好像騰雲駕霧，身體飄忽忽地只是往天上升，一下子，就到了天空。在一剎地方停下來，我父親偷觀一眼，見是一座宮殿，心裏不覺慌張起來，因為在專制時代，如果闖入金鑾殿上，是要犯很大的罪的，因此躊躇地不敢進去。可是那白鬚神人很鎮靜的還是拖着我父親往前走，他說：「怕什麼，跟着我來吧！」於是走進了那座宮殿。舉目一望，裏面的陳設，華貴極了，恍惚從戲臺上的佈景中所見到的一樣，中間掛了一個燦爛的繡纓，兩旁站着許多宮娥妃嬪。我父親心裏一怔，又低下頭，不敢再看了。那白鬚神人便告訴他：「這就是你的家，怕什麼呢？儘管抬起頭來看好了。」我父親便抬起頭來，想看看坐在中間龍椅上的皇帝是誰。你說奇怪不奇怪？原來不是別人，就是我，他的兒子！」

那睡在牀上的同志聽了這故事以後，披了衣服，馬上起來，一點沒有驚奇表示，却淡淡的說：

「你這個故事，一點也不奇怪。我也是正在做一個比你父親更奇怪的夢，也夢見了一個神人，你來的時候，我正好夢方醒，却給你打斷了。那神人把我帶到一個小山上去，因為風吹得很厲害，於是我就問他：『這樣大的風，你把我帶到這地方做什麼？』那神人把手向前一指說：『你看這遠遠的地方是什麼東西？』我一看是個墳墓，便說：『這不是墳墓嗎？』神人說：『不錯，可是你知道這是什麼人家的墳墓？』我說：『這話怎麼說呢？』神人說：『這是你祖先埋葬之地。』我便問他：『我祖先埋葬之地，又有什麼特別呢？』他說：『你知道這個墳墓與普通的墳墓不同，是很有來歷的，你們的祖先是埋到了龍眼，是一個真正的龍眼。』當時我便問他：『有什麼方法能夠證明是龍眼呢？』那神人用拐杖向前面一指，就有一條很大的金龍，從墳墓中出現，在天空繞了幾圈，又回到裏面去了。我說：『不錯，是龍眼了，可是龍眼又有什麼好處呢？』那神人說：『你祖先埋到了龍眼，便應在你身上，你要做中國的皇帝了！』」

他們兩人彼此胡言亂語，孫先生都聽得非常清楚，因此引起了他很很多的感想。帝王的迷夢，支配了中國幾千年的人心，造成了這部相斫伐的慘痛歷史。他們兩人互說詳確之辭，完全是帝王迷夢的下意識的浮現，這就是歷史的傳統觀念的反映，這是中國革命進程上最大的危機。

「就中國歷史講，每換一個朝代，都有戰爭。比方秦始皇專制，人民都反對他，後來陳涉、吳廣起義，各都響應，那本是民權的風潮，到了劉邦、項羽出來，便發生楚漢相爭。劉邦、項羽是爭甚麼呢？他們就是爭皇帝。漢唐以來，沒有一朝不是爭皇帝的。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

這是孫先生後來在民權主義第一講所說的，大概就是當年聽了那兩位同志胡言亂語以後的最重要的感想，因此在那一講上特別追述一下。爭皇帝爲什麼能引起戰爭呢？這原因是很簡單的，因爲皇帝祇有一個，有權力的人都要去做皇帝，但皇帝祇有一個，就非爭奪不可，因爲要爭奪，就非互相撕殺不可，這是多麼悲慘的一回事。革命的目的，是在解除人民的痛苦，如果爲了爭皇帝而革命，豈不是將因爭皇帝而更加重了人民的禍害？那就非失敗不可。現在革命還沒有發動，但同志中四個人已有二個人懷抱帝王的思想，將來演變的結果，一定不出這權兩途：一是同志要打同志，二是本國人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伐，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因此孫先生後來在民權主義上堅決的說：

「共和國家成立以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照這樣辦法，便免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

這是孫先生眼光遠大的地方，也就是他提倡民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的根據。從歷史上研究，太平天國的失敗，是一個最好的教訓，孫先生對於他們失敗的原因，曾經有過精確的論斷，是不在洪秀全的不懂外交，或得到南京以後不乘勢長驅北伐。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以後，就互爭皇帝，胡起城來自相殘殺。這殘殺的事實，經他簡明扼要的這樣指出：

「第一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爭權，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楊秀清也想做皇帝。楊秀清當初帶到南京的基本軍隊，有六七萬精兵，因爲發生爭皇帝的內亂，韋昌輝便殺了楊秀清，消滅他的軍隊。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專橫起來，又和洪秀全爭權，後來大家把韋昌輝消滅。當時石達開聽見南京發生了內亂，便從江西趕進南京，想去排解。後來見事無可爲，並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說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軍隊帶到四川，

不久也被清兵消滅。因為當時洪秀全、楊秀清爭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那時候的基本軍隊，都完全消滅，太平天國的勢力便因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是由於楊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錯。

孫先生這些繼續的感戴稱頌，確是在民國十三年演講三民主義時說的，但他的概念的構成，早已發生於三十多年前四大寇中兩位互說異夢的時候。革命運動是必須朝同一條實定的大道前進，所以在開始發動的時候，如果就走錯了路，那是最危險的事情。有遠識定見的人，先生，他早已確定了未來的中國革命的大道。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思想的根苗，從當時兩位同坐紅氈的夢境以後，已經在 孫先生腦海中深深地種下了。

第十二章 最早的政見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一年） 孫先生二十六歲了，就從雅麗氏醫校出來。 孫先生在校時，一面鼓吹革命，一面對於學業還是沒有疏忽，所以畢業考試的結果，各門學科都是一百分，僅有一科是九十幾分。學校當局為獎勵他勤學起見，就經過教務會議的決議，在這二科上多加幾分，並且在他的畢業證書上特別注明是一滿分），由校長、教員十三人，試官八人，及收師書記官等簽字。在七月二十三日那天，由香港總督羅便臣爵士親臨給予香港政府的第一張醫照，准以內外科行世，學校當局也贈送 孫先生助產器具全套，以資獎勵。從這時起， 孫先生就結束了他的學生生活，而開始到社會去從事實際的運動了。

這雅麗醫校現在已歸併於香港大學， 孫先生曾經實習過的雅麗氏醫院，也遷到般含道與那打素醫院聯合一處，已非當日原址荷里活道的舊觀了。

孫先生在雅麗氏醫校畢業後，本來是想自己開設藥房，但正在草擬招股章程時，忽然被學校當局知道了，就禁止他；因為照他們英國的習慣，醫師的地位是很高的，稱為上流人，做買賣的人，就比較低賤了。所以當

陳廉德黎就書 孫先生很懇切的說：

「你不應該做這種事情，不能用你的名義去開藥房的；因為你是本校第一屆著名的學生，應該自愛。」
澳門是 孫先生每次往來香港與故鄉間的必經之地，有一次，孫先生假期回鄉，經過澳門的時候，當地鉅商曹子基、何穗田等的家人，正患着很重的病症，經 孫先生一診而愈，於是大家都驚爲神奇。他們現在知道 孫先生已經學成業就了，因此聯合當地紳商一致要求到那裏去行醫。所以 孫先生到澳門，也不是出於原定的計劃。這樣一來，孫先生開藥房的計劃不得不打消了，於是到澳門去掛牌行醫。

孫先生對於外科和解剖的手術，特別擅長，所以不到兩三月，聲名遠播，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耳聞其名，極端欽佩的，就診者戶限爲穿。他這一年的醫金收入，竟有一萬元之多，但他並不積蓄，總在各方面用去了；尤其是關於交遊的費用。那時廉德黎常常到澳門來幫助 孫先生施行較重要的手術。他是 孫先生的教師，但他竟忘了師生的隔閡，對於 孫先生不斷的幫助，他自己這樣說：

「何以我要這樣地到澳門幫這位男兒的忙呢？別的人有爲他而戰鬥，而殉難的，我却爲着愛他與救他。他的天性易於吸引人們注意他，當時預備在診室中或沙場上替他服務；一種不可解釋的潛勢力，一種吸引人們親就他的磁性。」（見 *Catholic: Sun Yet Sa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這是確實的，孫先生的坦率、胸懷和真摯的態度，是永遠的被人們所佩服而樂於聽他指揮的。他偉大的領袖風度，早在學生時代及開始做醫生時代表現了。不久，孫先生又到廣州去行醫，他同樣的獲得良好聲譽，他往來澳門廣州間，非常忙碌，成了廣東最有名的西醫了。後來因爲醫務上的必要，還是回澳門來行醫，就住在澳門仁慈堂附近的診所，遷到草場街，擴充而爲藥局，定名爲中西藥局。有欠，又接受了當地紳商的目的，竟破例兼用西醫西藥，他自己一本濟人利物的宗旨，所有酬金，一概不受，因此他非常受當地紳商葡萄牙人，也即來紛紛求治。於是引起了葡萄牙醫生的嫉視，仗着他們特殊的勢力，到澳門或廣州來攻擊。

孫先生沒有葡國的行醫證，結果竟勒令孫先生停止行醫。孫先生氣憤極了，就把藥局搬到廣州海基，另覓廣東西藥局；並且聘尹文樞醫生為助手。他還要救濟貧窮人的疾病，特別規定每天上午十時以前就診的，費金藥費，一律免除，因此更得社會的信仰，醫務發達，遠過澳門。

然而，醫生終究不是孫先生終身的職業，他行醫是別有懷抱的。所以一面醫務雖是十分忙碌，但他始終沒有忘掉他的本志；他那時的同志除了楊、尤、陳外，更有：魏友琴、程璧光等。這時尤烈在澳門任廣雅書局內的廣東輿圖局的測繪生，孫先生就常常邀集這許多同志在這書局內的南園抗風軒會議國事。一面由鄭士島結納會黨，聯絡防營，也很有端倪了。孫先生倫敦叢雜記中說：「余早年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之存在，此種政治運動，大可名之曰『少年中國黨』之形成。J (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就是指這個時期的活動情形，所謂少年中國黨，是那時國際間對維新政黨的一種普通稱謂。有人說這就是孫先生手創的興中會，不免有些誤解。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說：以後興中會的創立，實導源於這時期的活動，要比較準確得多。

孫先生那時對於政治改革的觀念，已從空泛的議論轉變到有條理的辦法。他自己說：「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能為八股以博科名，文章句以應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上李鴻章書）這就是說明，他已完成了各種基本學問和專門學術，並且無時無刻不關心到國家生民的根本大計，也慨然以國家天下為己任。因為他已有廣博的學識，所以對於政治改革的思想，就有充實的內容和切實的辦法了。他那時在醫務稍暇時，開始做政治的論文，在報上發表，但這些論文，已很難看到，盡現在所能搜羅到的，祇有在盛世危言中有一篇叫做農功，據陳少白說是孫先生做的。這文章的要點是說，農功的動靜，可以補救天然的缺憾，所以要農民知道利用科學方法，講求土田的性質；政府要有農官，地方

7
也

負責要負得農功的責任，將使各農地種，各盡人工。他論：

「古之言曰：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七人，最下食五人，同此土田，同此精養，而收穫之多寡，迥乎不同者，農功之勤惰爲之也。故水潦出於天，肥醜判於地，而人力之所至，實足以補天地之缺陷而使之平。昔英國挪佛一郡，本屬不毛，後察其土宜，遍種蘿蔔，大獲其利。伊里島因卑溼，利用機器竭其水，土脈遂肥。撒里司平原之地，既枯且薄，自以烏糞培養，百穀無不勃茂。猶是困也，而物產數倍，是無異一畝之田，變爲數畝之用，反確確爲沃壤，化瘠土爲良田，地利之闢乎人力概可知矣。」

但是農民的智識有限，怎樣能盡量的發揮地利，來變確爲肥呢？因此 孫先生又舉西洋各國的辦法來說：「蘇西農政，皆設農部，總攬大綱。各省設農藝博覽會一所，集各方物產，用考農功；與化學諸家詳察地利，各隨土性，種其所宜，每歲收成，自百鈔而外，花木菓蔬，以至牛羊畜牧，皆入會考察優劣，擇尤異者，獎以銀幣，用旌其能。至牲畜受病，若何防治，穀蠶木蠶，若何預防，復備數等田樣，備各種汽車，事事講求，不遺餘力。先考土性原質，次辨物產所宜，徐及澆溉糞養諸法，務欲各盡地利，各極人工，所以物產贏餘，昔獲其一，今且倍獲千百而未已也。……其尤妙者，農部有專官，農功有專學，轉得一法，暮已徧行於民間。何國有良規，則互相仿效，必底於成而後已。民心之不明，以官瞞之，民力之不足，以官輔之，民情之不便，以官除之，此所以千綱其紕，比戶可封也。」

「我國似宜專派戶部侍郎一員，綜理農事，參仿西法，以復古初。委員赴泰西各國，講求樹藝、農蠶、養蠶、牧畜、機器、耕種、化痔爲腴，一切善法，沛爲專咨，必簡必賅，使人易曉。每省派藩臬道府之幹練者一員，爲水利農田使，責成各牧令，於到任數月後，務將本管土田應辦若何，農功勤惰若何，何利應興，何弊應革，招徠墾闢，董勸經營，定何章程，作何布置，決不得假手胥役，生事擾民。……」

這可說，孫先生最早的政見了，他對於農政是很關心的。中國是以農立國，農業與民生，關係最切，最

以孫先生這篇文字，也可說是民生主義的最初最簡單的概念，已在這時候潛伏在他的意識中了。他自己也說過：「某也農家子也，生於賤賤，早知稼穡之艱難。」（擬創立農學會書）後來對人更具體的表示：「要是不生為貧困的農家子，也許會忽略這重要的民生問題，而不加以注意，是很可憐的。」（見宮崎新天孫傳）我們在上面說過，他這時對於專門之學，已尋求其一，這農業問題，也許就是他所研究的專門問題之一。所以孫先生最早的政見，注意於農功農政，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實。他這一篇文章，是反對滿清政府中提出軍獻的意見，他對於滿清政府固然是以敵視出之，但那時也還沒有力量可以把它一蹴而倒的，所以他還沒有暴亂狂跳的態度，他只是在革命的言論時代。

那時，李鴻章在北方，正努力創辦所謂新政，是當時在滿清政府下算是比較識時務的大員了。孫先生就想把他的大政方針告訴李鴻章，借他的力量來改革一切，也未嘗不可挽救中國的危亡。因此就從廣州回身到天津去，一個人獨自閉着門，做了一篇大文章，預備給李鴻章。在這一篇文章內，孫先生的見解，從經濟到政治，充而致全部政治了，但最重要的還是在農業方面。這文章的主要骨幹是在下面幾句：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政利，學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人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者者，實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欲擴張宏圖，冀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變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砲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這是孫先生政見的四個綱領，他對於這個綱領的實施辦法，關於人盡其才的，是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地盡其利，是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物盡其用，是在「將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貨暢其流，是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銷地產之貨，通

在這四大綱領之後，孫先生又指出應辦的業務，在於不知之人應辦者行之人，農商兩業之通商，農商兩業之通商，

已以爲其利
人解其才

「夫天下之事，不慮不能行，而慮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聲，必踴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這是孫先生革命哲學——知難行易學說的胚胎，如以二十五年以後，他五十國歲時所發表的孫文學說來證明，就可知道，他在學說自序說：「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不行者，則誤於以知爲易以行爲難也。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爲矣。」他對於中國病源的診斷和真知力行的提倡，表現了前後一貫的基本態度。我們可以認定孫先生革命哲學的創建，是從長時間許多痛苦的經驗和觀察中來的。至於施行四大綱領的緩急，孫先生的主張，還是在農政，他說：

「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食，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亦爲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爲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示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虛我故規，夢行新法而已。……」

最後孫先生表示自己志願，在農政方面致力，他說：

「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於樹藝牧畜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蘊。泰西理法，亦頗有心得。至各國土地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遍歷其境，未易週知。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游其間之農學名家，尋覓最新法醫治貧病，並擬順道往游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真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遊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與藥商舉辦。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人民者此也。……」

孫先生拿了這篇文章，到廣州和陳少白商量，少白也復贊成，於是孫先生準備到上海，然後設法把這篇文章送上李總統。廣州的藥房，就請少白把它轉來。

孫先生到了上海，就去找胡漢民、李鴻章的人。一天，在鄭觀應（即盛世危言的編著者，是孫先生的同鄉。）家裏遇見了李鴻章的秘書。秘書說：「李鴻章最近在上海策劃，想來調查香港助英國政府。他請胡漢民、李鴻章去，他在英國住了幾年。後來回到香港，在循環日報做主筆。他最近在上海來，聲名很盛，他辦事辦得很好，對於世界智識，也很充實。」孫先生知道他是和平天國有關係的人，所以一見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很熱心的就介紹他一位朋友在李鴻章幕府當洋務文案的羅豐祿。

孫先生快樂極了，就約陸皓東一起到天津去，皓東這時已回上海來了。孫先生到了天津，就去看羅豐祿。那時中日戰爭已經很緊張，李鴻章正在蘆台督師，軍書旁午。羅豐祿就把孫先生的文章送到那邊去，李鴻章那裏有空暇來研究。孫先生的大政方針呢？他祇是含糊的對羅豐祿說：

「打仗完了以後再說。」

羅豐祿回來告訴了孫先生，孫先生知道沒有辦法，於是他就和陸皓東北走北京，看看滿清政府所在地的情形，南下武漢，觀察中原大勢，然後仍回到上海來。

第十三章 創立興中會

上書李鴻章是失敗了，但孫先生沒有絲毫灰心的表示。當他到北京時，看見滿洲人的驕奢淫佚，庸劣無知，官僚的昏庸腐敗，百政廢弛，他斷定滿清政府的崩潰，是時間問題，因此排滿的志向，愈加堅決了。但是他經過這一次刺激，却增加了很多經驗，他知道革命的運動，決不能依靠現成的勢力，來企圖實現他的主張，他承認上書李鴻章，是一個錯誤的幻覺，顯然是已成泡影了，他現在須要自己構立一種勢力，站在現成勢力的對面，堅決的奮鬥，衝破這現成的勢力，才能完成革命的目的。然而革命的勢力，怎樣才能樹立呢？那當然要有革命的團體，因此孫先生決定要到檀香山去。

檀香山是孫先生蔽避之地，那裏有他的同胞哥德彰公，更有許多同鄉華僑，無論在感情上，經濟上都給孫先生很多幫助的。因此，他這一次重到檀香山，是懷着無限希望的。

太平洋的怒潮，不間斷地在掀起。孫先生第三次到檀香山，他把革命的種子，從太平洋怒潮中帶來了。舊時的親友，他們應當怎樣的對這一個懷有大志的少年，表示刮目相看？他以真摯的熱情，開始向一切認識的以及不認識的祖國僑民宣傳了。然而，風氣畢竟還是閉塞，革命的呼聲，似乎刺痛了他們的耳鼓，大家都掩着耳走開了。勝手既足的華僑，對於祖國是最關心的了，但那時說到滿清政府的腐敗，以及如何改革的辦法，這些政治的問題，似乎與他們的生計問題有些不相關連，他們是不會發生興趣的。富有演說天才的孫先生，就滔滔地替他們解釋多少疑惑，說許多刺激的興奮的話，鼓吹，鼓吹得舌敝唇焦了，才得到一部份人的瞭解和同情。經過幾個月的宣傳，孫先生才決定結合少數同情的人而成立革命的團體，贊助最有力的，就是德彰公和鄧蔭南二人，他二人都願傾家相助，這是很難能可貴的。

大約是紀元前十八年（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事情吧，中國革命團體的元祖，在檀香山創立了，地點是在卑涉銀行（The Bank of Bernice）華經理何寬的家裏，到會的有何寬、李昌、黃華恢、鄧蔭南、劉祥、黃亮、鄧金、程蔭南等，由孫先生主席，提議組織革命團體，大家就決定定名為「興中會」，並且發表了中國專制政治史上第一條革命宣言——興中會宣言。

我們從乙酉年孫先生決志革命算起，到現在創立興中會，恰恰十個年頭。在這十年內，正是滿清政府辱國喪權，倒行逆施，造成了內憂外患，最嚴重的存亡關頭。在這時期以前的國內外大勢，是由鴉片戰爭到五口通商，接着便是十四年的洪楊戰爭，紀元前五十六年至五十二年（一八五六至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之役，中國民族開始在不平等條約的桎梏中，沉淪於慘苦悲痛的生活。而滿清政府的黑暗，和社會經濟的衰退，亦隨之表現。到了這時期，便每况愈下，如日本的侵台灣，取琉球，到法越戰爭以後，更割安南以求和，滿清政府的懦弱無能，和列強勢力的侵凌威逼，更充分地顯現在國人面前呈現無遺。於是籌備畫策，版圖日蹙，如我藩屬

種的破壞，馬省愛蓮運河等地的被削，澳門被迫承認葡萄牙管理，西藏省主權的破壞，帕米爾高原的被侵，我朝貢國邊境沿河地域的被佔，種種悲慘的事實，紛至沓來。在內政方面，紀元前二十五年（一八八七年）河南鄭州黃河決口，二十三年（一八八九年）江蘇、浙江、湖北等省大水，二十二年（一八九〇年）直隸永定河決口，二十一年（一八九一年）蕪湖、丹陽、武穴等處被發耶毒、天主教堂，大鬧教集，二十年（一八九二年）山東各河大水。天災人禍，連年交乘。滿清政府反藉此開河工賑災各種情例，搜括民財，貶價招捐實官，於是仕途冗雜，各省吏治，愈不整肅。滿清政府的西太后那拉氏却大興土木，修建廟和園，自紀元前二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動工至二十年（一八九二年）告竣，費時五載，耗財至千數百萬兩。同時在社會經濟方面，也起了巨大變動。因為列強藉不平等條約的關係，直接或間接向滿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作政治性或經濟性的投資。譬如當時已有外國直接投資的和中國借款舉辦的鐵路，列強已在中國沿海和內河發展了他們自己的航運。因此洋貨充斥市場，原料大量輸出，由於外貨入超急劇的增加，現金外流，逼着中國向殖民地的道路飛馳。一八七五年（紀元前三十七年）以後，國際貿易每年都是入超，計一八八〇年入超約一百五十萬兩，至一八九四年增至三千一百五十餘萬兩。十五年間入超的數目增加約達三十倍。而國際貿易總額也由一萬五千七百餘兩，增至三萬八千四百萬兩。中國的落後手工業在外國的新式機器工業衝擊之下，紛紛破產了，農村也因為購買的都是製成品而賣出的都是原料，支付了一大筆利潤，弄得入不敷出而日漸貧困。列強又在滿清政府手裏取得了在內地開採礦山，設立工廠銀行，經營各種企業的特權，他們可以利用中國價格低廉的原料和勞動力，以新式的生產工具，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製造商品，在中國市場銷售，以獲得厚利，這種對國家民族經濟上的損失，更是無法計算了。所以孫先生在東京會堂言上劈頭就大聲疾呼的說：「中國積弱，非一日矣！」這寥寥八個字，包含了無數辛酸憤激的熱淚。

造成這積弱的原因，滿清政權當然要負一大半責任，而人民智識程度的低落，沒有糾正這腐敗的政府，也不能辭其咎。因此孫先生接着復嚴正的指出：「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名，下則蒙昧無知，無能遠慮。」這

種種惡因所造成的惡果，便是：「近之辱國喪師，剪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隣邦；文物蕩喪，被驅於異族。」

「夫以四百兆蒼生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虜奴覬覦，荼毒蒼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極。」這是何等的慨歎！如此大好河山，竟被一大批滿清政府的虜奴，糟塌到了極點。當時最著名的虜奴，第一就是葉名琛。一八五七年，廣州民衆因爲承五口通商之後，憤怒外人屢擾無禮，激起了許多糾紛，英法聯軍欲以兵戎相見，通知葉名琛限四十八小時讓出廣州。這時本可據理力爭，和平解決，但他竟置之不理，相信「邊十五日必可無事。」結果聯軍破城而入，葉名琛也被俘而去。廣州其他守將聯檄勸奏，才奉到咸豐所下革職上諭，內稱：「葉名琛以欽差大臣辦理夷務。如該夷等非禮要求，不能允准，自當設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籌撫馭之方。乃該夷兩次投遞將軍、巡撫、副都統等照會，並不會商辦理，即照會中情節，亦祕不宣示，遲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著卽革職。」但是上諭已經太晚，葉名琛已被解往加爾各答，居鐵海獄中，終以死關。第二件事情，是一八七八年滿清政府派侍郎崇厚爲全權大臣，與俄國交涉交還伊犁之事。這個糊塗的大臣，竟擅將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的廣大平原，奉送了俄國。當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黃體芳一奏，可以看出崇厚誤國的種種：「竊惟朝廷遣使外國，意在安邊。失詞不可，專擅尤不可。史册所紀，及歷屆奉使諸臣，未有荒謬誤國，如崇厚者也。查崇厚奉使俄羅斯，身以全權，隆以優秩，宜如何籌劃萬全，以副委任。俄人願歸伊犁，酌予犒師之責，尙屬可行，奈何不顧全局，不慮後患，通商劃界，任意定約，因索地而棄地，欲弭釁而招釁；行之則商稅日虧，要害盡失，不行則俄人有辭，更煩唇舌。其心但知畏敵，而不畏皇太后皇上。於重大事件，不請諭旨，擅自許人，不候召命，擅自歸國。」這種荒謬昏庸的事實，真足以被駁於異族，不齒於列強。中法戰爭是子孫先牛，以及國人很大刺激的一次戰役，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次戰役中，李鴻章實際上也是一個誤國的重要人物，因爲他始終堅持和議，雖有諒山之捷，但巴黎和約已定，事已無可挽回，於是簽約，停戰，撤兵，屈降。當時張

之洞謂：『中法用兵年餘，未有如今日之得勢者，我撤彼進，徒中狡謀，悔不可追！』彭玉麟奏稱：『法狡無信，和可許，兵不可撤。』左宗棠也主張：『宣慎重盟。』但滿清政府沒有接受他們的建議，仍諱以『獲勝得不償失，蹉跌更傷國體。』嚴令撤兵。這完全是李鴻章誤國所致，也是滿清政府的昏聩懦弱的表現。局勢到了這地步，『有志之士，能毋撫膺！』革命的勢力，不得不抬頭起來，革命的呼聲，在孫先生領導之下，開始堂堂正正地怒吼起來了。

『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這一段是接着唐叔誤國以後，很明顯地指出列強侵略的可怕。內政和外交，是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有這樣腐敗的滿清政府，當然招致了這許多繼續不斷的外患，而這些蠶食鯨吞，瓜分豆剖的外患，更加速的促成了中國覆亡的危機；這真是中國存亡危急的緊要關頭。當時國際上對中國的觀念，非常惡劣，他們認爲將步非洲後塵，由列強分據統治。外國出版界，討論中國問題的書籍，大多用這樣可怕的書名：『中國之割裂』(The Break-up of China)『中國之瓜分』(The Partition of China)『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這是孫先生開始對四百兆國人沉痛迫切的警告，要大家共負起這救民救國的革命重任。

『用特集會衆以與中，協賢豪而共濟；抒此時艱，奠我中夏。仰諸同志，盡自勉旃。』這是說明創立興中會的主張意義，也是宣言的最後一段，用畫龍點睛的方法，說出了孫先生的抱負，他對中國革命的無限熱望，就寄託在這最後一段的寥寥數語之中。

這一篇極簡單的宣言，坦白地指出當時滿清政府及其官吏的腐敗無能，和中國國內外形勢的險惡，種下了民族革命的種子；經過仁人志士們的熱血，灌溉扶持，就很快的發榮滋長起來。這是中國革命火種的初現，中國的革命史從此就和孫先生的生活史打成一片而開展了。

那時候，加入興中會的祇有二十餘人，收到會費和股份銀（大約就是會規所定的義捐），共有一千三百八

十八元。孫先生本想再從檳香山到美洲去，向華僑推廣宣傳與中會的組織。但是這個時候，滿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節節失敗，充分的暴露它的弱點，全國的人心，開始和滿清政府發現離心的傾向，上海同志朱曜如以爲機不可失，就飛函孫先生，要他立刻回國。

這位宋先生也是廣東人，外國人稱他爲宋查理（Charles Jones 'Charlie' Soong）一八七九年當他還在兒童時就移居美國，畢業於萬德曼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他有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回國後在上海協助組成第一個青年會，又從事於印製出售聖經的工作。他是三個兒子，三個女兒，在此後很長的時期中，他們整個的家庭，都和中國革命發生最密切的關係。

孫先生經過一番精密的考慮，認定廣東可以做革命的發動地，於是就和鄧蔭南經日本回到香港，這時大約已是十二月底了。（見榕山華僑）

孫先生經過日本橫濱時，有一個廣東人陳青，到船上來兜賣東西，孫先生因爲他是中國人。而且是同鄉，就向他說起革命來了。陳青聽了孫先生的話，回去就對他的同鄉說：

『今日船上有一個人，很奇怪的，他說要在中國造反呢。』

這個同鄉好奇心起，就到船上去見孫先生。孫先生見他，就問他姓名，知道姓姓諱名發，在橫濱開洋服店的，兩人就談了一會。譚發聽了孫先生的言論，就非常悅服，他很願意在孫先生領導之下効勞，因此他對孫先生說：

『我雖是一個智識淺薄的商人，我却很想替先生盡點忠心。以後如果有什麼事情，我一定出力幫忙的。』他說了，就向孫先生鞠躬而去。孫先生也很奇異這個人，他因此知道以誠懇的態度去感化人，不是一件難事，革命思想的普遍發展，是有希望的，他對於譚發的自動訪問，留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從日本到上海，孫先生是不停留的就到了香港，上了岸，就去找陳少白，這時少白大約還在雅麗氏醫院讀書，因爲放年假回到廣州去了。孫先生就在當晚坐了夜輪，趕到廣州去找他。經過了許多轉灣，在一個期

友的家裏，終和找到了他。這時，孫先生革命的熱情無窮盡了，他不能安耐地在廣州了，就和沙德當機仍繼續潛去，他們於是商量聯絡全省革命同志，擴充粵中會組織的計劃。不久，鄭士良從澳門來，也說聯絡同志聯絡同志。少白就到上海去接鄭君應、陳建威以及其他同志，準備一齊回到廣東來起事。

這時候，香港有一個團體，叫做輔仁文社，由楊善雲、謝讚生主持社務，雖以開通民智為宗旨，人但對於滿清政府也處於反對地位的，因此，孫先生要他們加入興中會，以便集中革命力量。楊謝及一部分社員，復贊成，並且願意取消舊社名義，免致紛歧。於是紀元前十七年（一八九五年）正月二十七日香港興中會正式成立。總機關設在士丹頓街十三號，為免人注目，以奉行天命，其道乃亨的意義，就題了「乾亨行」的名號，裝作做買賣的樣子。

孫先生在這一來到香港擴大興中會組織時，對於革命的經驗和計劃，顯然有進步了。他規定入會的必須一律宣誓，這是對於入會手續鄭重的辦法，而且這宣誓的手續，是成了孫先生此後對於同志和國民要表示信心時很重要的主張。那時又發表了一篇宣言和章程。

這次宣言，和檀香山發表的，詞體上大不相同，僅有一詞一句之更易。比較更明顯一點的，就是檀香山宣言「乃以屠奴謀國……如斯之極。」一段，改為「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括地，暴虐虎狼。盜賊橫行，飢饉交乘，哀鴻遍野，民不聊生。」這是更澈底的鼓動人心的暴露。同時更具體的指出滿清政府的腐敗，因為這裏說明了三種事實：第一綱維敗壞，第二盜賊橫行，第三民不聊生。而這三種事實，有互為因果的作用，循環反覆的演進，表現了整個滿清政府的黑暗腐敗。

關於綱維敗壞，貪污卑劣的事實，在孫先生所著倫敦叢報記中，很沉痛的說道：「至中國現行政治，可以數語賅括之曰：無論為朝廷之事，為國民之事，甚至為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其身為官吏者，擁有審判之權，人民身受冤枉；無所翻訴。且官場一弊，等於法律，上下相蒙相結，有利則奪隨其私義，有害則各委其責任，貪婪勒索之風，已成習慣。賣官鬻爵，賄賂公行。間有一二被政府懲治或斥革者，皆不請自

謀者。然經一番懲治或斥革之後，而其弊害乃尤甚。」又說：「夫滿政府既轉科欽憲直貴官縉雲以自存；則正如蠶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蠶愈甚，彼人民欲望之潮，又何任其潛滋而暗長耶？」這正是有志之士能不痛心。而欲大聲疾呼，負起救民救國責任的說明。

由網羅敗壞引起盜賊橫行，所謂官逼民反，其結果便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這種社會秩序的崩壞，人民生活的痛苦，是當時任何人可以感覺到的。所以孫先生在上李鴻章書中，也毫不隱諱地說出：「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嗷嗷之衆，何以安生？明之閭閻，近之黠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悉受潰裂而出，爲毒天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穢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

這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所表現的事實，夠令人驚心悚目。與中會兩篇前篇宣言所包括的意義，不但喊出了當時國人隱伏在心坎中所欲說的話，並且也明確的指出了革命的對象。雖是在全篇的文字上，沒有提起革命的口號，但這強烈的革命氣息，已獲得充分的表現着。

在這次新訂的章程中，更可看出孫先生對於革命運動有更進一步的規劃了，就是第一，規定與中會有總會，和分會，並且要分會廣大（章程第二條及第六條）第二，規定會務的範圍，如「記糧餉以圖軍實，立學校以育人材，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增國賦等事。」（章程第三條），這好像是空調的，但在當時的風氣中本來不能明言革命的宗旨，所以這些事業，都可說是與革命宣傳接近的事業。設立分會的辦法，在檳嶼山時是沒有說起的，但孫先生一到香港，就主張有分會，這就可見革命勢力的發展趨勢，也就表示孫先生奮鬥的遠慮；所以不到幾個月，第一次的實際的革命運動，就在廣州發動了。

第十四章 第一次廣州起義

香港與中會成立了，便已有了革命的大本營，孫先生就計劃怎樣的去襲取廣州，做革命的根據地。這時候，孫先生又掛起了醫生牌子，廣州的滿清官吏，都很仰慕孫先生的醫術，大家爭相延請，於是孫先生出入軍政界，高談時政，放言無忌，往來香港廣州，策劃會務，非常忙碌。但沒有人留心他是一個革命黨領袖。那時，風氣是非常閉塞的，人心是非常渙散的。孫先生偉大的革命計劃，怎樣才能着手呢？這不是一個謎麼？有人說孫先生說由乙酉（紀元前二十七年）到乙未（紀元前十七年），這十年中間，是革命醞釀時期，孫先生在這革命醞釀時期，是很孤獨的，很沉着的。這話很能說明孫先生當時的環境。這時孫先生爲要施展他的革命的抱負，祇有憑藉了醫生的名義，苦心孤詣的聯絡秘密會黨，和智識階級中的有爲人才，準備革命力量的充實和擴展，期待革命機會的到臨。然而事實的推演，是非常曲折的，當時孫先生曾經一度在雙門底聖教書樓行醫，號稱新學領袖的康有爲也從長興里遷到廣府學宮講學，這廣府學宮，卽世稱萬木草書，和聖教書樓相隔祇有半里。那時聖教書樓除經營基督教經典外，又發售李提摩太、林樂知、花之安等所譯的泰西新史要，五大洲風俗通考等書，以及當時初出月刊的萬國公報等，這些都是當時介紹西洋文化的書籍，有爲因爲不諳外國文字，無法直接瞭解西洋文化，所以對於這些譯本，是非常愛好的，因此他就成了聖教書樓的大主顧。漸漸地孫先生也認識了他，因爲他是號稱新學的人，所以孫先生很想接近他，使他成爲一個革命的同志，但有爲始終堅持着他的頑固成見，並不因孫先生的一腔熱誠而有所感動，因此他們中間到底沒有建立起一些友誼，後來有爲竟成立了保皇黨，始終和孫先生的革命大業，處於敵對的地位。那時孫先生的處境，真是何等孤苦。但不久孫先生就發現了一個真正的同志，他就是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因爲胃病，延請孫先生醫治，孫先生一面替他醫病，一面就考察他的品性，知道他是有血性的，所以於醫病之外，還和他交

換各種談話，孫先生乘機向他說道：

「你這個病，最好每天清晨，在清靜的地方散步。」

「我也很想，但苦於寂寞。」奎光這樣答着。

「我是起得很早的，可以來陪你。」孫先生向奎光自告奮勇。於是從此每天清晨，孫先生總是和程奎光在江邊散步，兩個人的談話，便愈來愈深了。有一天，由江邊走到一間古廟，意思是歇腳，誰知入了廟門之後，重重的門都關閉起來。

「這是什麼原故？」奎光有些奇異，問孫先生。

「你已到了革命黨的機關部裏來了。」孫先生微笑的說。奎光不免嚇了一跳，孫先生於是把革命大義以及種種革命計劃，都告訴給他，奎光聽了很為感動，他就欣然的答應聽命。孫先生指揮。孫先生為要準備第一次起義，是如何的苦心孤詣，我們從這兩件事看，就可知道。孫先生是怎樣的孤苦而又沉着呢？

革命的局勢，終於漸漸地成熟起來了，孫先生在廣東內地派人運動聯絡的會黨和營勇，都有相當成功了，其中如鄭金部下的安勇，廣東北江的綠林，城外三元里有名的鄉團，香山和順德的綠林，都已很有聯絡了，祇要待機而動。孫先生為指揮聯絡便利起見，不能不在廣州成立一個機關，經過一番考慮以後，為避免清吏注目，還是以講求振興農業為口號，與士良奎光等，正式發起組織農學會，會所就在雙門底聖教書樓，實際上這農學會就是孫先生的秘密的軍事機關，也就是與中會在廣州的總機關。

我們現在從孫先生手著擬創立農學會書的一文中，固然可以看出為適應當時環境的許多冠冕堂皇的話。但他對滿清政府的厭恨，還是很明顯的流露出來，他說：

「我中國衰敗至今，亦已甚矣，用兵未及經年，全軍幾至覆沒，喪師賠款，蒙恥啓羞，割地求和，損威失體，外洋傳播，編成談笑之資，雖符諱之而無可諱也。」

這不就是與中會宣言中「近之辱國喪師，剪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衣冠，被輕於異族。」

的同一意義而另一說法嗎？所以這一篇徵求會員的信，實際上和與中會宣言，有同樣的革命意味。這篇文章，寫得非常懇切而有條理，他首先說明挽救國家的危亡，是每個士農工商的責任，所以說：「遠求積弱之故，不得追咎於廊廟之上，即專顧之士農工商，亦當自任其過焉。」但士農工商四者原有連貫的作用，西洋各國所以富強，就是以士類而實因民，民間講求學問的集會，無地不有，因此農有農士，工有工士，商有商士。「說者徒羨其國多善政，吾則謂其國多士人。」這是孫先生指出西各國所以富強的根本因素。因此他接說：「故欲我國轉弱為強，反弱為強，必俟學校振興，家弦戶誦，無民非士，無士非民，而後，與泰西諸國並駕齊驅，馳騁於地球之上。」一面又批評當時滿清政府中一些自命開通，侈談新政的官僚，專以練兵製械為得計，說他們徒費外人的皮毛，而沒有顧到立國的命脈。於是堂堂正正的揭舉創立農學會的宗旨和任務，孫先生說：

「今特創立農學會於省城，以收集庶廣益之實效，首以繙譯為本，搜羅各國農乘新書，譯成漢文，俾開風氣之先，即於會中設立學堂，以教授優秀，造就其為農學之師。且以化學詳覈各處土產物質，開明穡生相剋之理，著成稟書，以教農民照法耕植。再開設博覽會，出重賞以勸農民，又勸糾集資本，以開墾荒地，此皆本會之要著也。……」

最後孫先生又提出了一個口號：「干戈衛國，耒耜興邦，」他說：「古有童子，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曾見許於聖門，某竊師此誠，將躬操耒耜以農商新法啓吾民矣。」這是孫先生喚起全國人民參加革命運動的一種巧妙說法。

這一篇文章從另一方面看，又與上李鴻章書很多配合的地方，而所舉譯農書，設農校，教農，獎農，墾荒幾點，更是具體切實，所以也可以說這是當時孫先生對於農政的根本見解。這樣一篇富有生氣，委曲折，而且見解精闢，辦法詳詳的文章，當然會引起廣州城內一般所謂官紳的欣賞，但他們怎樣會瞭解孫先生倡設這個學會的意義呢？他們祇有欣賞與農業的漂亮口號，於是從總督李瀚章以下的一般官紳，表示贊助的或加

入會會員的很多。孫先生就借了他們做護身符，對於革命計劃開始秘密的無阻礙的施展了。

李瀚章在廣東的時間，本來已經很久了，他爲人香庸卑劣，賄賂盛行，廣東人民對他都表示痛恨。中日戰起，他曾經大規模的募兵，一批一批的開到前方去。在孫先生創立農學會後不久，滿清政府已向日本議和，簽訂了馬關條約，李瀚章也離開廣東，譚鍾麟繼任總督。那時瀚章任內招募的兵，因爲戰事結束，早已解散了，但當局並沒有設法替他們安插，一任他們流落在省城，爲了生計的逼迫，他們對於滿清政府及其官吏，是痛恨極了，經不起黨人一宣傳，他們都可以立刻歸附到革命黨來的。同時，那般巡防局局丁，非常飛揚跋扈，常常備端滋擾民衆，肆行擄掠，因此激起了大多數人民的憤恨，他們就推舉代表向官署去訴願，但昏聩的滿清官吏，不但沒有把作惡的局丁懲辦，竟反硬說那些代表是作亂，把他們十幾個人都送進了牢獄，這樣暗無天日的政治，真是替孫先生安排着革命的機局，孫先生偉大的革命抱負，於是在這樣一個機局之下一往邁進的開展了。

這時農學會的會務，不，就是與中會的會務，已經很發達，同時，得着會員黃詠襄的一筆捐款，因此又在東門外鹹蝦欄和河南等處，設立分機關，由陸皓東等分別主持。黃詠襄是賣去了一座在香港的蘇杭大樓來充作捐款的，共有八千餘元，他這熱心捐輸革命，在那時是很難得的。孫先生看到種種籌備，已經很有眉目了，就在香港總機關部商議攻取廣州的計劃，決定組織革命軍，分北江、廠籐、香山、客人（客家人）、潮州數路，同時進攻省垣，又購小輪二艘，運糧軍火。陸皓東因爲革命軍必須有一個特別的標記，黃龍旗是代表滿清皇帝的，不能用了，於是他就創設用青天白日旗。這旗的形式，是分十二個光芒，從潔白的日光中放出來，是表示十二個時辰，永不停止，光明長照，這意義非常特別，於是大家都一致贊成。這時孫先生在香港的師友，對於這個革命計劃也很同情，其中如何啓博士，助力最多，他在香港任議政局議員，名重一時，對於孫先生的計劃，常常有須步貢獻。還有德臣報記者黎德（Thomas H. Reid）和士蔑報記者勤勤（Cheung Gingan），也很替孫先生用力的，他們常在報上攻擊滿清政府的政治，鼓吹中國革命，以助與中會的勢力

。這是 孫先生在革命進行中，得到外人幫助的第一件事情。

到七月間，各方面的籌備，都已有相當頭緒了，但香港的乾亨行機關，已經被人注意了，於是就宣布取消，借西營盤杏花樓做臨時會議場所。七月九日開會，決定九月初九日發動，先在香港集合會黨三千人，於初八晚上坐夜船到廣州，把短槍放在木桶裏，充作士敏土購報海關；九日早上到了廣州，就可一齊把刀斧劈開木桶，拿出槍械，進撲各軍政機關，同時埋伏水上及潛伏廣州附近各處的會黨，分路響應。此外，又預定組織炸彈隊，在各要隘處施放炸彈，以助聲威。並以紅帶為號，以除暴安良四字做秘密口號，一切計劃，都很機密周詳。同時推定朱洪起草討論檄文，黎德和高文（T. Cowen）起草對外宣言。黎德並願担任運動英國政府承認中國革命政府，不加干涉。

孫先生為什麼定九月初九發難呢？這是很有意思的。因為這一天是舊歷重九節，廣東風俗到這一天都要掃墓，廣州白雲山一帶，墳墓纍纍，掃墓的人是格外的多。那時廣州往來的人當然是很複雜的，所以在這一天，香港的會黨三千人，如果混到那邊去，就不會引起人家注意了，這是最精密的計劃。

各方面事情差不多都準備好了，這時已在九月初，孫先生就到香港來再召集一次幹部會議，作最後的準備。到會的人大家主張在臨事的時候，必須有一個發號施令的人，才能集中權力，因為那時楊衢雲挾了一批輔仁文社的舊社員，自成一派，對於進行上，不免發生影響。孫先生也很同意，於是決定發號施令的人稱為伯理璽天德（President），就是起事後合眾政府的大總統。票選的結果，一致舉孫先生為總統。於是大家都向孫先生稱賀，預祝革命成功。孫先生就把所有在香港的財政軍械等等都交楊衢雲負責處理，他預備回廣州去發動，不再到香港來了。三千個會黨也決定由楊衢雲於八日晚上率領到廣州。這些決議才通過了一天，第二天，楊衢雲忽然對孫先生說：

「前天商議的辦法，都是很好的，但我在香港，主持一切，不可以沒有一個名義，所以我想請你把總統讓給我當，以後到省城，事情辦好了，再還給你，你看怎樣？」

這是太奇特了，一個起事還沒有成功的總統，爲什麼要爭奪呢？孫先生聽了痛心極了，他想實際運動還沒有開展，就有人爭奪名義，這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了因此他就很坦白的回答：

「這有什麼不可以呢？但這個總統名義不是我來的，是大家公舉的，所以你要當，還是去請大家來商量好了。」

孫先生說了，就去找少白、士良，商議辦法。士良聽了，孫先生說楊衢雲要當總統，他就說：

「這是不能答應的，我一個人去對付他，去殺他，非殺他不可！」

「這是不對的，殺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們還敢起事麼？照我的意見：我們到省城辦事，辦成，功那就沒有問題了。辦不成功，隨便什麼人做總統，是沒有關係的。」少白是主張穩和的，要孫先生就把總統讓給楊衢雲。

孫先生爲了革命大局，本來不想堅持這個名義的，於是同意了少白的意見，就在當天晚上開會，出席的還有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都是化學師，是孫先生從檀香山約來的。在會議席上，孫先生就自己提出來，把總統名義，讓給楊衢雲。少白和士良是早已說妥了，當然無異議，楊衢雲旁邊的人，更絕對贊成，於是會議結果，就把總統名義無理由的讓給楊衢雲了。孫先生因爲這事情解決了，第二天他就到廣州去，士良、少白等幾個人，過了兩天也去了，只留楊衢雲一人在香港。

孫先生在廣州，是住在河南歧興里瑞華坊，不叫上款天天坐定了肩輿，出去行醫，實際上是奔走革命。他爲減少病人就診，以專心革命起見，就把診金增加到十元。起初是五元定爲避免外間注目的一個辦法。那時，朱淇的哥哥朱慶生，是在清平局辦事，他知道他的兄弟和革命黨，告訴他恐權極了，就冒了朱淇的名義，託清平局勇目將黨人舉動向緝捕委員李家_四自首。李家_四得到這個報告，一杯，派兵士監視。孫先生行動，一面到督署報告粵督譚鍾麟，鐘麟問：「黨首是哪一個？」李家_四就說是「李不」。不鐘麟聽了，有些奇怪，他就笑道：

「孫文是一個醫生，他創辦農學會，李少帥（即李翰章）也贊助的。他好說狂語是有的，造反是不會的

李家軍撞了一鼻子灰就走了。他派去監視孫先生的探子，已到了河南瑞華坊，但不知道就是孫先生的寓所，很巧的遇到了孫先生的喪夫，他就問這與前報海關爲平時常見孫先生很俠義，他非常感動，知道這人來意不善，他就對這偵探說：

廣州附誌

「這裏沒有孫醫生，只有一位姓尹的醫生。」

偵探聽了信以爲真，也就走了，孫先生的口風竟得以無恙。但從此風聲一天緊一天，廣州城裏，大家都傳革命黨就要起事了。

事情是很迫切了，但是楊衢雲在香港，拿到了總統的名義，就作威作福。他要會黨三千人中開，抽出一部份做他衛隊，又挑選了比較精良的槍械，交給他的衛隊使用，準備省城佔領時，他才率領了進城。因此許多會黨都反對他，不願到省城來。孫先生在廣州，對於這些情形，還沒有知道，他祇是等着人馬槍械已到，就可發動。可是初九早上，這是預定發難的一天，忽然接到了楊衢雲的電報說：「貨不能齊，天不才知道事情是不對了。」孫先生非常焦急，就到農學會機關部和少白等商量，大家知道事無可爲，都主張延期，由孫先生打電報給楊衢雲：「貨不要來，以待後命。」這時，綠林首領，軍隊首領，民團首領等都來了，大家討口號，等命令，因爲事情中止了，孫先生只得向他們說了許多話，把舞來的錢，發給了他們，要他們回去，再聽命令。一面要少白等即刻離開廣州，因爲他知道危險的事情就要來了，再遲一刻，這許多黨人都集在這一機關裏，是容易招滿清官吏的注目的。少白等走了，孫先生才很安心的料理善後事宜。

第二天，就是九月十日了，楊衢雲却在香港，派丘四、朱貴全率領散處新安（今改寶安）縣屬深圳、鹽田、沙頭各地集中九龍的會黨二百餘人，搭保安輪船到廣州來了。清軍從多方面的偵探，也無不知道革命黨的行動，同時在清關又搜獲香港運來的短槍六百多桿，是革命黨私運的。譚鍾麟得了這訊，大吃一驚，才相信孫先生真的造反了，就急調駐長洲的營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禦，又令陸家炳率兵至王家祠嚴密搜查，陸鍾東

、程德、程奎光、程永、梁榮等五人，都被他們帶去，又搜獲軍衣、軍器、鐵釜等物；緊張的風聲就加倍的展開了。各路的會黨，已被譚鍾麟派兵守衛，也都不能起來，革命的計劃，到這時候已全盤失敗了。

皓東當時和許多黨人，奉孫先生命令，暫時離散，本來是要到香港去的，但到了船上，忽然想起還有一面青天白日的革命軍旗留在機關部裏沒有取出，他決然的不肯將這面旗落在敵人手裏，趁船未離岸，就跳上碼頭回到機關部裏，將那面旗取下來，摺疊好了，交給一個同志說道：「我上岸的時候，看見有幾個偵探模樣的人注意着，大約是走不脫了，你將這旗收藏起來，交給首領罷！」果然，他出機關部的門外，不多幾步，便遭拿捕，他這種愛護革命軍旗的偉大精神，就永遠照耀在歷史上了。

第三日，保安輪開到廣州、南海縣令李徵鴻已派兵守候。船上本運來槍械七箱，預備起事用的，但上面已壓了很多笨重的貨物，二百多健兒一時無所措手，只得無抵抗的就捕，被捕的有丘四、朱貴全等四十餘人，其餘就一開而散，籌備很久的起義，就此失敗了。陸皓東、丘四、朱貴全，就做了第一次爲中華民國奮鬥第一次犧牲的同志了！李光也就從此處死獄中，可勝浩歎！

孫先生在這緊張的空氣中，雖是遭逢着第一次的失敗，但始終是抱着鎮靜的態度，他知道一個人在廣州是無法挽回了，因此從家裏檢點了幾件應用物件，很安閑的走出，略一顧盼，就昂然的去了。他們家人還以爲是尋常出門，不知道外面的風聲已經很緊張，只是孫先生以大無畏的精神鼓勵着，因此在外表上沒有一些會黨的形色表現罷了。孫先生從家裏走出來，並不馬上就離開這危險的廣州。這一天晚上，王煜初因爲出婢女兒，在大基頭宴客，孫先生還是很從容的赴宴。煜初是香港道濟會的牧師，孫先生在維多利亞醫院時認識的。酒過半巡，才走近他，向他耳語，把失敗的消息，告訴他。說了，就站起來向許多客人敬酒，說道：

「對不起，我因爲有要事先走了，請大家共畫一杯，後會有期！」

於是就舉起酒杯，一飲而盡，許多客人也大家把酒杯舉起飲着，滿室散佈了愉快的空氣，孫先生就含着笑容向大家鞠躬而去。隔了十幾分鐘，譚鍾麟派來的人已經趕到，却不知道孫先生早已走了。許多客人才驚

奇 孫先生似有神術。這樣的鎮靜，而又這樣的敏捷。

第十五章 亡命

有人說 孫先生從不知道怕是什麼，他的勇敢之氣充塞於精神和身體上，而用智慧以駕馭；很像放炮騎車的時候，高下隨心而定。這是很確切的認識，在這第一次失敗的事實中，這種勇敢而又敏捷的精神，已經充分的表現了。孫先生的偉大，不是一二天和二二件事所表現的，他是整個的偉大，永遠的偉大。

我們看這次廣州起義失敗了，慘殺的，被捕的很多，廣州已滿城風雨了，但孫先生不慌不忙的從王家臺會中出來，就坐了一隻小輪船駛到香山唐家灣，這輪船是孫先生預定的，他並且已學會了開船的方法，因為他早就計劃過，如果從廣州就到香港，一定被清吏跟蹤而至，所以他必須要這樣的打一個灣，這是多麼有機警的謀慮？清吏是無可如何他的。他到了唐家灣，就坐肩輿到澳門，再從澳門搭輪船到香港，這樣經過了幾個灣，到香港時已隔了二天了。廣州懸賞捉拿革命黨首領的花紅單，已經貼出了。香港的同志，大家很着急，以為孫先生遲遲不到，恐怕有不測了，直到孫先生安然抵港，大家才知道孫先生是妙算如神。

孫先生到了香港，香港政府已經接受廣東總督的要求，有放逐楊衢雲、陳少白和孫先生五年的命令。

孫先生再沒有立足香港的餘地了，就去請教廉德黎，要他想辦法，廉德黎因為這是法律問題，就介紹去問達尼恩 (Dennis) 律師，達尼恩說：這是沒有辦法的，還是離開香港最好。這是孫先生第一次的失敗，也是第一次的亡命，他到那裏去呢？他就和少白、士良商量，決定到海外去。但是當天一隻到安南去的船，是貨船，不能乘客的，最後就坐了廣島丸，第二天早晨開往日本去的。船上祇有四個艙位，孫先生就約少白、士良同去。那時楊衢雲最機警了，早在一兩天以前，把辮子剪去，做好幾套西裝，衣箱也打好了，囑咐車夫一步不能離開，一聽到省城失敗的消息，就坐着他的手車，預先叫人把船票買好，頭也不同，一氣坐船到印度的加爾各達

去了。到了印度，還恐怕離中國不遠，便又從印度到非洲各地去。

廣島九出了香港口，就遇到大風，一路上顛播震盪，經過十四天，才到日本的神戶。到了神戶，看見日本報上有：「中國革命黨孫逸仙」等字樣，大家興奮極了，因為這第一次的失敗，已經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中國革命黨在隣國已經響亮的在喊起來了，這不是說他們一個最好的精神上的安慰麼？

他們在神戶住了一天，就到橫濱。那時他們在日本差不多沒有一個熟人，孫先生却記起了去年經過這裏時來訪問他的譯發了，就到他的洋服店裏去找他。譯發一見孫先生快樂極了，立刻替他們在山下町五十二番找了一個住所。這住所是一間狹窄小的樓面，只能容六張蓆子，孫先生倒很滿意，就和少白、士良三個人一起住下。這裏是離開了滿清政府的勢力，他們再不能追上來了，大家就很自由自在的在外面遊逛，孫先生却坐在家裏看書的時候多，這是他第一次的亡命生活。

在這安閑的亡命生活中，孫先生是不是從此做了逃遁客，不再奮鬥呢？不是的，孫先生悟了這機會，就努力推廣與中會的工作。大約又隔了二三天的光景，譯發就介紹幾個人來見孫先生，其中有一位馮鏡如，是在橫濱開外國文具店的，又有一位馮紫珊，是鏡如之弟，也是開文具店的。孫先生就對他們演說革命的道理，要他們組織與中會橫濱分會，當場就派定馮鏡如為會長，趙明樂為司庫，趙耀宗為書記，馮紫珊等為幹事。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號設立秘密會所，這地方接濟滿清政府的駐日領事館，黃龍的旗在領事館前面逆風招展，似乎正在對孫先生威脅，這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使孫先生格外的引起刺激而增加了拱滿的情緒。但那時中日戰爭已經結束，馬關條約的毒果，中國雖是喪失了很大權利，人民儘是盡力的反對。但滿清政府漫不經意的繼續和日本親善，而世新公使立刻要到日本來就任，因此日本政府允許滿清政府引渡革命黨的謠傳，就跟着這中日邦交恢復中起來了。孫先生知道從此不易活動，就一面要龔士良回國，收拾餘衆，準備捲土重來，一面自己計劃再到檀香山去，然後週遊世界。那時孫先生好似在漫漫的長夜中，滿地都是黑暗，他悲憤鬱在在海外，不知道那一天才能回國？遙望着四萬萬人沉淪的國難，祇有黯然傷心，也就決心剪去頭髮，換了西裝，永遠

的在海外奔走，去喚起華僑民族的思想；做改造祖國的發動力。

孫先生到檀香山，原定計劃是要少白同去的，但那時檀香山島剛被美國會併，禁止華人進口，孫先生說明他是檀香山出生，美國領事才給他護照，因此少白只得留在日本，孫先生就一個人到檀香山去了。孫先生離開日本時，介紹一個日本朋友實原傳給少白，是從前他在檀香山時相識的。後來少白由實原傳的介紹認識會極俊虎，由俊虎而認識宮崎野藏，即宮崎寅次郎的哥哥，革命黨和日本人士的交遊，就在這個時候開始。

這是孫先生第四次到檀香山了，他帶着革命的失敗消息，舊日的親友都要爭着這一個爲革命而奔走的領袖。中西演說會特請名人演說，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歡迎孫先生登岸。德彰公一見了孫先生，愉快萬分，就對他說：

「你辛苦了，但是這不算一回事，應該還要繼續幹下去。」

孫先生得了哥哥的安慰和勉勵，非常感動，就準備再把與中會擴充，以增加革命的勢力。於是在隆記報館設立機關，召集同志，討論促進與中會會務的辦法。但當時一部份同志因爲知道第一次起義失敗了，不免有些灰心，一部份同志都聽得在廣州已舉起了義旗，就踴躍的到那邊去準備參加起義了，所以到會的非常寥落，孫先生就決心加以改組，請預會的同志，對訪香港與中會的辦法，要舉行宣誓式，由孫先生自己領導，把聖經展開拿在左手，右手向上高舉，懇切的向上帝祈禱，求上帝鑒察，然後照宣誓書宣誓；其他同志也仿式循次舉行。這個形式，也許孫先生爲檀香山同志特立的，因爲這裏的同志，大部份是基督教信徒，所以必須先要向上帝祈禱，是一個變通的辦法。

經了孫先生這樣的提倡，檀香山華僑對於集會的興趣，才漸漸地增高起來，隔了幾天開第二次會的時候，到會的就有百多人，第三次開會更多了。並且有許多熱血的同志，都想立刻回國去籌革命軍餉，孫先生就替他們組織軍事訓練班，借佛蘭耶文的真理教室，做操練地點，請了一位丹麥人會說英語中國南洋練兵教習隊長叫做伯的，担任教練，每星期操練二次，用木槍代替真槍。參加操練的有葉桂芳、鄭照、鄭金、

社守備、許直臣、韓慶臣、陸燦等，大家都很認真的操練，準備做革命的戰士。但當時因為風氣所限，孫先生一切的計劃，常常遇到挫折，覺得久留了也沒有顯著的進展，就想到美洲去，因為那邊的華僑比檀香山多，如果聯絡得手，力量是很大的。

在孫先生到美國去行期剛決定的時候，一段巧遇的故事却展開了。事情是這樣的：那位康德黎老師，自去年孫先生廣州失敗從香港出亡時，急促間，沒有機會知道孫先生是那兒去的，就此消息，隔絕了很久。最近他因為回國，也到檀香山來了，這是他的老例，每次回國經過這裏時，他總是登岸遊覽一下的。這一天，他和他的夫人，還有一個日本人的女僕，坐了馬車在街上遊覽，突然跳上了一個短絨西裝，神采奕奕，很像日本人的樣子而又魁偉的丈夫，他們驚惶的疑心遭遇了暴客，康德黎就叫日本女僕用日語問他，他搖搖頭却說着很流利的英語道：

「我是孫逸仙！」

「原來你就是孫逸仙，你為什麼這樣打扮，我簡直不認識了。」康德黎略定了神，表示很愉快的語氣說。於是大家很親熱的握手。孫先生也就登上馬車，替他們做遊覽的嚮導，一直送他們到船上，孫先生對康德黎說道：

「我想不久要周遊環球，最近先到美洲，再從美洲到英國，到英國來時，一定拜訪你們，我們相見的時期大約是不遠的。」

「那一定歡迎，希望你到英國時，一定要到我們家裏來。」

大家就很歡喜的握手道別。隔了幾天，孫先生也就到美洲去了。美洲的華僑，果然甚多，但風氣的蔽塞，比檀香山還甚，所以孫先生從太平洋東岸的三藩市登岸，橫過美洲大陸，到大西洋的紐約市，沿途所到的地方，有的留住了幾天，有的住了十幾天，都盡量地向他們演說：「國危急禍很了，滿清政府太腐敗了！是救不住的，必須發從兵燹中改革做起，才救挽救危亡，這個重大的責任，是大家每個人都有份的。但是他們

聽了似乎不在意的樣子。真正歡迎孫先生革命主義的，每一個地方不過幾個人，多至十幾個人罷了，這真是醫務得連一線微光都沒有了。

但是美洲華僑對於革命不是沒有希望的，他們向來是立有洪門會館，這洪門是明末遺老傳下來的，他們都是明代的忠臣烈士，自明室覆亡以後，努力恢復運動，立志不願在滿清皇帝下面去做官，因此不斷地向滿清政府反抗。到康熙時代，滿清政府的地位已經鞏固了，這些忠烈的志士，也都先後死亡，剩下來二三個孤零零遺老，見大勢已去，無法挽回了，才把民族主義的根苗，變爲「反清復明」一個簡明的口號，團結一部份人而創立洪門，這是與哥老會、三合會一脈相傳，都以反清復明做目標的。但時代湮遠，他們幾乎數典忘祖，華僑的所以有洪門會館，不過爲了患難相助罷了，政治的意味，已經一些沒有留傳了。孫先生知道他們有洪門會館，就問他們「反清復明」的口號是什麼意義？大家都不能答覆，但經了這一問，他們漸漸地有些覺醒；所以後來革命同志到這裏來一宣傳，他們就恍然大悟，他們原來是民族的老革命黨，於是大家都樂於參加革命，這一次孫先生到美洲，雖沒有顯著的成績。却已散播了不少的革命種子。

孫先生這樣的一路宣傳革命，推廣黨務，却不曉得滿清政府正在四面八方偵探他的行動。從廣州失敗後，兩廣總督譚鍾麟就報告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說他到新加坡，不久回香港，要英掠沙面洋行，以報復前次的失敗。總理衙門根據這個報告，就嚴密注意孫先生的行動。當孫先生從日本到檀香山時，滿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就把這個消息報告總理衙門，他們想等孫先生到檀香山時設法逮捕，但因為檀香山係無約之國，美國交犯專約也沒有訂立，非常着急，就打電報給出使美國大臣楊儒，要他注意。大約六月二十四五左右，孫先生從檀香山到了三藩市，準備往歐洲去，楊儒已經知道了，就向總理衙門請示，總理衙門立刻要他調查孫先生到歐洲那一點？同行的什麼人？並且要他和出使英國大臣照會商量，等孫先生到英國時，援香港、緬甸交犯條約代拿；如果孫先生到新加坡，準備內渡，就電知粵督預防。這樣一來，照會也在英國注事孫先生的行蹤了；他和楊儒往返商討交犯條約的辦法，他們以爲要英國代拿或交出孫先生是不成問題的。

却沒有注意這是政治犯。這時候，總理衙門不知怎樣得到一個消息，說孫先生在三藩市購買軍火，就一面派格庚在橫濱查探，因為美國船到香港，必須先經日本橫濱，一面派金爾廣總督譚鐘麟和廣東巡撫馮許振樟，先期購線跟蹤，會同稅務司密巡。後來楊儒從美國打回電報來報告，說孫先生並沒有購買軍火，現在要到英國去了。滿清政府對於孫先生真是恨到切骨了，這樣四面八方的偵探他，正像撒下了一個很嚴密的大網，使孫先生無法逃避，於是孫先生蒙難傳教的悲壯歷史開始了。

第十六章 倫敦使館蒙難

紀元前十六年（一八九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夜間，龔照燮接到從美國楊儒來的電報，關於孫先生到英國的消息，是說孫先生定於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搭 White Star Line Mercatic 輪船，到英國利物浦（Liverpool）上岸。這是給他報効滿清政府最好的機會了，於是就叫一個英國人參贊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專心辦理這件案子，馬格里就僱了司類特偵探社（Slaters Detective Association）派人到利物浦去守候。九月三十日上午十二時，孫先生真的從美國到利物浦來了。孫先生上了岸就從利物浦密德蘭車站（Midland Railway Station）坐火車到倫敦，已是晚上九點多鐘了，就到斯屈朗海色爾旅館（Hartells Hotel, Strand）去休息。這一切行動，都被偵探看得很明白，完全報告了中國使館。

孫先生略略的安頓了，第二天就到波爾德（Portland Place 倫敦區名）譯文省街（Devonshire Street）四十六號，去拜訪康德黎，這是該樓高時的約定。康德黎夫婦一見了孫先生，快樂極了，竭誠的招待他，要他就搬到附近的霍爾區（Holborn）葛蘭德街（Gray's Inn Place）八號，好讓他時常來看他們。孫先生也樂悠閒的住下，常常到佛立特街（Fleet Street）羅姆特場（Ludgate Circus）牛津街（Oxford Street）等地遊覽。他看見與旺盛的實業，往來頻繁的電車，雲集而鎮靜，並不像中國都市的喧嘩紛擾，而且警察嚴密

，人民和黨，使他悠然神往的曠曠羨慕。

那時，出使英國大臣羅爾遜早已在報章對維新黨門。而馬格里已經和英國政府辦過交涉，要英國引渡香港、緬甸交犯條約，代拿孫先生，但英國政府這條約上難適用那兩處地方，在倫敦是不能照辦的。因此他還有派偵探跟着孫先生觀察他的行動，隨時報告維新黨門，也就是這樣幾點。隔了二天，魏照堯不知從什麼地方，得了一個消息，說孫先生要回法國去了，他就叫法國使館預防着，但是他的議員處常（當時魏照堯是公使）使法國大臣，法使館的專情，是應當代為負責的。從法國答覆他，說法國對於這種案件是不十分留意的，而英法同例，怕對於孫先生也不能隨便處置。這樣一來，魏照堯對於孫先生是沒有辦法了。但是我們革命領袖的一段悲壯的被囚禁的歷史，終於展開了，這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

十月十一日孫先生被禁在使館了，這一段有聲有色的歷史，在孫先生自己的記載中，說是被使館中人誘迫而進去的，但從許多可靠的史料推究起來，是孫先生乘有大無畏的精神，親到使館來宣傳，才被他們擊破而拘禁了。孫先生說被誘迫而進使館，是在國際上宣傳清政府的罪惡和愚妄的一種方法，所以後來也會經自己表示過，是說自己進去的。這是孫先生一生最重要的事實，也是中國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事實。

事情的經過，大概是這樣的：從康黨家裏到中國使館是很近的，因為都在波德蘭區。孫先生在前一天從萬蘭旅店街走出來，想到康德家裏來和他談天，但在路上，警眼看見中間使館的大門，他就大膽的進去，想去窺探虛實。恰恰碰到了一個使館的翻譯郭廷鏗，也是廣東人，他們就以同鄉的資格來談話了。然而這是極大的冒險呀！雖是孫先生自己說姓陳名載之，但他是整個滿清政府欲得而甘心的人，他們終於看破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革命領袖孫先生。於是這機關而善於做滿清政府奴隸的郭廷鏗，不動聲色和孫先生假意親善，約他明天到這裏來吃午飯，坦白的孫先生毫不疑心的答應了他。魏照堯和馬格里知道孫先生已進到過使館，他們得意極了，就準備第二天等孫先生來後的應付辦法。

第二天就是十一日，孫先生果然應郭廷鏗的約而來了，這時候，已到吃午飯的時候了，孫先生就和郭

廷鏗使館吃飯。飯吃過了，鄧廷鏗引導 孫先生到第一層樓上參觀了一週，又到第二層一個使館職員李盛鐸的房間，大家坐下談話。這時候馬格里來了，鄧廷鏗就對 孫先生說：「請你再上一層到我的房間去坐坐好嗎？」 孫先生隨口答應了就跟他們走上去，馬格里在前面引導着，走到了一個很小的房間門口， 孫先生看見這一間小屋，只有一個窗，窗外有鐵欄圍着，從窗外看去，知道這是在使館裏的最後一邊了，心裏才有些驚惑，他們爲什麼引我到這裏來？他不知道馬格里是誰，起先沒有留意他，這時候，他一面要 孫先生進去，一面很傲慢的對 孫先生說：

「你就是孫文，我接到中國美公使的電報，他們告訴我，你坐了麥錫斯輪到英國來，並教我捕你，現在這裏就是中國，你到了這裏，就是到了中國。」說罷，就關上了門，又上了鎖，和鄧廷鏗去了。這時候， 孫先生就是在鎖鑰之下的囚徒了。

孫先生被禁了，公使館中像得到了一件珍寶，全體都緊張起來。龔照璠一面打電報給總理衙門，說 孫先生改姓換名自己到使館來了，按照國際公法，中國使館就是中國地方，所以把他扣留，但解回廣東，很不容易，只好相機辦理了，請總理衙門給他一個名號，但不必使英國駐華公使知道，（當時英國駐華公使是費納樂），一面派郵廷鏗帶同武弁車練文和洋僕二人，輪流看管，不准洩漏消息。第二天，總理衙門就來了一回電，說不給英國知道這件事是很好的，要解回廣東，最好也不要讓英國來干涉，一切務須和律師詳商，如果和英國政府鬧翻了，被他們出來袒庇，事情就糟了。龔照璠接到這個回電，就很小心的要荷查着怎樣的把 孫先生能夠安然解回廣東，以滿清政府的重賞。

在重圍中的 孫先生，再不能搖撼而飛了，他知道已處在危險的境地，因此當被禁的數小時後，就想起龔照璠來替他援救，但是身上的鑰匙，鉛筆，小刀，以及紙片都被他們搜去了，因此只得在名片上寫了這樣的幾句：

「我於星期日被綁架到中國使館裏面，將要被偷運出英國到中國去受死刑，求即速援救！」

「致康德黎博士，譚文省街四十六號。」

「目前請照應這個送信的人。他很窮；爲了替我工作，他不免失業。」

孫先生寫好了，就請添火爐煤炭的那個英僕帶去，他答應了，隔了一回，另外一個英僕也進來了，也同樣託他，他也答應了。但後來知道他們都沒有把信送去，直到其中一個英僕叫柯爾（Cole）的，說出來了，才確定這些信不但不送到康德黎，却都送給偽常真的長官。

孫先生被禁的第四天，使館已經決定僱了一只船，把孫先生解回廣東，於是由鄧廷鏗來討孫先生的口供，但是他還要用很婉轉的口氣對孫先生說：

「那天我將你扣留，這是我的職務方面該如此做，也只好公事公辦，今天我來看你，却是用朋友的資格與你。現在你最好是直認你是孫文，什麼都完了，你也無容抵賴。」他接着又會談帶帶的假意殷勤地說道：「你在中國已經很有名望了，皇上同總理衙門都曉得了你的歷史，一個人得着這樣的盛名，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你在這裏，就是生死關頭，你知道麼？」

「爲什麼？」孫先生問他，「這裏是英國，並不是中國，你們想把我怎樣處置？你們如果想把我引渡，你們必先把我被捕的詳情，照會英國政府，我想英國政府未必肯讓你們把我引渡。」

「我們並不正式引渡你，現在事已辦妥，輪船已僱定，只消把你捆綁起來，塞住你的口，送到船上的秘密地方，就立刻開船。一到香港口外，有中國炮船在那裏等你，那時就用炮船送到廣州衙門，審問過了，就可以正法。」

「這種要點，未免魯莽吧，」孫先生很鎮靜的對鄧廷鏗說：「因爲我也許有方法在船中同英國人暗通消息。」

「你一經要點，就係在這裏一樣受嚴密的監視，杜絕一切脫離的機會。」鄧廷鏗以爲孫先生所想像的一定辦不到的，所以這樣說。

「但是船上員司的心理，未必與使館裏的人一樣的，也許會有人和我表同情，援助我。」

「那輪船公司和馬格里是很要好的，當然要遵守他的囑咐而行，決不能幫助你的。」鄧廷鏗說到這裏，歇了一歇，又說道：「那是格楞（Glen）公司的船，但是這星期中，怕不能成行，因為公使要節省經費，不願買你這艘雜船，叫他們先裝貨物，貨物裝好，便只花包旅客票這一筆費了。等到下星期，貨物可以裝好，那就是你解回中國的時候了。」

「這個計劃，恐怕辦不到吧。」孫先生還是很鎮靜的回答鄧廷鏗。

「如果怕辦不到，我們就可以在這裏把你殺死，因為這裏就是中國，凡公使館裏的事，誰也不能來干涉的。」

「那末，你們未免太殘忍了！」

「這是皇上的命令，無論是活是死的，只要能拿着你，就有很大的酬報。」

「將來英國政府也許要求中國把你們使館裏的人全數懲治。況且你又是我的同鄉，我的黨員在廣東很多，將來出來替我報仇，不單是你危險，就是你的全家也很危險。」

鄧廷鏗聽了孫先生這樣一說，面上立刻現出驚慌的神氣，於是停止了他那種傲慢的口吻，說道：

「我是照公使的命令行事，此來不過因私憤的關係，向你警告一下罷了。」說罷，就出去了。他出去以後，就在廳照壁面前，把和孫先生說話的結果，詳細報告，圍此公使館當天就打了一通密電到總理衙門，說是船已僱好，價七千鎊，或解或釋，請示辦法。第二天，總理衙門就來了回電：「購商船送解粵，係上策，即照行，七千鎊不足惜。……惟登舟便應確鑿，管解亦須加慎。」這樣，一切計劃，都備置就緒了。孫先生的命運，已完全操在他們的手裏了。鄧廷鏗於是又到孫先生前面，假仁假義的說是幫助孫先生。要孫先生自己寫信給馬格里，極力表白，說廣州的事情，他沒有參加，所以特地到使館來求昭雪。孫先生在這山窮水盡的時候，只要有一線生機，當然不會輕意放過，因此就照他們的意思，寫了一封信，但是鄧廷鏗拿了這

封信去後，就不看見他的影子了；孫先生於是籌備起來了。無疑的，這是他們預定的計劃，要孫先生給他們一個文字上的證據，說是他自己到使館來的，等到他們把孫先生送回廣東去了，以便掩飾他們綁架的嫌疑。

孫先生一切絕望了，他在狹小的房間裏，有什麼方法把消息傳到外面去呢？於是盡他所能找着的紙片，都一一把他利用起來，把他被難的情形寫在上面，擲到廊下的階外。起先是叫僕人拿去郵，因為他被禁的屋子，並不臨街，但是，這些都被扣留了。於是他才想由自己的窗子裏來郵，因為想把這種信擲得遠，就裹上銅幣一層，銅幣用完，就代以二仙的銀幣，這都是在搜查時幸而遺留下來的。但是這些紙片，雖是有的拋到了鄰家的窗簾或其他地方，其中一張，却就落在孫先生屋子的窗下，於是叫一個西僕——不是柯爾——拾來再攔，可是他反把這情形告訴了使館裏的人，他們就立刻在孫家屋上四面搜尋，把所有拋去的紙團都拾去了。因此不一日，他們就把窗子用螺釘釘起來，孫先生與外界的交通，便從此完全斷絕。孫先生失望極了，只有禱告上帝，藉求自慰，他眼看著淒涼的夏日，與更凄苦的長夜繼續進行着，要不是把腦筋來安慰，真的要發狂了。

這是十六日的事情罷，是孫先生被禁的第六天了。那天，孫先生在羸弱後站起來，忽然覺得胸中充滿了一種甯靜，富有希望與自信的心情，好像明示他的祈禱已上達於天聽，給他不少的希望，似乎一切尚有可為。因此孫先生決定再奮鬥，向那一個比較忠厚的英僕柯爾作一度的懇求；要他幫助。這時候，柯爾進來了，孫先生就很懇切的問他道：

「你能幫我盡力麼？」

「你是什麼人？」

「我是逃至外國的中國國事犯。」孫先生這樣的回答他，但覺得他不甚明瞭自己所說的意義，於是又問他：「你知道阿美尼亞人（Armenians）的事麼？」他說很懂得。於是孫先生就把這事說來，告訴柯爾：中國皇帝要殺他，就如土耳其蘇丹要殺阿米尼亞的一切那教徒一樣。中國皇帝之所以要殺他，就是因為他

是那教徒，並且是一個力求政治改革的革命黨人，最後，孫先生還鄭重的說：

「你們英國人，是沒有一個不和阿米尼亞人表同情的，因此我知道大家對我也是一樣的表同情，假如大家都知道我的情形。」

這極富有感動力的言詞，終於打動了柯爾的心坎，但是他對於英國政府不肯幫助，孫先生，是一個疑問。於是，孫先生告訴他，英國人一定肯幫忙的，若不然，中國使館只要明告英國政府把他引渡，爲什麼一定要嚴密的把他幽禁在這裏？孫先生又進一步說：

「我的生命，完全在你手裏，你如果肯把我被囚的事情，傳播出去，我就可以得生，不然一定是死。你以爲是救人的好，還是送人死的好？你以爲我們的責任，對上帝重呢，還是對僱主的重？你以爲保護公正的英國政府的光榮好，還是幫助腐敗的中國滿清政府的罪惡好？」

這樣反覆的說着，懇切的感動着，任何人都要感奮起來，願意出死力來救助了，但，孫先生不就要他表示意見，還是很鎮靜而又廣說的要他對，孫先生所說的話，仔細考慮一番，下次進來時，再切切實實的回答，他是否願意救，孫先生。

公使館對於，孫先生這樣的拘禁，在國際上本來是不對的，所以在拘禁後的第六天，孫先生圍然是很着急，緊要環第就請總領事了，因此這一天又打了一個密電到總理衙門說：「扣留至今，多無知者。釋放亦宜早，免礙航路。乞指示。」這大概所僱的船，貨物不能夠就裝好，時間延長起來，他們有些張惶了。

在這緊張的時期，孫先生的救星終於到了。這是和柯爾談話的第二天的早上，柯爾竟來了，這是可想而知，孫先生是怎样地在急盼着他的回音。希望之門遂開了，柯爾把回音寫在一張紙上，夾在煤斗中，暗示着，孫先生去拿。孫先生當他去後，就很快的去拾起來唸着：

「我可以爲你送一封信到你的朋友那裏去；但是你不可以在棹子上寫，因爲外邊從鎖鑰洞中看進來是很明白的，外面看守常常注意你。你必須在你的床上寫才好。」

我們要感謝這位使義的柯爾，他給孫先生一條生路了。於是孫先生依照他的話，伏在榻上，面對着牆壁，拿出一張名片寫幾句話給康德黎。等柯爾進來時，指示了放的地方，他走去拾起來，孫先生又把所有的存錢，大約有二十英鎊，都給他做酬勞；他拿了就走。

柯爾拿了這一張雜碎的中華比國創造者的生命的救命書，怎樣的去奔走活動呢？然而實際發動的，倒是他的妻子，因為他不能即離開使館，所以他的見義勇為的妻子就替他去做一件歷史上最光榮的工作了。那是在深夜十一點三十分鐘了，康德黎家裏，忽然門鈴響起來，康德黎很驚奇的從床上起來，打開門來，不會看見人，祇見一封信，是從門底下的縫裏塞進來的，他就檢起一看：

「你有一個朋友，從上星期一起，被囚在中國使館。他們打算把他送回中國，到了中國以後，他們一定會把他殺了的。這個可憐的人，真是慘極了。除非立刻有辦法，他就要被解走，並且不會有人知道的，我不敢簽我自己的名字，但是這件事是真的，請你相信我所說的話。你能盡什麼力就立刻盡，不然來不及了。他的名字，我相信是叫 (Sin Yin Sen) 了。」

這就是柯爾的妻子送來的信，康德黎看了，非常着急，就不顧深夜，到梅爾蓮 (Marylebone) 巷的警察署長那裏去，又從那裏到蘇格蘭場 (Scotland Yard) 總警署去。他把孫先生這一件非常的事情報告了，但他們都說這件事與他們無關；並且說他報告過他們以後，他的責任已盡了，他應當回家去，不要做聲。康德黎這時候已是早上一點三十分了，於是祇有回家去休息。第二天，他一早起來，就到他朋友那裏去商量，又到孟生博士的家裏。孟生博士，也是孫先生在香港雅羅氏學校時的教師，康德黎走到門口時，却遇見了柯爾，原來他已鼓勇勇氣自己出來要把孫先生被囚的種種秘密消息發表出來，並且他已經到過康德黎家裏，知道他到孟生博士家來了，所以趕上來的。柯爾見了康德黎，就把孫先生的信拿出來，這封是：

「中國使館已經雇好了一隻船，載我回中國去。我沿途將被封鎖起來不能與任何人通消息。唉！我的

大難到了！」

柯爾又告訴他們說，中國使館藉口 孫先生是一個瘋人，下星期二，就是二十日，就要把他解回中國。『如果馬格里在這裏，這件事還有辦法。最可惜的，是他不在這裏，我們到那裏去找他呢？』康德黎很婉惜的說，因為他昨天晚上已經找過馬格里，知道他到那裏下去了。

『馬格里是在城裏，他天天都到中國公使館裏，把孫君幽禁的就是他，要我嚴密防守着，不教孫君逃脫的，也是他。』柯爾很坦率的說了出來。

這是一個可驚的報告，康德黎和孟生立刻感到營救計劃格外的困難，格外的覺得沒有把握。他們決定小心從事，要倚靠最高的權力機關降服這般狡猾而有力的人。

他們一面寫了簡單的回信，教柯爾拿回去安慰 孫先生，一面再到蘇格蘭場要求警察廳出來干涉，但結果還是無效。他們着急了，於是到外交部去試一試，但是這天是星期日，沒有辦公的人，祇遇着一個值星的書記，他們把這些詳細情形報告了，他允許於次日將這件事呈報上級官長。可是事情太急了，不幸的悲劇也許就在目前。終於由孟生獨自到中國使館去，要求見 孫先生，以為這是使中國使館裏的人有所顧慮，但出來接見的，就是狡猾的鄧廷鈺，他以最虛偽的言詞應付了孟生。

這一切都無結果，怎樣辦呢？仗義心腸的康德黎並不因此灰心，他深怕 孫先生當夜就起解，就決定去找偵探以監視使館的行動。他就到佩星和爾街 (Beving Hall Street) 去找司賴特偵探社了。這是多麼危險呀！這偵探社就是馬格里僱用來偵探 孫先生行動的一家，現在康德黎却也要他們偵探中國公使館。做伴極了，他們因為是星期日，沒有一個人辦公，康德黎很失望的走了。他們的焦急，當然是到了極度，但是他沒有知道這是對 孫先生命運的一大關鍵，要不是這樣，給馬格里一切知道了，孫先生就立刻被他們毒害，等不到幾天以後，英國外交部出來交涉了。

康德黎從佩星和爾街出來，經過許多周折，才僱到了一個偵探。並且乘便去訪倫敦太晤士報的記者，他在一張會客的緣由單上，大書：『中國使館之誘捕案』(Case of Kidnapping at The China Legation) 但是

一向持重而帶有紳士氣味的太晤士報，當然不肯冒昧發表。這時已是晚上十二點鐘了，偵探還沒有到，他很不放心，就親自從家裏出來到使館監視，必要時還須要干涉。但一到門口，這偵探來了，便一起坐上馬車到使館那邊去。

這是一個月光皎潔的晚上，孫先生因為中午時候，從柯爾送來的煤斗中，得到康德黎和孟生的回信，他精神上得着極大的安慰，幾天來驚心駭魄的生活，到這時候才定了神，他安然的休息了。却不知道他的老師面兼朋友的康德黎正圍着寒冷的夜氣，坐在街頭所禱他的命運。玻璃窗從月光和燈光中，映演出種種情況，一切無可掩蔽的，康德黎看見沒有什麼異樣的變動，他就很安心的回去，這時候已是二點多鐘了。

十九日是星期一，也就是發動警放。孫先生的第二天，康德黎又添了一個偵探，但是這天英國外交部長沙理士堡（Salisbury）侯爵知道了，一方面教康德黎進呈一個節略，一方面用外交部派了六個偵探在中國使館四周守候，於是孫先生的危險，到這時候可以說是沒有了。第三天沒有動靜，假定柯爾所說這天二十日起解的話是真的，使館也沒有辦法了。第五天上午，英國外交部次長由德森（T. H. Cadogan）有一專函致馬格里，叫他下午去見總長沙理士堡侯爵。大概馬格里的外交手段不得結果，據說英總警長預備用人權狀向中國使館提人。就在這一天（二十二日），孫先生在幽囚的小室裏，經柯爾的巧妙傳遞的方法中，看見地球報（The Globe）上有這樣注目的題目：

「可驚可怕的新聞——革命家在倫敦被誘幽禁在中國使館內。」

接着就記載詳細的情形。無疑的，這是康德黎努力的結果。孫先生見到英國輿論界出來干涉了，知道生命可以保全，心中充滿着感激之忱，就如已經定罪的人，遭逢了大赦一樣。

二十三日下午四時，英國外交部正式派員到中國使館要人。在這時候，中國使館不能不把孫先生交出來。遂由馬格里引着孫先生下樓，出見康德黎和外交部所派人員等，於是孫先生毫無驚慌的問記者和人人山入海的羣衆中，走出了中國使館的門口。晚上，回到康德黎家裏，他全家的人，都很快樂的歡迎着，大家舉起了

酒杯，向孫先生的頭顱祝禱。

第十七章 完成三民主義

孫先生倫敦藏難這幕悲劇告終了，他在實際上却成了一個名聲赫赫的大人物。營事情擴大以後，倫敦的報紙除地球報以外，也都用大字登載起來，最令人注目的就是荷蘭教授（Professor Holland）在倫敦泰晤士報上所發表的論文，引起檮文狄希（Mr. Cavendish）胡特（Mr. James G. Wood）等的討論，他們對於國際法的研究頗很有聲望的。十月三十一日發言者報（The Speaker）還在繼續刊載關於孫先生案件的言論，一直到十二月三日，香港支那郵報更發表了一篇關於孫先生的歷史及主張比較詳細的論文，使貼牌香港的廣東政界，格外驚駭。所以當時海軍衙門派駐英使館的一個叫做凌鳳的，在他的日記上，這樣的記載：

十九日，（即十月二十五日）據孫文一案，反為該人成名。當解放時，有某同黨梅生等發報請諸人，齊門探討。翌晨時報，大發議論，並繪其像，謂黨被囚時有人告曰，此蓋匪黨同黨，當鼻首；或用烙毒，成實水銀，裝籠帶回。但在他國之地，豈能行仇讎之法。然此密謀，他人不知，何以別生機節如是？這是確實的，孫先生得着這樣一個機會，使他的成名格外快，並且更迅速的促進他事業的完成。但是使館的烏道，魏毒等密謀，如果做到了，孫先生也就完了，所以凌鳳怪外間怎機會知道這事，使滿清政府的罪惡，隨着孫先生的聲譽同樣的宣揚開來。

孫先生從使館出來以後，新聞記者和文人學士來訪問他的，絡繹不絕，他把這事情經過情形，一一回答他們，幾乎使他舌乾唇焦，大約隔了二十天左右，就從德輔道中回到原住的寓方，就是寬蘭旅店街八號。

可是滿清政府對於孫先生案件這案，是不肯干休的，所以孫先生要很久的寄居德輔道中。從二十三日，孫先生出使館門口起，就又緊跟着他的行蹤，而從事勸導偵察了。同時，北京總理衙門還是怕孫先生

困難，所以又有美國政府應允經費和實業家捐資等辦法在英、美、日、香港等處相繼發採。直到美國報業經理衙門，說：「孫先生在倫敦，一時不復回國，但該國報界採擇遠在東方屬國，甚至妻等孫先生一到香港，就實行暗殺，不使他生還。」孫先生和漢口政府，真是對不兩立了。

孫先生脫險後在他的生活怎樣呢？這却之無不應酬司職特許許多偵探的一番忙碌，使我們得到不少的材料。這報告自十月二十三日起一直到第二年的八月十二日止，那時孫先生已經離開英國往加拿大到日本去了。他們所報的，當然只是一些表面的行動，但這究竟是那時期，孫先生比較詳細的「起居注」，從這裏面很可以看出孫先生生活的一方面。

大概那時，孫先生每天早上十一點左右，從曼德頓店街出來，騎着一直到譯文名街四十六號去看康德黎，或者到上愛爾蘭郵局去寄信，那時孫先生大抵常信到外面去的人很多，謹慎報告，簡直是每天或隔一天都到郵局去的。大英博物館書館 (British Museum) 是孫先生常到的地方，有時從早上十一點多鐘進書館一直到下午七點才出來，這樣很久的七八個鐘點，都在參考室中研究，他真是用功極了。那偵探的報告中，一再說：「他的行動很有規律，幾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館書館，讀文名街四十六號，曼德頓郵局。」他們又說：「在大英博物館書館，他不變的總是進閱覽室，並停留幾小時，偶然的爲要吃些點心，總離開在萊街的倫敦麵包公司之樓，有時仍回大英博物館書館。」有時下午到阿爾培展覽 (Albert Hall) 並近股及園 (Treasury Park) 去休息，但手裏常常拿着一份新聞紙。每天七八點鐘，就回到寓所去，晚上却很少出來。」

當孫先生離開使館的最初幾天，是常到紅十字醫院或聖翠學校去，有時往動物園等處參觀，孫先生雖是在大難以後，但對於學問研究的興趣，並不因此有絲毫灰心，他反利用這個機會，盡量的加以考察和研究。據偵探見到的，孫先生常到大英博物館書館以外，有英國書室 (Hall and Barry Stone Buildings) 康辛頓帝國學院 (Imperial Institute)，和南甘星敦博物館書館 (Booth Kensington for Museum) 等處也常去的。同時並常到憲政俱樂部 (Constitutional Club) 去做過幾次調查的工作，到愛爾蘭曼業館家首展覽會，幸虧

會士羅曼亞會等組織或會等。大抵在是無事的時候，才到立近處羅曼亞（Romania）去消遣。

歷史上有沒有像這樣的事呢？顯十七年前（一八四九年）馬克思在大英博物館開始研究資本論的發源；現在，孫先生也在海峽殖民地常出入，偉大的三民主義的冬都惠然，也在這環境中確立起來了。但當時馬克思著作資本論，是想從亞丹史密斯以來各家經濟學中別開一個局面。那時歐洲社會主義的運動正在風起雲湧，馬克思以唯物史觀為導線，斷定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內在的矛盾，革命是有必然性的不可避免。但是他本身的思想就有矛盾，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文中，這樣說：「在一切生產力還有未發展的時候，原有的社會制度是不會消滅的；新的，較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們所藉以存在的物質條件還未成熟於舊社會的胚胎中之前是不能出現的。」所以他手創的第一國際（也在倫敦成立的）終於經過內部的激烈爭論之後，靜悄悄地歸於解體了。這個時代思潮的轉變，恰恰實實得四十七年後，孫先生來支撐和推進。英國從那個時期起，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運動，雖是繼續發展，但他們却成為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這樣，在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下面，小資本被併吞於大資本，勞動階級的生活，更陷於困苦；同時，由於國外競爭的結果，使農業工業同樣的受到打擊。於是從一八八〇年以後，社會主義的運動，還是回到復活的路，是一種很自然的趨勢。孫先生正在這英國社會主義各種理論和運動充分發揮和進展的時候，在倫敦用苦功的研究，這對於他思想上當然免不掉受到重大影響的。

當孫先生到倫敦前後，英國實際情形怎樣呢？阿格（Frederic Anshin Orr）在近代歐洲經濟發達史（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上說：「到一八八〇年之後，英國勞動階級安心滿意的感覺已經大不如前。工業情形已不及從前穩固，工人地位亦時有搖動之虞。於是又有人開始辯論，說英國國家財富已大增加，惟獨勞力之人得不應應分的利益；這種論調，便受歡迎。當時社會貧乏的情形，縱不如五十年前那樣可憐，而實不至於五十年前之盛行。據當時統計，每年二十人至二十五人中有一人全賴卹官官吏的贖濟為生。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九年商業蕭條，接連着有兇悍而不成身的反對減少工資的罷工，引起一般公眾的注

畫集中到工業上不調協的情形。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蘇格蘭種植輪變氣象，但到一八八五年，新接江產萎停滯的時期又開始了。社會的租工業的動亂，顯使人失望。『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主義者就有最力的發覺機會了。那時倫敦流行一種刊物，叫做倫敦廣告者之傳聲器 (The Bicker City of Outcast in London)。』又有福音教 (Evangelical) 徒的救世軍 (Salvation Army) 的出現。『一八八〇年，更有布打威廉 (William Booth) 的英格蘭之增樂樂捐與解脫方法 (In Darkest Kingdom and the out) 一書出版，喚起了大多數人的深刻注意。一八八〇年，社會民主黨前身之民主協會 (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 成立。一八八二年，費邊社 (The Fabian Society) 成立，到孫先生將到倫敦前的三年，一八九三年獨立勞工黨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也宣告成立了，所以孫先生當時在倫敦經過畫本的研究，和各方調查考察的結果，在思想上有這樣大的波動：』

「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知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容新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

但這時第一切的社會革命運動所表現的專實，已不是馬克思所預料的無產階級的必然性的革命，也沒有實現。孫先生從他的完成他的新的革命理論呢？那時，有一個美國人而影響孫先生得大的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 的進步與貧困 (Progress and Poverty) 一書，無疑的，對於孫先生思想上有很大的助力。這本書一八七九年出版，到一八八二年在美英帝國銷到十萬本以上。他會經過倫敦與蘇格蘭遊行演講，引起美國人民的擁戴和愛爾蘭政府的逮捕。他這本書，是把美國以前研究地租說的極端 (John Stuart Mill) 斯本斯 (Spence) 多甫 (Patrick E. Dove) 諸人的方法更進而集其大成。但是他堅決的斷定，貧困與進非真正比例的發展，是由於地租增進人沒有積聚的動勞，坐享乘人改良的結果的地主階級所造成，亦即地租制度所造成。這樣，他不僅其著作時所附贈與和工資基金的太少，而且不能增進的增進工資的增進，他更不認了馬克思的所謂資本主義主義，變工反資本主義的理論了。『孫先生頭一次讀完這本書，遂將幾十年的思

想是傾向於農樂問題的，他知道中國的土地問題，遲早要發生的，因此他對於亨利喬治的理論，是很同情的。孫先生革命的擁抱到這時候，從空想的理論而到有具體主張的時期了。大概孫先生早年革命意識的衝動，是單純的由於民族思想，由於認定必須從異族統治中解放出來，中國才有出路，因此民族主義的思想儘量較早完成，在夏威夷求學時代所見到的民主國家的設施，促成他的民權思想，後來表現於反對帝王夢想，和第一次廣州起義時選舉合衆政府總統的行動。在倫敦謀職以後，由於接触到英博物館圖書館，憲政俱樂部等處研究調查後，對於歐美各國政治得失的源流，各國現行憲法的精義和利弊，都有較深的認識，故在民權主義方面，關於五權憲法的思想，便在這時完成了一個輪廓。孫先生自己說：「兄弟革命雖然是遭過了一次失敗，但是並不灰心，把革命的事情，還是向前做去。在全球奔走之餘，便把各國政治的得失源流，拿來詳細考究，預備日後革命成功，好做我們建設的根據。故兄弟嘗亡命各國的時候，便很注意研究各國的憲法。研究所得的結果，見得各國憲法，祇有三權，還是不很完備，所以創出五權憲法。」（民國十年五權憲法演講詞）

至於民生主義，可以說也成熟於這時期，雖然在上李鴻章書中「地盡其利，」一「物盡其用，」一「貨暢其流」的三大綱要，和農功一文所說的，都是有關經濟民生的大計，並明言「農商之大政，爲生民命脈之所關；」與中會章程中也說：「必使吾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爲滿志。」此外對於民生的疾苦，也很關心，如與中會宣言中所說哀鴻遍野，民不聊生，上李鴻章書中所說救濟之策，何以安生。這些都和民生主義的思想有關。現在看到歐美的事實，更覺明民生問題的重要，必須和民族民權兩問題，同時解決，才能夠免除第二次革命的危機，才可以永享和平幸福。所以孫先生說：

「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現在孫先生全部的革命理論已經確定了，這時候雖是僅有概念的建立，還沒有完成具體的著述，但他在歷史上的價值，是與馬克思的完成資本論一樣的。我們如果從後來孫先生更進步的思想來看，三民主義是獨

馬克思主義以上而成為世界革命的最高經典。那麼，孫先生在大英博物館書館的一番用功，更有不朽的紀念價值了。

孫先生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中的情形，現在沒有什麼材料可以記載。但在二十七年以後，孫先生曾經自己追述一段很有意味的小小故事。他說：有一次正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內看書，遇到幾個俄國人，他們互相交談以後，知道彼此都是革命同志，有一位俄國人便向孫先生問道：

「中國的革命，什麼時候可以成功呢？」

孫先生那時雖是初次失敗以後，但捲土重來的勇氣，還是很大，他希望「二年內就要再發動一次革命，並且要這一次革命必須成功。不過對那些俄國人，不能說得太輕易，於是很穩健的這樣答覆：

「大約三十年可以成功。」

「你們在那樣大的國家發起革命，只要三十年便可成功嗎？」那位俄國人聽了孫先生的回答，竟這樣驚訝起來。

「你們俄國的革命，什麼時候可以成功呢？」

「大概一百年後能夠成功，我們便算滿足了；此刻正是在奮鬥，成功雖然在一百年之後，但是現在不能不奮鬥，如果現在不奮鬥，就是百年之後，也不能成功。因為要奮鬥一百年可以成功，所以我們現在便努力奮鬥。」

孫先生追述那時的情景說：「我當時聽了他們這番話之後，回想到我的答語，便覺得無以自容。因為我在初次失敗之後，本希望中國的革命，急於成功，不過對外國人說話穩健起見，故多說三十年。及聽到他們的答語，知道他們的計劃穩健，氣魄雄大，加我好幾倍，所以我在當時就非常抱愧。」（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演說）孫先生這幾句話的意義，是在勉勵他的信徒。事實上當時孫先生已經確定了革命主義的理論基礎，他對於中國革命正滿懷着無限光明的期望，他的勇氣也比俄國革命黨要大得多。

所以敢預言三十年成功。誰能料到，中國革命的初身成焉，轉在十五年以後實現，俄國革命也不到一百年的四分之一就告成功？所以，孫先生那時的預言，是相當靈驗的。但革命事業是最艱苦的工作，孫先生經過這一次失敗，並且和外國革命家交換了意見，他更認定算那舊門，加倍努力，才能達到成功兩希望。他在此後每次奔走革命的時候，總是有很多人問他：

「我們要到不知失敗過多少次了，爲甚麼還沒有喪氣，總是這樣熱心？這是甚麼原因呢？」

「我不管革命失敗了有多少次，但是我總要希望中國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總是這樣奮鬥。」孫先生遇到了這樣的問話，總是拿這一句話來回答。孫先生自己承認這句話，就是那時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內和俄國人談話以後，所得的結果。我們在這裏便可知道，孫先生這一次倫敦蒙難以後留居歐洲期間，不但在思想上完成了他的革命經典——三民主義，在行動上對中國革命成功的信心和奮鬥精神，更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基礎。

孫先生在留英倫敦的第二年，（紀元前二十三年二八九七年）完成了一部英文著作倫敦蒙難記(Kidnapper in London)。在勃靈斯託爾(Billingstall)的簡匠書店(Apostrophia)出版，把蒙難的經過，記載得很詳細。同時劍橋大學教授羅爾斯(Robert Giles)請孫先生寫了一篇自傳，孫先生在這一篇簡短的文章裏，說明自己是信仰耶穌教、湯美、華盛頓和達爾文學說的。此外又譯了一本赤十字救傷第一法，原書者是倫敦紅十字會總醫生柯士寶，這是孫先生對於醫學上唯一的譯作了。孫先生譯這本書的用意，也許爲將來革命軍軍醫學上的準備，是很有意義的。

大約孫先生在倫敦前居住了十個月，到第二年七月十一日才，坐了紐美蘭亞號，(Narritan)郵船到加拿大的蒙德里利爾(Montreal)埠，第二天又到溫哥華(Vancouver)，準備到日本。在那邊耽擱了二十天，到八月二日就坐了印第亞亞三號(Imperial)郵船向橫濱進發。

第十八章 日本志士的活動

孫先生第三次到日本，是很有意義的，因為第一，孫先生革命的主張，既經完成，務須要寬廣大的宣傳。準備第三次歸國革命，但那時歐洲的華僑很少，也沒有留學生，要鼓吹革命，也無從鼓吹。日本與中國，在地勢上是很接近的，最便於革命的策略；第二，因為那幾年孫先生到倫敦以前，陳少白留在日本，對於興學會的推廣，已有相當成績；第三，孫先生回到內地，當然是不可能了，因此祇有到日本，準備黨義在日本的興中會酌基礎，來做第二次的革命工作。

孫先生到日本的時候，大約是在紀元前二十三年八月或九月初的光景。到了橫濱，就去找陳少白。患難艱生，看見了老朋友，真覺得有異樣的快樂。那時少白一個人在日本，因為幾個華僑想學習國文，就利用機會，發起組織學校，但少白這時想到台灣去，現在孫先生來了，他就把這事情報告孫先生，要請他資助。孫先生就著他這姓名，叫做中國學校，教員由少白擔護託梁啟超在上海代請。梁啟超是少白當第一次廣州起義時，孫先生要他到上海來招集同志時認識的，那時梁啟超正和康有為進京會試，路過上海，同住在洋澄濱登安寓內，就此相識起來了，少白因為他是主張維新的，革命黨黨員的人又很少，所以就託他代聘。孫先生臨很贊成。不久，少白就到台灣去。但梁啟超介紹的教員，還沒看到日本，他已把中西學校的名稱，改了大興學校。孫先生因為這是小節，也不去交涉，這是維新黨和革命黨最早的聯絡，也是最早的伏下了衝突的導火線。

在孫先生未到日本以前，少白已認識了幾個日本朋友，如曾與俊虎、宮崎彌藏等。那時宮崎彌藏病得很重，他有一個兄弟叫做高崎直藏又名宮崎彌天，正在瀕死，他就寫了一封長信，說橫濱有一個中國革命黨的重要人物，要他趕快回來。宮崎直藏回來的時候，他的哥哥已經死了，他經由曾與俊虎的介紹，認識了梁啟超。少白把中國革命的要旨告訴了他，並且給他一本孫先生初編黨義雜誌。他對於孫先生在黨義雜誌中就五項黨義

白寫信介紹在香港、廣州、澳門的與中會的同志，因為他在報上看見孫先生已經離開英國，他準備到廣東去勸求孫先生。但是他到了香港、澳門，孫先生却已來日本，他就趕回來。那時孫先生就住在少白的寓所，宮崎寅藏一到了橫濱，就到少白的寓所，但少白已經走了。這時候大約是在早晨，孫先生還沒有起床。宮崎寅藏剛剛坐下來，看見裏面走出來的人，就是在照相上見過的革命領袖孫先生，他快活得幾乎要跳起來。孫先生因少白也曾提起過宮崎寅藏的事情，所以一見面大家就很親熱。但孫先生那時不十分能說日語，他們就用筆談，縱論中國革命形勢。孫先生問宮崎寅藏日本政府能否幫助中國革命。宮崎說：這事情必須要問犬養，犬養會說：大臣大隈很容易講話的，祇要陸軍參謀長門野同意，事情就好辦。大概犬養已經和大隈談過，不過他為謹慎和秘密計，不願意說出來罷了。犬養就是犬養毅，因為那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為外相，犬養毅幫助大隈辦理外交事務，他在大隈前面是很有辯論力量的，宮崎寅藏等許多志士，都是奉了犬養毅的命，調查中國革命的。接着孫先生就和他討論華文的發難地點：

「……今日有志者，到處皆是，惟不敢言而已。（原文矣字，疑為已字之誤。）是以吾輩不覺無同志，祇恐不能發一起點而已。（同上）有一起點，即如置一星之火於枯木之山矣，不必慮其不焚也。惟此起發之地，開下以何為最善？前者弟以廣東為最善，因人地合宜也。廣地一月之內，必可集山林懷悼之徒三四十萬，但有前年之失，當地之官，已如驚弓之鳥，到處提防，我輩舉動，較前略難矣。是廣東若，今日非善矣。不先擇定一地，則無由定經略之策也。」

「還是以四川為負隅之地，在張羽翼於湘、楚、汴梁之郊原耳。」

「但四川不近海口，接濟軍火為難，奈何？」

「軍火一項，雖近海口，亦所難，無已，開接濟之道於浙東之沿岸乎？」

「是亦失之太遠，誠如前之所言，在山、河、海、江蘇交界，可招二三萬衆，則以江蘇之海州為最善矣。起點之地，必先得人，其次接濟軍火之道，其三不近通商口岸，免各國藉口牽制，海州之地，於此三者皆得」

。且可操運河，繼糧米，此亦制北京之死命。」

「取道於海州之事，弟已於十餘年前思量之，曾到彼地盤垣七八天，細看海口之形勢，不便入巨艦，只離州城二十里，雲台山在海中，有可靠大船耳。且州城有厘金，每小船通過稽查甚嚴。」

「到此時不怕厘金卡矣，弟所謂起點者，則先奪取一地，而意亦並指雲台山也。」這是孫先生的答覆，但孫先生接着又改變口氣寫道：「先奪雲台結束已成，而入縣城，或事可集，然是亦不帶謂恰好之地。蓋起點之地，不拘形勢，總求急於聚人，利於接濟，快於進取而已。在海州則進取接濟，亦利於廣東矣，惟聚人則難於此毫無把握；蓋萬端仍以聚人爲第一着，故別處雖有形勢，雖係接濟，而心仍不能捨廣東者，則以吾人之所在也。」

「如閣下之此地，可招二三萬衆，亦可集事矣。蓋海州既有兩便，又有其人，則北可進握山東，以窺北京；南則奪取淮揚，以通大江，則糧食無憂也。有人有糧有器，成敗在乎運籌指揮之策耳。」

「從海州到河南，山東之交界，約要十數天，此間一帶之地，土亦民貧，無糧鹽之可積，我數千之衆，棲憑之間，或食餉所系，弟敢以爲起點之地，先要選（原文撰字）形勝之區。」

他們筆談的內容很廣泛，從孫先生第一次起義失敗經過起以及革命後的遠東國際形勢，和孫先生到日本後的起居問題等都談到，並且談得很投機。

宮崎寅藏在他所著的三十三年落花夢中，還記載了一段和孫先生討論革命宗旨和政治建設問題的談話。

孫先生說：

「余以人羣自治爲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豈唾手可獲？必也革命。……」

「且夫共和政治不傳爲政體之極則，且適合於中國國民，而又有革命上便利者也。觀中國古來之歷史，凡經一次之擾亂，地方羣衆，互爭雄長，百戰十年，不幸同一無辜之民，爲之受禍者不知幾許。其所以然者，皆由於聚義者無共和之思想，而爲之盟主者，亦絕無共和憲治之願佈也。故各建一己之兵力，非至併吞獨一之勢

不化，因有此傾向，即盜賊胡虜，極其兵力之所至，居然可以爲全國之共主。……今欲求避禍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而與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竟其野心，竟其野心之法，唯在聯邦共和之名下，夙著聲望者，使爲一邦之長，以盡其材。然後建中央政府以馭之，而作聯邦之樞紐。……此所謂共和政治，有革命之便利者也。」

那段談話，可以看出 孫先生民權主義思想的最早形態。所謂滿足英雄的野心，也許受了早年在求學時代四大寇帝王幻夢的刺激。就是第一次起義楊衝雲的力爭總統，也何嘗不是英雄思想的作祟？所以 孫先生說共和政治有革命的便利。 孫先生此後民權主義的完成，固然根據了世界最進步的潮流，和中國立國的精神，但他初期思潮的發動，和上述兩件事實，不無多少關係。

宮崎和 孫先生經過幾度接觸，他就到東京去報告犬養毅，從此以後，常常到 孫先生這裏來和他談話，不久平山周也來了，他們對於 孫先生都一致擁護和尊敬。

犬養毅因宮崎實藏、平山周等的報告，對於 孫先生也非常欽仰，急於一見，於是就在 孫先生到日後的第二年正月（紀元前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宮崎實藏、平山周代表他到橫濱來歡迎。 孫先生到東京。當日的情形，犬養毅曾在一篇談話中表示過，這談話的題目是革命志士之風骨，就在前年（民國二十年）發表於東京朝日新聞。他說：

「樞機洋報之孫逸仙氏，具有革命志士之風骨。孫氏與余第一次會晤，係在明治三十一年，由宮崎滔天等導 孫氏同至余處，並爲余介紹。宮崎者，一富有興趣之丈夫也。憶外務省曾命其調查中國革命之秘密結社，在橫濱會見孫氏，意氣非常契合，即相偕以赴東京，並曾謁外務省報告云：「中國革命秘密結社之標本，已備來在此，以代報告書如何？」自是政界中人，一掃前此之偏見，而樂相周旋矣。當日余甚貧乏，時爲新歲正月，僅以鹽魚一尾饗客，而所邀至五十人之多，如頭山滿、平山周、古島一雄等皆在其列。彼等對於此番懷故國，寄身海外之孫氏，咸表極薄之同情。協商結果，遂請孫氏棄居早稻田附近之小屋內。」

並於門上標以「中山樵」三字，蓋以用中國人名義，恐引人注目也。於是此假名之「中山」二字，竟成舉世盡知之孫氏名號；即現時中國人所通稱爲孫中山先生是也。」

這是孫先生與日本政界交際的開始。大養教所說的，當然是根據他的回憶，是很可貴的史料。但關於孫先生改名中山的經過，似乎說得太簡單了，應該拿平山周的語來補充，他說：

「同軍訪大養，歸途過比谷中山侯爵門前，我數寄拜候外對輪館，掌櫃不旬總理之爲中國人，出宿泊帖邊署名，弟想到中山侯爵門標，乃執筆書（姓）中山，未書名，總理忽擊擊自題（名）樵，曰：「是中國山樵之意也。」總理號中山，蓋原如此。（平山周對總理年譜長編初稿發註意見函）」

大概孫先生遷居東京，是由於大養教諸人的邀請，但最初住的不是早稻田附近的小屋，平山周因爲陪同孫先生一起去的，所以說得近於事實。當時日本還有租界制度，不准內外雜居，平山周就託名聘請中國語教授居住。從這時檢起，孫先生認識了許多日本朋友，在政界的如大隈、大石、尾崎、副島種臣等。在野的志士，如西山滿、平岡浩太郎、中野二郎、萱野長知、的野半介、福本拜南、內田良平、中村彌六、井上稚、原口開一、平岡小太郎、清藤幸七郎、山口良政、安川、犬塚、久原、鈴木、秋山、菊池宣野等。其中平岡浩太郎，是九州福岡煤礦的主人，家裏很有財產，對於孫先生傾慕極了；孫先生住在東京時，他知道孫先生境况不佳，每月房租飯費，都由他一人負擔，這樣豪俠的性格，是很難得的。平山周因爲能說簡單的英語，孫先生和日本朋友談話時，他可以當翻譯，所以常在孫先生的寓所裏。

那時，日本志士都說東洋的和平，在平中日兩國之真正的提攜，兩國之真正的提攜，尤賴於國民雙方相互的理解與擁護，所以對於中國革命是非常關心的，對於中國革命領袖孫先生尤其是熱烈的歡迎。正如平岡小太郎所說：「吾輩在此理想之下所結合之同志，皆能與孫氏有理解之思想相體會，而出以極熱忱之共鳴，於是同志間一片儂氣，竟至由協助而完成孫氏回天之事業。」（見平岡小太郎回憶）那時日本政府對於中國革命

黨也許沒有十分注意，對於一般志士的奔走聯絡，也許不能公開加以援助，幸有大黨較一辭聯絡了許多志士，一面在大隈面前解釋，他在那時談話中也說到這一點，他說：

「當時政府及政黨，對外國亡命志士，從來予以密切之注意，但以對外關係之故，表面上則不能不取以彈壓主義也。余在當時與憲政本黨已有關係，然無論憲政本黨，或舊自由黨系人，對於中國革命派，而欲其加以援助者，實未多見，尤以大隈侯對於浪人之舉動，極爲嫌惡，故頭山滿曾謂余曰：『政治方面，諒解浪人之煩擾者，僅君一人而已，君意謂何？』」

這是確實的，當時大黨對於孫先生是有許多幫助的，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中國第一幕的九一八事變以後，據著就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發動淞滬戰事，就在大黨擔任閣總理的時代，他們早已忘掉當年和我們革命黨所講的什麼中日提議，確保東洋和平的話，遂造成了中日兩國的深仇大恨，甚至影響世界局面的紛亂，這是人類感情上的一大奇變啊！

孫先生在東京住了很久，後來因爲經濟上的關係，還是回到橫濱去住，同時那邊華僑復多，孫先生想在那邊做一番宣傳的工夫，有時還是到東京來，於是他就往遷於東京橫濱之間。但是橫濱的華僑，風氣的輕薄，怕聽革命的宣傳，和在別個地方的華僑，沒有什麼分別，孫先生鼓吹了很久，加入與中會的不過百多人。但橫濱的華僑加入會黨的很多，孫先生就斷地向他們開導，有時予以經濟上的援助，他自己講是華僑中件復破舊的面貌，但始終很執著的抱着樂觀的態度。大黨教有時對孫先生笑着說：

「閣下倘長此抱着釋迦、孔子等說法的態度，怎樣能夠做這樣龐大的黨的黨魁？」

孫先生聽了沒有回答，祇有報以一笑。

這時候，楊杏佛往南非洲跑，孫先生已到日本，並且外國報紙都宣傳孫先生已籌得二三百萬塊錢，預備再行革命，他就不辭跋涉到東京來見孫先生，當他到橫濱時，孫先生正在一個友人的俱樂部內，聽到楊雲雲要來見，立刻勾起了那年第一次廣州失敗的往事，情緒複雜極了，同座陪評參友人，也認爲是出乎意料的

事情。他進來了，孫先生就請他到旁邊一間房內，把門關上了，向他斥責當年失敗的責任。孫先生說：

「當時你要做總統，我就讓你做總統；你說要最後到廣州，我就讓你最後到廣州。你為什麼到了時期，你自己不來，那還罷了，隨後我打報電要你不來，隔一日，你又不多不少派了六百人來，把事情鬧糟了，消息洩漏，人又散了，你得了消息，便一個人拚命跑掉，這算是什麼把戲？」

楊衢雲俯首紅臉，知道過去情大的風波，都是他一個人造成的，他內心頓時起了極度的懺悔，他對於孫先生嚴正的聲斥，只有承認，便吞吞吐吐的說：

「以前的事，是我一人的錯誤。現在聽說你籌得大款，從新再起，因此不怕遠趕來，是想再為革命奮鬥，請你原我前過，容我再來効力。」

「大款從什麼地方來呢？你能認錯，那就沒有事，將來有機會再共事吧。」孫先生很和藹的接覆他，聽着就讓他走出來。俱樂部內的人，都看見他臉上罩着一層灰白而有淺紅的顏色走過；就向他略事寒暄，大家心裏却非常感動。孫先生對待朋友不使難堪的那種偉大精神。

第十九章 革命黨與保皇黨的對立

現在我們要說到與孫先生同時代的維新黨的活動情形了。維新黨的首領是康有為，梁啟超是有為萬木草堂的學生，也是一個重要份子。康有為和孫先生同為廣東人，但他是理學傳家的世家子，不像孫先生是一個貧苦的農家子弟，因此他是富於忠君的思想，常常在想怎樣的才能替滿清皇帝効忠，這和孫先生排滿革命的主張，顯然是不同的。但他們活動的開始，都是直接受了甲午中日戰爭影響的輪學會。孫先生七哲李維寧的時候，不久康有為新中舉人，也就聯合一批新舉人公舉上書。當孫先生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康有為的桂學會、保國會也相繼成立。當孫先生在廣州第一次起義時，康有為會派人與楊衢雲和孫先生磋商合作，

陳少白也在這時期，應請了梁啟超。那時維新黨是在士大夫階級中活動，並沒有廣大群眾，所以很想與革命黨聯絡，但一部份維新黨人，却代表了士大夫階級的口吻，對於革命黨是和會匪一樣，頗有待。

當孫先生在倫敦籌備黨以後，實際上已引起很多同情和注意。康有為的信徒麥孟華在時務報上作的論會匪宜設法安置一文內，却說：「今日之會匪，其勢之大，其人之智，莫我愛護所願望其肩背。……哥老、理教、三合、興中諸會匪，或煽於東南，或煽於西北，或煽於內地，……孫汝之案，沙侯語難（即沙士伯里侯），德澤國難，實獲彼饒，忍而置之，則養癰貽患，起而救之，則乏下手之策。」這種調劑簡直是替滿清政府張目，但他們祇迎合了士大夫階級的心理，卻沒有廣大羣衆擁護的基礎，不像革命黨在海外深入會黨中間。維新黨一直到紀元前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渣打德宗接受康有為爲總法維新的主張，康梁大活動於宮廷之間，才算是他們最得志的時期了。這時期是正當孫先生遊跡日本的時期。

孫先生這一次剛到日本的時候，橫濱的中西學校正籌備就緒，由少白始提議，請梁啟超代聘教員，梁所聘的教員，不用說，都是維新黨的重要份子，如徐勤、陳默庵、湯費騰等，並且改校名爲大同學校。孫先生以爲大家都爲國事奔走，對於這一個校名的變更，絲毫不介於懷。徐勤等到日本後，對於孫先生也非常尊敬，所以雖是各有宗旨，在感情上也很融洽的。但孫先生往還東京橫濱各埠，非常忙碌，對於校務，不能兼顧，徐勤就乘機進握教育權，並且與橫濱的僑商，朝夕酬酢，廣爲交際。把當時與中會創立這學校時的形勢一比較，到現在幾乎已成反客爲主的形勢了。

康梁的百日維新運動，終於失敗了，熱心的日本志士，却想利用這機會使革命黨與維新黨聯合起來，共謀國事。因此當康有爲由京逃滬轉道香港的時候，宮崎實藏就在香港引導康有爲到日本，梁啟超也由平山周的保護，從天津下塘沽，繞道赴日；先康有爲七日到東京。康有爲到了東京，孫先生因爲同是爲政治奮鬥而出國的人，他滿懷着一腔同情，特地找宮崎陪着他去看康有爲，但是述盡君恩浩蕩的康有爲，怕和革命黨接近了，不能表白他的心跡，雖是孫先生親自臨門訪問，他竟不敢出來見孫先生。宮崎實藏對此事有這樣一段記

「翌日，孫逸仙若來訪，欲余介與康君相見。康君托事而說絕之。孫君之求見康也，蓋對於彼之現狀，不獲同情，一視其面處異鄉之接命，所謂古義照人心也。然康君之避而不見者亦有理由；蓋孫君之價值，自民黨之一面觀之，則希世之英雄，銅石範而香花祝者也。然自清帝一面觀之，則背叛之逆賊，以十萬金購其頭顱而不惜，而孫君之視清帝亦爲不共戴天之讎。至於康君者雖一朝蹉跌，受刑章之痛，蹈海亡命於千里之外；而變切妻妾，夢想三天，尙冀賜環有日，宣室重逢，爲偽朝進不位之業。故自行迹而言，不能與罪人相交接；自利害而論，尤不願與政敵相周旋；此所以望氣而却步，舉扇而恐元規之塵汚。」（三十三年落花夢）

康有爲的爲人，在氣度宏大的孫先生面前，自然益見其褊狹而不足有爲了。後來，由犬養毅的發起，邀請孫先生和康梁等一趙到他家裏去會面。犬養毅的意思，是要他們討論兩黨合作的辦法。那時少白已經從台灣回日本來，孫先生和他就踐約而去，但康有爲竟拒絕不到，由梁啓超代表他和少白議論，終於一無結果而散。

康有爲演說不能和革命黨合作，是要將來他們再回滿清政府籌餉地；因此不久，他們就打起保皇的旗子，一面反對西太后，一面坪推護德宗。在這情勢之下，於是保皇黨和革命黨對立的形勢，愈趨顯著了。那時天津的國民報發表了一篇噴山揚海，是保皇黨人所做的，對於孫先生大肆攻擊。橫濱的大同學校也震理不許孫文到校的紙條，他們對於革命黨聲譽進逼了。大同學校的教員楊早被保黨擄取了，担任校長的就是徐勤。那天孫先生到學校裏去和那些教員們，但他們都單去了，沒有看見一個人，只有桌上放着這樣的一張不署姓名的條子：「孫先生，你這人真奇怪，就走了出來，竟會惹惱與中會的同志，就把這段材料送到的事，告訴了他們。大家聽了，都熱心不發，一齊到大同學校去大舉鬧學之陣，徐勤見來勢洶洶，怕鬧出事來，他們吵着要追究掉。大家悔的過，徐勤就藏在門口說：不要開會，守條子不是侮辱的。」當時一條條子，徐勤出來講停。真光

會的同志，都責徐勳不念本本水源，有些激烈的同志，要同他們火併，經孫先生一再制止，才沒有意外事情發生，但這樣一鬧，大同學校就成爲兩黨短兵相接的地方，後來日本志士也出來調停，推大養毅爲名譽校長，校務才得繼續維持。這也是革命黨和保皇黨衝突的一場小風波。

但是康有爲的徒衆，傾向革命黨的也有，大概徐勳、麥孟華等是跟着他老師一致主張的；梁啓超、韓文舉、歐漢甲、張君若、王照之流是同情革命的。梁啓超那時正橫濱辦清議報，時時流露革命言論，態度最顯明。康有爲因爲徒衆不能夠完全聽他的話，他氣極了，天天和他們爭吵，被日本當局知道，恐怕他們要鬧出什麼事來，就叫他離開日本，於是他就往加拿大去了。康有爲走了，梁啓超和孫先生就格外親熱，他曾致函孫先生，有這樣的話：「前者挾險之見，不免有之，若盈滿則未有也。至於辦事宗旨，弟數年來，至今未曾稍變，惟務求國之獨立而已。若其方略，則隨時變通，但可以救我國民者，則傾心助之，初無成心也。」可見他是比較有理性，不是固執着成見和孫先生爲難的。孫先生有時也約到寓所來談天，有時他們到上野精養軒小酌敘譚。那時兩黨合併的計劃，進行得已經很成爲，梁啓超已和少白洽商，想在合併後推孫先生爲會長，梁爲副會長。但不久，梁啓超和陳少白在香港會面，繼續討論合併辦法，推陳少白和徐勳草訂聯合章程，徐勳表態答應了，暗中却和麥孟華商量，立即飛函報告康有爲，說卓如漸入行若國會，非速設法解散不可。卓如是梁啓超的別號，行若是指孫先生，他們說梁啓超入孫先生的圈套，就根本不理會。孫先生的宏大的懷抱，但康有爲是主張絕對不許與革命黨往還的，他知道梁啓超這和革命黨商議合併辦法，也急極了，就派人拿了一筆款子，到日本來要梁啓超到檀香山去辦理保皇黨，不許遷延。這樣革命黨和保皇黨的合併，從此中止，梁啓超個人的理想，也從此打破了。但他一面照師命，不得不去，一面依然不能忘情。孫先生，臨行的時候，還在，孫先生面前說，他們雖用保皇的名義，實際還是革命，所以必須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孫先生因爲愛重其人，也就相信他。他又說檀香山是孫先生的第二故鄉，與中會的發源地，要求孫先生介紹同志。孫先生坦然不疑，就介紹他去見德彰發，以及其他親友，梁啓超就欣然到檀香山去了。

孫先生始終是保持着偉大的態度，他毅然介紹梁啟超到檀香山去，是爲公證，爲國事。但消息傳來，梁啟超到了檀香山後，得着德彰的便利，結納華僑，却大倡保皇之說，並且漸漸地進而組織保皇會。他說革命與保皇是名異實同，華僑不曉得內容，以爲有孫先生的介紹，於是加入保皇會的很多。孫先生知道了，就寫信給梁啟超，責他背約失信，然而與中會會員大半已變爲保皇會會員，情形正和橫濱的大同學校，如出一轍。保皇黨的反覆無常，破壞革命運動的陰謀，終於暴露。孫先生的前面，孫先生這時正在東京籌劃第二次起義，沒有方法到檀香山去肅清他們的邪說妖言，祇有留待將來有機會再作一番苦鬥，但他的內心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他後來回憶這時期的情形，有這樣的話：

「自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清廷爲尤甚。」

這一段艱難困苦的實際情形，波譎雲詭，變化無窮，將在以後各章加以敘述。

在這時期內，孫先生是一個貧乏的亡命者，滿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鐸，曾經利用這機會游說。孫先生說：如果肯歸順滿清政府，一定可以得到高官厚爵。李盛鐸在滿清政府是屬於后黨的，他到日本來是偵察廉潔和孫先生的行動，他以爲孫先生一敗塗地，再沒有重起的希望，如果趁這機會勸降，一定能夠成功，但不曉得孫先生是有金鋼百煉的革命黨，毫無猶豫的拒絕了他的游說。所以孫先生自己說過：「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心理建設自序）也就在這時期內開始充分表現。

第二十章 援助菲律賓獨立與革命形勢之重振

孫先生滯留日本，中國的革命風雲，表面上是暫時平靜了，但太平洋上的風雲却已兩變其顏色。這就是菲律賓人脫離西班牙人的羈絆而反抗美國的一個壯烈的獨立戰爭。菲律賓是和古巴（Cuba）同爲西班牙的殖

志願了

此地，他們不斷地向西班牙反抗。一八九七年獨立戰爭又起來了，但結果是失敗。這時便是正當美國的努力向太平洋猛烈進展的時候，因為爭奪殖民地的緣故，也就和西班牙開戰了，聰明的美國就利用了菲律賓和古巴的獨立軍，要他們內應。戰事的結果，西班牙在內外夾攻之下，當然是失敗了。美國就代替着西班牙的勢力而統治它們，古巴以及波爾多黎各（Puerto Rico）島，都歡迎美國干預他們的內政，但菲律賓島却毫不躊躇的要求完全自由。這是出乎美國意料之外的。它們就對菲律賓的獨立運動，施以嚴重的壓迫。菲律賓獨立軍領袖阿奎那度就把抗拒西班牙的軍隊轉而向美國血戰了。一個久處在殖民地地位的菲律賓島和強大的美國抗戰，當然是不能取勝的，原因是缺少新式的軍械，阿奎那度不得已通電亞洲各國求援，並密派代表彭雷（Perry）到日本購取軍械。彭雷對於孫先生很是敬仰的，並且知道他和日本民黨有關係，就託了一個香港朋友介紹見孫先生，並以購械全權委託孫先生。這是顯然的，大家都是為民族獨立而革命，因此孫先生一見了彭雷，就表示十萬分的同情，對於購械的委託，毫不推諉的接受了。那時孫先生對於國內軍事的規劃，一無成就，所以一聽到菲律賓獨立軍的求援，認為是一個絕好機會，就主張率領與中會會員投入菲島獨立軍，幫助他們去反抗美國，等到菲島的獨立運動成功了，再由菲人協助中國完成革命。這是何等遠大的目光，菲律賓代表和中日同志聽了孫先生的提議，大家都一致的贊同。於是孫先生履行代購軍械的約定，和宮崎寅藏商量辦法了：

「你能替菲律賓設法購軍械，並且安全的送到那邊嗎？」

宮崎是一個熱心豪俠的人，聽了孫先生的囑托，就慨然接受了這個使命。但他對於這事情，是完全外行，就轉商於大義教，大義教告訴他說：私運軍火，必須要避去警吏的注意，都不是我們所能做的，但商人貪利忘義，是不能隨便託他的，必須找忠實而有肝膽，並且具有商人手腕的人去辦才好。後來就介紹中村彌六担任這件事。

大義既經決定，孫先生就負起間接的使命和他接洽，但為避免警吏的注目，由宮崎寅藏和平山周做傳達消息的機關。同時孫先生為要和彭雷接洽便利起見，就從東京又搬回橫濱來住，因為彭雷是住在橫濱的。經

遭了許多周折，中村爾六從大會社購到了水陸兩軍械，又向三井會社借一隻布行丸輪船，準備載運到小呂宋去，搭船師去的有日本志士二人，就是高野和及林。但不幸這輪船離開日本，到了上海外的洋面，忽然沉沒了。平山周和原棟本來也想到菲島去從軍的，原棟原是一個陸軍大尉，他辭了職準備去的，結果因事中止，竟逃去這個危險。菲律賓代表以及菲律賓的獨立軍，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當然是悲傷極了。孫先生也爲了這件事非常懊喪，被壓迫民族的命運，是同僚的可憐，孫先生內心的煩悶和焦急，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在這踴躍的境況中，透露了一線光明的，便要算是長江閩粵各會黨一致併入與中會的一件大事了。這是孫先生經過許多籌劃和佈置而成的一個結果。原來當孫先生和保皇黨聯合不定的時候，早就注意到宣傳政策和切實聯絡會黨的計劃。所以一面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日報，宣傳革命主義，同時，招待同志和聯絡會黨，一面命平山周到長江一帶去聯絡哥老會。因爲平山周在中國北方，曾經認識了一個湖南哥老會首領畢永年；畢永年是和保皇黨人有往來的。這時候平山周就要他到日本去見孫先生，保皇黨恐怕他爲孫先生所利用，就向他哄騙說：「哥老會立刻要起事了，你趕快回國吧。」他很相信的就回到上海，但後來知道並沒有這些事，就和平山周到湖南的長沙、瀏陽、衡陽一帶去，遇見了很多哥老會頭目李雲彪、楊鴻鈞、張堯卿等。那時陳少白在香港早已加入了三合會，能而又封他做白扇，鄭士良也奉了孫先生的命令，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是香港發動，畢永年率領長江一帶的會黨到香港來大會合。不久，畢永年就率領各頭目到香港來，於是集合兩廣福祿長江一帶會黨首領於一堂，歃血爲盟，一致公推孫先生爲會長，並辦一印信，以昭鄭重。這次大會，宮崎也參加的，就由會衆推他和少白把印信帶到日本去送呈孫先生，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個最顯著的異數，各地最複雜的會黨竟能聯合起來，革命的聲勢陡然增加了不少，而統一指揮的就是孫先生。

當少白和宮崎回到日本見孫先生的時候，第二批援助菲律賓的軍械，已經又購到了，但在嚴密的警吏監視之下，沒有方法載運，還是繼續有貯在大會社內。菲律賓獨立軍陷在重重的困難中，終於因爲沒有接濟而失敗了。孫先生因爲見到與中會的聲勢已經重振起來，菲律賓的獨立軍却一蹶不振，也不用這些軍械了，就

和彭西商量，請他們把未運去的軍械轉供給興中會，好讓他們在國內重新掀起了個革命的風潮。彭西對孫先生誠懇的提議，非常感動，就很慷慨的答應，不久他也從日本到西貢去了。孫先生很愉快的好像獲得了什麼似的，人已有了，軍械也有了，他就很興奮的計劃第二次的起義。

在苦鬥中的孫先生，曙光終於透過黑暗而出現了。這時候是正當紀元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的前後，滿清政府的戊戌政變已經過去，也就是康梁百日維新的政績，完全已成陳蹟了。西太后已自己臨朝，后黨的勢力日甚一日；她爲要防止德宗權力的再起，更想進而廢止他的皇帝名義，於是立溥儀爲大阿哥，爲廢立做準備。那時康有爲在南洋，二聽到這個消息，知道「皇上」有危險，報恩的機會到了，就聯合僑商通電反對。各地的反對的聲浪也很多。西太后對於本國人的反對，當然也有些顧忌，但是她所最憂慮的還是怕各國的干涉，很巧的，這時候義和團在山東鬧事，宣稱有神術，不怕火器，他們的鬧事漸漸地蔓延到近畿來，昏聩的滿清政府却異想天開，要利用他們來威懾各國，於是一意的放任，讓他們去殺外國教士，搗毀公使館，結果動了國際的公憤，英、法、德、意等八國聯合起來進兵北京，把西太后和德宗嚇跑了。在這風雨飄搖的時候，智識階級的感到滿清政府的必須改革，已漸漸地普遍了。在孫先生初到日本的時候，留學生是很少的，而且都不瞭解革命的意義。到這時候，却大不相同了；在不滿百數的留學生中，主張根本革命的却佔了大半。那時介紹西洋民權思想的書籍，開始由留日學生編譯而發現了，如譯著黨編和開智錄等，所譯的有憲法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約翰穆勒的自由論等，對於國內思想界，都有很大影響，孫先生在這風氣中，對於革命的運動，更增加了許多勇氣和決心；這是朱啟鈞後復見的一條光明之路，孫先生更堅決的走向前去了。

這時候，梁啟超早已回到日本，繼續辦報。他們在這風潮中，也想活動起來，但他們的目的，是在勤王，和孫先生的根本宗旨是不同的。然而那時兩黨都在聯合會黨，中間做牽線的便是畢永年。畢永年有一個很親密的朋友叫唐才常，他和譚嗣同同鄉，嗣同被西太后殺掉以後，他就蓄志替他舉兵除奸，因此他始終是擁護保皇黨的。畢永年曾經偕唐才常到日本見孫先生，平山周也有很多次的斡旋，都勸他加入興中會。但那時康有

爲在新加坡已向華僑籌到一筆巨款，他就決心要利用這款子在漢口起事。但一面仍和畢永年訂殊途同歸之約。因此，在這大革命醞釀之前，革命黨和保皇黨又暫時聯合了起來。

東亞的風雲，接着菲律賓獨立軍的驟仆而重行開展了。孫先生這時候正派人在廣東籌備軍事，但梁啟超、唐才常等已決定在長江沿岸各省起兵，以漢口爲中心。他們準備出發回國去，梁啟超和他的同志就在橫濱紅榮館開歡迎會，同時請了孫先生、陳少白和宮崎等到會。在歡宴的席上，大家舉起了酒杯，各祝前途勝利，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情形，要是梁啟超、唐才常等能夠聽命孫先生，這一次大家回國在南北同時發動，在統一的指揮之下，滿清政府也許就會崩潰，這一次歡宴就不啻啜飲黃龍了。但他們別有懷抱，終於兩敗俱傷，使滿清政府又延長幾年壽命，這是何等可惜！

孫先生對於保皇黨起事的目的，雖不能贊同，但他在公誼上，還是幫助的，如林述唐離日前，孫先生還替他介紹漢口某俄國商行的買辦與中會會員容星橋。林述唐是和唐才常同時回國的，他和長江會黨很有關係的，但他得了孫先生介紹容星橋以後，在漢口有不少的便利。這是孫先生始終和保皇黨獨狹心理最顯著的不同的地方，也就是造成孫先生偉大的領袖資格的原因。

第二十一章 聯合李鴻章運動的失敗

第二次革命運動，孫先生已經準備就緒，但快要臨到發動的時期，香港的同志要求孫先生聯合李鴻章在兩廣獨立，組織新政府，以免流血的革命。這也是革命史上留下的一個幻影，事情是沒有成功，不過更促進了孫先生對於革命進行的信念而已。

這一段事實的經過很複雜，現在簡單的說：那時李鴻章是做兩廣總督，他因爲在中日戰爭時，對日本屈伏了，全國輿論都不滿意他，因此在滿清政府中很失勢，後來康梁在海外僱議保皇，滿清政府要他出任兩廣總督

是在防止廉梁在廣東起事的。現在義和團事件發生了，北方陷在混沌的狀態中，香港同志何啓和陳少白兩議，想借重香港總督的力量，勸告李鴻章聯合孫先生在廣東獨立，理由是說保全兩廣，免得讓北方一樣的混亂，這是一方面的情形。同時，李鴻章的親信劉學詢，早就有意拉攏孫先生，紀元前十三年（一八九九年），他到日本和孫先生往還甚密，孫先生並且介紹他去認識大叢毅，由大叢毅引見大隈重信。劉學詢的拉攏孫先生是要向滿清政府邀功的，因為他知道滿清政府對於康梁已經厭惡，但他仍遠避海外，無法應付。孫先生久居外洋，對於華僑是很有聯絡的，所以他想利用孫先生來抵制康梁。但是他的如意算盤，沒有成功，孫先生和他接近，是利用他來籌款的，他決不會拋棄了革命立場，和任何一個在滿清政府下的官吏妥協的。因此，孫先生一面拿定了主見，一面還是讓一部份同志去活動。

這大隈是在紀元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的五月，何啓和陳少白等在香港的活動，已經大體成功，並且和劉學詢以及在李鴻章幕下的另一要人曾廣銓也疏通好了，要他們從中助力。他們就徵求孫先生的同意，用孫先生的名義做領銜，上書香港總督，大意是說，滿清政府的腐爛失敗，既害本國，延及友邦。英國和中國有密切的關係，商務教室，遍於內地，因此要求借重他們的力量來改造中國。接着就說到滿清政府政治的腐敗，尤其是着重於外交方面的情形，以激動英國人的注意。但最重要的，是把這次義和團亂事和滿清政府的關係，說得很詳細，目的是在暴露他們的罪狀，主要的幾句話是這樣：

「就現在之已見者，則如妖言惑衆，煽亂危邦，離禍奸民，復以忠義，是謂毒民變。東亂既起，不啻劇平，又借元兇，命爲前導，是謂挑邊釁。教異理同，傳導何罪？嗷嗷民庶，屈試遭人，是謂仇教士。通商有約，保護宜周，乃種禍根，蕩其物業，是謂害洋商。陸路遣使，陸路伐陶，吞砲環攻，如待讎敵，是謂狀使命。書未絕交，便種毒境，圍困使署，囚禁外臣，是謂背公法。平匪全交，乃爲至理，竟因亂釁，慘殺無辜，是謂殺忠臣。啓燬兵功，覬覦大位，不加誅伐，反授權，是謂用僭帥。裂土瓜分，奪據廣廈，暗受副議，漠不知恩。是謂忘大德，民教失歡，原易排解，偏爲挑撥，遂啓禍端，是謂修小怨。危與者

滿政府之種種罪狀，苟不反正，爲禍何極？」

最後又附發治平章程六則，內容是：一、速都于適中之地；二、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以總其成，於各縣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三、公福利於天下；四、增添文武官俸；五、平其政刑；六、變科舉爲專門之學。其中第二條關於政治的組織，中央政府官吏的職權，是規定在憲法之內；並且注重各省的自治，如省的一切政治，皆由全權自理，不受中央政府的強制，這是一項聯邦政府的理想。第三條公福利於天下，各關稅等類如有增改，必先與別國妥議而行，這是因爲要求英國幫忙不能不這樣說的。在這信上署名的，除了孫先生以外，就是楊銜雲、鄭士良、陳少白、史堅如等，以及其他與中台會員。那時楊銜雲已回到香港，幫助少白等聯絡會黨。

從這信的全篇主旨中，可以看出有一個言外之意，就是說義和團式的亂事，是影響在華各洲的利益，香港密運兩廣，如果有事情了，必受莫大的影響，所以必須預籌保全的辦法。換言之，是要香港總督勸告李鴻章獨立。香港總督認定廣東是他們英國的勢力範圍，對於中國亂事的漫延，當然很注意的，並且他和中國人感情極好，他受了何啓的運動，又接到這封書，倒很同情，就寫了一封信，由沙面領事轉交李鴻章，很委婉地說明此意。

李鴻章那時對於這個提議，不免有些心動，但他是以清帝后的存亡爲關鍵，所以還是保持穩健的觀望態度。劉學詢見李鴻章已有些活動的意思，就報告孫先生，要孫先生立刻到香港來商議。孫先生就派平山周先到香港來探聽確實，隨後自己也從日本搭法輪印地亞斯動身到香港來。孫先生自紀元前十五年（一八九七年）九月來日本以後，到現在已過了四個年頭了。這次隨孫先生同來的，有鄭士良等，還有幾個日本志士，如高崎、清藤幸七郎、內田良平、福本誠等。

船到吳淞的時候，日本志士，還是記起保皇黨在漢口的起事，想和革命黨聯絡策應，就由清藤上岸到上海去找平岡小太郎，要他擔任長江一帶和日本同志的通信聯絡機關。平岡從上海坐了淞滬火車到吳淞港，轉乘

地亞船上見 孫先生。那時在盛夏的天氣，孫先生橫臥在床上，很安閒的閉着眼睛，靜默的思索着，一見了平岡小太郎很愉快，把這事情說過了，就在船上唾血爲盟，幾個人呢喃着，吃燒羊肉，以代祝賀。大概 孫先生和日本志士的訂交，都是這樣豪放而痛快的。

孫先生到香港的時候，大約是六月十七十八左右，李鴻章已派了安備兵艦來迎候，請 孫先生到省城會商，但 孫先生經過審慎的考慮，覺得不能隨便答應去的，就派了宮崎坐這兵艦代表他到省城去，他自己因為那年香港有五年放棄的命令，也不能上岸，就換了船到西貢去。以便聽取這裏的消息以後，再定行止。和 孫先生同去的有一個英國少年廣根，他是 孫先生四年前在倫敦相識的，不久以前，他從遠道來訪 孫先生，孫先生便派副志招待他住在香港，現在見到了 孫先生，因此就請他同到西貢去。

宮崎奉了孫先生的命令，到廣州去訪劉學詢，和他詳談了一夜，劉學詢說各國聯軍未攻陷北京以前，李鴻章還是不能有所表示；請宮崎轉達 孫先生。宮崎知道時機還沒有成熟，就離開廣州回到香港，那時 孫先生已經到西貢去了。隔了二日，劉學詢派人送三萬元到香港來，說是送給 孫先生的，宮崎就代收了。那時康有爲在新加坡，由僑商邱菽園招待。他並且資助康有爲軍費至百萬元之多。宮崎富和 孫先生向來香港時，就以赴新聯合康派的意思請示於 孫先生，孫先生唯唯否否，因為他以過去的事實來看，革命黨和保皇黨的合作，恐怕是不能實現的了，但他又不好過意反對日本志士的一番好意，所以祇有含糊的答應了。但宮崎的用意，固是不錯的，他想到用過去國會改選康有爲的資格，向他提出游說，要他備無異計，幫助建立民國，就可以把康有爲資助的這筆款子，移作革命黨的軍費了，既少也可以分出一小部份。因此他到西貢後，就去了。可是事情並不像宮崎所預料的那樣順利，眼光短小貪生怕死的康黨，因為宮崎到過廣州，和劉學詢見面，他們恐懼他是奉了李鴻章的命令，到新加坡來查刺康有爲的。因此當他到新加坡後的幾天，康有爲就向當地英國官廳告發，說他們是來行刺的。新加坡英國官廳派人向他搜查，看見三萬元的紙幣，和一把日本刀，就認爲行跡可疑，把他下獄，清藤也同樣的下獄，這是出乎宮崎意料的一件冤案，他到這時才充分的認識保皇

黨的面目，從此他不敢再說和革命黨聯合了。

這時候，孫先生已到了西貢，住在 Grand Hotel，他還是很關心廣東的消息。一面向劉學詢、李鴻章最後的切實態度，一面要楊衢雲、陳少白、福本、平山諸人，仍在香港繼續軍事計劃。六月二十三日平山飛抵劉學詢處來三萬元和宮崎到新加坡去的消息，告訴了孫先生，孫先生就於七月六日和摩根德西貢到新加坡，想去看宮崎。

當孫先生到新加坡的時候，宮崎和清藤已下獄六天。孫先生知道了這個消息，就親自到英官前保釋。於是英官下令不許宮崎、清藤五年內登陸，這一場查獄從此結束。孫先生於是就和宮崎、清藤、摩根等搭佐渡丸輪船回到香港。但這一次到香港，情形不同了，因為新加坡英官早已通知香港總督，要他防止孫先生一批人上岸。因此輪船到了香港，水陸警察，都嚴密的注意着。香港與中會會員陳少白等，只得到船上來迎接孫先生。

這時，北方的義和團事情已經平息了，清帝母子也安穩回到北京來了，滿清政府就要李鴻章回去當議和代表，君臣之見深於民族意識的李鴻章就不顧一切的準備北上。裁員李鴻章北上的一只安平輪船，正當佐渡丸開到香港後的第二天，從廣州開來準備向北去了。何啓、陳少白知道事情不妙，於是要求香港總督，等他過港拜見時，當面勸阻他不要北上。孫先生知道這一切，就斷定這事情是沒有希望了。

革命的計劃，經過這許多周折，不免停頓了，熱血沸騰的日本志士有些不耐煩，但他們不知道孫先生的深謀遠慮。幾個人聚居在佐渡丸中，瞻望着茫茫前途，就把棧房做會議室，開始討論革命的新計劃了。那時是在深夜，靜寂的香港海上，他們都正興發的辯論着。孫先生首先提議：

「由福本全權辦理香港事情，由平山周等的攻佔。推鄭士良在內地越後，由原模做表談，聯合日本諸同志以占領某地，兵進一半而至廈門。宮崎和孫先生秘密到臺灣，以便聯絡。」

「這樣的計劃，甚足以使同志灰心的，而且清藤和宮崎則變了談判的飛車，應當怎樣的發發前進。」

現在的計劃，祇有趁今夜兵暴未靜的時候，由九龍登岸，疾走內地，行迅電不及掩耳的革命，事情才有辦法。」在眾人靜默的空氣中，福本首倡表示異議，宮崎等聽了，也很贊成他的主張。

「這是最無謀劃的事情了！我們這幾個人，不是像把一塊肉投在饑虎的前面麼？」孫先生搖着頭表示不能同意福本的主張。但宮崎似乎很興奮的盼望實際革命的到臨，他說如果我們還是回到日本去，有什麼辦法呢？於是，孫先生很莊重的對他說：

「我的生命，負着百州之重，一切的謀劃，雖未必都能成功，但終不能採取這種自絕的方法。」

「如果回日本去，事情還是不能辦，那還不如就死在這裏，否則解散同黨，免得人家說我們是拿革命做口頭禪的。」宮崎很焦急的說，接着又帶嘲帶笑的說：「革命不能一定靠謀算，如果等謀算定了才做，不是和秀才造反一樣，結果到三年也沒有成功。太遲了！我不能和你共事了。」

「你要死，為什麼不就跳到大海中去？免得奔向內地去革命。」孫先生有些怒意了。

討論變成辯論，當然沒有什麼結果，福本去睡了，只有宮崎和清藤在船房。孫先生仔細想起來，知道宮崎大概在新加坡受了刺激太深，所以感情很偏激，還是向他解釋一下，以挽回剛才的形勢。於是獨自走向宮崎，前面很懇切的說：

「你太遲了！」

「你也未免太多慮了！」

「你當然知道我不是多慮，也不是怕死，但爲什麼一定要藉問我的究竟，你太不明白我們現在的處境了。」

孫先生很痛心的說，兩眶已充滿着熱淚。說罷，就回到自己房間去睡。不一回，清藤也去了。宮崎也準備就寢，福本却張惶的來敲門，說道：「甲板上有警察。」宮崎走出一看，真的幾個英國警察和中顧巡查，站出兩面，海面上還有滿載了警察的小輪船在巡遊，宮崎才悟到孫先生的意思，很佩服。孫先生的先見之明，覺得自己太遲了，就到孫先生那邊，聲明謝罪，從此絕對服從孫先生的命令，聽他的指揮。孫先生聽了

個好笑起来，因為他早就忘掉剛才的事情了，大家解釋一番，就各自歸寢，一宿無言。

第二天，李鴻章的輪船從廣州到香港來了，和平革命和急激革命的關鍵，就在這剎那間。香港的同志，到船上來報告。孫先生說，今天十一點鐘，香港總督準備和李鴻章會面時討論獨立問題，如果事情成了，私特許。孫先生登陸。孫先生和宮崎等，就在船上等候消息。到了傍晚的時候，陳少白、楊衢雲等到船上來報告，說李鴻章竟不接受香港總督的勸告，已北上去了。和平革命到這時候已完全無望，於是大家決定起事。

孫先生因為當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對革命主張很贊成，已經有過數次接洽，答應起事時設法相助，所以孫先生對於這一次革命，決定變更計劃，不到廣州發難，預備在惠州起事，沿海向東前進，他自己存台灣等候。同時主張，革命軍必須能夠打到廈門，他就可渡過台灣海峽，親自督師。這時候宮崎沒有話了，大家也贊同，就開軍事會議，討論結果，把發難的責任委之鄭士良，就以鄭士良為總司令，原禮為參謀長，楊衢雲為財務部長，兼入內地，聯絡會黨，畢永年為民政部長，平山周為外交部長，李紀堂在香港任經理。史堅如和鄧蔭南到廣州省城組織響應，那時，李紀堂還是初次見孫先生，就捐出三萬元為革命軍費。計劃決定了，孫先生就留一部份日本同志在香港，幫助陳少白、楊衢雲等辦事，自己就和宮崎坐了原船到上海往日本去了。這是惠州起義前的大概情形。

第二十二章 惠州起義

惠州革命發動了，孫先生回到日本準備一切，預定革命軍到達相當地點以後，就馬上前來指揮。不久，命平山周轉知楊衢雲等在香港辦理對籌，不必到內地；關於內地聯絡會黨的事情，由鄭士良被人代替，以專責成。那時保皇黨漢口的事情，正在積極醞釀中，孫先生想南方同時發難，使滿清政府，顧此失彼，窮於應付。因此回到日本沒有多久，就於八月卅二日到上海來，預備着手指揮長江一帶的會黨。這時平山周剛從香港到

門司，孫先生過門司時，約他一同到上海。不幸唐才常在漢口失敗的消息，當孫先生的輪船，到了上海的第二天就得到了，長江一帶正宣布戒嚴，孫先生祇得留在船上，不能登岸，因派平山周趕赴香港催促陳少白、楊銜雲等速消息給各方面。第四日，九月三日，孫先生仍舊回到橫濱，同時派平山周趕赴香港催促陳少白、楊銜雲等即到台灣，準備發動，以待孫先生親來指揮。

這次惠州革命的發難地點，是在歸善縣和新安縣中間的三洲田，這裏靠近九龍，距離香港也祇有一天水路，從東江出來，可以直接省城；有險要的高山，茂密的森林，迂迴的路徑，是用兵最好的地方。鄭士良率領了六百個英勇的同志，隱蔽在那裏，是隨時可以發動的。但六百人中祇有洋槍三百桿，子彈三千發，後來雖從附近清軍營中秘密買到了槍枝若干，但還是不夠用。因此孫先生最初主張暫時不要發動，鄭士良和黃福得到了命令，便嚴密戒備，等待機會發動。可是時候延長了，糧食發生恐慌，就派八十人留守大營，其餘的散在附近鄉村。這裏又怕風聲走漏，於是把巡船樵牧走進山裏的，都拘留起來，不許出去。因此謠言四起，都說三洲田有幾萬人馬，在那裏密謀造反。到陽歷八月下旬，粵督德壽據各方緊急報告，立派水師提督何長清抽撥新募精勇及虎門防軍四千餘人，於初十日進駐深圳；陸路提督鄧萬林也率領惠州防軍填紮淡水、鎮隆，把三洲田的出路，緊緊的包圍起來，可是他們得聞革命軍聲勢浩大，還不敢深入把統帥圍攻。

這時，孫先生已經到了台灣，和平山周等在台北新起街，組織機關，兒玉源太郎派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代表與孫先生接洽。鄭士良在前方，已經把戰機迫切的情形報告，只等孫先生下令，就可以發動。孫先生這時正在當地補聘軍官，因為會黨中人都沒有新式的軍事智識，所以必須要有富於軍事學識的人去訓練指揮。那時準備還沒有就緒，鄭士良的急電已經到了，孫先生在遠緊張關頭，還是要鄭士良鄭重應付。但這個命令還沒有到三洲田大本營，何長清的水師二百人已移駐新安縣沙灣，並又從橫濱移回三洲田。士良為先發制人計，決於十五日，派統將黃福率領敢死隊八十人，夜襲沙灣。何軍猝不及防，一聽到革命軍來了，頓時張惶起來，交戰沒有多時，軍容大亂，傷亡無數，革命軍奪到了洋槍四十餘支，彈藥數箱，俘虜三十餘人，其餘的也

都東竄西逃。這是出乎預料的。第一次勝利，革命軍的聲勢，立刻大振。士良趁着這勝利的餘威，想直攻新安。一口氣打到廣州；同時，新安和虎門同志江養喜等也集合了數千英勇的黨人，正得芝罘田大軍一到，即可合攻新安城。那時，孫先生接獲了勝利的消息，非常快樂，就一面電令鄭士良，要他改從海道，向廈門出發，以便親自前來指揮；一面電軍署，要他把預備的菲律賓軍械，立刻運來。並囑兒玉接洽，就近接濟軍械，使人多械足。格外充實革命軍前力量。

鄭士良得到了命令，就把軍隊集中橫岡，改變計劃，取道東北，直向廈門進發，可是新安和虎門的軍隊，因和軍署會合了，在沙灣的軍隊，既有六百個人，懂得軍事學識的沒有一半，因在平山、龍岡的中間，又召集了一千多人，軍械不夠分配，就拿戈矛替代補充，整列隊伍，浩浩蕩蕩地，從龍岡前進。這時，何長清的水師，雖遭失敗，還有三千人，陳師於淡水之上，陸軍鄭萬林也率兵千餘堵截要道。鄭士良率領大隊人馬，開到佛子坳時，清軍已扼險相守。鄭士良深怕寡不敵衆，祇有出奇制勝，分做三路進兵，派拿戈矛的在前面，拿軍械的分爲左右兩翼，趁敵軍不備，偷偷的爬到山上，兩面夾擊起來，敵軍頓時大起驚慌，沒有反抗的能力，紛紛潰散，士良就率領大隊，追趕上去，當場殺死守備嚴某，俘虜歸善縣丞兼管帶杜鳳梧，和賊兵數十人，奪到洋槍七百餘支，彈五萬發，馬十二匹。一時士氣大振，聲勢浩大，這是閏八月二十二日第二次的勝利。

這一次勝利以後，得到了一個很大的響應，就是博羅附近的梁慕光、江維善等，也率領千餘人，圍攻博羅縣城，另派一小隊進撲惠州府城，以分清軍的兵力。但狡黠的惠州知府沈傳諱早把從博羅到惠州的浮橋截斷，又派土勇二百人把守着。同時粵督也先後撥調提督馬繼麟、劉邦盛、總長黃金福、鄧潤琦、都司吳祥遠、莫善積等，各帶大兵前來救援，就在惠州府城外白芒花、平潭等處，與革命軍接戰。革命軍因爲寡不敵衆，只得分作幾路，散到附近各鄉村去，惠州城的圍攻，終於沒有成功，於是清軍就以全力對付鄭士良的軍隊。

士良自佛子坳大勝以後，正向永湖進發，一路所向披靡，戰無不捷。沿途鄉民都燃放爆竹，異常采烈的歡迎革命軍。也有拿酒食奉獻的，也有殺牛奉獻的，一路跟去殺敵的，浩浩蕩蕩，聲勢非常雄壯。二十個日

與水邊時，人數因填補幾五六千，但從永湖再前進時，走不幾裏，就遇到了從淡水退回和惠州派來的大陸清軍；欲路相碰，便迎頭進擊，清軍出其不意，某連遇了一次大敗，紛紛向惠州、淡水、白芒花等處四散逃竄，鄧高林中槍墮馬，也抱頭而逃。這次奪到龍軍洋槍有五六百支，彈藥數萬發，馬三千餘匹，又俘虜敵兵百餘人，叫他們都剪去辮髮，充作軍役。隔天晚上，又出發向白芒花追趕清軍，到連時天已明亮，却不見一個清軍的蹤跡。那裏的村民五六千人，看見了革命軍，都俱躍躍的前來歡迎，並且也有很多投軍的，革命軍連時已增加一萬左右的人了，在行軍的途中，不免感到一些困難。這是第三次的勝利。

從十五日發動，到第三次勝利，祇有七天工夫，竟三戰三勝，這確是出於意料的事情。士良到了白芒花，便再向廈門進發，一路不見敵人蹤跡，直到第十日，就是二十六日，到達巔岡好，看見清軍已在對岸守着，士良便據高臨下，對準着清軍，展開了陣地戰，隔江對射，相持不下。到了晚上，趁夜色朦朧中，派了一個小隊做襲清營，給敵軍一度打擊。第二天清晨，再以全力進攻，清軍便又大敗。這時革命軍的子彈已經不夠，無法追趕上去，因此轉向三多祝前進，在那裏整編隊伍，集中糧餉，準備再到梅林，這是發動後的第四次勝利。

在革命軍節節勝利的時候，清軍的不堪一擊，已經充分的暴露，滿清官吏，深恐有負皇恩，慌張極了。南海縣令裴良福就異想天開，想利用陳廷威和革命黨議和。陳廷威是第一次廣州起義時，孫先生要陳少白從上海去找來的，這次也探他在北江聯絡綠林，但他只是躲在家裏，捏造事實，虛報。孫先生是一個意志薄弱而實生怕死的人，他知道滿清官吏要議和，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便和陳少白商量，但少白意志堅定，把他痛罵了一頓，他就快快而去。隨後又和楊衢雲商量，這一回他居然達到了心願，因為楊衢雲也極力主張停戰議和的，他們商量了以後，就和裴良福的代表楊槐軒討論議和條件。孫先生在危時，接到楊衢雲的報告，知道事情不妙，怕又鬧出像上一回廣州起事的亂子，就打了一個電報給陳少白說：「提防七指。」因為楊衢雲幼年時代曾娶過楊樞，三個指頭被機器軋去了，所以叫他七指。第二天，又派了楊心如帶了一封長信給陳少白，說明楊樞要求接納議和的事實，信末又附着這樣一句：「看畢即可燒去，以存忠厚。」少白看了，就把這數千字的

長信燒掉，這是革命黨的一個小小波折，孫先生又是很寬宏的饒恕了他。

但那時，最重要的還是在怎樣的接濟大批軍械到前方的革命軍。可是不幸的事實，連接的發生了，第一是官餉從日本打探的電報，說中村爾六所購的菲律賓軍械都是廢鐵，是一個巨大的騙案。第二是日本的政局，隨着惠州革命的進展而起了奇大的變化，從山縣內閣而變為寺內內閣。伊藤博文對於中國的革命，却一反山縣的態度，他首先禁止兒玉幫助中國革命黨，並禁止軍械出口，也不許日本武官投効革命軍。因此孫先生所預定的計劃，到這時候全部失敗了！前方革命軍勝敗的關鍵，就在這一點，他不忍數萬健兒就此苦鬥犧牲，就急派日本同志出團良政，帶了幾個人，從香港經海峽而到革命軍的大本營，把這一切告訴了鄭士良。

這時，革命軍正在白沙埔備向梅林前進，鄭士良從山田良政手中接到孫先生的傳令，原來是：

△一、政情匆變，外援難期，即至廈門，亦無所得，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

這好像是一個晴天霹靂，全軍二萬餘人，聽到這個消息，立刻激起了無法抑止的悲壯慷慨的情緒，有的竟痛哭失聲，那壯烈的呼聲哭聲，幾乎震動了山谷和原野。現在一切都失望了，於是祇有回到三洲田大本營，以便從香港購取軍械，再會合新安和虎門的同志，進攻廣州，但當革命軍還沒有到達三洲田，經過橫崗時，何長清的先隊，已在前面阻擋，士良任這進退無路的時候，祇有揮着熱淚忍痛解散這二十天中患難相共的幾千個革命同志，他自己就附黃福、黃耀庭等先後到香港來。山田良政因為不曉得路徑，在這混亂中，從大隊裏落伍了下來，給清軍擄去殺害，這是日本同志為中國革命犧牲的第一個人。

惠州革命是這樣的失敗了！但是當鄭士良在惠州苦戰的時候，史堅如在廣州曾經幾次發動響應，都沒有辦法，最後就決心謀炸廣東巡撫兼署總督的滿州人德壽。但結果只有炸去了撫署的圍牆數丈，德壽却一些沒有傷害，更如雄心不死，竟大膽的圍到撫署附近去查驗，於是被清軍營勇截獲，在南海縣署就義。廣州的事情在惠州革命的風潮中也曇花一現的失敗了！史堅如年少英俊，竟隨着陸皓東做了為革命殉難的第二個健將，孫先生一想到這兩位先烈，就非常悲痛。這是惠州起義失敗經過的大概情形。

第二十三章 惠州失敗後的革命大勢

這次惠州起義的失敗，菲律賓軍隊不能如期運到，可以說是一個最大的原因。孫先生因此失敗後不久，就從台灣回到日本，把這事詳細說。孫先生一到了日本，才知道日本同志也正碰一個難題。中村藏六，他——孫先生為島事幫人起見，祇要求大倉會社償還原價六萬五千元，以償債交形函，了難這一重責任。可是大會社因中村從中得利太多，祇答應拿出一萬二千五百元。這時犬養毅和尾藤謙人，也非常憤怒，一致到大倉會社的話，就格外攻擊中村的見利忘義，同時又發現中村偽造的函件和印章等，中村的人格，更宣告破產。東京萬朝報把這一切欺詐的情形，都盡量發表出來，事情愈弄愈糟了。犬養毅因中村是進步黨黨員，有關全黨的名譽，就派人諷中村自行脫黨，但中村竟不肯，犬養毅就用總務委員的權力，把他開除黨籍。孫先生也因為中村毫無誠意，請了兩個律師三善和梅井，想在法庭起訴。但後來經過詳細的調查，知道這事情與中、日、菲、德四國都有關係，牽連太多了，可以變成一個國際的極大交涉，不是一下子可以解決的。恰在這個時候，頭山滿出來調停，勸孫先生就收回中村的賠償一萬三千元，孫先生也就答應了，這一場極大的風波，就爲了結。

這一個騙案草草了結了，孫先生因為有事情，就派宮崎到上海去一下。宮崎在這事情中也是一個重要人物，他因為發現受欺詐，也經過許多奔走的路線。但他到上海以後，許多日本同志對他不滿意，惡聲四起，甚至有的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去訴孫先生。這大概是同志的誤會吧！孫先生也不想窮究這事情。就沒有什麼動作。不久，宮崎從上海回來，到橫濱去見孫先生。宮崎所辦的上海的事情，沒有什麼成績，孫先生也不責難，却把這信拿出來給宮崎，很溫和的說：

「你到上海去的幾天中，許多同志對於你有很多謬話。」說着隨手把信拿給宮崎看，接着又說：「你看了

這封信，不必動怒，古往今來的事情，都是處則爭功，敗則歸罪。其雄的志氣，就像螺旋式的槍彈，要打破疑難的空氣而往前去，決不被退，所以你不能說此就失去向前的決心。」

宮崎出乎意料的讀到這一封來歷他的信，但聽到孫先生這樣的一番話，也就心中爽然，再沒有像在佐渡丸中那樣的偏激的感憤了，孫先生讀完了這封信，就拿來燒掉，笑着說：

「你胸中如果有一些不平靖的波動，就像這信一樣把它燒去了吧。」

宮崎很滿意的回到東京。大隈也爲了同志間對於宮崎有誤會，特蒐集了許多日本同志，設宴調解，在歡樂的議會中，終於因爲內田良平的窮問，頭山滿又因事未到，無從解釋，宮崎和他就拔刀惡鬥，結果宮崎的額上受了傷，經過了十多天才痊愈。事後，宮崎悲憤交集，就寫了一封長信給孫先生，詳述這次解決菲律賓軍機案的經過。這是顯然的，他受了委屈後的訴苦，也可看出他對於孫先生慈祥偉大的氣度的感動的深刻。我們從他這一封長信中，却可以看出當時這事情的真相，也是一件無意中留下的革命史料。

當孫先生在日本交涉菲律賓軍械的時候，廣東都督德壽，已密奏滿清政府，組織孫先生等，同時，因爲史堅如的事情，更注意到楊衢雲。但孫先生遠在日本，滿清政府是無可如何的；楊衢雲在香港，也不是廣東部行勢力所能到達的。隔了不多時，德壽就賄買了一個陳林，把楊衢雲在香港暗殺，這時楊衢雲正在學塾中授課。孫先生接到這個消息，非常悲痛，就於十二月七日在橫濱永樂樓開會演講，當衆演說楊衢雲的生平事蹟，並發起募捐，以撫恤他的遺孀。同時又用了自己的名義，代發計告，告警各地同志。楊衢雲爲人好虛榮，意志薄弱，兩次起事，都出了亂子，但他畢竟也是舉義起革命的一個人，孫先生對於他，固不滿意他，於私是一個情深手足的同志，所以這樣的悲痛，這種盡力爲他謀劃善後。要曉得在當時人的情懷，是怎等的深厚瀟灑啊！

從惠州失敗到楊衢雲的被刺，一個未盡的餘波，到這時暫告平息了。第二章，紀元前十二年（一九〇一年），滿清政府因電議將國庫銀兩充公，引起人民不滿，於是

百五十兆兩；這是最惹起人民反對的一件事，因為亂事是由政府造成的，但得幾巨額的賠款，何必須從人民的膏血中榨取。因此海內外志士，都感到滿清政府是失望了，軟弱漸趨傾向革命，對於孫先生也不像從前一樣不敢接近了。那時，東京留學生的思想言論，都集中於革命問題，吳祿貞在留日學生會館演說，比會館爲美蘭費城的獨立廳；沈翔雲、耿翼章、張溥泉等也發起《刊國報》，鼓吹民族主義。馮自由、馮斯鏞、王寵惠等繼續廣東獨立協會，孫先生也加以贊助。那時，漢口起事失敗而逃亡日本的人也很多，梁啟超是在橫濱辦清議報，新到東京，曾到孫先生這邊來談話，但談話始終不能接近。孫先生到東京時，就在對陽館做會館地點，去見孫先生的人，各釋不絕，革命的空气，已籠罩了留日的學界。

時代不斷地前進，革命的思想終於取得了領導時代前進的主力。在這時代以前，因為國人由於傳統思想的支配，對人是崇拜士大夫階級，對政治則君臣之義，超於一切。因此當戊戌變法進行的時候，康有爲、梁啟超一流人物，在國內的聲望，居然高於孫先生。康有爲是出於所謂「以理學傳家」的家庭，且新由舉人得中進士，他的主張又是迎合了不忘君臣大義的士大夫階級的心理，因此取得了一時的領導地位。孫先生第一次廣興起義以後，國內人士，雖然因此有知道他的名字的，但是報紙上講到孫文，都要把「文」字旁加上三點水作「汶」，形容他與強盜亂賊一樣。以爲這位姓孫的有什麼紅眉毛，綠眼睛，是最厲害的公道大王。一般帶着傳統的腐敗頭巾氣習的人，都以爲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經生文人，甚至疑心他不識字。（見吳稚暉先生著我第一講中山先生。）到了康梁變法失敗，孫先生在惠州第二次起義以後，他的身份，就大不相同了。粵督德壽對於更堅強和惠州之役發布的告示和奏摺，雖然任孫文的「文」字上，仍舊加上三點水作「汶」，却把孫先生和康梁並稱，什麼「無非因康梁孫汶各逆，從中煽惑，什麼康孫各逆，勾結土匪。」把這次革命運動，也牽到孫先生身上去，對於康梁未免冤屈了一點，但是把「滿眼晴紅眉毛」的孫先生，公然放在「帝師」一例，却承他過於抬舉了。

滿清政府對於孫先生的看法如此，留學界對於孫先生革命思想的接受，又邊那麽深而熱烈，孫先

這事實上就成了變遷時代的唯一的動物了。在這裏，我們再要說幾句，寫在下面：

「那天他們已經約定鈕（勳生）先生，要邀我同到橫濱去講英文。我雖不會駭成一跳，暗地裏吃驚不小，其時聽見孫文與梁啓超，都在橫濱上下其議論。我說：「梁啓超我總不帶去，何況孫文。充其量，一個草澤英雄，有什麼講頭呢？」他們二人（尙有種家權）微笑而出，約我下午在淺草上野公園稍待候候他們回來，同吃晚餐。他們傍晚果然回來了，我馬上去問孫文的狀況，是否像八幡廟裏的大王爺爺，魁梧奇偉麼？鈕先生說：「你大大的弄錯了，一個溫文爾雅，氣象偉大的紳士。」程是已經來往得好的，說道：「你不相信他是革命的領袖麼？」我說：與「梁啓超如何？」程搖頭道：「梁是書生沒有特別之處。」鈕先生道：「你沒有看見，看見了一定出於你的意料之外。」其時鈕先生以實說有名的學者，被梁鼎汾所賞識，介入湖北陸軍學校，與後來申報主筆的陳冷血，梁所謂爲二難，亦受到張之洞看重。我說問他：「梁鼎汾是個固人物，不必論，難道孫文就有張之洞的氣概麼？」他說：「張之洞是次官而已，你不要問，孫文的氣概，我沒有見過第二個。你將來見了，就知道了。」於是我就領有點尷尬，就把草澤英雄的猜想，完全解除了。」（總理行誼）

吳先生這段話，可以代表當時經生文人對於孫先生認識轉變的經過。他那時事實上已把孫先生看作洪發全以上的人物，不久也成了位很重要的革命同志。

，紀元前十年（一九〇二年）三月，章炳麟、秦鼎彝、周宏業等，發起在十九日明祭讀會演說的忌日，舉行亡國紀念會，這是最能表現民族主義的一種儀式。要求孫先生著名爲發起人，孫先生就立刻答應。但是不久便使蔡鈞就知道這事情，要求日本政府干涉，勸阻章炳麟等中止舉行。到十九日。東京上野精養軒的前面，已站滿了許許多多的留學生，這裏是預定的開會場所，他們都不知道日本政府的干涉，而從各方面趕來的，日衆響應向他們一一難阻，但已來的和繼續前來的，都不肯散去。這時，孫先生帶領了幾十個學生，也是參加開會的，一見這情形，就急中生智，把開會改作聚餐，日本警察無可如何，只得紛紛退去。聚餐完

孫了，孫先生就急急回到檳城，在永樂樓召集同志，補行開會。這一次事情，因為有章炳麟的一篇開會緣起，和孫先生的竭力提倡，對於留學界思想上，有很深刻的影響。

孫先生見東京的革命空氣，非常濃厚，所以不必親自鼓吹了，就請到別地方去，剛剛這時安南總督賴美（Doubé）托東京的法國公使轉請孫先生到河內去參觀博覽會，已經連接邀請了幾回，因此就在這年冬天，決定到安南去。賴美對於孫先生非常傾佩，這一次很懇切的邀請孫先生，是要對於中國革命有所貢獻。孫先生於是於十二月初九日由日本搭日輪八幡丸到香港，這時香港五年放逐孫先生的時期早已滿了。孫先生就安然上岸，到上環永樂街中國日報社觀察一番，就在社內三樓作寓所。住了一星期，就轉道西貢，往河內去了。這次孫先生到香港，香港政府雖沒有干涉，但孫先生離開了，就繼續下令禁止上岸，一直到民國成立時，才把這個命令撤銷，所以這一次孫先生在香港，可說是民國未成立前最後的一次了！

孫先生這一次到西貢，還是第二次了，但上一次匆匆的就走，並沒有認識什麼人，這次來自然也沒有熟悉的人了，孫先生就秘密地進行，不顯擺真姓名拿出來，化名爲杜嘉福，充作美門某大報館的記者，到西貢來採訪新聞，但住了不多時，華僑李卓峯、曾錫用、馬培生等，不知怎樣的竟知道了孫先生，就接獲了珍寶似的，竭誠招待，並且都慷慨的捐助鉅款。孫先生過了相當時候，就離開西貢到河內去。

這時，河內華僑中來了一位生客，他的名字叫做高逸生，住在火車站對面的一家中等旅店，深居簡出，不苟言笑，在莊嚴的面容上，帶着似有重大憂愁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的神氣。這裏有一個老華僑黃陸生，是該店的老闆，有人看見這一位神秘的生客，就告訴了他。他雖是一個商人，却富於民族思想，對國家大事，尤其關心。他那時正同情於康梁一派的立憲運動，一聽到河內來了這樣一位怪客，他敏銳的嗅覺着，這也許就是一位亡國的犧牲人物吧，這要熱心愛國的志士，是應當尊敬他的，他就想法要和這位生客接近。這雖正當護法新年，全埠的華僑，都依照祖國慣例，團團休息，盡量歡活的慶祝新年。陸生就趁這機會，約了幾個夥伴驅車訪問。

傑驍這位高遠生是不像康有爲一類的人。由康康康的介紹，他才見到高遠生，那筆揮毫；

「他是一個當地的慶豐華僑，在埠上很有聲望，今天特來拜訪，想和先生出去遊遊。」

這位高先生對於華僑，是極喜歡接客的，和他們談了一回，就同坐車到各處遊玩，大家談了一些很平常的瑣情，玩了一回，就到陸生的洋服店樓上閒坐，漸漸的談到國家大事。陸生極稱維新變政的好處，並以滿清政府沒有斷然採行，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但高先生却大不爲然，他說：

「那班主張維新的人，是最不澈底的，變政也不是最好的辦法，康有爲這些人結果一定會失敗，要希望他們來救國，是絕不可能的。」

這議論，使陸生嚇了一跳，實出了他意料之外。因他初意以爲高先生或即是康有爲，現在高先生却反對康有爲，這真是奇怪了。但他又不便問他不是康有爲，抑是另外一個人，或是高遠生就是高遠生。談完了話，陸生送高先生回到旅店以後，他晝夜沒有釋去這個疑團，苦苦的想高遠生究竟是怎麼樣的人？

第二天，高遠生回拜黃陸生，在洋服舖樓上，兩人痛快的談着，陸生從高先生犀利的辭鋒中，才恍然大悟，知道高遠生不是康有爲，原來就是 孫先生，高遠生是化名。他高興得不禁隨着 孫先生的大笑，也笑得仰前倒後，緊緊地握着 孫先生的手，說道：

「原來先生是中國革命黨領袖，我真相見恨晚。」

我們現在追敘 孫先生剛到河內的情形。那時稻美因爲等不及 孫先生的來，已請假回法國去了，他臨走的時候，託總書長哈德安 H. H. H. 代表接見，因此 孫先生到河內以後，就見到了這一位哈德安，却沒有遇到稻美。高遠生就是當時 孫先生的化名，現在被黃陸生發現了。不久，龍州巡防督辦蘇元春不知怎樣的也知道了 孫先生到河內的消息，就派了二個幹練的武弁來偵察他的舉動。 孫先生看見這兩個武弁，跟在後面左右不離，早知道是滿清官吏派來的偵探，他就不慌不忙，和他們接近。一天， 孫先生竟邀請這兩個武弁入宴會，二人知道 孫先生已經察破他們的行徑，竟不敢拿起着來， 孫先生看出他們的心事，就把自己的杯箸和他們的

家庭的快樂，不能阻抑了他革命的興趣。他不聲不響，不休息，又刺各處發展了艱苦的革命工作。

檀香山是與中會的發源地，孫先生自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一度到此後，相隔七年的光景，現在的情形，就有些不同了。歐戰爆發以前，梁啟超曾經得了孫先生協助力，到過這裏，備極艱難，積極提倡保皇，迷惑了不少思想純潔的華僑，也轉瞬了很多與中會會員，投到他們的旗幟之下。現在他們的旗幟新中國報，正天天發表以退還香港權宜論。幾位立場堅定的與中會會員，看到保皇黨勢力的日見發展，也都繞口結舌，不敢反抗，他與孫先生來往頗密。

孫先生與檀香山保皇黨的被人維持，覺得非常明白。他在這時期，曾經寫信給馬木山僧說：「彼黨狡詐非常，見今日與保皇黨，被在此地，則日借名保皇，實則革命，在美洲竟自稱其保皇黨為革命黨矣。欺人實甚矣。旅美華僑，多受其惑。」他又檢討過去沒有注意到這裏保皇黨活動的謬誤，在這借上痛切的說：「他與梁啟超等，多受其惑。」未暇謀及海外之運動，雖使保皇黨橫如此，亦無有不應辦也！」以此孫先生這次來檀香山，就是直衝保皇黨的勢力，鞏固革命黨的基礎，並盡力掃除其毒，以一心。對保皇黨，他已不假辭色進行了，孫先生採取了多方面的方式，他曾特與華僑拳擊運動人心，因此在檀香山早報（The Honolulu Advertiser）有這樣一段記載：

「昨天下午，著名革命家在荷得爾街戲院，很勇敢的向大衆說道：『革命是拯救在國際現狀下處很危險地位運動中唯一的法門，救護華僑最良的贊助革命黨。』許多華僑很熱心的聽着，都表示接受的熱誠。這位革命家身穿很樸實的衣服，頭上留有很短的頭髮，很像一個小呂宋人。他的言論舉動，顯然有一種感化入骨的力量，加以態度溫和，秩序整肅，他真是一個天生說的尖刺。她說：『沖動最早提倡革命的，就是孫先生，因為他是仗義平民，所以現在還稱他是聖人。現在我們為什麼要革命，因為最近北方的義利關係中，已經到了極點，我們應該打孫先生，在孫先生打孫先生。』」

起來就可以把他們推倒。我們請買的，是在建立真國，調查身體了，就是孫英圖，選舉大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

孫先生演說的天才和力量，本來是顯顯著的，林白克曾經描寫一次 孫先生演說的情形，非常生動，他說：

「有一次 孫先生演說，聚眾而聽的很多，中國人外國人都有。在一個大廳裏面，聲音恐怕俱不容易傳達，到四點鐘。孫先生說了幾句開導語之後，向前面走幾步，聽衆掌聲雷動。他靜默了一下，再前進一步，掌聲又起，夾雜一片歡呼聲。他等了一等。將手舉起，聽衆肅然，寂靜無聲。孫先生仍舉手靜默，屹立不動，乃繼續演說。他演說時差不多換了一個樣子，屹然響朗的聲音，中人知有魄力。他的話句句是真實的，個個字是迅疾，準確，熱烈。有人拍胸脯，只聽得嗒嗒的聲響，高，下疾，徐，如金黃節；演說平穩如流水，終尾很清楚，聽衆可從他演說時立在講廳迴聲的中間，而他的話已深入聽衆的腦筋裏了。歡呼和鼓掌聲又起，但是 孫先生仍舉手靜默，看海裏的波浪，他再舉手，喧鬧的大衆又靜下來；他又繼續滔滔地講了一回；於是「停頓，聽衆人靜默」孫先生一口氣差不多說五百字。」(The Speaker, Paul M. Chan, yet seen and the Chinese speaker.)

孫先生演說，聽了幾次，每次一連二三天，聽衆多至千餘人，真是唇焦舌敝，不辭勞瘁。他爲要幫助階級在講壇上，聽衆聽衆，每次演說影了以後，總是站在演說台上很久，對着聽衆說：「聽了我的話，倘有疑問的，請提出來討論。」因此有許多把革命和保皇的意義分別不清的，都紛紛起來請求解釋，孫先生不假思索，一個個都很滿意的答覆了他們，於是有不少的人，都走出了保皇黨的迷途，重歸革命的大道。希境(Hill)場的聽衆，甚至自動的歡迎 孫先生到該處去演說，聽衆成立與中實分會。檀島的革命空氣，從此又活躍起來了。

孫先生不以其親戚家原有同情革命的報紙，名「陰記日報」，改組有責起來，作爲文字鬥爭的區地，這時

原有爲此種加拿大總理羅曼斯，大維清勳，哄騙領袖，到處播傳。又發表了一篇「最近政見書」，勸告孫君擁護保皇，排斥革命。他聽到檀香山的情形，就大罵新中國報羅維德（維德）等無用，爲什麼讓孫先生倡言革命，不加阻礙，保皇黨黨員，竟拱手把黨員送給革命黨。陳繼傑等因此在新報上更肆言詆毀革命，嘲罵孫先生，甚至公然大言：孫先生在檀島不宜多事。孫先生認定保皇黨的氣餒萬張一分，革命運動的前途，就多一分困難，因此不覺不把保皇黨的陰謀，康梁的爲人，向華僑宣布，在陸記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敬告同鄉書，最重要的話是這樣：

「夫廉潔一舉進士，一以舉人，而蒙清帝裁牒（即光緒）特達之知，非常之寵，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維新，言聽計從，空虛不成，而康梁從此大名已震動天下。此誰爲爲之，孰令致之？非光緒之恩，曷爲至此？今二子之遠遊外國而倡保皇言也，其感恩圖報之未遑，豈尚有他哉？若果有如公等之所信，彼等爲保皇而實行革命，則康梁者，尙得處於人類乎？直禽獸不若也。故保皇無毫釐之假借，可無懸義夫之加罪。則請讀康有爲所著之最近政見書；此書乃康有爲勸南洋、美洲華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談革命，不可舉進士，只可死心踏地以圖保皇立憲，而延長滿洲人之國命，續長我漢人之身契。公等何不一察其情，而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己之欲，推人之欲，而妄誣康梁一至於此耶？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實明明出於梁啓超之口，是何特誣？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無他耶？而何以梁之門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視梁爲公敵爲深仇耶？梁爲保皇會中之運動領袖，關係頗深，世皆羨慕；日擊近日人心之趨向，其情之懇款，毅力不足，不覺爲革命之氣所動盪，而竟棄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黨之起而倡革命，每言破壞，似言贊同維新之過於恩光緒，想言其真誠之過於其有者，是猶子病人之偶發毒語耳，蓋其有原情而後去而後明之實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則一舉進士而後，康既滿心，即願其保皇會之不振，而梁亦與之於滿，去其之分離，則其言革命與保皇者，康梁亦與保皇者不相容，豈不難哉，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說，首鼠兩端；其所言革命與保皇，則保皇之言盡虛偽；而其所言保皇則其

說

，則革命之成功也。

這是在革命成功之後，我們對內對外的關係。康黨的心事也說得非其虛語。首先康黨要了這篇文章，大家那俱歡喜，保皇黨也大受鼓舞。康黨在革命成功之後，也發了一篇文章，其內容與孫先生的革命宗旨相背，大受鼓舞，他即發出了許多關於民生革命的問題，如革命可以召瓜分，因為革命成功必召外國的空氣，非常濃厚，保皇黨的人便拿這問題來攻擊革命。他又說中國實行革命的國民自由黨問題，這問題在革命程序問題。這些都是非非的議論，却迷惑了。孫先生筆戰的樂趣，於是在該地日報上發表了「一掃康黨毒氣」，對這等新學派的攻擊，在孫下一個嚴重的駁斥。現在我們這篇文章對於上面三個問題的關係分錄如下：關於第一個問題，孫先生說：

一、康黨之革命與瓜分，在於旦夕，外人窺伺，乘間即發，各國指認之地，康黨政府不得與列國云云，康黨之革命與瓜分，在於旦夕，外人窺伺，乘間即發，各國指認之地，康黨政府不得與列國云云，耳其，康黨之革命與瓜分，在於旦夕，外人窺伺，乘間即發，各國指認之地，康黨政府不得與列國云云。蓋今日之滿清，人民能奮發，則做小如巴拿拿（今譯巴拿馬），激烈如蘇威亞，列強即之承認也。而日前百里，月大數城，終於於盡而已。尚有一線生機之可望者，惟人民之發奮耳。若人心日解，發奮為雄，大舉革命，一起而倒此殘廢將死之滿清政府，則列國方欲我殺我之不暇，尙有幾何瓜分之事哉。既引管子之作，以寄軍令，何以偏阻漢人行革命覆運邦？今日之作內政，從何下手？必先驅除帝制，復我政權，始能克竟其今日誓一約制山東，明日押一款賣兩廣也。彼滿清政府，不特簽約款以割我賣我也，且使外國不靖地方，然後送之；廣東之新安縣、廣州灣已然之事也。倘無滿清之政府，為之助慫為虐，吾民猶得便宜行事，可以拚一死以殉吾之桑梓。彼外國知吾民之不昂興，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則彼雖貪欲無厭，猶有戒心也。今有滿清政府為之鷹犬，則彼外國者，欲取我土地，有手取予之便矣。故欲免瓜分，必先倒滿清政府，則無挽救之法也。

關於第二個實行民治的人民自由民權和法律的問題，孫先生說：

「他又會謂中國人無自由民權之性質，幾會力斥其謬，引中國鄉族之自治，如自得斯祿，自行保衛，自行教育，自行修運道路等事，雖不及今日西歐之美，然可證中國人原有民權性質焉。又如中國之民，向來不受政府之干涉，來往自如，出入不關；婚姻生死，不報於官；戶口門牌，辦莊於册；甚至兩鄰械鬥，爲所欲爲，此本於自由性質也。彼又反覆相繼謂：「此野蠻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較言。僕既云性質矣；夫天生自然謂之「性」，純樸不文謂之「質」；有此野蠻之自由，則便有自由性質也，何得謂無。夫性質與事蹟異；發顯於外，謂之事蹟，稟賦於中謂之性質。中國民權自由之事蹟，未及西國之有條不紊，界限秩然，然何得稱謂之無自由民權性質乎？惟中國今日富於如此野蠻之自由，則他日容易變爲文明之自由；倘無此性質，何由而變，是猶擊玉，必有其玉質，乃能擊之成玉聲；若無其質，雖琢無紋也。彼又謂：「中國人民富於服從權勢之性質，而非富於服從法律之性質。」試問無權勢可以行法律乎？今如權島，若政府無權勢以拘禁處罰於犯法之人，其法律尙成爲法律乎？夫法律者，治之體也，權勢者，治之用也，體用相隨，不相判也。今該主經駁別服從法律與服從權勢而爲二事，是可知彼於政治之學，毫無所知也。」

這一段辯論的要點，是在革命後能否實行民治的一點，孫先生是承認人民有能力可以建立民權的，但保證派却主張先君主立憲，然後過渡到民主立憲，這是他們最巧妙的主張，因此關於立憲的問題，孫先生有最嚴正的一段話，就是說：

「他又曰：「立憲實過渡之時代也，共和者最後之結果也」。此又可見彼不知立憲爲何物，幸而附會也。夫憲法者，西語曰 Constitution 乃一定不易之常經，非革命不能改也。過渡者，西語曰 Transition 乃變更之謂也。此二者皆皆從英文譯出，中國無此定辭也。該主筆雖不知憲爲何物，而會讀 Constitution 時代，一何可笑也！排彼之論，必當先將立憲者注意而後可成立憲派主，乃合進化之次序也。」

而不知天下之事，其爲被天所運則難耳；若世謂已有其事，且行也，已故大教者，則我何以取法而爲後來居上也。試觀中國向未有火車，近日始興建，皆取最新之武者。若照彼之理，則中國今日爲火車萌芽之時代，當用英美數十年前之舊物，然後漸漸更換新物，至最後之結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車，方合進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人聞有如是之愚乎？今擬以君主立憲爲過渡之時代，以民主立憲爲最終之結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壞，而始得至於民主之域也，以行二次，如何行一次之爲便耶？夫破壞者，非得已之事也，一次已難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專制之時代也，必先破壞此專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憲也，既有力以破壞之，則君主民主隨我所擇。如過渡焉，以其滯乎中流，何不一掉而棄彼岸，爲一勞永逸之計也。使該主筆者不知民主爲最終之結果，其倡言君主立憲猶可說也。若乃既爲美談，而又認爲最終之結果，胡爲如此矯強支離，多端辨難也。得勿以此事難善，誠爲救中國之良劑，但其始不倍於吾師，其終亦不減於吾手，天下上等之事，必不讓他人爲之，故必竭力阻之以致不成而後已！是實私心而忘公義也。」

這是孫先生討論實際政治的最早的文章，詞嚴義正，保皇報無話可答。後來氏報和新民報的筆戰，根本理論，也都採用了。孫先生這篇文章，所以也可說這是革命論與君憲論爭戰的綱領，是很重要的一段史實。保皇黨在趙島的勢力，從此遭受了嚴重的打擊。但孫先生爲要爭取會黨的力量，擴張革命的聲勢，和鞏固革命同盟起見，更親身加入致公堂。這致公堂就是洪門的一種組織。洪門本來是三合會，哥老會的支流，響美洲的華僑，都是這組織中的人，致公堂便是他們組織的名稱。保皇黨在美洲，不但誘騙其中會員，並且混入了致公堂，把持一切。致公堂一日爲保皇黨所把持，革命黨便一日無法發動華僑參加革命，所以孫先生加入致公堂，就是要使華僑從保皇黨的欺蒙之下挽回過來，加強革命的力量，這意義是非常遠大的。紀元前十六年，孫先生到美洲時，已遇到了很多洪門的人，但他們因爲「孫先生是「黑仔」（洪門稱非同道者爲黑仔），所以不能發生感情，對革命活動的進行，受了很大影響。這次孫先生看出了這個根本原因，便毅然加

入他們的組織。介紹的處是孫先生。致公黨黨員中的孫先生從知了這個消息，才敢舉力破壞，有一位洪門祖父（洪門稱和黨為祖父）雖亦被孫先生而得，對他的說：「洪門宗旨，在於救濟復明，而孫君未入洪門，已實行洪門宗旨多乎，此等人應招納之不暇，何可在之門外？」這話反對派無話可答。致公堂於是擇日為「孫先生演說，別開台戲（洪門稱拜盟曰演戲）。同時拜盟者六十餘人，當場由主席員某大德封「孫先生為洪棍。洪門軍職，例分洪棍，稿扇，草鞋三級。洪棍就是元帥的別名。他們又稱介紹人為舅父，因此有人說楊文納是「孫先生的舅父，乃由洪門關係而來的。但最巧的，孫先生的太夫人，也是姓楊。

保皇黨既無法破壞，孫先生加入洪門，就到處散播謠言，說革命黨的聯絡會黨，是出於一時的利用。孫先生又對他們痛罵一番，他說：「不知革命與洪門志同道合，聲應氣求，合力舉義，實有應盡，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門之宗旨，而令洪門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

第二十五章 重遊美洲

孫先生在檀香山經過了這種種奮鬥，把保皇黨打得落花流水，奪回了革命發源地的地盤，工作已算告一段落，於是準備到美洲去，繼續進行鬥爭。因為致公堂總機關是在三藩市，所以孫先生這次重遊美洲，他的任務是很大的。楊文納在遠時，又向孫先生建議，他說這次孫先生在檀香山和保皇黨大開筆戰，他們難免被毀殺復，運動美國副員阻礙他登岸，因此主張設法取得一級夏威夷的出生證明書，以備不虞。孫先生對於這個建議，躊躇了很久，經楊文納一再懇求才答應。於是向總彰公託了幾位老年的同鄉，向茂宜島當局代為證明，取得了一張正式文件。當時總彰公所經營的礦場，因為夏威夷政府修改土產法，取消私有制度，大受損失，已經沒有從前的富裕，故於孫先生遊美的旅費，不敷各所供給，祇差了一枝極珍貴的龍涎香，以滿孫先生途中萬一發生經濟困難，可以變價補充，他稱手是之的同情，何等真摯而深切。

們知道了。孫先生說這國人的消息，高來高去，並且買了許多食品，因此，孫先生也不覺得什麼痛苦，祇有體健試調。

不久，美海關竟把孫先生連同了這國人的水庫，統統孫先生和陸上的朋友，都關在下面的，這便陷入了最危險的境地，隨後經移民顧問以後，才得自由出來，便原形而獲救。這是孫先生這幾年來最難得的事，又是失去了自由的三天，他內心是如何的焦急呢，正在恍惚疑計的時候，他在拘留的同伴所寄的中西日報上，突然發現孫伍靈壽三字，確實的。孫先生就得到了一條光明大道。因為他從模糊的記憶中，記起了這位伍先生是一個著名的基督教學者，向來從傳教及雜誌事業，到廣州時。八年以前，孫先生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亡命出陣時，廣東的救友於斗山，感其意，一人早曾與孫先生一封信，現在還放在竹籠中，沒有用過。他正這因居時，正請要這伍靈壽的救友來營救，於是，孫先生就寫了一封信，要求一個賣報的美國小孩子，送到沙加滿都街中西日報社。

中西日報社便從購經靈壽的一番事業，他勇於殉難，他領事館顧問的職務，何妨如有重要對外事件發生，多向他諮詢辦理那天，他突然接到了廣州來運送靈壽的拆開一看，祇有這樣幾個字：

「靈壽被囚於批發出院，請即來木屋相見！」

他平時對孫先生早已久仰大名，知道靈壽這番事件不平常的事情，因此立刻想到了移民局長的准許，趕到碼頭上向本處長去請請靈壽先生，相見之下，本處長甚歡，孫先生把被道困辱，判作出境的經過，告訴本處長，本處長聽了，更覺對日土報的欺騙，已獲追促，主謀和救友竭力援助。本處長照後熱心地答應了。孫先生的要求，即行轉請。本處長並和出黨年任職三人除介靈壽與本處長同，因為這信出同時又介紹了一位司德達南牧師。在靈壽回美以後，他與司德達南牧師及其他許多教友，公議靈壽的辦法，他得知消息，孫先生已經加入法門，準備逃往我地，並請其出關，靈壽並應允他。他與司德達南牧師等，並請公使，橫加阻力，於是先向他警告一番。牧師將靈壽呈遞於五政府，然靈壽應他受公使護照而轉的事情，他應認這是事，即請清政府命令，儘量

陳對他說：「孫先生是革命黨，不能辦爲僑胞的理在德索同鄉人，已經決定向美政府上訴，你如稟報公使，即將激動刑獄！」他聽了這個嚴正的警告，始覺容顏小小心行，不敢再提罷了。

任盤照阻止了孫先生的舉動以後，又去訪問該公堂案卷書記唐理昂，指孫先生被阻入境藉留木岸的經過，竟情地聽了出來。那時三藩市政公堂本爲全美僑商林洪門的總機關，但以代遠年湮，大多數已經忘了反渣復明的本來面目，並且也有身時保皇黨的。取有總堂李春情（主盟員之稱）袁三德和這位唐理昂，平日熱心革命，尤欽佩孫先生的爲人，他們聽到了這個消息，大爲激憤。唐理昂就陪着伍盤照去找他們的法律顧問美律師那定，請他依法相助。並且又約集同志到木岸去慶賀伍盤照先生。孤立無援尚在被困中的孫先生，到這時才得到這許多誠懇實惠的援助。

他們援助工作的進行，首先由那文向移民長展聲明，即向美政府工商部上訴，並依照移民法例，得以五百元保證金，保釋候判。那時五百元保證金的籌措，收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最後由致公堂以士波福街的一座木樓的產業，向一家保險公司具保，才担保孫先生出外，聽候美京判決。

孫先生從木岸出來的那一天，致公堂的職員都歡歡教教中的有志者，駕到碼頭上去歡迎。在木岸中困居三屆期的孫先生，於是在熱烈的歡迎聲中，跨上三藩市之門。

孫先生這次入美籌留木岸的事情，實爲我國歷史上的一件奇事；因爲在這裏反映了當時我們的國難地位。孫先生曾經說過這件事，也很痛心，他說：

「記得到美國上岸的時候，無論所見的聽見的，第一等美國人問你是中國人，第二等日本問你是日本人呢？如果是日本人，便可自由上岸；如果是中國人，便受人稱（橫即木岸）檢查，必須須須好幾日，始可自由上岸。兄弟有一次到美國，在國內住過一星期，但那邊是橫條條的，有不幸的，甚至空花錢費充務和所受檢查的種種痛苦，見到美國而不能上岸，由那定盤照等中國人……就是像從前舊金山的大旗節，也不許我們住。上海僑領的外國公使，也寫出招牌說：「一列同中國人不准入」。像這樣一想，便知道中國人民在世界上

是甚麼地位？」（民國十二年十月對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
當時美國海關的法律，對於國籍地位低微的國家，有一種特別的觀察，無可諱言的是一種特別奇例，再加上保皇黨和渣渣官吏的搗亂，使孫先生重陷於困苦的環境，浪費了二十多天寶貴的時間。當孫先生駕傷給伍盤照求救的時候，他身上已一個零錢都沒有，他無法購報送信的那個賣報小孩，祇得把信封上註明由伍盤照付給，他那時情況的窘迫，由此可見。

孫先生從木屋出來以後，洪門同志，一致歡迎。因為照他們的慣例，誰起兵抗清的，誰就是大哥，孫先生既已加入他們的團體，當然是一個大哥，因此也就受到了這種特殊的歡迎，和紀元前十六年到美洲時的情形，大不相同。隔了幾天，美工商部的判決文也送到了，這判決的內容是：「孫某既持有夏威夷出生證書，當然取得美國公民所享受之居留權利，絕無可以撥送出境之理由。」於是清領事及保皇黨徒中傷計劃，粉碎無餘，孫先生在美國，可以自由活動了。

現在三藩市的聖瑪利公園中，已經建立了孫先生戴鐵的銅像，四十多年前，這個小小的波折，也許還留存着若干年老的中美人士的腦海，但由於我們國際地位的增高，和中美邦交的進步，這一段故事，會變成了講述中華民國國父歷史時一個最有趣味的資料。

我們回過來再說本題，那時保皇黨在三藩市還是有相當勢力，致公堂機關報大同日報，就由康有為的門人歐陽甲把持。他看到洪門同志這樣熱烈招待孫先生，不免眼紅，於是天天發表排斥孫先生的言論。黃三範、唐瑞昌等，忍無可忍，立刻把他停職，請孫先生另薦同志擔任主筆，孫先生因託身自由轉騰到成昌，從此大同日報的論調，完全改變，洪門的宗旨，大昌於北美。中西日報也要求孫先生代聘駐香港的探訪員，孫先生就推薦了陳少白、鄭實公二人擔任。他們更以無代價編印為容革命軍一萬餘冊，致公堂推任了寄書的郵資，向各埠大量的分發，全美華僑得此有宣傳品的啓導，不及半年，風氣為之一大開。

孫先生又得黃伍諸人之助，假士作頓街長老會正道會所，開救國會，說明革命主義的大要，並募捐革

命軍需債券，及徵求軍中會員。到會的大多數是舊派領袖，對孫中山的組織，却不免畏縮，結果認購債券共有美金二千七百餘元。這次對孫中山的組織，刺地募得一千三百餘元。這次對孫中山的組織，可以說並沒有多大成功，但已經建立了相當基礎。孫中山以後

孫先生重來這裏的時候，當發動廣州起義而募款，新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艱苦的革命工作，是從一點一滴的奮鬥中，繼續不斷地成長起來。孫先生又從各方觀察，覺得致公堂各埠分埠對於總堂的聯繫不夠，這便有歷史性的團體，已有組織散漫，精神鬆弛的趨勢。這種情形，對於保皇黨，而不利於革命黨。因為革命黨和保皇黨對華僑事業的態度，是兩相相反的；革命黨對華僑嚴密的組織起來，以前覺的精神來實行固有的反清的民族革命的任務；保皇黨則不然，他們害怕華僑民族事業的變遷，害怕華僑的組織力量，但他們又不能不利用華僑。因此當時孫中山華僑組織散漫的形勢，正十分便於保皇黨利用。

孫先生針對着這一點，因此發起洪門總註冊。洪門總註冊的意義，就是把華僑會黨的力量統一組織起來，華僑的組織愈嚴密，愈強化，保皇黨的欺騙和蒙蔽，便無所施其技了。致公堂的職員，對於孫先生的提議，都一致贊成，註冊工作就很順利的開展起來。在這期間，孫先生特親自訂定了一個「致公堂重訂新章」。這新章的唯一意義，就是把華僑原有組織的舊瓶，裝進了革命思想的新酒。換句話說，就是把致公堂變為一個激頭徹尾的革命團體，把華僑會黨的力量變為一枝洪大的革命力量。

新章分為「要義」和「條款」兩部份。在「要義」裏，首先揭出了致公堂原是民族革命的組織，但因內部散漫，宗旨漸忘，遂為保皇黨所利用，而走入歧途。唯一補救的辦法，只有重新團結起來；「原夫致公堂之設，由來已久，本愛國保種之心，立真誠團結之志，以救國之難，而保種之危。其宗旨之所在，早已遍布於十八省，及五洲各埠，凡我同胞，無不聞之。其所以救國之難，而保種之危，惟是向來太鬆，每多不肖時輩，維持乏人，其和民政之邦，結合聯盟，皆無所聞，此所以致公堂之組織，向來太鬆，每多不肖時輩，維持乏人，間有未備兼意，故有散漫四方，未能聯絡一氣，以成一極強極大之團體，誠為憾事！近且有背盟負義，趨人

終途，倒戈相向者，則更覺痛恨也！若不亟圖振作，發奮有為，則洪門大義必將淪廢矣。有心人憂之，於是謀
議改良，力圖進步，實打新黨，以應時勢，而維繫人心。夫力分則弱，力合則強，衆志可以成城，
此特事團體之真也。我堂同人之在美者，不中皆具熱心，而政體最爲進步，人自奮談，無所統，故有
則消息少，有事則呼應不靈，以此之故，爲外人所輕視所欺侮者，所任委有，此改良章程維持業務所宜
也。」

其改良章程出於堂堂黨所應負起的三個重大任務：第一是：「聯合大羣，團結大力，以捍禦時勢，傾懷
同人；」第二是：「聯合大衆，團結大力，以圖光復祖國，拯救同胞；」第三是：「聯合大羣，團結大力，以先
濟內奸而後除異種。」第一種是互助的任務；第二種是救公堂會員彼此之間的任務；第三種是排滿的任務；第三
種是漸消保皇黨的任務。第二三兩種是救公堂等機關民族性的任務，也就是應負起的當則民族革命的任務。
關於第二種任務，「要義」裏說：「吾等爲華族生存之時代，天下列強高倡帝國主義，莫不以開疆闢土爲心，
五洲土地已盡爲他種所排擠，今所存者，無亞東之官華與海峽羣島，而清國則世人巴因之爲病夫矣，其國勢積弱，
顯等傾覆。今滿洲爲滿洲宗發祥之地，險要所在之鄉，稍不能自保，而謂其能長有我中國乎？此必無之理也。
我民族飄蕩萬入並甘爲僑籍人之羈籠乎？今之時代，不競爭則無以生存，此安南、印度之所以滅亡也；惟競
爭始能獨立不爲他國。日本之所以興也。當此清運已終之時，正漢人光復之候，近來各省風潮日熾，革命志士
日多，則天意人心之所向，吾黨以順天行運爲念，今當應時而舉，不可失此千載一時之機會。」

關於第三種任務，「要義」裏說：「中國之見滅於滿清，二百六十餘年，而其能恢復者，初非滿人能滅之
能有之也。因有僑商爲此作僑，視同胞而痛，故有集雲程、許承嘯以作倡，繼有曾雨濤、左宗棠以爲厲，
今又有所始倡者設空室之說好，以維談助，海島滬人願抑漢族，假公濟私，圖財肥己，官爵也，銀行也，
以爲惡，新勢也，而皆也，明堂也，皆所以餌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本堂洞悉其弊，不肯附和，遂大開彼黨
之忌，令其本堂舉行新之初，故有種種惡語，令其憤入，蓋我本黨編結一成，則彼黨自然瓦解，而其所事真

君父之滿載，亦必無覆滅，則彼獲奸滿奴之職，無主可供也。其衷心病狂，罪大惡極，可處誅哉？凡我漢族同胞，非食其肉，寢其皮，何以伸此公憤，而除此敗類也？本堂雖疲瘁，亦必當仁不讓，不使此毒種流傳，遺害於漢族也。」

在「舊款」裏，則不特揭出反滿反漢奸的任務，而且揭出了三民主義的革命任務：

一、本堂以驅除殘毒，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

二、本堂以協力助成祖國同志施行宗旨為目的。

三、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堂相同者，本堂當認為益友，互相提攜；其宗旨與本堂相反者，本堂當視為公敵，不得附和。

這條款中顯露的三大宗旨，就是後日同盟會的四大綱領，是孫先生由三民主義思想的形成，到革命綱領的確立，最早的具体表現。

新章經致為堂大會通過後，即公推孫先生和總堂大總理三德遍遊全美各埠，鼓吹洪門革命，抨擊保皇黨。經過一個多月的奔走，周遊美國南北數十城市，最後到了紐約。孫先生於是年西歷六月十六日，曾從加利福尼亞省途中，寫信給東京的馬目山僧，可以看出他此行的收穫。這信說：

「弟近在苦戰之中，以圖掃蕩在美國之保（皇）黨。（該黨）已到退位，大處俱得得手。今擬遍遊美洲，所有華人之處，次第掃之。大約三個月後，官軍肅清。保（皇）黨不無多少反動之事，因此有一二廣徒，而後漸冷淡矣，掃之想為不難。惟是官發給之初，即係（皇）黨不無多少反動之事，因此有一二廣徒，而後漸冷淡不集，今已與各大使商妥，設法先行聯絡各地洪家，咸為一氣，然後可以再圖其他也。故現時正在清黃不獲之秋，尚無他策，以冀圖爾爾及日本之用而報。大約數月之後，當有轉機也。弟致感在萬幸同輩，當當遵守，以待好機之來。」

從惠州起義到現在爲止，革命的形勢，正走上開展的階段，保皇黨雖百計破壞，也沒有阻撓了這方與未艾的革命潮流。所以孫先生在自傳中說：「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渡粵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

孫先生到紐約時，剛巧日俄戰爭很劇烈。他想借這個遠東問題緊張的機會，指出美國上下援助中國革命的一條路線，因此發表了一篇英文宣言，題目是中國問題真解決 (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主要的意思，是說明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國的，現時中國所流行的種種不能滿意的事情，都是滿清政府的罪惡。中國在歷史上是很能和邦交通的，因此必須建立一個健全的中國政府，才能謀中國的富強和世界和平的建立，同時又說到美洲的致公堂，是中國的愛國會，將來滿清政府的下落，就可取決於這個組織和同志。最後說到「黃禍」的無稽，中國人民是天然的平和守法的人民，所以一旦中國覺醒了，對於世界的影響很大。但如果列強瓜分了它，便一定釀成像這次日俄戰爭一樣的大禍；如果列強保全中國主權的獨立，那不是滿清政府所能擔負得起，還須要經過一番革命，這是美國上下尤須幫助的一點。這一篇可說是革命黨最早的對外宣言，是很有很深刻的意義和歷史價值；也是孫先生在革命進程中到另一階段開始的一個徵兆。

第二十六章 在歐洲的活動

孫先生在美溯差不多住了七八個月。他除了上述種種活動外，對於革命理論的研求，和三民主義思想的充實，也隨時留心。他曾經說起任紐約和一個留學生討論五權憲法的故事，從時間上推測，恐怕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因此知道，孫先生創造五權憲法，到這時已經具體完成了。

孫先生這次在美洲的旅費，僅僅從檀香山募捐的幾千餘美金，他住下了七八個月，走遍了南北美洲，從事種種活動，到這時，已經用光，因此想到歐洲去，爲了旅費困難，竟一時不能動身。那時歐洲留學生以湖北以

為最多，都是湖北無黨派之派從兩湖書院中挑選思想最激烈的學生派送出來的。這些學生大都與當時武裝的黨團機關通聲氣，企圖推翻政府。所以被派之派分派東西洋留學，免生事端。大約日租界對面就是花園山機關的同志不能知道。孫先生有激進的意志，但他沒有旅費，就寫信告訴留日的湖北同志賀子才，說：「孫先生要與歐洲來了，但很緊，請他們設法籌集旅費。」賀子才等本來是想和孫先生接近，有了這樣一個機會，大家就非辦不可。那時留日學生可算完全是花園山的精英，大約有三十餘人，德國二十餘人，法國也有二十人餘。賀子才就與各同學努力設法，請他們大家制出錢來匯到美洲去，請孫先生來。結果在比國籌得四千餘法郎，德國二千餘馬克，法國一千餘法郎，由賀子才匯寄孫先生。孫先生知道歐洲留學界有這樣一番熱情，就決定到歐洲去。賀子才要與孫先生商討行期和輪船的名號，就一面遞留德同志朱和中到比國來，一面等輪船到埠了，就和李仁柄、李壽昌等，到比國北海口奧斯坦得(Ostend)埠去歡迎。

這時候已暮春，到地生穿着皮袖的外衣，手攬着一只皮包，匆匆地從輪船下來。一見了這幾個歡迎的同志，就流下了慷慨的情懷，和他們一一握手。乃由賀子才引導，坐了馬車到慶賓去。路過工廠，一直陪到北京布魯塞爾的(Brussels)路。孫先生下榻在胡斐柯的寓所。

許多黨於熱血青年留學生，都希望得與一備革命的正道，因此大家一見了孫先生，都紛紛前來請教，於是「精革命的談話開始了」。

「我們在武漢各學校中，都有同志去聯絡，我們的力量，想從武漢革命的頭腦着手，然後將這些頭腦在黨中組織，我們在外面宣傳。」賀子才、朱和中以及其他湖北留學生都這樣說。

「武士是以服從為主，要他們首義，是很困難的。留學的事，必須要革命同志自己担任。」孫先生笑着頭說。

「現在湖北黨中的同志，已經很多，官長都有，應該積極去，總會有「一天全軍都變成我們的同志。」賀子才笑着頭說。

「這恐怕是一個理想而已，事實上做不到的，要真實的擴張革命勢力，必須深入會黨，並且要和會黨發生密切的關係。」孫先生還是表示不滿意感憤的主張，據着便說明會黨的遠近和歷史道：「會黨的宗旨，本來是反清復明，不過到現在他們的宗旨却已漸漸地改變了，我們應當向他們開過去的歷史，使他們恢復本來面目，並且要幫助他們改良組織，使一般普通階級都能參加。因為會黨的組織，還是未開先上訂定的，單是生齒繁到士人無行，所以拿是粗惡的儀式，和一切不通的文章定有教條，使一般士人望而生畏，不肯加入，因此會黨的組織，保存到現在。可是時代不同了，現在應當使學界也加入，去領導他們，才有辦法。你們知道張文祥的事情麼？張文祥是一個會黨的總頭目，犯了很多案子，滿清政府要殺他，滿清定宗葉爾剛做松江總督，滿清政府就命令他寫拿張文祥。不久，張文祥自己到江甯來，在宗葉的軍隊總總出城，他派了幾備軍官去查問，他們說是去歡迎龍頭大哥，問誰是大哥，竟就是所要通緝的張文祥。左宗葉聽了，大吃一驚，於是叫他的心腹也加入會黨，運動他們暴左宗葉為總頭目，等到他在會黨中勢力大了，就再下令在通緝張文祥。我聽這件事情，不是希圖請君要做左宗葉，但復還無事，可以知道，這些會黨會黨組織的團體，就有人去指揮，一定能夠發生很大的力量，我們不應遠離他們，要顧慮他們否聯合這些團體存心禁止而與備存和他們聯絡，我們一有舉動，他們可以隨時阻礙我們的。」

大家聽了，孫先生這番辯論，恍然大悟，個個人都點首稱是。孫先生這樣的反覆宣導，經過了三天三夜，大家才肯脫信服，因此提出組織革命團體的意見，都一致很贊成。到了第三天晚上，何秉柯的家裏，來訪問孫先生的留學生格外多了。孫先生應問大家道：

「參加開會的都在這裏麼？」

「都在。」

「衆人齊聲答着。」

「我們今天開會，不是一種泛泛的聚會，是革命黨開辦的一種儀式，請位今天來了，必須每個人當衆宣誓，以昭信守。」

孫先生以極莊重的語氣，向大家宣誓。

「我們願意爲革命而犧牲，爲什麼要用這宣誓的形式？」有些表示懷疑，提出了這個抗議。

「這不是形式，是一種信念的表示，而且也不是我獨創的，近代會黨的加盟，也有這一種手續，古代的尙書中，也有秦誓歃誓，都是宣誓詞。我們革命黨應當有終身不變初志的信念，所以當加盟的時候，必須鄭重宣誓。」孫先生這樣的解釋了很久，大家才無異議。於是孫先生請他們拿紙筆來，當場寫了這樣一種誓詞：

「具願人某某某，當天發誓，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失忠，有始有卒；倘有貪言，任衆處罰。」

天運 年 月 日

某某某押(指印)

主盟人某文

當時有些僑學生因爲和孫先生接觸的機會太少了，竟有人誤以爲孫先生是生長在檀香山，不懂本國文的，現在看見他對於宣誓問題，引經據典，並且當場親書誓詞，大家都暗暗驚奇他的學貫中西，便愈加信服了，因此都很願意宣誓，一個鐘頭以後，宣誓的有二十餘人。孫先生就向他們一一握手，很愉快地向他們祝賀道：

「你們現在不是清朝人了！」隨着又傳授了很多秘密的手式口號，如問：「你從何處來？」答：「從南方來。」問：「向何處去？」答：「向北方去。」問：「貴友爲誰？」答：「陸皓東、史堅如，」等等。大家聽了，都很快樂的歡呼着，這是革命黨在歐洲第一次組織成立。第二天又加入十餘人，這天晚上有一個集會，大家靜聽孫先生關於革命的過去和今後希望的演說，都非常滿意，到第三天，他準備到倫敦去，於是大家擁着，他遊覽各公園，以資留別。孫先生乘便到滑鐵盧(Waterloo)拿破崙戰勝俄國地方，對着一位失敗的英雄，懸吊了一條。

孫先生在比國大約住了一星期，就到倫敦去。朱和中也回到柏林，準備鼓吹柏林的留學界也組織革命黨。

孫先生這一回到倫敦，耽擱的時間很短促，起先住在城西肯尼敦街，訪問了久別的康德家以後，就在荷蘭公園附近的摩根家裏歇下來了。這位摩根自紀元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創辦華英學校後，曾一度被保皇黨拉攏去，但不久就發現他們的欺詐，因此回國後再不問中國的事情，現在知道孫先生到歐洲，就以友誼的資格，請多孫先生住在他的家裏，這也是不忘舊情的一種厚道。吳稚暉先生到歐洲才遇到了孫先生，也認一見面，就覺得是一個很誠懇，平易近情的好紳士，然而止覺是偉大，是不難形容的偉大，稱爲自然的偉大。孫先生這回在倫敦，旅費又是不充裕，幾位留學生湊了三四鎊送他。但三天以後，他已把那個錢買了一大堆緊要書籍，使許多留學生大爲驚訝，因爲他們知道孫先生付房錢也恐怕付不出了，爲什麼買這許多書？其實孫先生爲了要圓滿主義，博采旁收，雖然天天在奔走奮鬥中，但從不間斷他的讀書生活，這次短距離旅行中，也帶了兩隻箱子的書籍。倫敦的留學界對孫先生革命宣傳的接受，不像北京那樣的熱烈，加盟的祇有孫鴻哲等數人。

朱和中回到柏林，留德學界，早有一部份已知道孫先生在比京組織革命團體，都要求朱和中論孫先生到柏林來，和中於是寫信和孫先生商量。孫先生因爲倫敦的情形，未免冷落，就毫不疑遲的答應到柏林來，到了柏林，就住在朱和中的家裏，留德的學生天天來訪問他，討論革命的問題，熱騰騰的情形，和在布魯塞爾差不多。大約過了一個星期，大家對於革命的意義，都很明瞭，於是準備加盟。那時留德學界差不多以加入革命黨是算光榮的事情，所以劉家佺、陳匡時、周澤春、王發科、王相楚等等都加入了。這是革命黨在歐洲第二次開會。

柏林的事情辦妥了，孫先生因爲安南總督稻美的介紹，向法國政府有所接洽，就準備到巴黎去一下，巴黎的留學界聽到孫先生要來了，都非常高興，願加入革命黨。孫先生知道留法學界這些情形，也很快樂，就派留比的胡秉柯先到那邊去準備一切，因此，孫先生到了巴黎，沒有經過什麼宣傳，就有十幾個人加盟，以唐多寓所，爲通訊機關，這是第三次成立革命機關，於是歐洲的革命聲勢，格外緊張起來了。孫先生在巴黎就專心辦理外交事情，當時法國政府的參謀部稱孫先生已接洽得很成熟。孫先生有時缺乏交際上必需

的費用，想由留歐同志湊集起來幫助，因此孫先生在歐洲的活動，並不感到什麼困難。後來又由柏美的介紹，和法屬的殖民部也有接洽。一天孫先生正在別墅裏看報，竟拉他到德意志殖民地大臣履信院談話，兩個留法同志湯爾納和胡國華忽然來訪問，孫先生若無從置置的招待他們，但他們是要約孫先生到外處去吃飯的。

孫先生因為大家都要問話，就毫不推却的讓他們出來了。吃過飯以後，孫先生在園裏散步，却發現一件奇異的事情，就是他帶來的一只皮包，已經被人割破了，所有比、德、法留學生加裏的警費以及和法國政府安插難民往來的重要文件，都被偷去了。這是太神祕了，孫先生大吃一驚，立刻幻想到幾年前在倫敦被賊偷去的一切圖書情形，恐怖的事變，好像就在後面準備出演了。但孫先生所恐懼的，是加盟同志的生命和法國政府在歐交涉的暴露，這一切都可以影響大局的，因此在無可如何中，祇有電告比、德各同志，設法調查。

當北南志接到了孫先生的警報，立刻公推胡乘柯到法屬來偵查。不久，就查明這事情的真相，原來是留德的王寶科和王相楚所做的。王寶科是一個怕事而又好名的人，他的加入革命黨，不過跟着大衆一時好名心的衝動罷了；所以等到加盟了，就後悔起來，他怕帶了革命黨的頭銜，國黨去不請在滿清政府下做事，時時想方設法要脫黨。這時王相楚和周蔭春也爲了這個問題常常吵鬧，他們二人本來是奉和陸兩，因此互相牽連名信攻擊，在留德學生會中攪得烏煙瘴氣。王相楚無法應付了，就和王寶科商量，他們一談之下，更覺得問題嚴重，因此又聯合了陳匡時準備一起叛盟，免得將來有禍。他們計劃決定了，三個人就聯名到法國去，向唐巧巧書建議，要求他把警費要還，唐書說這不是兒戲，怎樣可以反疑無常，沒有要應付他們，他們更發急了，就寫去數封信，向國黨交涉，這才是投機了，於是決定由湯向二人，假意來請孫先生與法國政府外交時大伸伸大舞會出來了。先生的房間，把皮包割開偷出警費，却不料連孫先生與法國政府外交時大伸伸大舞會出來了。

他們四個人拿到孫先生這許多重要文件，就到蘇法亞使署質詢面前，把這事經過說給他聽，要入革命黨之類，在已經修書了，隨着就是警費和外交文件，那蘇法亞使署一則算一則，蘇法亞使署，要他會同先生，都是他的隨員，二則恐怕辦得不妥當，也許會聯成證據奔前會致使他的生命，他祇得極力反抗他們。

「你們加入革命黨，已經叛變了。現在你們曾以是請教革命黨，並運送給書信學的舉動，你們這樣不忠不義，還有人格良心麼？趕快把名冊還他，否則我先撤掉你們的官職，送你們回國。」

說着，就把名冊退回他們，但是法國政府的文件，却被他留下來，他就叫侍役把他們趕了出去。後來孫寶琦把這些法國政府的文件都入奏清政府，因此他飛黃騰達，就是這一次二王給他的機會，這也是革命史上的一件奇事。

他們四個人被孫寶琦痛罵一頓，實出意料之外，弄得退無路。還是湯銘有主意，獨自一個去向孫先生謝罪，把割皮包的事情，却推到王發科他們幾人身上。孫先生若無其事，說道：「沒有什麼要緊。」接了他名冊，仍講幾句勉勵他革命的話，待如初。這寬宏的度量，是出於孫先生的自然態度。這一個風波，於是告終。但孫先生在巴黎奔走三個月，向法政府一切交涉的結果，經這一次都已破壞了，這是不免有些傷心，那時所能安慰孫先生的，就是同志加盟的一天增多一天，日本的同志更增多了幾倍，都催孫先生回去主持大計，於是孫先生決定再回日本。

孫先生準備東歸以前，又到倫敦去一下，倫敦的革命團體，不久也成立了。倫敦住了不多幾天，就回到巴黎，準備從馬賽啟程東歸。在離行時又有李石曾、王鴻猷等加盟。巴黎的革命團體，從此擴大了，同時孫先生還遇見了張靜江，他是駐法使館的商務人員，兼營古董生意。他一見了孫先生，就很驚奇的問：

「你是主張革命的，孫先生麼？」

「是的。」

他聽了很高興，就很爽直的說：「你是主張革命的，我也很贊成革命的，我老實告訴你吧：我在法國做生意，賺了幾萬塊錢，你發動革命的時候，我目前可以拿五萬元來幫助你，打電報的時候依着A B C D E的大序，A字要一萬元，B字要二萬元，再字要三萬元，這就真是你打電報給我，我要錢和要多少錢的密碼。」

這真是一個豪爽慷慨的人，孫先生很愉快的和他訂交，就回到日本來了。

第二十七章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

孫先生這一次到日本，大約是在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年）的秋天。這時候，日本留學界的情形比從前大不相同了，幾乎都是從各地亡命而來的革命同志，最著名的就是華興會的黃克強、宋教仁、陳天華等；廣東同志胡漢民等也在東京法政學校肄業。黃克強，初名黃華，號震午，後改名興，別號克強。是湖南善化縣人，湖北兩湖書院的高才生，以官費留學日本。紀元前九年（一九〇三年）俄國佔東三省的事情發生，國內外學界都非常憤慨，克強就首先發起拒俄義勇隊。紀元前八年更組織華興會，組織留學生，大多數加入。他們一面努力向國內學界鼓吹，一面聯絡會黨，並在長沙明德學校中，盡量宣傳，更設立東文講習所，作運動的機關，一時國內外學界加入的，漸次增至四五百人；他們另外又設立同仇會，專為聯絡會黨機關；哥老會員加入的有十萬人，聲勢在紀元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唐才常一役之上。他們預定趁紀元前八年（一九〇四年）九月西太后萬壽節日，分長沙、岳州、常德、衡州、寶慶五路起事。宋教仁也在此時，跟着黃克強等同湖活動，擔任常德方面發難的任務。不料在萬壽節的十日前，事機便洩露了，湘撫嚴密查拿，克強以聖公會教師責吉庭及曹亞伯衛護出險，逃往上海。宋教仁這時剛到長沙，一聽到事情有變了，也逃往上海。他到了上海，黃克強和陳天華、張繼、章士釗等十餘人，又因萬福華槍擊王之春案的嫌疑，正在被捕房拘究，因此就足不停留地一直到日本。不久，黃克強和陳天華等因得龍璋、袁海觀的營救，也避往日本。於是黃宋等在留日學界，特別露頭角，組織一種雜誌，名曰二十世紀之支那。

這是孫先生未到日本以前的形勢。那時宮闈實政等見到湖南革命同志的增多，也很留心，他們極力主張華興會和興中會應當密切的聯合起來，使革命功業兼得。因此宮闈常常加派密探監視孫先生。孫先生是志趣清高，心地光明，現今東西洋再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了。克強、教仁等對於孫先生因此非常敬仰。等到

孫先生一回了日本，東京和橫濱這在來各省留學生頓時非常忙碌，那時孫先生還是繼續住在橫濱；奔走最多的要算是程家棟了，他也是主張孫先生與各省留學生組織革命團體的一個，因此由他介紹，請孫先生到東京二十世紀之支那社和宋教仁會晤，討論這個黨案問題。

這是七月二十八日的事情，孫先生應程家棟的邀請，和宮崎從橫濱到東京來看宋教仁了。這時陳天華也在二十世紀之支那社，大家見面了，就談到本問題，孫先生先問教仁這裏同志有多少，教仁還沒有答覆，陳天華就把前年長沙的風潮說了一下，又說到他們革命的方略。孫先生聽了就很懇切的繼續現今大勢和革命方法，最後更鄭重的說：

「中國現在，不必要各國的瓜分，但要自己的內訌。如果這一省欲起事，那一省也欲起義，大家不相聯絡，各自爲謀，結果便造成秦末二十餘國的爭鬥，和元末、朱、陳、張明的變亂，這時候各國乘機干涉，中國就可以立刻覆亡。所以現在我們革命的主要問題，就在怎樣的互相聯絡，使革命的力量，切實的團結起來。」

這確是當時革命形勢中的病態，要不是像孫先生富有這樣偉大的領袖大才，把各地革命同志整個團結起來，中國革命的口號，雖是已經喊了出來，不曉得現在已變成了怎樣一個局面呢？因此孫先生這一次在歐洲結合許多同志，是重組革命團體的初步，現在到日本來，更想擴充與中會變成一個整個容納各方面革命份子的團體，這是孫先生多年經驗對於革命運動更有進步的表現。

宋教仁等對於孫先生的意見，非常贊成，孫先生同時又和黃克強商談，黃克強也很願意重組一個革命團體。因此就在七月三十日假東京赤坂區檜町，黑龍會舉行籌備會。到各省留學生七十餘人，除甘肅一省因無留學生，沒有人來，其餘十七省的都有。日本同志宮崎實藏和末永節也來參加。

開會的鈴響了，孫先生就首先起來說明開會宗旨，並提議組織革命團體，定名爲中國革命同盟會。大家對於組織革命團體是一致贊同的，但對於名稱有很多意見，有的主張稱爲對滿同盟會。孫先生說革命黨的宗旨，不專在排滿，應當兼顧到廢除專制和創立共和二大意義，所以不能單純的說是排滿。大家都明瞭這革命團

體的宗旨了，但還是一個秘密組織，如果揭開這二字後頭顯的提了出來，恐怕在實際行動上會許多妨礙，因此討論的結果，決定簡稱爲「中國同盟會」。孫先生隨着提出這建議，請大家執行監督，討論的內容，和在歐洲時所用的差不多，但有些人對於平均地權四個字，大起疑團，請求孫先生把它取消，孫先生詳細地解答了一番，大家就毫無異議。因此議定，請與會的諸君立誓約，電衆宣誓，於是大家都實行宣誓，由孫先生領導先開始，誓詞的原文是這樣：

「驅逐人畜，掃除封建，創立民國，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信天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

天運乙巳年七月 白

這是繼與中會以後而組織的革命團體，從此革命力量，擴大革命組織。但這一次活動，和十年前創立

與中會的時候，有顯然不同的地方，就是孫先生三民主義的思想已經滲入了革命的組織和每個革命份子的腦海裏，所以這一次中國同盟會成立，可以說是一民主義革命團體的正式成立了，也就是革命黨組織的開始。

孫先生看到這一偉大的革命風潮，他非常興奮地在自傳中說：

「同盟會成立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

這樣是一個可貴的預言，中華民族經過這偉大的革命而產生。孫先生因爲大家都已宣誓了，就當衆傳授袖章，如：「漢人」、「中華革命軍」、「天運年」等語，並與各黨派訂了訂新誓詞。孫先生會後指定馬君武、陳天華等爲會章起草員，價值極高。這批小的會員，也充滿了這種許多人的，這種極厚的革命空氣，中華民族的革命是有的組織的基礎，孫先生隨着開始壯起來。最巧的，人頭擁擠的坐席，這時候忽然塌倒了，孫先生就立刻像預言家一樣，隨着大家說：「這批孫君政府顛覆的先兆，大家聽了，都歡喜歡呼，像祭潮水狂風中呼喊着，就是孫君政府。」

隔了幾天，即八月十三日，東京留學界在體育會士見禮會開了一個極大的歡迎會，歡迎孫先生在。這是永遠留著的一個別烈的印象，到會的有一千三百多人，座無虛席。門外站立的還有許多，都本國旗，迎着大門，立在路旁，紛紛揮動的，非常喧鬧，宋教仁舉到門上河大旗說開了，並開門及他們進來，大家才靜靜事，因為他們都是很有誠意的要來瞻仰。孫先生的半采。這富士見禮建築在駿河臺的山麓，後面有一條清流激湍的小河，遊艇很悠閒地在往來着，對岸就是雄偉的砲兵工廠，煙突拔地而起的一個個高聳着，轟轟一響的響着，天空，機器的聲音，不斷的響着，和富士見禮中滿着人的熱烈的情緒，好像一樣的一樣都在表示歡迎這革命領袖的到臨。

在這緊張而又靜寂的期特的空氣中，宮崎和末永等從外面進來了，繼着就是孫先生，在幾個人擁護中很安詳的走着，會場中頓時掌聲大起，站在後面的，膝足以震，一時像潮湧一樣的波動着，但大家都肅靜無嘩。這是東京留學界從未有過的盛況。經過主席說了幾句介紹詞以後，孫先生以巍然可觀的面容，颯爽不羈的姿勢，從人叢中出現於演講台上，掌聲又散佈了全堂。於是孫先生很謙遜的開始感謝歡迎的盛意，繼述環遊金環的經過，聲聲綿綿不絕，最後孫先生很莊嚴的說到革命問題：

「鄙人從前提倡民族主義，表示同情的只有會黨，至於中流社會以上的人，竟寥寥無多。可是沒有經過多少時候，思想進步得很快，民族主義傳播於各種社會之中，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大家都承認革命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雖以鄙人之愚，也因為會黨是民族主義的運動，所以蒙諸君這樣的歡迎，這是應該為中國前途慰慰的。諸君到日本來，是在拯救他們的文明。但是日本的文明，不是他們所固有的，從前是取之於中華，後來又師資於泰西。所以中國如果把自己固有的文明發揚起來，一定可以駕乎日本之上。（鼓掌）」

「中國不但可以駕乎日本之上，並且還有更廣大的前途。鄙人這次從歐洲到歐洲，一路上所謂古代文明中心地，倫敦及巴黎等處都看遍了。現在阿利安民族的文明，不過在幾百年前才發生的，但中國的文明，早在五千年以前便發達了。這是兩難各國所不及的。雖然中國因交通利便，於是被西洋文

期趕上來；而且獨步一時。不過最近十年中國思想變遷的趨勢，進步的緩慢很顯著，從這樣的趨勢來推斷，十年二十年以後，不難把所有的西洋文明，都吸收過來，或者超過他們，這也不見得不能辦到的。因為各國的進步，都是從舊的變到新的；英國倫敦從前沒有電車，祇有馬車，日本也是這樣，但都人離開這裏不到二年，這一次回來所看到的，竟迥如隔世，從前的馬車，現在都改換為電車了。所以說幾年以後的中國，這是像現在一樣的沒有變動，是誰都不能相信的。（鼓掌）

「中國土地人口，為各國所不及；我們生在中國，實在是根幸運的，各國的富豪，欲得像中國這樣的一個舞台而利用之，而不可得。我們有了這樣的大好舞台，竟反而無所藉手，蹉跎歲月，使錦繡山河，依然被異族所佔據，到現在還是不能光復故物，建立一個大共和國，這不是最可羞辱的事嗎？」（鼓掌）

「列強各國因為知道我們不能利用這些土地，所以大家都想來染指，我們見到事情迫切了，於是不勝危懼，但如果我們能夠發憤自雄，列強就對我們很敬佩，怎敢來侵害我們呢？我們不想自己振作，祇是怕人家來欺凌，這決不是辦法。」（鼓掌）

「所以鄙人沒有什麼話，祇有希望諸君把振興中國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土。從前日本維新的開始，也不過幾個志士做原動力，祇有三十多年，就一躍而躋於六大強國之一。我們今天立刻發動起來，不是事半功倍麼？」（鼓掌）

「有人說：中國現在尚在幼稚時代，一切改革，俱不容易有速效。其實不然，各國發明機器的，都是積數十年的經驗，才能成就一件事物，但是仿造起來，祇要幾個月或者一年的光景就得了，我們中國的改革，也就像這些情形。」（鼓掌）

「又有人說：各國都從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開始共和，有一定的秩序，不能躐等而進的。所以中國現在應當只可為君主立憲，絕對不能一躍而為共和。這是很穩妥的說法，我們拿修築鐵路這件事來看，就可明白了。鐵路上的汽車，起先是很粗笨的，後來加以逐漸改良。假如中國也

從鐵廠了，試開用最初粗惡的汽車呢？還是用最最近改良的汽車呢？從這價值中，就可知道是非了。（鼓掌）而且菲律賓的土番，能夠起來抗拒西班牙、美利堅兩大強國，以謀獨立而進共和，北美的黑人，從前都是蠢如鹿豕，現在都成爲自由國民。所以說中國不能建立共和，是誣中國人不如菲律賓的土番和北美的黑奴了。（鼓掌）

「因此，我們如果說中國不能建立共和，是違反進化的定律，是不明白文明的價值。而且世界上各國的立憲，從流血中得來的才算是真正的立憲。同一的流血，我們爲什麼不從事於亂殺了當的共和立憲，而從事於這不完不備的君主立憲呢？孫君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如果擇其中而取法之，當然不是聰明人的行徑。因此我希冀諸君把這些謬誤的思想，淘汰淨盡，從最上的改革着手，同胞幸甚，中國幸甚。」這是孫先生在日本對中國留學界第一次公開演說，播下了很多革命的種子。所以一星期以後，即八月二十日，同盟會正式成立的時候，到會的就增加一百多人。

這一天開會，是在東京赤坂區霞關子爵邸本金彌邸，這屋子和滿清政府的駐日公使館恰是貼隣，所以有許多會員多親走了門口，也是一件趣聞。下午二時開會，由黃克強宣讀會章後，就投票選舉總理和職員議員，結果大家一致舉孫先生爲總理；其餘黃克強爲庶務，陳天華爲書記，宋教仁、程家權等爲交際，謝良牧爲會計，鄧家彥爲執法部長，胡衍鴻等二十人爲議員，曹亞伯、胡毅生等爲各省主盟人。選舉過了，孫先生又傳授了很多秘密口號。最後又通過把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爲同盟會的宣傳刊物，於是大家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以後，宣佈散會。孫先生也帶着很愉快的笑容，從會場中走了出來。

第二十八章 革命的宣傳與南洋黨務的開拓

中國同盟會感透了。革命的份子存同一主義下切實的結合起來，革命的聲勢，頓時震動了全國。孫先生

爲要普遍的傳播革命思想，就一面派孫自由回國籌備，組織香港、廣州等處同盟會分會，並整理中國日報的編輯，以擴張革命的勢力，一面把二十世紀之支那正式實行改爲同盟會刊物。但隨到實業了，二十世紀之支那，只登載了一篇日本政事之雜報中國說，談日本當局禁止通商，於是臨時政府遂將此種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個刊物。最初主持編輯的，是由 孫先生擬定的胡漢民、朱執信等。在第一期上面，孫先生自己做了一篇發刊詞，開始把三民主義的理論，充份的發揮，他說：

「千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治自帝其國，盛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族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而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發，物質發達，百年銳於千歲，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繼，則民生主義繼而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擅鵬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破壞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治化焉。其種種維於小已大舉之間，而愈爲放縱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露而毒及吾耳。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羸之，外鄙遇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就於人爲既往之陳迹，慮於我爲方來之大患，無難我獲所有事，則不可不并時而強發之。嗟夫！所影響者，其視不遠，遂五都之市，見美隳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稱也，又但以當朝者爲運業。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望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國，視大同而王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真不遠。吾國縱能比迹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况遠遜於人已然之末劫者之終無成歟。夫歐美革命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速去。中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初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

孫中山先生傳

孫先生對於三民主義第一次的文字說明，因此自這篇文字發表以後，偉大的三民主義，如日中天，大家得到了一種規範，對於三民主義的本體，如響呼应的內容。那時，正當日俄戰爭以後，日本以爲滿三島，

竟將天下讓與。國內有許多人以爲這次戰爭是立憲政治和專制政治的戰爭，大家都相信立憲兩字，是確有我國的效力，彷彿一紙憲法，便可以抵禦專制。於是清政府也想東施效顰，擬了五個大要，在立憲各國去考察，俾盡善盡美在那裏大地被吹，像臺灣的漢民報，就是他們的領袖。國內外都認爲是頭分頭個整型，就是一面是革命黨的民主革命論，一面是保皇黨和滿清政府官吏的君主立憲論，前者是以孫先生爲代表，後者是以康梁爲代表。這是無稽的，清政府的立憲，是要緩和革命的空氣，但康梁竟和他們一鼻孔出氣，替他們張目，在革命傳單上是有很大影響的。這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吳佩孚在北京車站轟炸滿清政府派往考察立憲的五大臣，確是革命黨對君主立憲的第一種。

所以民報出版了，首先就是駁斥新報報論君主立憲論，使革命的理論愈辯而愈顯，因此引起了極嚴重的筆戰。保皇黨所持的理論，還是說革命可以召瓜分，中國人民沒有實行民主政治的能力等這些問題。梁啟超還引了許多歷史事實，證明滿洲是中興領土，滿洲人入主中國，不過以異族入寇，是一種內亂的結果，因此連民族革命的口說，都否認了。那時在民報上參加筆戰的，要算汪精衛和胡漢民的文章，最有力了。關於革命可以召瓜分問題，孫先生在檀香山陸記日報上的文章和在美國發表的一篇中國問題與解決都已說到了；汪胡就根據了駁斥梁啟超。關於人民實行民主政治的感力問題，孫先生在孫報發表一文，和這次在東京歡迎會中的演說，雖是也有說明，但那時孫先生更有精詳的意見，就是：

「察君權與民權之轉讓，其權權所在，爲革命之標。先定兵權與國權之關係。蓋其時用兵，貴有專權，而民權諸事革創，資格未詳，使不稱便而務相維，兵練一度，則兵權亦漲一度，蓋乎既定，解兵權以授民權，天下晏如矣。完此關係，厥爲約法。革命之始，必立軍政府，此軍政府既有兵事專權，復乘統權。譬如既定一縣，則軍政府與人民相約，凡軍政府對於人民權利義務，人民對於軍政府之權利義務，其學學大者，悉規定之軍政府發命令，俾編地方行政官廳，達其治之；而人民則應遵守其命令，其議會亦遵守其共和國之議會也，第暨軍政府之渠補約法與否，是其要職。他日既定召職，或明與之權而守約法

，復定內縣，則甲乙縣又與內縣相聯而共守約法，推之各省各縣亦如是。使國民遵守約法，則軍政府時時強制；使軍政府而背約法，則所得之地，成相聯合不負責任之議會，而不應軍政府所有之權利。如是則革命之始，根本未定，寇氛至強，雖至愚者，不內自戕也。洎乎功成，則十八省之議會，廢乎其後，軍政府即欲專擅，其濟無幾。而強難以來，國民力於地方自治，甘犧牲盡心之日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國民之資格。一旦根本約法以為憲法，民權立憲政體有磐石之安，無搖搖之慮矣。」

這就是說由民族革命到民權革命的過程，是以約法做過渡的，所以民主政體的建立，不在人民政治的實際前方，祇要把民權隨着軍事的力量一面逐漸推廣，一面切實訓練，等到全國軍事底定了，約法也普遍了，就可了由約法而變為憲法，就是民權政治的實現。這是孫先生實際的革命方針，比較以前所講過的更切實而有條。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說這固然是很好的規則，但首難革命的人，是否有這樣優美高尚的人格，汲汲於民事理？這是一個疑問。假如有這樣人格的人了，但祇有約法，也是靠不住的；並且附從革命的，是否個個都有這樣優美高尚的人格，其他的革命軍，能否服從這個宗旨，人民能否相安無事？這都是表現了保皇黨的短視和怕事而態度。民報也有一篇很長的駁斥文章，最扼要的一句話，就是：「欲決革命之成功與否，當決民族主義國民主義之昌明與否。」這是確實的，孫先生對於革命的前途，是在適應大多數人民的需要，所以約法是建立在大多數人民的共同心理，而轉以強制大多數人民的行動，決不是空調的理想。此外，梁啟超又造了一個謠言，說孫先生的民生主義實行的時候，必須殺四萬萬人的半數，對於平均地權的理論，也盡量地攻擊；民報和新民叢報幾乎每期都有相互辯論的文章，這是革命史上關於革命理論的大規模論戰的時期。

孫先生諸事略略辦妥了，又準備離開日本先到南洋，再到歐洲。這一次跟孫先生同行的，有謝良牧、胡殿生等。經過上海乘激時，安而總督羅美知道了。孫先生的行蹤，就派了石加聖到船上來訪問；這是前年在巴黎交涉的結果；石加聖是直接奉了法政府陸軍部命令的，但他和孫先生第一次見面，船美在法國時，曾和孫先生講定，把他的名片，一分為二，一半留在孫先生那邊，一半就留給將來被介紹的人，以便見面時，拿

出來對照。這次布加卑就拿了精美名片以另一邊而來的，因此一見了很融洽。但匆促間沒有談什麼，孫先生約下次從歐洲回到香港時再見，於是握手而別。

從上海到香港，在船上又召集了陳少白、馮自由等許多同志，指示同盟會會務。這時候香港中國日報和有所謂報因為抵制美約的事情，意見不合，互相攻擊；有所謂報本來也是主張革命的，礙孫先生以為都是革命的同志，不應當自己鬧意見，就勸他們和解，這是孫先生對於團體革命同志的一貫的態度。船停了十天，就離開香港，孫先生乘道到西貢、安南，對於同盟會的推廣，也有很多努力，但住不上幾天，就到新加坡。

孫先生這次到新加坡，已是第三次了，前次是從歐洲回來時路過，因為當第一次來的時候，為了宮崎的事情，禁止五年不許登岸的影響，沒有登岸。但新加坡僑商張永福、林義順等知道孫先生在船上，都來謁見，於是就告訴他們歐洲的革命團體已經成立了，這次到日本去準備組織革命團體的總機關，將來在南洋也成立分機關，托他們準備一切，所以這一次孫先生來新加坡，張永福等早已準備妥當，等船一到了，大家到輪船埠頭上去歡迎，並且請孫先生就住在張永福的晚晴園別墅。

大約是孫先生到新加坡後的第四天晚上，幾個僑商都已被孫先生說得明瞭了，孫先生就要他們宣誓加盟。這時在晚晴園的有李竹癭、陳楚楠、張永福等，孫先生寫好了盟書，就自己先行起立舉起右手，以最莊嚴的態度，在他們的面前宣誓，大家心中慙慙，覺得革命黨的儀式，確有些不同。待孫先生把誓詞宣讀完了，就由李竹癭起，依照孫先生的儀式輪流做去。大家宣誓完畢了，孫先生就把誓詞上的三民主義宣言，解釋了一番，並嚴肅的說：

「我這同盟會的組織，是希望發展得很大很大的；我們的責任，當然是犧牲，但是犧牲到什麼程度，我們總不能預說。假如犧牲到兩個人在內，亦算是同盟會存在的一日。」

這話是何等志壯，大家聽了精神奮發到了極度，熱淚充滿了兩眼。隨着便選舉陳楚楠為正會長，張永福為副會長，孫先生的誓書就交陳楚楠保存，又一二傳授他們揮手符號及秘密口號。當大家正在這裏會神的時候

候，屋外的風聲忽然大起來了，屋內也覺得很大的震動，不消幾分鐘，晚膳已不勝地呼喚起來。大家等也慌了，就大家走出會客廳來觀看一下，原來是一百多隻鳥飛，在清屋內不出聲地飛來飛去，把屋子內掃得聲聲動地，好似得勝地裏的一樣。差不多飛了半點鐘光景，那鳥鴉牠們力盡了，才漸漸地分飛散去。張永福嚇呆了之後，都莫名其妙，坐了靜默了一回，孫先生却先衝破了這沉寂的空氣，開口說：

「那是不足為怪的，因為外面突起颶風，這些鳥鴉被大風驅逐飛進了這屋子，是在閃避大風的危險，算不得是什麼怪異的徵兆。」

這本來是很尋常的事情，但孫先生知道他們被從前讀史書的迷信觀念緊緊地籠罩着，以為這是奇蹟。為要打破他們的神怪思想，再不要迷信禱禱，大家努力工作，不顧成敗利鈍，要認清一條正路向前去，所以首先拿這句語來解釋。但那位李竹樓聽了還是絮絮地說：

「魚龍孟津，武王伐紂，這勝利的故事，歡祝大家，今晚結社，定卜再途成功。」

大家聽了相顧而笑。第二天，林義順、李曉生、謝心準等也來加盟，於是新加坡分會，就逐漸充實起來，晚膳間也從此充滿了革命的空氣。孫先生和他們朝夕相見，無話不談，他們好像得到了一位良師，從種種方面都比加盟前不同，大家都非常滿意。大約住了十多天，孫先生要到歐洲去了，臨行時留下了一個秘密名字，叫做「高野」，預備通訊和電報上用的。

第二十九章 法國武官的活動與南洋黨務的擴展

紀元前六年（一九〇六年）三月，孫先生在歐洲的事情已經辦妥了，就從馬賽啓程東歸。經過香港的時候，在船上約布加卑來會談，布加卑屬孫先生中國革命的實際形勢，和各省軍隊的聯絡情形，如果運動成熟了，法國政府可以立刻幫助。孫先生說現在還在準備時期，因此請他先派幾個得力的人來協助，以辦理開

袁聯絡的事情，布加車就滿口答應，由他們駐紮天津的參謀本部派定武官七人，歸 孫先生指揮調遣，這樣決定了，就握手道別，孫先生也一去不返到日本。

孫先生到日本以後，就派廖仲愷駐天津，協助布加車調查中國革命實力及翻譯各報所載革命消息；派葉禹錫與某武官調查兩廣，派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派喬義生與歐種樂武官調查長江沿岸各省。一切部署就緒了，孫先生因為內地方面，既然有這樣的調查聯絡，祇要靜待消息，因此又偕胡漢民重到新加坡，準備更擴大同盟會的會務，使成爲南洋革命的中樞機關。

孫先生到了新加坡，早有林義順等在碼頭上歡迎。他和胡漢民二人上了岸，先到張永福的舖子新長美號坐談一回，然後坐了馬車（當時汽車很少）回到晚晴園安歇。許多同志一聽到孫先生來了，大家都來會見，晚晴園頓時又熱鬧起來，每天晚上總有許多同志會餐，大家就公推謝心準爲晚晴園招待，門外加用幾個門警衛守衛，情形好似莊嚴了許多；因爲那時新加坡保皇黨對於孫先生非常注意，所以必須要有相當的保衛。

過了幾天，孫先生命胡漢民起草分會章程，就在晚晴園召集開會，把章程通過了。這時候，人數已比較從前增加了許多，因此孫先生提議把前屆職員重行改選，選舉結果，張永福爲正會長，陳楚楠爲副會長兼財政主任，林義順爲外交主任，謝心準、李騰生爲文牘科主任，於是這分會的規模比從前擴大了很多。

孫先生這一次在新加坡，一般同志對他比從前格外熱烈崇敬，張永福有一段關係說：

「我們在七八年以前的人生觀，本是宗教主義。小桃源俱樂部（按此俱樂部在孫先生未到新加坡前，由張永福等發起組織的。）雖是我們總會討論國事的場所，同時亦是我們隨意消遣的地方，胡天胡帝，其樂陶陶，真是尋得桃源可避秦了。然自從聽了孫先生後，凡遇先生來星住在晚晴園的時候，我們就漸漸有些覺悟，知道一味的娛樂是不正當的，以後每三五星期，總不見往小桃源俱樂部一次，因爲晚晴園有孫先生和許多的同志，每天午後以至十一二點鐘，總是開晚晴園會，孫先生說說笑笑，講那過去未來的故事。雖然多是無關緊要的閒談，但是每每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問題發生，隨時就請孫先生解釋。他總能

原原本本根據科學說給我們聽，比較別人說的要增加許多道理，增加許多興趣，我們因為這樣得益不少，求樂主義的人生觀，亦一變而為求知的人生觀了。每日自下晡以至半夜，總離不開這晚晴園的晚餐會。外間以為我們是神經中了革命毒，及迷信革命太過，但是我們很明白，這正是我們得到正當認識的起頭。我今回想當日情形，要再有晚晴園一般娛樂，是再不可能的，假使非有 孫先生循循善誘我們，我們那能得這樣的進步呢？」（南洋與創立民權）

這是代表一般華僑老同志的情形，因為那時的華僑，暖衣飽食，本來想不到就要急切的革命，他們的智識程度，也是有限得很，所以在那時的風氣中， 孫先生不但是做他們革命的領袖，同時也是他們智識的指導者，於是許多華僑認識了 孫先生以後，都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像張永福所說的一樣。現在我們約略說幾件 孫先生在新加坡的故事，也是永遠留在那邊華僑腦海中的最深刻的印像，而使他們對 孫先生格外的崇敬和信仰。

那時 孫先生每晚晴園，和許多同志朝夕談話，但一到同志們散去了，就獨自坐在書桌前，很靜寂的埋首看書，四壁滿掛着地圖，隨時可以指出各省要塞的位置，各國重要的軍港。但從不看見他拿着一本小說或其他無謂的書籍，許多同志都很驚異。 孫先生的用功。但 孫先生對於象棋很有興趣，行篋中除書本外，就以象棋和棋盤為重要的伴行物，棋術雖不十分精，似乎胡漢民還比他強些。在晚晴園中，晚餐客去後，時時約張永福等對奕，至更深人靜了才各自罷手。一天， 孫先生和張永福在家裏對奕，已過半夜了，外面細雨絲絲，隨着微風吹進窗來， 孫先生說：「我們上樓在房內繼續工作，」就捧着半局的棋盤走出客廳，張永福也拿着棋盤跟着登樓，就在林時瑛、謝心準所睡的前設局對奕。他們工作開始了不多時，謝心準却在夢中囁語，喃喃不知所云，最後才聽得很清楚的在叫：

「雙文呀！雙文！」

這是因為謝心準這幾天讀西廂記着了魔，所以夢中也喊起雙文來了。 孫先生聽了還是很沉默的下棋，但張永福却忍不住要笑出來了， 孫先生於是解釋道：

「對君的胃大概是消化，神經通暢，因此有這種現狀。」說罷一笑置之，依然繼續下棋，到金雞報曉，才大家分別休息。孫先生這種解釋是在常識的範圍中，當然是很合理的；但這些是大概張永福所說的不可思議的問題吧，孫先生始終是站在指導的地位，對他們不斷地指導。還有一件故事，就是有一回，因為一個同志家裏的妻子小產，在晚齋臨別幾個同志，偶然中批評起聽土，沖犯，賽安胎符，種種神話。孫先生也在座，聽了便說：

「這可以用的。」

「果真有效麼？」他們問着。

「當然有效的。」孫先生很肯定的回答。他們都很奇異，似乎不能相信。孫先生的話，於是要追問這有效的原因，孫先生就這樣說道：

「你們不必懷疑，這些是有科學原理可以解釋的；心理學和糖醇學二者，都可以造成這小產及安胎的原因，所以要有效果，還是從這方面去着手。譬如養有一對黑色的馬，你要牠受胎，將來生出來的是別種顏色小馬，這亦可以用科學原理把人工使牠感化；大凡畜牧家多能明白這道理的，我的哥哥在檀香山亦時時把所畜的馬匹改變顏色來玩耍。這可以知道凡受妊的孕婦，在精神上須有適當修養，調劑其意志，對妊孕當然有適當關係；但究竟亦以該婦人生來是否迷信分別，如這孕婦平素是迷信深重的，還是順應的意志用符法來安慰他，那當然是有可能的效果。」

這一個很圓滑巧妙的解釋，自然說服了許多同志。但從這幾句話中，很可以看出孫先生對於中國民族的風俗和習慣，不肯跟着人家隨意批評反對的，他一面拿科學原理做根據，一面還是尊重自己民族的風俗和習慣，所以許多同志除了絕對信服以外，再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孫先生對於騎馬是很精明的，他可以坐沒有鞍子的馬，跑得很穩當，在新加坡時，也曾騎馬到郊外去運動，所以隨口就拿馬變顏色來做例子，可見他對於騎馬的興趣了。

孫先生這樣約住了很久，新加坡的同盟會基礎已經鞏固，於是準備擴充到其他各埠，親自帶了李竹坡、陳楚楠、林義順到吉隆坡（Kuala Lumpur）去。在青年黨舊黨層層，羅陳、陳永福、陳秋傑、王清江、邱怡領、彭鏡波、劉濤和一位七十餘歲的老革命黨阮英等，備了豐款美給花團聚會，公舉王清江為會長，和其他職員。於是吉隆坡的同盟會分會也開始成立了。孫先生一行八人等，就投宿往大馬路（D'Almeida），怡保（Ipoh）一帶前進，想把會務更大的擴展開來。到了怡保，行裝已搬入新改良旅店，準備安歇。却不料這時候怡保的華僑勢力，完全被康有為黨徒所佔據，那大資本家胡子春與廣西總督岑春煊是少有些關係，因此希望帝統萬年，並且想藉康有為的力量在滿清政府下面去做官；而那種極其低賤的資本家勢利之見本來是很淺薄的，他們富了就要想貴，認康有為是保皇領袖，自然想巴結他，以為做官的階梯。他們這樣的想者，同時就把孫先生等看做他們的敵人，因此一聞孫先生到來，就舉以極大的阻力來打擊他。那時孫先生等因為同處於他人統帥之下，力量比較薄弱，敵不過這海外土豪劣紳的胡子春，當然就避他衝突為上策，所以看出風聲不對，就乘夜由林義順、陳楚楠、李竹坡等攙着行裝到別家旅館去暫住，第二天早上，回到吉隆坡，大家商量了半個鐘頭，覺得同盟會的推廣工作，還是不能因此停頓，於是派林義順、陳楚楠二人到檳榔嶼（Penang）去。孫先生寫了封介紹信，給那邊的一個僑商吳世榮。孫先生等就從吉隆坡回到新加坡。不久，林、陳二人也回來了，向孫先生報告檳榔嶼的情況確是不錯，分會已經復原順利地成立，孫先生聽了很愉快，因為失敗於怡保，並能成爲檳榔嶼，革命勢力的擴張，不是沒收辦法的。

過了二個月，張永福等所負責運送汕頭羅建乃表，潮州許雲秋、陳芸生、蕭竹濤等，也先後到新加坡來見孫先生，報告閩潮兩處地方的情形和運動的成績。因為他們一向在那邊組織起義的準備，和張永福等早有聯絡，當孫先生上一回在新加坡時，張永福等已經詳細報告過。孫先生要他們來前盟，所以這一次特地從潮州趕來，和孫先生見面了，就在檳榔嶼加入同盟會。大約又過了十多天，張永福、許雲秋等領了孫先生的委任和機密命令，就分頭回去，準備一切。孫先生也交下秘密電碼和通訊方法，通訊地點等，帶了胡漢民和

魏特使和劉獨日本去了。

孫先生回到日本的時候，蘇省各地的法蘭武官和隨同統帥的同志，已經分頭積極進行，但歐極樂的事情，却已失敗了，不久，喬義生就從上海到東京來報告了。事情的發展是這樣的，喬義生奉到了孫先生的命令，引導歐極樂到武昌，就在武昌萬家巷露宿會館的日知會開會報社開歡迎大會，軍界同志來參加的，座爲之滿。歐極樂演說革命，非常激烈，由喬義生實翻譯。大家聽得很興奮。但清官吏早已派了兩個密探，混在人叢中，有人說新軍統制張彪也化裝混在中間，這也是可能的事。於是一切情形，都被他們知道，告訴了湖廣總督張之洞，因此，不久日知會會員劉家運、朱子龍、李雨霖、胡瑛等都以嫌疑被捕。這時喬義生已跟着歐極樂遊長沙、沙市、九江、南昌、南京、上海、廈門、福州各地，備受當地同志的歡迎。當他們回到上海時，本想再到武昌，但在報上却見到張之洞通緝喬義生的消息，因此就中止到武昌，歐極樂回到天津，喬義生祇有到東京來了。一孫先生聽了他的報告，非常惋惜。這時候，派往天津的彭仲愷，因爲他夫人何香凝的催促，早已離開那邊，因此，孫先生就派喬義生到天津去，歐極樂也表示非常歡迎。但是意外的事情，竟連續的發生，當喬義生正要出發到天津去的時候，忽接歐極樂來電，說：事已洩露，請暫緩行。隨後又接到他的報告。原來當他從上海回到天津的時候，滿清政府因爲得了張之洞的奏聞，就密派英人偵探，每日不分晝夜，偵伺左右。後竟賄道跟歐極樂南下的一個廚子，一天晚上，歐極樂出去時，忘掉銀門，便給他乘機把所有南方通訊都拿去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孫先生苦心幕請的計劃，又遭了一次嚴重的失敗。

滿清政府得到了這一切證據，就向法國公使大開交涉。但這是孫先生和法國政府直接交涉的結果，法國公使事前是一些不知道的，所以他無法答覆滿清政府，就請命於他的本國政府。法國政府倒也痛快，他們教駐華公使不要過問這件事，於是滿清政府無可如何，孫先生暗贈歡書。可是不久法國政府改組，新起的內閣是不贊成這種政策的，於是把天津參謀都根本撤銷，而加卑也奉召回國，孫先生的計劃依然不能實現，倒掀起了一個小小的國際風波，孫先生常常引爲這是一件憾事。

第三十章 革命方略

法國武官的調查工作，雖告失敗，但革命的聲勢已經比從前格外伸張了。孫先生趁著在日本有許多同志可以討論的機會，於是決定草訂革命方略，把革命進行的大綱和革命發動時對外關係，軍隊編制，籌餉，因糧，安民，招降等等要點，都規定在這裏，成爲一本革命黨人的必備藍本，這是孫先生革命理想和行動綱領具體完成的開始，是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同盟會本部許多同志都很贊成這個提議，於是開始討論草訂內容的辦法。第一關於革命軍發動時號施令的機關，主張必須組織軍政府，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第二關於革命軍發動時應該有代表一種新的革命的旗幟，以有別於滿清政府的黃龍旗，却發生了許多紛歧的意見，孫先生的主張，是要沿用與中會的青天白日旗，他說：

「革命軍的旗幟，決不能忘掉最先流血的先烈的精神；青天白日旗是先烈陸皓東所發明的，與中會諸先烈爲了這旗而流血的，不知有多少，我們應該永遠留作紀念。」

「可是這旗幟的形式，太不美觀了，並且和日本的旭日旗相近，最易引起誤會的。」黃克強首先表示異議。

「青天白日的顏色，非常鮮明，是表示光明正照的意義，還不美觀麼？如果和日本旗相近，可以再加上一種紅色，成爲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三色旗（Red, White, & Blue），也是舉世共曉的民主主義的旗幟。總之，這旗是革命軍的唯一標識，我們必須要永遠採用的。」

「如果以與中會的旗來代替同盟會的旗，那末我們在湖南起義時也會用過一種旗，我們也可以說這是舉與會的革命標識，要同盟會來採用它，因爲這旗也會有人來它流血的。」克強似乎帶了些意氣這無說。

「我們平均地權的宗旨，是和古代井田的意思差不多，我們還是用井字來做革命的標識吧！」廖仲愷緩緩

和兩方面的意見，這樣的提議者。

「用金瓜斧餞式，以發揚漢族的精神，也可要得。」及是二種調劑的提議。

「那還是用十八星式吧，以表示十八行省。」

「如果因爲三色太單調，可以增加爲五色，似乎更合乎中國歷史上所習慣的，所以我們不妨採用五色旗。」這樣複雜而紛歧的意見，大家都不能解決了。這是很明顯的還是同盟會未成立前各雜革命志士各自爲政的痕跡的遺留。孫先生爲顧全大局起見，不想以口舌來爭辯，祇有拿努力來表現到事實去。章炳麟、劉揆一等也沒法調解，主張把這個問題保留起來，暫時不討論，這一場辯論因此結束。但是在革命史上終於留下了一個遺憾，雖是此後潮、惠、欽、廉、鎮南圍請役起義，都用青天白日旗，克強也親身參加，率領英勇的同志衝鋒陷陣，對於這旗也表示默認了，然而民國元年臨時政府規定國旗，反沒有採用它，這不是顯示着同盟會同志的易於爲環境所轉移麼？所以這一次討論，大家對於孫先生意見，不肯尊重，不能不說是革命史上的一個遺憾！

國旗問題既然擱置起來了，但孫先生主要目的，是在編訂革命方略，所以辯論終結了，就開始這革命運動綱領的規劃。幫助孫先生這一個重大工作的，是胡漢民和汪精衛。在這一箇方略中，孫先生當時全部的革命理想和計劃都已充分的表現出來了。全書共有十三節：一、軍政府宣言，二、軍政府與各國民軍之關係條件，三、軍隊之編制，四、將官之等級，五、軍餉，六、戰士賞恤，七、軍律，八、略地規則，九、因糧，十、安民布告，十一、對外宣言，十二、招降滿洲將士佈告，十三、掃除滿洲租稅釐捐佈告。關於革命發動後的各方面，都很詳細的規劃妥當。軍政府宣言，是一篇革命的具體綱領，第一段是闡明革命的意義，和軍政府的責任，說：

「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祿二百六十年之禮腥，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爲己責者也。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漢人倡率義師，掃除胡虜，此爲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

，當無不瞭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英夫孟蘭，蓋以獨善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異，於掃除殘虐，恢復中華之外，更體民生，尙當盡善。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爲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爲英雄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爲其機關而已。自今以往，國民之責任，即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任。」

這就是說同盟會的革命主義，一方面是承繼了先民的遺教，要恢復中華，驅除殘虐，但另一方面還要變更國體，就是創立共和；並且注重民生的轉念，就是平均地權的實行。也即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說明。這是國民應該負的責任，所以說是國民革命；軍政府不過是一個推動革命的機關，它的責任和成功，就是國民的責任和成功。因此這宣言的第二段，就接着說明這四大綱領的要義，說：

一、驅除殘虐：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爲邊患。後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迫我漢人爲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傳萬。我漢人爲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洲政府窮兇極惡，今日貫益。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清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爲滿奴作漢奸者，亦如之。

二、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殘虐之後，光復我民族之國家，敢有爲石敢塘，與三姓之所爲者，天下共擊之。

三、建立民國：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立民國政府。凡我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欲建共和國須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遵守。敢有前朝遺孽，天下共擊之。

四、平均地權：文明之國家，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地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經濟之增進，應歸於國家。由國家經營之，舉進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違斯以制國民之生計者，與共擊之。」

這個說明比起真中會宣言更有力量而具體了，無疑的，這是孫先生革命經驗的進步。但是任這一篇宣言中，更重要的還有實行上四個精領的步驟的規定，使孫先生的革命抱負，更能具體的表現出來。這步驟怎樣規定呢？就是分爲三個時期，他說：

「第一期爲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脫滿洲之羈絆，隨敵者宜同仇敵愾，內輯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軍隊爲人民禦力破敵，人民供軍隊之需要，及不妨其安甯。既破敵者，及未破敵之地方行政，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致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抽捐之橫暴，辦髮之屈辱，與滿洲勢力同時斬絕。風俗之害，如奴婢之蓄養，糧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每一縣以三年爲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軍法，布約法。

「第二期爲約法之治。每一縣既解軍法之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於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皆遵守之。有違法者，負其責任，以天下定後六年爲限，始解約法，布憲法。

「第三期爲憲法之治。全國行約法六年後，制定憲法。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國民公舉大總統，及公舉議員，以組織國會。一應之政事，依憲法中之行。

「此三期，第一期爲軍政府督導國民掃除積污之時代；第二期爲軍政府歸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爲總攬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爲軍政府歸職權柄，憲法上圖彙權分掌國事之時代。俾我國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皆於是乎在焉。」

這個實行步驟的規定，在孫先生和保黨黨辦論中，大體已經說過，但這裏似乎說得更透闢，更具體。愛德華在革命的自傳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一書說：「所謂革命，乃是在前此未經特定爲

「合法的」方式裏，由前此未經特定為「合法的」機關，來執行統帥權。革命在普通的意義中，是不合法的，除非獲得成功，便立刻合法了。革命不是法律，但在一種真切的意義裏，乃是「超法律」。它乃是純粹的主權，乃是人民的意志，在直接的活動。所以它是一切法律的創造者與毀滅者，是一切權力的最初的發動和最終的結果。這幾句話，很可以拿來證明 孫先生這三個步驟的意義。因為革命是超法律的，是一切權力的最初的發動和最終的結果，所以第一階段，必須經過軍法時期，這軍法時期就是由軍政府領導國民推翻一切舊有的法律而實行革命的統治時期。但是軍法時期又可說是培養滋長民權的時期。 孫先生說：「兵權一度，則民權亦漲一度，遠乎事定，解兵權以授民權，天下晏如矣。」所以軍法時期的後面，必須緊緊地接着約法時期。這約法就是愛德華所謂是純粹的主權，是人民意志直接活動的產物，也就是由「不合法」的行動，而變為合法的。經過這兩個階段，而後實現憲政，民主政治的基礎，當然是非常鞏固的。這是 孫先生規定這三個步驟的根本意義。梁啟超以及一切保皇派的種種懷疑和揣測，正如愛德華所說，是由於他們從法律假定(Legal Fiction)上所产生的迷信，他們距離瞭解革命意義的程度，不免太遠了。

革命進行的程序，既然有這樣精密的規劃，依這個方略而前進，當然第一步是軍法時期，所以這方略上除了上面一篇宣言以外，其餘都是軍法時期內軍事規劃和一切重要工作的綱領，如軍隊的編制，將官的等級，軍餉，戰士的賞恤，軍律，略地規則和國權等。安民佈告，對外宣言，招降滿清將士佈告和掃除滿清租稅釐捐佈告等，是預定着佔領一地方以後張貼的。方略第二條軍政府與各國民軍之關係及條件，是規定軍政府和各軍都督職權的分際，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出 孫先生對於軍法時期統治機關運用上的理想。這條條的規定是這樣：

(一) 各處國民軍，每軍立一都督，以忠義之首領任之。

(二) 軍都督有全權軍權軍務便宜之事。

(三) 關於軍大之外交，軍都督當受命於軍政府。

(四) 關於國體之制定，軍都督當受命於軍政府。

(五) 關於軍政府宣言，安民布告，對外宣言，軍都督當依軍政府所定，不得變更。

(六) 略地，因糧等規則，軍都督當依軍政府所定，權盡歸軍，得變通辦理。

(七) 以上各條，爲軍政府與軍都督未交通前之關係條件，其既交通後，別設規則以處理之。

第五和第六條差不多是關於革命方略上運用的規定。軍政府是事實上秉承革命領袖的意志而統治一切的，這個條文是說明軍政府和軍都督的關係，依照這條文做去，當然不會有意外的紛亂發生，於是革命方略上所擬設的一切辦法，都可推行無阻，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規定。

這是中國第一部的革命經典，孫先生的革命主義和理想都已化爲條文和進行的程序，而充分的表現了。法國社會學家勒邦 (Le Bon) 曾經說過：「一切大革命，必定有一種重要宗教成分，如果沒有超越理性的科學原動力，就沒有大革命。」(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這所謂宗教的成分，是人類精神上自覺的表現，是給予在現狀煩悶中的人的一種得救力的暗示，使人們在這個新信仰之下前進。索勒爾 (Sorrel) 又稱這革命的精神發動力爲 (Seal Myth)。因爲這是從無數現有零碎的批評與將來景況的無數希望中，逐漸浮現的一種新理想，是有一種新天地的描寫，使人易受感化。(Reflections on Violence) 這樣說來，孫先生的革命方略，是給予人民一個最好的理想典範了，它是綜合許多人的自覺而把它具體化了，它不但有現有事物的批評，並且還有將來景況的規劃。無疑的，這是中國人新信仰的起點，是新的革命宗教的教條。因此，隨革命方略規定以終，中國革命的發動力更推進到另一階段，革命黨員的活動，更得到一個新的軌範，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變遷。

第三十一章 民報週年紀念與萍瀏起義

革命方略制定了，許多同志無形中都有一個中心的思想那運動的綱領，大家都很興奮的期待看革命機會的到臨。這一年（丙午年公歷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恰恰是民報發刊一週年的紀念，於是開國會本部許多同

志都主張趁孫先生在東京的機會，舉行一個紀念節的慶祝大會。孫先生也很贊成。開會地點是在東京神田錦輝館，到會的有六千多人，空場空氣，非常緊張，比去年越過。孫先生的大會，還要熱鬧。主席是黃克誠，報告開會宗旨後，由章炳麟宣讀祝辭。於是孫先生很安閑的走到演講台上，向大眾見面，開始發揮革命主義的真諦，滔滔的演講。六千多聽衆一見了孫先生，就掌聲不絕，夾雜一片嚶嚶的呼聲。孫先生說了幾句謙遜的話以後，就說到三民主義的本題道：

「……那民族主義，却不必有什麼研究，纔可曉得的。譬如一個人見着父母總是認得，決不會把他當做路人；也決不會把路人當做父母。民族主義也是這樣；這是從種性發出來，人人都是一樣的。滿洲入關，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着滿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來當做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鼓掌）但是有邊緊要一層，不可不知：民族主義並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鼓掌）因為我漢人有政權，纔是有國，假如政權被不同族的人所記持，那就雖是有國，却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鼓掌）我們想一想，現在國在那裏？政權在那裏？我們已經成了亡國之民了。地球上人數不過一千幾百兆，我們漢人有四百兆，占了四分之一，算得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到了今天却成爲亡國之民，這不是大可怪的事麼？那非洲國杜，不過二十多萬人，英國去滅他，尙且相爭至三年之久，菲律賓島不過數百萬人，美國去滅他，尙且相持數歲，難道我們漢人就甘心於亡國？想起我漢族亡國時代，我們祖宗是不肯服從滿洲的，（鼓掌）閉眼想想歷史上我們祖宗流血成河，伏尸蔽野的光景，我們祖宗很對得起子孫，所難過的就是我們做子孫的人。（鼓掌）再想想亡國以後滿洲政府愚民時代，我們漢人面子上饒他，心裏還是不願的，所以有義勇的起義。（鼓掌）到了今日，我們漢人民族革命的風潮，一日千丈，那滿洲人也倡排漢主義，他們的口頭話，是說他的祖宗有圖精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漢人，他們要長興遠力量，以便永居人上。他們這幾句話，本是不錯，然而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漢人無團結。（鼓掌）我們漢人有了團結，這力量定比他大幾千萬倍

民族革命的事，本也不成功。惟是吾輩革命黨人認爲民族革命是重要而難辦的民族之運籌大略，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至吾輩的政，定是種種的政府，尤復我們民族的國家。（政黨）這雖看來，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滿洲人納滿洲人，這國家之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那滿洲人下不來阻害，我們決不如此。惟有他來阻害我們，那滿洲人必不與他並立。照現在吾輩來，滿洲政府要實行排漢主義，謀中央集權，愈急法做愚民的工具，佔領的心願，是三天毒一天，然而他所以死命把持政權的原故，未必不是怕我漢人要剷絕他，故此滿洲人下。所以我們黨要犯民族革命的目的，認得清楚，如要滿人始終執迷，仍緊要把持政權，制改漢族，那就漢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視的，想來諸君亦同此意。（政黨）

「這是對於民族主義的原本意義，加以說明，並且指示狹義的排滿主義，不是民族主義的本旨，因爲當時一部份同志不免誤解民族主義而有狹義的排滿趨勢，所以（孫先生）特別提出來聲明。但那時滿清政府假托立憲的名義，實行中央集權，以排擠滿人在政治上的人力量，是復舊的手段，因此民族革命的運動，脫不了政治革命の意味，於是（孫先生）接着就說到民族主義：

「民族革命的大要如此。至於民族主義，就是種種變化的根本。將來民族革命實行以後，現在的惡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掃而空，却是還有那惡劣政治的禍害，不可不去。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接受的，要去這政體，還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試想明太祖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完成，他的政治，都不過恢復到漢唐宋和近，像此三百年後，復教外人侵入；這本來就全不是的國家，不是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政黨）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費經營，至於着手的時候，都是國民革命黨，我們推測種種政治，以在種種大那一種說，是民族革命；從種種君主政體，到國民革命，並不是把來分做兩支來做，而是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照現在吾輩的種種國家，就是漢人爲君主，也不過是種種種種而大革命政體，革命，本沒有種族問題

是反批評，統計上英國財富，多於前代，不止數千倍，人民的貧窮，甚於前代，也不止數千倍，並且貧窮者愈多，貧者愈多，這是人力不能與資本力相抗的緣故。古代農工諸業，都靠人力去做，現時天然力量愈進步，人力萬萬不能及，因此農工諸業都在資本家手裏，資本越犬，利用天然力越厚，貧民愈窮同他相爭，自然弄到無立足地了。社會黨所以倡民生主義，就是因貧富不均，想要設法挽救，這種人；日與月盛，豈要弄一種假慈悲的形事，其中流派極多，有主張廢資本家歸諸國有的；有主張均分於貧民的；有主張歸諸農有的，議論紛紛，凡有意見的人，皆知這社會革命，歐美是決不能免的，這真是箭車可鑿。將來中國要弄這步田地，幾去講民生主義，已經遲了。這種現象，中國現在雖還沒有，但我們雖或者看不見，我們子孫無難看見的。與其將來弄到無可如何後去想大破壞，不如今日設法預防的法子。況且中國今日如果實行民生主義，總較歐美易得許多。因為社會問題，是文明進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會問題也就不大，舉一例來說，今日中國貧民，還有砍柴割不去謀生活的，歐美却早已絕跡，因一切謀生利益，盡被資本家吸收，貧民雖有力量，却無權利去做，就算得些蠅頭微利，也決不能生存，故此社會黨常言，文明不利於貧民，不如復古，這也是矯枉過正的話，況且文明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極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此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鼓掌）這決是歐美所不能及的。歐美為甚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太凡文明進步，地價日漲，譬如英國一百年前，人數已有一千餘萬，本地之糧，供給有餘，到了今日人數不增加三倍，糧米已不夠二月之用，民食專靠外國之粟。故英國要注重新軍，保護海權，防糧運不絕。因英國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築礦場，所獲較豐，且徵收容易，故農業漸廢。並非土地不足，貧民無田可種，都鑽做工傭口，工業却盡歸資本家所壟，工廠雖然停歇，貧民立時飢餓。而執倫敦一城算計，每年空閒，工人失業的常有六七十萬人，全國可知。英國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倫敦西偏，後來因擴張倫敦城，把那塊地圍進去，他一

家地權，占總地權四分之一，富貴家地等，實富不均。竟到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頭空話了。大凡社會現象，總不能全靠其自修，紙條檄水而能自然生長，毫無支那社會問題亦是如此。中國現在實業經濟出產，所以幾千年地權繼承沒有加增，這是與各國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後，却不能照前一樣。比本方現在香港、上海地價，比內地高幾數百倍，因為文明發達，交通便利，故此漲到這樣，假如他日全屬改良，那地價一定是跟着文明日日漲高的，到那時候，以前值一萬銀子的地必漲至數十萬數百萬，上海五十年前黃浦灘邊的地，本無甚價值，近來竟加至每畝百數十萬元，這就是最顯的證據了，就這樣看來，將來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十年之後社會問題，便一天緊似一天了，這種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過現在還沒有這現象，所以容易忽略過去。然而眼前忽感到日後却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籌個解決辦法子，這是我們同志應該留意的。(鼓掌)聞得有人說民生主義，是要殺四萬萬人之半奪富人之田爲己有，這是他未如其中道理，隨口說去，那不必去管他。(衆大笑)解決的法子，社會學者所見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價辦法，比方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爲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將來因交通發達漲至二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家，這於國計民生，皆有大益，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害，自然永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歐美各國地價已漲至極點，就算要定地價，苦於沒有標準，故此難行。至於地價未漲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國在膠州灣，荷蘭在爪哇，已有實效。中國內地文明，沒有進步，地價沒有增長，倘若仿行起來，一定容易。兄弟剛纔所說社會革命在外國難，在中國易，就是爲此。(鼓掌)行了這法以後，文明越進步，國家越富，一切財政問題，不至難辦。現今苛捐，盡數歸除，物價也漸便宜了，人民也漸富足了，把幾千年搖搖的弊政，永遠斷絕，漫說中國從前所沒有，就是歐美日本雖說富強，究竟人民負擔租稅未免太重。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稅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這社會的國家，決非他國所能及的。我們做事，要在人前，不要在人後。(鼓掌)這社會革命的事業，定爲文明各國將來所取法的了。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衆生謀幸福。(鼓掌)

(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制，故要民族革命；(其學)不願君主一人專制，故要政治革命；(鼓掌)不願少數富人專制，故要社會革命。(鼓掌)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也不是我們的本意。(鼓掌)達了這三樣目的之後，我們中國當成爲完美的國家。(鼓掌)」

孫先生早期的平均地權的理論，在這一篇演講中，可以看出一個概念了。所謂收回萬里人之半，實富人專制爲已有，是暗指梁啟超的造謠，那時保皇黨頭腦的幼稚，也可想而知了。最後，孫先生又提出了一個新者而精密的政治主張，就是五權憲法，這可算是第一次正式發表。(孫先生說)：

「尚有一問題，我們應要研究的，就是將來中華民族的憲法。憲法二字，近時人人樂道，便是滿洲政府也曉得派些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憲法草案的上書，自暴自棄。(與天策)那中華民族的憲法，更是要講求，不用說了。兄弟歷觀各國的憲法，有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憲法是英國最好。英國是不能舉的，美國是不必舉的。英國的憲法，所謂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兼制權各不相妨，這是從六七百年前由漸而生成了習慣，但界限還沒有清楚，後來法國孟德斯鳩將其劃度作爲根本，遂合自己的理想，成爲一憲之學。美國憲法，又將孟氏學說作爲根本，把那孟氏學說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來，雖數次修改，那大體仍然是未變的。但是這百餘年間，美國又日日進步，土地財產也是增加不已，當時的憲法現在已經是不適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分立。那五權除剛纔所說三權之外，尚有兩權：一是考選權。平等自由，原是國民的權利，但官吏却是國民公僕。美國官吏，有由選舉得來的，有由委任得來的，從前本無考試的制度，所以無論選舉，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就選舉上說，那些瞎有百才的人，便去巴結國民，運動選舉，那些學問思想高尚的反都因訥於口才，沒有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國代表院中，往往有愚無所知的人。來雜在內，那歷史實在可笑。就委任上說，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衣冠領袖進退。美國長和憲，君主偏向麥基來投票，選着練了大號領，由內閣至郵政局長，不下六七萬人，同時俱換，所以美國政府最放散漫，是各國所沒有的。這

機看來，都是考選制度不發達的原故。考選本是中國始創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却教外國學去，改良之舉成了美制。英國首先仿行考選制度，美國也漸取法。夫凡下級官吏，必要考試合格者得委任，自從行了此制，美國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祇能用於下級官吏，並且考選之權，仍然在行政部之下，雖少有補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將來，中華民國憲法，必要設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那官吏，是由選舉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這法可以除却官從濫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國向來從選最重資格，這本是美意，但是在君主專制國中，黜陟人才，悉憑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雖講資格，也是虛文。至於社會共和的政體，這資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國民的公僕，必須十分稱職方可任用，但是這考選權如果屬於行政部，那權限未免太廣，流弊反多，所以必須成了獨立機關，纔得妥當。（鼓掌）一爲糾察權，專管監督強助的事，這機關是無論何國皆必有的，其理爲人所易曉，但是中華民國憲法，這樣規定要獨立。中國歷古以來，本有御史臺主持風憲，然亦不過君主的奴僕，沒有中用的道理。就是現在某黨各國沒有不是高揚機關兼有監督的機關，那機關雖然有強有弱，總是不能獨立，因此生出無數弊病。比方美國糾察權機關家極，往往搜捕此權，抹殺行政機關，使他不得稍不顧首顧命，因此常常成爲議院專制，非有雄才大膽的杰總統，如林肯、麥堅尼、羅斯威等，纔能進行政獨立之目的。況且照正理上說，裁判人民的機關，已經獨立，那裁判官的機關，却仍在別的機關之下，這也是論理上說不去的，故此這機關也要獨立。（鼓掌）合上四權，共成爲五權分立，這不但是各國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學說上也不多見，可謂破天荒的政體。兄弟如今發願講基礎，至於那詳細的條理，完全的結構，要望大乘同志盡力研究，臣所不逮，以成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這便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這是我漢族四萬萬人最大的幸福了，想諸君必有擔任，共成此舉，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孫先生說到這裏，一篇莊重的演說辭就告一結束，全場掌聲大作，並且高呼萬歲，孫先生看看和藹的笑

向愈這事最難查，孰真新人最難辨？
寒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
幾時痛飲黃龍酒，橫覆江流一箕公！

這沉痛的哀詞，不但是懸吊劉道一，是懸吊許多爲萍瀏起義而犧牲的烈士，也是 孫先生對於革命熱望的表示。真的，滿清的遺孽太多了，還有誰來繼續剷除呢？革命的大業，是永遠須要繼起的慷慨悲歌的烈士，但無論失敗到怎樣地步，這一次起義，是顯然增加了許多革命的聲勢，也是給 孫先生不少的革命成功的希望。

第三十二章 日本放逐與南方革命的再起

萍瀏起義失敗以後，民氣的激揚，已不可復抑。滿清政府知道這是由居留東京革命黨人鼓動而起，因此命出使大臣樺徑力求日本政府驅逐革命黨重要人物出境，使他們無活動餘地。日本政府爲要討好於滿清政府並希圖從中索取權利起見，竟答應了，在紀元前五年（一九〇七年）一月，正式道 孫先生離境。這是 孫先生離家常便飯，十二年前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香港政府就有禁止五年入境的命令，到紀元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已五年滿期， 孫先生上岸了一下，又重申前令，革命黨人的生活，是常常遭受人家威脅的。但這時 孫先生活動的範圍，比從前更廣大了，因此對於日本放逐的命令，毫不在意。同時 孫先生因爲萍瀏起義失敗以後，必須要繼續不斷的從事實際行動，使滿清政府疲於奔命，而且上一年早已派黃克強到滿洲，和桂林巡防營統領郭人漳游說反正，現在郭人漳的軍隊，剛由廣西調到廣東的羅定，正是活動的絕好機會。另一方面，在潮州黨人的運動，已經成熟，準備起事的報告，正在這時到達，潮州的事情，是由許雪秋主持的。雪秋自在新加坡加盟，奉了 孫先生命令回來以後，積極進行，事機更熟， 孫先生也派了喬義生、方瑋麟、郭守毅、張煊、方次石、方漢城、梁鳴九，及日本同志監野長知，池亨吉等前往襄助，於是決定一月七日發動，分兩路

起事，一路從浮山進攻郡城；一路從黃岡進攻汕頭；第一路有郡城內的十八館同志爲內應，第二路由惠來、豐、揭陽、豐順等地同志，準備響應。其他總務、財政、外交等事宜，也都派定了負責的同志。這纔決定了，就在七日晚上發難，許雪秋、方瑞麟、謝良牧、李次溫等都騎了馬到潮子橋邊，靜候義軍到陣。但浮山一路發動後，數百同志走到澄福舖，忽然風雨大作，各鄉同志不能知約集會，祇在大雨淋漓中旋聚旋散，不能到達潮州城。雪秋等候至天明，看見毫無動作，就悄然面散，黃岡一路也停止要戰。這次的事情，竟這樣流產而失敗了。雪秋於是一面通告各同志暫停動作，一面把經過報告。孫先生，孫先生接到了報告，就答覆道：「以後潮屬舉事，須與惠州欽、廉同時並起，以牽制清軍，萬勿假玉從事，徒費元氣。」因爲孫先生早有準備西南大革命的成算，所以要雪秋等時機再熟，一面也決心離開日本回到南方來了。

在這裏我們必須要特別說到的，承繼孫先生革命大業，現任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先生也在這一年，由於陳英士（其美）先生的介紹，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他那時正在東京振武學校（士官軍校的預備學校）肄業，醉心民族主義，他在自留照像上有這樣幾句詩：「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知人肯且休？光復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他抱負的偉大，於此可見。蓋顯老所著蔣介石先生傳中，有這樣的記載：

「當這位認真的青年站在孫總理面前的時候，孫總理立即感覺到蔣委員長一定會負起革命的實際行動來。在孫總理舉行了某一次熱烈的演講之後，這一位年輕的士官學生便跟他討論起一大批的革命計劃，當時孫總理就受到很大的感動，曾經把這事情向陳其美說過。他指着蔣委員長說：『將來這個青年一定成爲我們的革命事業中的英雄；在我們的革命運動中，就正是需要這樣的人物。』」（Hollington K. Tung: Chiang Kai-Shek Soldier and Statesman）

這一段事實，太富有歷史意義了。可惜那時並無大羣衆在場，否則很可以把這革命的開創者和偉大的承繼者的有歷史意義的聚會描繪出來，使它永垂不朽。

這時候孫先生很窮困，竟沒有方法籌集一筆旅費，正好有一個日本朋友鈴木五郎仗義疏財，他是一個造

船發財的人，官商和他非常熟識，就運點他幫辦了一萬幾千塊錢。孫先生有了這一筆款，就很有把握了；於是拿二千元交給民報社作發出紙費用，其餘錢都存開通路買賣。但民報社一部份同志，對於孫先生這種辦法，竟發生許多誤會，因此起了種種糾紛，我們繼續以後再說。

這次跟孫先生一路去的，有黃克強、胡漢民、汪精衛等，二月初一日到香港。孫先生派克強、精衛暫駐下來，準備到鄂人渡營中去游說。克強住在一家日本人開設的松原旅館，是要避免外人的注目。但不久有一個同志張伯喬從廣州來報告消息，說人渣又調駐欽州，並且省城的當局已探得克強的行蹤，要求汪督引渡。同時松原旅館也忽然有幾個清吏派來的偵探窺伺，克強知道一時不易着手進行，因此派胡毅生跟人渡到欽州，相機行事，自己就回到日本。精衛和漢民也搬到普慶坊機關部去暫住，於是許多同志，如許雪秋、劉師復、鄧子瑜、廖平子等都來接洽，經過幾次會議，他們都先後分赴廣州、汕頭、歸善、欽州各地去積極進行。孫先生也帶了胡漢民到新加坡轉任安南、暹羅、桂、滇軍事。

孫先生坐的是日本船，先到新加坡，就擺了幾天。負責潮州軍事的幾位同志如黃乃裳、許雪秋、陳雲生、蕭竹溪等，也都先後到新加坡晚睡團來，向孫先生報告一切，而儘量宜以後，就回去分頭工作。孫先生又和張永福、林義順、陳楚楠等會面幾次，準備趕赴河內佈置一切。臨行時交下密電碼，通訊暗號及通訊地點等。在革命運動中，通訊是一件很重要的技術，關於革命起義的情報，軍事機宜的指示，軍械軍餉的籌劃，和其他一切活動情形，都須要通訊來聯絡和指揮。孫先生在這一層重要技術上，也費了不少腦筋。三年以前，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年）孫先生匆匆過此時，曾和張永福等約了一個密電，那是很簡單的，祇是就已有的電碼，稍為變通它的番號罷了。當日約定的原則是：來電照加一〇三，去電照減一〇三。如收到來電是二二二〇三，就應該加上一〇三，即二二二六號，是代表電碼上的一個什麼字。如果要發二五九六這個字，則須減去一〇三，用二四九三這個假號發出去。這種辦法，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似乎和明碼一般，完全不能保持甚麼秘密，但在那時，強有它的效力。

孫先生這次在新加坡，又自己發明了一種新的密碼密本，親自編寫，印發應用。以後就成為同盟會在紀元前四年左右通用的密本。全部密碼共計二十六頁，每頁用一個英文字母代表，但不必依次排列。每頁之內，各分十行，每行二十字，全頁二百字。二十六頁統計，除少數空格之外，共約五千多字，普通所用的字數，大體已罄。至於它的用法，大致如次：

每面十行，各以一側字母代表。由左至右，分寫上A B C……J等。每行二十字，同樣各以一個字母代表，由上至下，分寫A B C……T。因為當時收發電報，多在海外，故以英文為主。應用的辦法，是以三個字母為一組，把它看成一單字，再查電本。第一個字母，代表頁數，A字母查A面，Y字母查Y面。第二個字母，代表橫直的各列，如G字母在第七行，S字母在第十九列。第三個字母，代表直的各行，照中國習慣由右至左的數法，B字母在第九行，H字母在第三行。拿目前通用的密碼本來說，即是先橫後直的意思。不過目前的中文電報，是以四個號碼組成一單字，前兩個號碼代表頁數；而這個辦法則以三個號碼（字母）組成一單字，把第一個號碼（字母）代表頁數罷了。當時的原電，現存的已少，我們曾經在張永福所著「南洋與創立民國」中，見到一張影印的電稿，茲將原文列出，並舉例說明於下（同時亦可大略推知密碼全部）：

原電係以五個字母組成一單字，共十二字。Keann waseh rihgy jrjnj gahxh
 hmima emfch rewh rthy exreh rhoiz myfko
 K'oa nww gao hrl hgy jrj mjz dax hhm ina eml ebr elw
 xih hty exr ehb sci zmy fko

但把每三個字母看成一組，當做一個單字來算的話，則共有二十字。如：
 [按密碼本翻出來，乃是XX君昨晚由西貢持法公司來星欲善船招待孫。]
 [為甚麼發電時用五個字母為一組，而譯電時又用三個字母為一組呢？這除了關於秘密的作用以外，還有一種節省電費的好處。照當時電報局的通例，別種每字不得超過十個字母，發電時該電稿同；密碼則祇以五個為限]

，而每字不得超過五個字樣。因此，孫先生經過這番和鄭君的目的，便決定了這個辦法。比如上面所舉的例，電報紙紙付出十二個字，却可以收讀二十個字，幾乎能節省一半。如果認得快捷，又可隨時訂行約定，更收價數的字樣，和將紙在字格的次序放棄。

以後（紀元前二年），孫先生在日本又另發明有鉛本一種，字數繁多，字母的編排也稍有不同的地方。此外，還有一種文字信件編排法，原底式是由永福保存着，是用裝格式，直行十八格，橫行二十五格，填寫行格內，每行可填入幾個數目，每一個數目下，空着不填，由右至左，按次填去。全頁共有九十九個數目，由一至九十九。沒有填數目的格內，不是完全空着的，間或填入特別的記號——○。全頁共有二十五個欄，分註在三、六、一〇、一四、二〇、二五、二八、三〇、三四、三八、四一、四五、五〇、五八、六〇、六三、六五、六九、七一、七七、八二、八六、八八、九四、九八等二十五個數目下的空格內。這種圖的分布，沒有一定的規則，既是任意錯亂填寫，顯露了保存這個底式的人以外，便不容易找到線索。可惜張永福對於這底式的用法，沒有說明，大概這一個圖，就是所代表的腳窠符號了。從這一件小事情上，我們可以知道孫先生對於革命工作的規則，真是無微不至，精神實注。

孫先生離開了新加坡，就到西貢，又轉赴海防。在西貢時，和王和順等會面，並由和順的介紹，認識了一個在法國銀行裏當實辦的曾錫周。這位曾錫周曾參與革命，前後損壞的錢不少。

由海防到河內的時候，張吉亭、黃壽生、楊壽彭等都熱誠招待。孫先生為避免人家的注目，仍用五年前對此用過的假名，叫做高適生，漢民也改稱陳高。在廿廿六街六十一號租了一所房子，作為機關部，開始和汪雲南的同志接洽。孫先生此行，十分秘密，汪雲南新加坡同志張祝華說：「河內同志已成立分會，諸會員多熱心之士，辦事認真，慎守秘密，嚴守紀律，三言兩語之外，無雜言在此者。兄處如信至河內，請會，不可提及弟之所在。其與弟往來信件，亦須至河內，若係兄等親筆，則請寄信至河內，現在有事之時，被匪不取，更難獲，方更於危險。兄等持新加坡同志，亦須堅守此秘密為要。」

「我們的同志，因為人被清軍捕去了，都非常憤激，形勢十分危急，怕萬不能制止他們不動了，並且這種形勢似乎很可憂慮，但也不失為一個藉機而上的機會，所以說成和漢波都這樣主張。」

「既是這樣，你們不妨先隱忍，和黃龍請同志仔細商量一下，如果果能辦到，就候到孫先生命令來了以後，和惠州、欽、廉同時舉事，如果辦不到，就聽候打電報來，以便準備。」孫先生還是很有機變的觀察，說罷，又拿了一張電報紙，交給余陳二人，留作打電報用。

既成、漢波走後，漢民也將這些情形報告孫先生，但漢波沒有消息。大約在四月初，黃岡紳士余素，突然把二十多黨人的姓名，連號守備黃龍等，將其黨羽呈鎮總兵黃登福，於是已熄的革命火焰，又燃燒起來了。黃龍也正等着機會要擁護革命黨，接到報警，就派巡防營哨弁蔡河宗帶兵前往查辦，定四月九日出發。但黨人早於八日得到這個消息，先發制人，由葉炳文、吳權等統兵數百人，在九日晚上，埋伏於黃岡附近，等蔡軍經過，就起來攻擊。胡恩等到黎明，蹤跡杳然。原來蔡兩營從游洲航路而來，已進擊橋署了。黨人的計劃既然失敗，本來可以暫時不戰，但跟着蔡河宗來的一個偵探，仗勢橫行，聲言要搜查余與機關，因此又激起黨人的憤慨，立刻開會討論應辦辦法。但會至之間，大家還沒有具體主張。這時漢波、既成恰從汕頭帶了一筆款子回來，主張立刻舉事，運了就被敵人所疑，一面派余邪到汕頭傳達消息，一面派余永興於十一日下午七時在距離黃岡三里的連厝，召集各同志，聽候調遣。這一天晚上，月朗星稀，天朗氣清，黨人的精神都興奮極了，九點鐘時已聚集七百多人，隊伍整齊，聲勢非常浩大。由主盟余永興督師，並宣佈軍法十條，一時更鼓雷動，振撼了連厝山岳，響聲與諸告終後，已經十時左右了，就開上前陣，由漢波、既成等領一隊攻守備署，由林德、葉永興等領一隊攻大東門，攻招林河巡檢署，由余清標、余御官、余寶等領一隊攻大門，攻海防廳都司署，主力軍集中在都司署，那晚既成駐守營署的，除蔡河宗二營外，還有警察三十人，有槍一隊，有砲一隊，其餘守備署的砲兵，其餘都歸漢波統一調遣，大家相持不下，漢波見形勢不利，就下令生火，把都司署燒燬，燒燬後，漢波就率領全隊，不日即回，漢波回天，意圖各處，意圖去手

隊伍之調集，在附近的小村莊中，一切輪流在進軍了，又事變解散，子槍在香檳，不多時被勒令離境，軍隊被勒令以嚴刻的罪名，向香港政府控告，不久引渡解回廣州加害。這是接着潮州黃岡以後，孫先生第四次失敗！

第三十三章 防城起義與汕尾運械

潮州、雷州失敗以後，接着又有欽廉防城的起義。孫先生經營革命的苦心，和遭遇困難的事實，在這一件事情中，更是格外表現出來。因為欽廉起義，自孫先生派克勤和那文金籌劃以後，早已醞釀了很久；所以當潮州發動時，孫先生再三要許雪秋等暫時不動，但事實上他們不能不動，心動又立刻失敗，使兩方面失掉了聯絡，這是很可惜的。

引起欽廉革命的種子，是很確實的由於滿清政府苛捐雜稅的壓迫人民，激起了一種猛烈的反抗運動。欽廉原是地瘠民貧，但欽州的那黎、那彭、那思三城，土產蔗糖很多，橫徵暴斂的滿清政府，對於這地方的蔗糖稅加了很重的捐稅，人民因為負擔不起，就在這一年（光緒五年）丁未起義，鬧舉了十幾個紳士到官廳去要求歸減這項捐稅，但官廳竟把這幾個人均禁起來，想把他們加以恫嚇，就可平靜無事了。可是被壓迫的人民爲了生計的要求，逼着他們不能不反抗到底。在同一首標下的鄉民愈聚愈衆，於是產生了二個萬人會，是抗捐運動的總機關，以劉思裕爲領袖。他們第一步工作，就是搜查被捕的十幾個代表，因這和清軍衝突開火，鄉民死了數十人，但反抗的聲勢益見膨脹。欽廉道王秉必嚇得手忙腳亂，向省城告急，指劉思裕等爲土匪作亂，粵督周馥立刻調統領鄉人渣統率防軍三營，標統趙聲帶新軍二營，砲兵機關各一隊，馳赴欽州，會同總兵何長清合力攻擊。孫先生在河內得到這個消息，非常快樂，因為欽廉人民能夠反抗政府，而政府所派軍隊的長官鄉人渣早已與鄉人通聲氣，趙聲本來是一個最熱心的黨人，如果聯絡一致，就可立成大事，於是立即派民從香港回來，製成一封。這封欽州三鄉鄉民代表梁少廷，梁楚妻也到河內來見孫先生，要求協助。孫先生於是派鄭敬川

劉恩裕自負其才，對恩裕，一面調查確實，又派胡毅生到趙雲雲中去約那入辦一齊乘機起事。不久，郭維三那姓的便出聲反對恩裕，即派陳四帶了密函去見胡毅生，要他轉達郭維三，說他原屬兵，已與陳入聯絡，不必反對了。但陳四到了北海，郭維三都已離開故走了，陳四却沒有勇氣再趕上說這封信，於是那入就不轉得內情，經過米仔村時，派管帶林虎帶了一營兵進逼劉恩裕，恩裕以爲新已派人到郭軍處好，現在郭軍開來，當然不會有什麼的，因此毫不準備。却不料這事出意外，郭軍突然開火了，劉恩裕結果死在亂軍手中，數萬資產，也因此完全損失，人民死傷的更不可計數。這一場大禍，完全是由陳四一手造成的。毅生在軍中還沒有知道，因爲消息隔絕，才很着急的去見 孫先生，孫先生却早已調查明白，把這經過告訴了毅生，於是大家都非常痛心。

這時候，孫先生已經僱克強從新加坡回來了，因此派他和王和順跟毅生再到北海去。孫先生的意思是委王和順在欽州腹地担任收編民團的主幹，以便再起事，克強和毅生仍和郭維三二人去聯絡，這樣兩方並進，不致有呼應不靈的缺點。

王和順是出身行伍的豪客，曾和遊勇胡欽、陸亞發在廣西起事，一舉而佔據南甯，威振清廷。他這次從西貢到河內來聯絡 孫先生，孫先生對他解衣推食，禮遇至優。那時因爲僕役不多，機關部裏許多同志的衣服，都由 孫先生的一位親屬陳四姑親自洗濯。和順却引爲不滿，見孫辭色。克強大不爲然，他對 孫先生說：「先生以國士禮相顧，而和順不以禮相還，豈精神之？」

「和順是行伍出身的人，舉止不免粗豪，我爲國納賈，怎麼可以因一點小事情，和他計較呢？」孫先生沒有接受克強的意見。和順聽了 孫先生這樣的話，因之大爲感奮，他的態度也從此改變。現在 孫先生要他到北海去，他却有些爲難了，原來他是一個膽怯的人，孫先生再三叫他快去發動，他總是不敢，並且提出種種要求，孫先生因此很婉轉的勸他他說：

「你進去發動好了，在發動的時候不能夠讓那郭完備的，從前沒有聯絡，而且可以發動，現在有了聯絡，

爲什麼反而不能呢？」

和順沒有理由回答，祇好勉勉強強的答應去。他隨身帶了許多雜糧，這雜糧給孫先生看見了，就露出他的錯誤道：

「我們不可以帶這些東西，我們不必怕殺，假使給人家捉住了吃雜糧，這就是他死的明證。廣東人所說的『大丈夫自有人家殺我，我不自殺！』這是革命者的勇氣，你還是不棄這些雜糧去呢。」

這許多話又把和順說得無話可答，於是決定和克誠就生出發。克誠不多時又轉赴欽州。和順等到了陸屋，再約郭趙發難，郭趙都說如果有堂堂正正的革命軍起義，當然立願響應。當時計劃，想由和順率先進取南甯，由趙發以所部自後尾追，相機暗助，如果南甯攻下了，再用這方法去攻他其他地方。但後來因爲運動南甯的清單，沒有成功，這個計劃始終沒有實現。那時三那父老對於和順非常歡迎，已故劉恩格的孫兒顯明也率領幾百人來會。但遷延了很久，和順天天想等機會來動作，都沒有成功，顯明也引衆散去，就是和順統率隊在緬城屯紮。一切糧食，都由鄉民供給。這樣很平靜的過了幾個月，儀好的，駐防緬軍左營左哨官劉輝廷給黨人說服了也決心反正，右哨哨官李耀堂是以劉爲馬首是瞻，他們是防城全境僅有的駐軍長官，他們能夠反正正是再好沒有的機會了。孫先生因爲防城近白龍港，有海上接濟的便利，非常贊成，就一面派王和順爲南軍都督，梁雍葵、梁少廷爲副都督，準備一切。一面去電香港得自由及日本長崎董野長知，催促他們把已購軍械運至白龍港起岸，以備革命軍取用。同時在河內就地召集同志，並加聘許多法國退伍軍官，預備軍械一到，佔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就可組織軍隊。這樣很周密的計劃和佈置，如果一一實現，這次起義就很有辦法的，但不幸却發生了許多枝節，使孫先生這周詳的計劃，依然失敗。

這次失敗的關鍵，很像七年前惠州起義是一樣的爲了運械問題，但上一次是因爲所託非人，並且是一個日本人；這一次却起于自己同志的內訌，現在我們說起來，是非常痛心的。原來這次孫先生運械，早在本年四五月時着手計劃，自資同事情失敗以後，孫先生還是繼續進行，並派董野長知於五月七日回到日本，要他專

辦這個事情，此外宮崎實藏、三上豐夷、前田九二四郎、宮崎義弟等，也都很忙。二十日萱野就從長崎來電說明購被租船二事，都已辦妥，祇要款項一到，就可完全辦好。孫先生因即着馮自由在香港向正金銀行匯去日金一萬元，交長崎實屋轉借萱野，祇等着第一批軍械運來。很好的，妨礙起義的事情也在這時決定，因此要他們改在白龍港起岸。但是不知怎樣的，東京同志把這件事情告訴了章炳麟，章炳麟知道了就進行破壞的陰謀；這事情是和上次孫先生離開日本時留交民報社二千元的事情有直接關係的，我們應當在這裏約略的補述一下。那時炳麟在民報社擔任編輯，就以民報社看作他私人的地盤，他以為給米短給，孫先生的錢，都給民報社的，而孫先生籌款交出二千元，其餘的都充作潮惠起義的需用，因此就決意嘗試的牢驗，摸不着頭腦的大鬧大吵。同時竟把掛在民報社的孫先生的照片撕下來，下面批了幾個字，叫做：「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撤去。」他以為孫先生還是在香港，就把照片連批語寄回香港。後來潮州、惠州軍事相繼失敗，在東京的陶成章等更附和炳麟反對孫先生，炳麟竟又提議革除孫先生同盟會總理的職務。孫先生到東京時，力排衆議，因此和同志起了一場架，劉光漢更引日人北輝次郎、和田三郎等主張改組同盟會本部，東京的同志鬧得烏煙瘴氣，同盟會幾乎風雨飄搖。也有人勸孫先生引萬方有罪，罪在一人的古語，向東京本部引咎謝罪的，但孫先生先嚴正的答覆他們：孫內糾紛，惟事實足以解決，決無引咎的理由，這個黨潮也就漸漸地平靖下去。但章炳麟始終對於孫先生抱持惡意態度的。這是一回孫先生派同志到日本買軍火，他當然要乘機報復了。當時孫先生所購的軍火是村田式，炳麟竟亂說道：「孫某處購軍火是村田式，這種式子在日本早已不用了，運到中國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送了性命麼？可孫某實在是不講道理，我們要破壞他。」他說了這些話，一部份同志也露鋒目的附從。其實炳麟這幾句話完全沒有根據，因為當時清政府軍隊所用的槍械是老毛瑟，比村田式不見得高明，甲午年中日戰爭的時候，中國懸用老毛瑟打勝仗，根本是用村田式打勝仗的。不過炳麟存心造謠破壞，就不惜顛倒事實說了。當萱野正在積極準備啓運時，他們就聯合北輝次郎等用明電打到香港中國日報，說運一批軍械，萬萬不能用，這是無異於告訴敵人說：革命黨在私運軍械。於是這個計劃被章炳麟

一手破獲而又轉失敗了。

欽廉同志正在慶幸操場的很奮興着，等待軍械一到，就可樹起革命的旗幟，大規模的起事了，那裏知道東京本部已起了一場風潮，一直等了好幾天，都沒有消息，才忍不住於七月二十七日在欽州王光山起事。一舉而防城劉李二酋，立即反正，殺清知縣宋鼎元及其幕賓家屬十九人，於是全城大定，由鄭敏川率少數隊伍，留守後方，其餘大隊即向欽州府城進攻，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襲取府城為根據地。但這時氣候惡劣，大雨傾盆，道路泥濘，使行軍增加了很多困難，走了一天一夜才到達府城外，遠遠望見城上煙火齊佈，不便動作，就退到離城四十里浦口下營。郭人漳是駐在這府城之內，克強也在裏面。克強得了和順等在城外的消息，就和人漳商量，以出巡為名，帶了六十人的小部隊，出城與和順見面，他說欽城不必進攻了，到晚上就可自動反正。到二十九日早上，郭人漳却突然派霍時安到和順這裏來說：「城中欽廉道五聯及駐欽宋安權部，已經戒備，使他不發動，請革命軍不必來了。」革命軍聽了這話，就派人去偵察，的確看見形勢不好，因此決定改道攻靈山。郭人漳見革命軍果然不來攻城，就派一營尾追革命軍的蹤跡，一面派兵攻陷防城，後來怕這事給霍時安傳出來，就借端把他殺掉，這人反獲險得可怕，但這時革命軍還不曉得他的詭謀，竟貿然向靈山去了。

革命軍從欽城到靈山，一路上都受到鄉民熱烈歡迎，民團多攜械來投，有一個張拾義的妻子，也率隊數十人來會，於是人數愈聚愈多，大約有三四千人，但槍械祇有幾百桿，女不夠分配了。軍行三日到南勞墟，開軍事會議，決定先攻佔距靈山城十二里的六峯山砲台，和山下通城的環秀橋。同時派同志陳發初預備製造雲梯五具，以備攻城。環秀橋的名字，是多麼醜陋？據說這環秀二字是一家富戶美婢的名字，曾經留下過很多醜跡，這裏的鄉民都拿來做談話資料的，現在却再灑上了革命志士的鮮血，它不但是醜陋，更是悲壯了！八月一日，革命軍才到達環秀橋，清軍從六峯山砲台和縣城上兩面夾擊，革命軍在彈雨槍林中還是奮勇攻城，可是所造雲梯祇有三具，其中二具又是壞的，祇有從一梯攀援而上，先後約有二三十人入城，苦戰三日，傷亡無數，因此退兵到木蘭樹同意的丁屋內宿營，這不能不算是一次很慘痛的失敗！

在革命軍繼續進攻中，忽然來了一個奇特的消息，說廣州城內的黨人已起來響應了，如果班師回去，就可把欽城佔領。革命軍聽了，就拔隊回去，那知將近城下，宋安福部就調集迎戰，革命軍才知道已經中了詭計，於是且戰且退，向廣州伯通花會殿五王山等處而去。這時趙聲駐在離廣州城八十里的五利，接到了宋安福請援的急報，不免有些為難，他為要避去人家的注目，祇有派兵，但他就派了兵，却繞道而行，以免和革命軍衝突，他的用意也算是很苦了。革命軍在獅子山和宋部管帶李福華、黃秀如兩營相遇，交戰一日一夜，還是不能支持，於是敗退至羅家小洞，餉械都缺，已到勢窮力蹙的境地了！王和順藉口說要去請示，孫先生，就帶了二十人到安南去。其餘的黨團，也漸漸離散。梁建葵、梁少廷因此分領數百人退入十萬大山屯聚，以待後命。後來劉輝廷等囚王和順久無消息，也想到安南來見孫先生，到法界平寮時，却被扣留了。李耀堂也率領所部屯聚在邊界洞中，直等到第二次欽展起義，他們又出來會合轉戰。防城起義就這樣先敗了！這是孫先生第五次失敗的經過。

接着這次失敗後更有一件傷心的事情發生，我們不應把它忽略的，這就是日本運械的一件舊事的餘波。當五六月間，孫先生計劃在白龍港運械的事情，既然被章炳麟等破壞了，但孫先生還是希望在另一適當地點能夠把軍械運來，以備起來。不久蒼野長知從日本到中國來，和許雪秋同到河內去見孫先生，就談論到這件事。雪秋主張以海豐縣屬的汕尾為接收軍械的地點，因為那處距離香港汕頭很近，交通便利，黨人也很多，他請先期召集，等軍械一到，就可大規模的起事。孫先生覺得這是很合理的提議，因此就派他主持這件事，並促蒼野回日本去辦理一切。這時正在欽廉軍事緊張之中，孫先生正注意那邊的軍情，似乎把這運械的事件忘却了，現在欽廉的軍事完全失敗，却正是汕尾運械的事情接着出演的時候了。

蒼野回去以後，就積極進行，不久有一個電報打到香港來說：船械兩事都辦妥了，請立即派熟悉汕尾水勢的引港人到日本，以便指導運械的輪船。獨自由電在香港就找到海豐人陳二九等二人做引港，托劉雲龍做翻譯，因為孫傳璋這時避著假要回國，就乘便担任這個任務。這樣準備妥當了，定於九月一日從長崎出發，給行五

日，六日就可到達。約定由許軍款在汕尾預備二千餘大擔船隻，就近接濟，準備接收，白天以白旗為號，晚間以紅燈為號。彼此信號相符，就可應運，不至有誤。這次所購軍械，我們可以簡單開列如下：

明治三十八年村田式快槍

快槍子彈

二千枝

槍頭小刀革囊及各附屬品

日本古刀

一百二十萬發（每枝帶子彈六十發）

將校用指揮刀

短槍

二千具

短槍子彈

五十具

此外還有望遠鏡等軍用品很多，全都價值很大，除已先付一萬元外，其餘款項都由山下汽船會社主人三上豐夷担保清償。所僱的輪船叫做幸運丸，載重二千八百噸，是日本紀州和歌山縣藤岡幸十郎所有，也是由三上幫忙的。這時三井洋行也要載煤炭送到香港去，董野、三上為節省費用起見，就叫這輪船主人把軍械順道載到汕尾港起岸。這次有好幾個日本同志同船去準備到戰地效力的，除董野外，還有陸軍大尉定孝位一、前田九二四郎、金子克己、三原千尋、松木壽畫、鹽月三郎等。犬養毅知道了，也送了極右的寶刀三柄，以壯行色。

這攜載着革命軍軍械的幸運丸直向中國海開來了！雲秋自奉命後，早已委派許佛童、范錫魯、林鶴松、李子偉、吳金彪等前往佈置。預備軍械到時，就可召集海陸豐沿海岸會黨數千人，聽候指揮。現在船快要來了，他就帶了柳聘儀、譚劍英等幾個人於九月三日到汕尾去，但這天他在香港上小輪船時，突然看見碼頭兵吳祥雲的偵探，就害怕起來不敢去了，紙派柳聘儀等先去。幸運丸在六日黎明時準期開到了，停留在距離汕尾十里左右的海面上，等候有船來，就可搬運軍械，但信號發出了，沒有人答應，直等到十點鐘，才看見一隻小船

以白旗爲號開過來，雲野知道雲秋失約了，就對小艦的人說道：「你們這樣一雙小艦，有什麼用？必須在下午四時用很多大船來，才能起卸；否則我們就開走了。」這小艦去後，駐在礮石附近的情軍小兵艦，早注意到雲運九，因爲那邊海面本來不是停泊大輪船的，現在雲運九逗留了很久，不免形跡可疑。因此他們逐浪駛來，偵察一切。幸運九船長知道被清艦注意了，他不要心虛驚慌起來，就急急忙忙要開去，雲野還想要他在別處暫泊一下，到晚上再來，但船長因爲這船原是租給三井洋行載煤的，如遇意外，不能回還三井，因此他就直往香港開去。船到了香港，許多中日同志還是極力想在平海起卸，但遠事情早已給香港政府知道了，因爲在汕尾的兵艦看到了這船以後，已經報告粵督，粵督就要求香港政府加以扣留。因此十日早上，香港日本領事就找到山下汽船會社經理，要他趕快卸貨，仍舊開回日本去，免得惹禍。這機一來，運煤計劃又功虧一簣，完全失敗了！後來幸運九回到日本，所載軍械，又給警察查到，把它全部扣留了去。三上豐夷本來是保羅購械欠款的，現在又須負責承受這輪船所未卸完的三井煤炭，這二項損失是很大的。雲秋知道事情弄糟了，不敢去見孫先生，却寫信報告說：「這件事情是日本船不好，其實我們平心而論，日本船固然因虛驚而失事，而最大的錯誤還是在雲秋一人啊！」

在這時期內，還有一件事情，孫先生認爲很痛苦的，就是引用會黨，所託非人。那時有一個廣西人梁爾泉，又名梁秀春，在軍界及會黨中，有相當勢力。他在邊防帶兵時，縱兵殃民，無所不至，後爲岑春煊撤職查辦，就逃到河內來。他受了這一次打擊，誓誓不轉志，於是設法加入同盟會河內分會，企圖實現他報復的圖謀。河內同志因爲他過去會黨招搖，在會黨中有相當地位，很有用處，雖明知他爲人心術不正，也都沒有拒絕。當孫先生到河內以後，本來不願軍餉歸泉知道的。後來因爲事情一天天緊張，請人甚急，梁泉本人雖不是一個玉潔，但他結識了許多有用的人，而他們則請求梁泉知道許多有用的人，也是一個辦法。並且他爪牙甚多，如不是通過他去招致那些有用的人，那怎麼能辦成？其來函結果更大。孫先生經過再三考慮，就接見了他。

聞泉竟了。孫先生以後，屢告勸導，但孫先生不肯聽，他仍舊自利之見甚重，竟他所引薦的人，並擇其河間的入，分派巡警，並充許輪船相責任務，以防生變。但他竟自利之見甚重，竟見他所引薦的人，多分派了任務，硬要孫先生去編練，經孫先生嚴正的斥責，竟法的原諒，一面嚴防生變，他才不敢動作。同時他手下的人，也已看出他是一個毫無血誠的人，並不樂為所用，但因為過去沒有機會和孫先生見面，不得不求他介紹，現在他們見到了孫先生，傾心聽命，就已成了孫先生的革命幹部，他再要破壞，便沒有辦法了。

孫先生既允許聞泉分派任務，自不能食言。前後給他五千元，令其運動謀事，但他反覆失約。當王和順進行防城起義的時候，大約在七月初，孫先生派他到三那去運動，他接受了命令，竟失約不去。後來派他到海濱去佔領一個地點，担任接運軍火的工作，又一再延期，不馬上就去。經孫先生嚴令催促，他才勉強表示就，但拿到了經費以後，還是不走，祇招了一批「咕哩」來裝點門面。先後招了幾百個沒有身發執照的人，騷擾喧鬧，弄得不成樣子。其中有七八十人，走到邊界，被滿清官吏通知法國當局把他們一齊扣留了，在警察署囚禁了好幾天。後來他們供稱欲回廣西起義，並非盜匪，法國當局才知道這是國事犯，一概釋放。這七八十個被囚者釋放以後，法國當局因為他們都未繳納身稅，不許還舊境內。河內分會於是大動俠義，立刻發動會員捐款，一下子募集了二千元，代他們繳了身稅，更送他們路費，分別遣回。孫先生在這時，也很滿意，他說：「當時法國官吏，見其俠義，多所優容。法國西人美會，亦為之助。以百餘人之分會，而救七八十人於危難之中，不獨此七八十人或激涕零，即會外人亦感動，多有因此紛紛入會者，夫河內之地，風氣未開，商務未振，會員營業小生意，財力不安，而能於數日之間，集款二千，為善後用。」（致陳楚楠等函）

但聞泉狼子野心，嗜利無恥。他看見河內分會募集了二千元來救這七八十人，就想把這筆款子攬為己有，公幹向分會要求，說這筆款子應該由他經手分配，分會裏有允許，他便惡狠狠的說：

「我此時不能為公衆之利，亦能為公衆之害。如果不答應我的話，我就派人行刺高連生。你們看：高連生

的說詞便左右，顯已有入插伏了！」

他這無賴的與面目，從此完全暴露。這一天晚上，孫先生寓所約周慶，果然來了十幾個人。他的陰毒詭謀，是在直搗孫先生規劃革命的祕密，以冀要挾詐的工具。分會同志，看到這情形，非常憤怒，都主張應以重罰。孫先生因為革命的機局，正在開展，各黨的布置，亦已妥當。不願因黨內的爭持，破壞大局，因此始終出以和平態度，寬恕了他。

不久，關泉被福州官吏列舉他在邊防時種種罪惡，移請法國提解，他由西貢出走新加坡。孫先生恐怕他到新家坡以後，又去誘惑同志，實行騙詐階級的手段，因此把兩陳楚楠等注意提防。孫先生在這信上說：「關泉之行爲……有幾反噬，罪不旋誅，弟在此廣謀毒，除防情親之外，務防此人。爾等競爭，多因此故，已被其破壞不少，今日所布實諸路，皆由邊防懷謀，始不爲關泉所誤。律以自負債事之咎，亦罪不容誅。此人來時，各同志切不可與之往來。」可見孫先生對這個關泉痛恨之深了。但在那時對這件事情，始終保守機密，在這信上說：「弟此書所言，皆秘密之事，爾兄及子瑜兄等可共閱之。」這種以革命事業重於一切，而對寬厚偉大的態度，真非一般尋常人所能企及。

第三十四章 鎮南關起義

孫先生繼續經營的革命運動，已經接近着崩潰失敗，這是何等悲痛！但革命是逼着入心的要求，他是肯運盡氣的。當孫先生在兩廣方面，再作再興的舉事策時，其他黨風興起，獨樹一幟以黨義的也很多；像這二年黨實同和老女兩事轉失敗不久，就有五月廿四日孫先生親率軍隊開往鎮南關等處，結果湘帥自己炸橋毀城有礙。不久，更有五月二十六日徐錫麟在安慶槍殺清帝後逃撫原帥的激蕩激烈的壯舉，六月更有秋瑾被害的事情。

，這一個消息，雖然報告，但孫先生和機關部的許多人，都興奮得不得了，儘管一來，大家都期待著，但中步那裏而來的廿三日，但到了那天，沒有什麼消息，這夜就過去了。翌日早起，都先發第一聲動靜，然而依然別無消息，這一天就過去了，現在只消睡一夜，怎樣過去，大家都充滿著明天可以建國的志趣，但這是機關的希冀，要難去靜向度夜，不料十五日的黃昏，王和順忽然悄悄地歸來了。孫先生問他怎樣回來？他說是為了生翹。唉！這是什麼一會事呢！本來的期待太大，因此失望也隨着大了，大家都罵他是自誤而思推諉的畏葸病。但孫先生經過詳細研究以後，才知道和順是繞林出身，本來和那樣的游勇沒有感情，大約李祐卿因此不願和他合作。可惜難性的王和順就這樣毫無結果的回來，連軍械都不敢說出來，只是推託生病，孫先生知道他的苦衷，也不深責。於是另派黃明堂、關仁輔和何伍經營軍事。至於王和順，因為曾經主持防城軍事，於是派他聯合靈川失敗後逃入牛馬太山的同志，謀舉水口關，以為聲援。明堂和仁輔等，本來是游勇首領，事前早與台上守兵聯絡成熟，還原兩度革命軍重任，發動軍事是很容易的。

事實的真相，果然和孫先生所懸想的距離不遠，當他派人和黃明堂等商量時，他們只要求王和順不來加入為一條件而忽然允許了。十月二十四日的早上，他們就有密電來說，已經決定在十月二十六日晚上起事。到了那天，機關部的幾個人，因為要於從前王和順的失望，所以並沒有什麼感動；是大家相互祈禱他們能成功而已。可是在各人的胸襟中，總不能安定；在一間會客室裏會見後，忽然散開了，散開後，又忽然聚了攏來，沒有一個人能安靜著的。當時有一個日本同志海亨吉，是孫先生約他來當英文秘書的，也在這機關部，他因為在遊戲的書兒，發高處跌了下來，傷了左臂，感覺得非常疼痛，這天晚上，他就獨自先去睡了，在夜間更深，萬籟俱寂的時候，他正轉極反側着，突然看見孫先生走近他的臥床，他就慢慢地起身來，孫先生急忙的制止他，在天生成的溫和的面容上，笑對他說：

「你睡著了麼？」他亨吉因為疼痛不能說話，祇是默默的望着，孫先生却又破顏一笑地說道：「你也尚且如此，我實在睡不著。我一生約運命，就在今天晚上，幾年的辛苦，如果在這方面能夠成功

，就是將來發展的端緒了。一想到這裏，我時時測測心裏有如聽着鐵蹄隊方面的砲聲，就是要爆發，但竟不聽聲響！

他享吉鶴了不由的表示着深切的同情，就緊握着孫先生的手。不一回，鄰床也發出了很大的聲音，是在嘆着道：「誰能磨得着呢？」就突然地起了身來，原來是目光炯炯的胡毅生。在騎馬漢長和克強也互相和聲地說：「誰能磨得着呢？」就霍克強已舉走了出來，這時已將將近三點鐘，窗外也聽到一聲聲幽靜的鴉聲。可見這時各人期待着革命軍捷報的心理，是何等急切而頻頻啊！

勝利的捷報終於傳來了，原來二十六日晚十時，黃明堂等已率領那樸村游勇八十人，快槍四十二桿，循着鎮南關舊後的間道突然向關上右輪山砲台開始發動了，經過了幾次的攻勢，在第二天早上佔領了，就像上面東京日報登載的文字所說。孫先生得到了這個勝利的報告，真是快樂極了。沉寢的樸關部，也頓時現出活潑的景象，大家忙着手準備做軍服軍帽，奔走接洽各方面的事務，預備明天（二十八日）都到陣前去奮戰。受了傷害的池亨吉，也忘了他的疼痛，驅車參加各人熱心，都預除了陰霾，現出了無窮的光明。

稀微的晨星，還是冷寒的天際閃爍着，寒秋蕭瑟之氣，一陣陣襲到身上來，幾等發抖，這正是十月二十八日早上四點鐘的時候，河內廣關部的同志正在法者。孫先生出發到鎮南關去。一路同行的有克強、漢民、駱生駒、盧仲琳、張翼樞，（他們是在安西已離軍警署後從軍的）等，另外還有池亨吉和一個游勇副團長上尉的勇將。六點鐘到了車站，大家就上了幾輛空空的車子直向同卷站進發。不幾時，車到紅河橋，一直向雲南省馳掩而下，橫斷富良江的下游，一應難難，直達東京府中央，延長計一千八百餘里，可算是如雷六萬萬河橋以外最長的大橋了。出了紅河橋，東京都城，就隱隱在曉霧模糊之中，不可見了。這車子直達和延進的姿態，真是反映出這許多人的勇氣和希望，他們是同坐在一輛車頭裏，再也沒有其他的人夾雜在中間，似乎都忘却了原來的曉風吹來，只是彼此熱誠的相互談話，沈默寡言的孫先生，也被除了習慣，在與着熱誠的談話之下，變成了歡喜多說話的樣子。他道：

「我只有一個希望，就是進入中國是南方的蘇俄，蘇俄要變為蘇俄黨，貫通中國的腹地，而此中蘇俄北角的山海關。一出山海關，蘇俄就把愛經德羅塔送走了。現據運價信願的前半，快要成功，其餘後半的處境，還不得在那一天。唉！我聽不聽得在那一天？」一痛快淋漓的談話，這就哈哈地笑了一陣。

孫先生這樣興奮的快樂，的確不是尋常的，因為他自本年一產離開了日本，航行到新加坡，再由新加坡出來，就此投身置跡於河內，在這二百四十多天的中間，滿清政府而密探，時或懸賞二十萬兩，以求其首級，或以雲南一省為報酬，要求法蘭西政府加以逮捕。孫先生在這陰雲滿佈的幽暗生活中，因為是出戶，缺乏運動機會的緣故，曾經發生劇烈的胃病，這種的遭遇，是多麼艱難痛苦？現在竟突破了重重圍困，疾馳於荒蕪的大野野之中，於耕种的噴霧中，恣意呼吸，對於他真可以說是蘇生復活了。同行的許多人，也都感覺到新的光明的照耀，於是都不期聲應然的連呼「革命熱萬歲！」這樣不覺不覺間已到了諒山的同登站。大家下了車，步行到文煙館。這時那模村總辦代表，已經獲知革命軍領來，所以預備好了幾匹馬來迎接。孫先生等和游勇代表略略討論了關於戰略的問題，就各自上了馬，揚起了馬鞭，奔向那模村出發了。一路上，看見突插雲表的奇峯，高出海面約三千餘尺，在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的時候，法蘭西曾以一萬精兵，沒有奪得這險要之地，因此稱它為第二紫順；現在却有無匹的三色革命旗與無數軍旗，在這上面的要寨上飄揚的飄揚着。他們沿着凌澗起伏的羊腸小道的悉祥行馳去，就折入到那模村的捷徑，隔山的砲聲，正聲聲地傳來，孫先生面上更顯出喜悅而興奮的神采，拍馬前進，就一直衝到許多人前面去，因為他自幼就有騎馬的經驗，所以走得很快當，雖然克強是一個軍事家，也自嘆勿如。池亭吉老是落在後面，祇有自笑為殿軍，他談大發詩性，撫着馬背高吟着：

感來意氣不虛功，魂夢忽驚征馬中；滿漢是亞妻萬疊，曉鞭吐附風天風。

大約走了一點多鐘的時間，就到達了那模村目的地，這時是下午五點鐘的光景，由游勇首領何佐出來招待，葛先生等就在他家裏很匆忙的吃晚飯，充實了一天來沒有吃飽的空腹，吃過了飯，就關住了後院的夏落地雨

始討論爬雲南關山的辦法，決定立頭要上去。這時天色已黑，因此那根繩子幾乎全用完了，由瘦壯的孫勇，一手拿斧頭，一手拿着火把，照樣着繩子。孫先生等前進，同行的有六十多人，每樣走，氣壯聲。下級街約半里許，由此就左折而入鎮南關山後的關道，開始爬山的工作，這時黃生的孫先生爬得比任何人都快，克強因爲是一個胖子，越爬越喘氣，非常辛苦；法國砲兵上尉D男爵，因爲身上背着一支藏煙槍的箱子，非常累贅，所以都落後了。漢民大概在柯伍家裏吃的東西，不十分舒服，爬到半路，覺得口渴得很，把這衛的葫蘆裏的冷水又喝了些，這樣就肚子作起怪來了，忽然昏倒在地上，大家都很着急的要把他抬起來，孫先生就本着醫生的態度，對大家說：「這是不要緊的，只要睡一下就可以好了！」說着就把漢民的脚步補高，頭部放低，這樣一來，他就頓然蘇醒，等一回，就起來說：「不要緊，我可以和大家同去。」大家聽了，都放下了心。又繼續爬上去。大約在九十點鐘的光景，才到達砲台，早有黃明堂等出來迎接，一時軍樂大作，奏起了歡迎革命領袖的歌曲，夾着一片歡呼的聲音，衝破了這深夜靜寂的山上空氣。孫先生見了明堂等，約略談了一下，因爲一天來奔走，疲憊極了，就和大家睡覺。在這砲台裏面是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於是祇有把堆在台下下的茅草當作寢具，D男爵却拿出他的煙槍來大吸了一下，以補充他的精神。這一夜，就這樣地過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都就起來。這時清軍參將陸榮廷尙堅守鎮南關本營，專候龍州大兵到援，白天祇是派小隊向三砲台轟擊，沒有什麼大接觸。所以明堂等早已很焦急的等候。孫先生親來指揮，然後向龍州大舉進攻。這一天晚上，這一方面，孫先生已經起來了，敵人方面的援兵却也來了很多，孫先生等起身後，就聽到敵人的槍聲，一直從這三砲台傳來，於是大家開始向第一砲台檢閱內部。這第一砲台是向北的，稱爲鎮北，由黃明堂堅守着，其餘二台，一爲鎮南，是何伍守的，一爲鎮中，是李聯勝守的。第一砲台比較最堅固，有十二生爾克摩伯大砲二門，七生的大砲一門，新式四響機關砲一門，七生的野戰砲四門，白砲數門，大小砲彈數千發。D男爵也觀察了一下，他看見大砲的器具，有很多不完全的，連那也已經沒有了，因此總是滿腹着許多愁，但都不中用，後來他動量放了幾個大砲，向距離四千處砲擊，第一響就命中，清兵死傷六十餘。

人，立刻呈露紛亂現象。但事情太不機巧，再看那個砲台，砲的方向是向安南的，開炮就是向安南打，不能向中國發炮的。打大砲的方向是改不來的，於是管砲的幾個軍官，一個是天地的方位改不進來，有了大砲等於無用；一個是其餘幾枝槍也是老式的無用之槍，必須重加修理。男爵要想把砲的方向改過，但是沒有工匠，一個人弄不好，就是有了工匠，也不是一二天可以辦得好的，弄得他沒有辦法；就是配槍的話，又是弄下山不可，這樣大家不免焦急起來了。有附主張在這無辦法的環境中，如果遲延下去，倒不如下山後另覓辦法。孫先生却不敢離開這裏，很興奮地說：

「我是不願意下去！因為第一，我是十多年沒有踏過中國的地方，我現在踏在這個山上覺得很高興，我簡直捨不得下去，我認為我們在這裏總是有辦法的；第二，他們幾十個人敢佔砲台，（指黃明堂等）就是要希望我們來，要是我們走了，這個砲台不是馬上失守了麼？」

孫先生這個話，是很有理由的，但事實上那不能運糧在山上，所以漢民也申述他的意見說：

「如果我們在這裏沒有辦法呢，我以為坐守在這裏是不必的。我們守這個砲，而砲備炮也沒有戰鬥的作用；守這幾十枝槍，也沒有最終的目的。至於他們守炮台的將領，也會明白我們在這裏是無法幫助他們，就必定想我們下山了，想方法來策應幫助，決不因此而失靈的。」

在這議論的時候，忽然發現了一個粗野驕嬌，聽說幸了陸榮廷的使命來見孫先生，大家就向他問了一番，她拿出陸榮廷的一封信面，大意是說：他也會統率游勇，專與清兵交戰，現因時運不濟，實堪孤身義族，但沒有忘掉本志，這次革命軍起，他起初以為近於擊擊運動，及至看見今天早上砲火的聲響，才知這真是一代豪傑。孫先生已經義勇前陣，籌劃一切，無任欽佩！現在願率六百餘人前來投誠，懇請收留。沒怪又說：明天有清軍五百員應難開來，後天更有二千人自應難開來，請早日預備進切，請他身家重。孫先生一聽意外的收獲，一時的精氣神竟有這樣許多人來投誠。但大隊的難人，自是負重難上來了。孫先生聽了，心裏也不是不滿意。事實勝於雄辯。孫先生就一面答應陸榮廷，如果每人備銀幾兩，就領下龍州南寧以後，每人派法。

各營殘兵四千多人，真如魏榮廷所說：「纏綿緩會集，把三砲台圍困住，向山上環攻。明堂等雖是悉力拒戰，迭將將軍鎗弁右拔郭，營長黃瑞興、馮朝輔等多人，側底因為糧盡彈竭，糧食不繼，在初四晚上放棄砲台，奔衆街圍而退。將軍也紛紛逃去。這時革命軍中有一個小孩，看見砲台上青天白日旗還沒有撤去，他怕給清軍拿去，就冒險獨自再上山去，把這旗拿了回來。這是革命史中一件有趣的小故事。大蓬亦孩的見識和勇敢，是很難得的。革命軍佔領了九天的鎮南關，到這時完全失敗了。」孫先生在失敗後的第二天初五日就得了這消息，非常痛心。當時安南的法蘭銀行家已經和。孫先生接洽關於籌款的事情，他們允許向他們本國代募革命軍債二十萬萬元，但第一批款子必須佔領了龍州才拿來，這是他們的條件。孫先生正在發覺像羅馬神話中 Tantalos 的願望，現在事情已經失敗了，這願望也就無法實現。這是孫先生革命運動第六次的失敗！

孫先生在這次馬傑德，革命工作萬分緊湊的時候，偶然還有忘掉他的講書生涯，和革命主義的研索。現在留心的給我永輝稿中，可以知道。孫先生這時研究工作繁瑣的一般情形，這係他說：「最近因查考列國政事，需用六年英文政治學選一部，此地無買，香港書店，亦剛派到，今寄託在下備校（現與新加坡）代購一本，其英名列下：(The Statesmen's Year Book 1907) 該價多少，請先代文，並轉示喬君自當奉上。」

第三十五章 被迫離安南後的革命運動

亞南關的事情完了，孫先生又重陷於苦悶的境地，但匆匆的上關和匆匆的下關，這一個像夢一般的故事，回想起來是很有趣味的。孫先生在機關部宴會和漢民等談論到這一問題時：

「我當時自己親自走上嶺南關，實在是別有懷抱，不料大家都跟我止關，毫無意義，現在想起來，假使我還在爬出關或上山的時候，只要清軍派少數的部隊來，就可以把我們統統打空。事情仔細想一下，我覺得我們那時的準備真是極優的！」

「先生所說雖然是很對的，不過我們當時有兩種想法：第一點，革命者對於自己的性命看得無所謂的，普通新黨不怕犧牲者，有時還爲熱懷所激，就是走不穩危險的地方，而且爲之犧牲，若無其事，何況我們爲革命主義而做事呢！所以我們不覺什麼，就跟着先生上關了！第二點呢，我們當時時機很快，四圍的時機也是很快，好像是神不知鬼不覺的樣子，所以也覺得不會碰到什麼危險的。」談及這裏，一回，這樣回答。

「不錯，你說的兩點都是很對的。」孫先生說。

這樣危險事情，本來在孫先生以及跟從孫先生的革命黨人是已看慣了的，但這一次，如果他們在山上多逗留二三天，恐怕就陷入清軍的重圍中，再不能安然衝出了，所以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不幸中的幸事了！然而革命者的生活畢竟太曲折了，平靜中又起了波浪，使孫先生又不能安居河內而度着流浪的生活了！

這波浪的掀起，就是由於那天從諒山跟來的那個警察所查成的，原來他對孫先生偵察明白了，就報告了安南政府。本來安南總督和孫先生是有相當感情的，他對於孫先生的活動，是取不干涉的默認態度，但不能給警察看見，因爲警察看見了就要執行他的職權，要依照公事的辦法去做，軍府也只好使警察查辦辦理了。這一回這警察看見了孫先生的行跡，他就公事公辦，曾經和孫先生交涉了幾次，因爲警察是當地的縣長，關於這種事情，政府常常先和他談話的。警察對他說：「我們現在已經曉得孫先生在偵察了，你帶我們去找他出來。」孫先生聽了嚇了一跳，簡直不能說回話，祇是抵賴，但警察更進一步的說：「你帶我們去找他出來，我們是中立國，不能做你們革命的窟窿地。」這樣一來，孫先生更想不出應付的辦法，就帶警察到孫先生在所了。當時機關部許多人都質問孫先生爲什麼面說出孫先生的居所，因爲偵察機關一以確定說我是做偵察的人，什麼事也不曉得，警察也說你回他這事事情不是不發空守場，總之，這樣警察太老練了。

第二天，安南政府請孫先生去，對孫先生說：

「現在別的辦法沒有，我們只有請你離開這裏了！」
「我也曉得你們說得沒有不便，離開就離開罷了！」孫先生說。

「那麼可以變我們的機關報，先到西貢，到了西貢，你要到香港地方都方便的。」
「那幾天，就睡個好覺了。」

在這裏要居一百多天，指揮南廣革命運動河內的機關報，從這裏起，孫先生又被通緝去了！但革命運動是不因連續的遭逢打擊而停頓，每個細胞中都充滿着革命情緒，孫先生決不會因此而表示退却的，他在每一分，每一刻的時間內，永遠的緊張着革命的意識和情緒，因此給袁世凱政府限制了幾天，他的還是在安排着此後革命的計劃。那時越南邊陲可以繼續南進而起的，還是在欽廉一帶，因為王和順在中萬大山，本來預定和廣南革命軍會攻龍州的，但因為路途遠，沒有趕上發動，現在便可以張作士氣再來一下。孫先生和大家經過了幾次磋商，於是決定派克強再到欽廉去收拾餘衆，一面還是聯絡郭人津。此外，雲南的腰驢目上一回來接洽了以後，還沒有什麼動作，應該再去更進一步的活動，便可成事，因此派黃明堂到河口去佈置一切。這樣規劃妥當了，孫先生就留漢民在機關部辦理未了事情，自己又到新加坡，因為那邊有同盟會分會，華僑同志也很多，很可以做發號施令的中心地點。

這是在紀元前五年的冬天，孫先生從安南到了新加坡；這一年內，孫先生從日本到安南，現在更從安南到新加坡，已經三易其地了！在新加坡，仍是住在晚晴園裏。不久，河內同志黃應生和東京同志張繼、林時遠等也都先後來此，把狹小的屋子，都佔滿了，晚上常常二三人共床而睡，但他們並不覺有人滿之患，祇是感覺興奮和熱鬧。後來，孫先生搬到 Orchard Road 111 號去住。孫先生的行裝中，帶着曾經豎立在鎮南關的青天白日旗，和仔褲清單所穿的前後補心等軍衣三四件，這時就拿出來給許多同志觀看，這是很像一個小規模的革命軍戰利品展覽會，許多同志對着這曾經戰地的黨旗，都表示十二分的敬意，對它們作最懇摯的行禮。

孫先生現確的處境，已十分侷促無助了，但更有比中法革命黨河籌約安南人，也擬在孫先生後面起事，同時更牽連到許多中國革命同志，這時逃到新加坡來尋，安南本來是我們的藩屬，一八八九年甲法戰爭的結果

說說法蘭西的共和黨時正當孫先生二十歲，決志革命之年，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他們這二十幾年來，
 也是天天替舊失國的慘痛，圖謀革命復仇。因為受到孫先生在革命運動的影響，更使他們的熱情衝動起來，於
 是秘密地想趁中國革命緊張的時候起事。可見法國人監視得非常嚴厲，使安南人無法動彈。剛逢着我們的黨人
 領袖兩黨撤逃下來，安南人心，經此風潮，更趨趨於激。他們有和我們黨人接近的，就請求要幫助他們，這在
 黨人當然是很同情的。但安南人竟急切地要舉義，同時因為手無寸鐵，就想出了一個妙計：先用砒霜去毒死法
 國軍人，然後奪取他們的軍械來起事。放砒霜的是在法國軍營服務的安南人，桑法兵不留心時，把許多砒霜放
 在餐室中的飲水桶裏。晚餐時，法兵都據案大飲，不一而足， equal 毒；就一個個倒下來，慘哭哀號，先後死去
 六七十人。後來經醫生檢驗食品，才知道是因安南兵所飲的水料含有質量砒質，於是立刻搜查在營中服務的安
 南人，但他們早已逃去。安南政府就一面下令戒嚴，一面大募投捕。在河南機關都下網的我們許多軍人同志，
 因為沒有身執執照，也都給法國警察拘去；先後拘去將近二千多人，並且有送回中國官廳處分的消息。這事情
 鬧得真不小了！孫先生得到這個消息，非僅震驚，即連法政府交涉，證明這許多被囚的人，都是他熱
 衷的中國革命軍人，依照國際公法，這數的人應受第三國的優待，免責款次，法警才同意允許照辦，但必須發
 出法據。孫先生無可如何，於是對這許多同志勸新加坡來居住，第一批先送回百人。可是新加坡總督知道了
 這件事，表示反對。所以輪船二到了，這四百多同志，就停泊在岸。孫先生迫得無辦法，親自去見新加
 坡總督，據理力爭。同時安南總督也來電聲明，說這是中國革命黨，在越南圖亂等語，法國會宜守中立，已
 經與安南國議，應該可以上岸。新加坡總督聽了這話，終於總督總督上岸，但必領用交保手續，由新加坡地方
 法庭去辦理。孫先生見交涉已無成功，非若徒費錢財，總督後來和總督人會議，每人以三百元保出。事前並且替
 他們每人發下龍卷白帆布學生裝，他們出港的這一天，就在市上舉行了。這許多同志，新加坡政府派員多
 人，看見這種情形，驚呼不已。這許多同志出來後，孫先生就進安南在陳楚楠家裏，一切佈置招待，都非尋
 常，此外如林義順、林推遷、林推遷等，對於這件事，也都盡其出力。這許多同志中如周壽和馬佔二人，後

漢口漢陽鐵路總局總辦五百餘名，其種解脫開手與者最多也。不過工省數。推測打這槍聲到後，軍和龍賊
表決陣形起，打不幾槍，就全軍覆沒。其種解脫開手與者最多也。不過工省數。推測打這槍聲到後，軍和龍賊
（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款簽者將被談說。蘇漢運軍另一次演講中，又把這次克強奮鬥的精神，鼓動湖南的同鄉
，他說：「湖南老革命黨最著名者有魏理學，魏理學有一次自安南以款簽起義，當時到款簽來接抗革命黨的首領，
有兩萬多人。黃克強帶的武器僅有兩百支，所有的武器不過兩百枝槍。以那麼少的人和那樣的槍，打兩
個多月仗。到後來彈盡糧絕，遂將安全全拋出。這一次戰事，就是用人去打一百個人。像這
樣的戰鬥，是非常的戰鬥，不可以常理論。轉運件不可以常理論的事，這是你們湖南人做出來的。」（民國十
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對湘軍演說）克強這次在款簽奮鬥的價值，於此可見。林白克贊美克強這時期對於 孫先生
的幫助革命，也說得很透切，他說：

「克強是天生的三個梅領，孫先生也是。但是兩人的心理是不同的：所以天使他們聯合在一起，成
一種替人類建功立業的力量。克強是一個射擊手，單身陷陣，顯他精準之能，在書中殘敵的；
孫先生是一個指揮者，立在高崗上，注意全軍的行動，不是管一槍一砲的動作的。克強刃到近；孫先生
看到遠。克強的手常放在以上，孫先生手常備同敵人決死。孫先生能使更有精神繼續奮鬥，決不輕用武力。
克強只有在戰陣上面見他表現勇氣；打仗對於他像用酒席一樣，敵人的血象紅的醇酒，越吃越足以鼓勵他
的勇氣。」

這幾句話，的確很能認識 孫先生和克強二人的個性。克強的英勇氣概，在革命史上是永遠光耀著的。但
這時因為他轉戰無績，已經歷時四十多天，河內和香港的接濟，非常不便，等到兩廣清軍一齊調動了，到底
是寡不敵衆，加以彈盡糧絕，他知道勢難決勝，於是只得又解散軍隊，退回安南來了。這是很可惜的一回事。
孫先生的革命運動，到這時已是第七次失敗了。

克強在欽州廣州一帶繼續籌款時，孫先生更接到黃明堂等三月廿九日在河內起義的報告。河內是處於

，因為知道他是無用的人，仍報他走了，他的部下，也都誠械。於是河口全境，在二十四小時內，都歸革命軍所掌握。這一戰計奪得槍千餘桿，子彈二十萬發。明堂就用南軍總督的名義，佈告安慶，並派兵保護領事和洋人，送到老衙，秋毫無犯，居民悅服，遠近歸附的，絡繹不絕，不到幾天，革命軍人數竟增加了一千多，聲勢大振。

孫先生在新加坡，接連着得到克強和漢民的捷報，非常興奮。這時明堂既佔有河口，本來應當一鼓作氣，依照原定計劃，於最短期間，分兵四出，攻取蒙自、昆明。那時蒙自的守備非常空虛，並藏有岑春暉的三千桿槍。他們如果乘勝前進，佔領蒙自，就可增加軍械。而且滇越鐵路公司早已由河內機關部接洽妥當，鐵路線可以給革命軍應用，軍用品也可以運送便利，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可是明堂始終遲遲前進，原來他本人並沒有什麼作爲，正如漢民對孫先生報告所說：「他是好像江湖腳色中的宋江一樣，自己本來沒有什麼作爲，不過能開大鍋飯，能養許多的兄弟們。他帶人也沒有紀律，譬如他在抽大煙的時候，底下的小兄弟在旁就說道：『老大哥煙抽得夠了，讓兄弟們也來抽抽吧！』這樣的人，要統率龐大的軍隊，自然不能指揮如意了。不過他在會黨的資格很老，頗得江湖上的人心，做聯絡的工作，是最適宜的。』這一次，他佔領了河口，遲遲前進，大概是他的能力所限的緣故。直到國月五日，才派王和順率領部隊沿滇越鐵路進攻。那時黃元植投降以後，早經勸告在鐵路上的李蘭亭和黃茂蘭兩營反正，李蘭亭並且就於二日晚上親率全營來降，繳槍二百餘桿，子彈三萬發，殺一百餘。黃茂蘭部下的二營，也在王和順的隊伍開到半路時就來歸降了。於是革命軍很順利的直達南溪。這時雲南總督錫良已派開廣誠總兵白金柱帶領兩營清兵趕到八寨來抵抗，八寨距離開化城八十里。和順得報，就分兵襲取古林箐，把白金柱的軍隊牽制住，白軍部下一百多人也都投降了。這時滇越鐵路的南部沿線，差不多全部在革命軍的手中，很可乘勝進克蒙自。但在後方的明堂，因為沒有調度的方法，使餉彈的接濟，失了聯絡，軍事又停頓下來了。另一路關仁甫的部隊四百多人，也在三日開到蠻耗，想從蠻耗到個舊，會合臨安周文群的部隊，進迫蒙自。第二天就遇到清軍管帶柯樹勛所部二百多人，革命軍就迎頭痛擊，到晚上，清軍竟不

孫先生見克強來了，道這過的情形，不是深深地嘆了口氣，但事情到了這樣地步，再沒有挽救的辦法了。這時河口方面的軍事，因為克強走了，弄得更糟，因為軍隊進行一再延遲的結果，便是給清軍一個調度軍隊的機會。這時滿清政府已派劉春霖督辦雲南軍務，未到任前由總兵白金柱暫代，另飭廣西左江龍濟光率領南甯防軍北來前往協助，並派江督端方，鄂督陳夔龍發濟餉款。鶴良也大賣氣力，親自督師臨安，從兩路抄襲，一由蒙自大路，一由開化而南折入蒙自後路，向盤龍岩採取包圍攻勢。在盤龍岩樹助部下投降關仁甫的殘卒，一聽到清軍救兵快要到了，就和柯樹勳裏應外合，突然變變；仁甫無法維持，只得放棄盤龍，退回河口，這是第一非失敗。隔了幾天，清軍愈集愈多，計桂軍三營，川軍一營，黔軍二營，都已陸續開到，聲勢更壯，於是更向王斯顯大營進攻。和順在河口，隔河近頭戰，相持二十天，因為敵勢日漲，而自己軍隊的子彈已經起了恐慌，於是也退下來了，這是第二非失敗。和順到了河口，就和明堂商量，想把全軍開到普洱去，準備以取思牙為根據地，然後徐圖進攻昆明。明堂反對這番提議，約定兩部一同開到巴沙集合。不料這一次明堂忽然緊起來了，他先開到巴沙，沒有等和順部隊開來，又一直前進，在下田房地方，就遇到了敵兵，給他們竹筒一淋，因此仍舊回到河口。和順聽到明堂部隊敗退了，知道移兵思牙的計劃，不能實行，於是也率領部下向河口退來。這時革命軍已割據着各日的形勢，等他們集中河口，想擴大支那的時候，清軍龍濟光、王正廷都派兵已經趕到河口守禦着，兩方戰了幾天，革命軍又退至馬角寨，晚上又輪戰軍偷襲，更不能支持，因此都逃往中法租界。佔領了雲南的革命軍根據地河口，從此也失去了。雲南革命的軍事計劃，到這時也宣告失敗。失敗軍官，孫先生住在河口成立機關部，包圍雲南地黨，到這天河口失敗，已連連六次，孫先生除部下革命歷史計算起來，這一次已是第八次的失敗了。這中間所經歷的艱辛，和孫先生內心的苦悶，決不是筆墨所可形容的，雲南這樣的苦運，八五種或更苦更苦，切切望望必形而論。

孫先生見克強來了，道這過的情形，不是深深地嘆了口氣，但事情到了這樣地步，再沒有挽救的辦法了。這時河口方面的軍事，因為克強走了，弄得更糟，因為軍隊進行一再延遲的結果，便是給清軍一個調度軍隊的機會。這時滿清政府已派劉春霖督辦雲南軍務，未到任前由總兵白金柱暫代，另飭廣西左江龍濟光率領南甯防軍北來前往協助，並派江督端方，鄂督陳夔龍發濟餉款。鶴良也大賣氣力，親自督師臨安，從兩路抄襲，一由蒙自大路，一由開化而南折入蒙自後路，向盤龍岩採取包圍攻勢。在盤龍岩樹助部下投降關仁甫的殘卒，一聽到清軍救兵快要到了，就和柯樹勳裏應外合，突然變變；仁甫無法維持，只得放棄盤龍，退回河口，這是第一非失敗。隔了幾天，清軍愈集愈多，計桂軍三營，川軍一營，黔軍二營，都已陸續開到，聲勢更壯，於是更向王斯顯大營進攻。和順在河口，隔河近頭戰，相持二十天，因為敵勢日漲，而自己軍隊的子彈已經起了恐慌，於是也退下來了，這是第二非失敗。和順到了河口，就和明堂商量，想把全軍開到普洱去，準備以取思牙為根據地，然後徐圖進攻昆明。明堂反對這番提議，約定兩部一同開到巴沙集合。不料這一次明堂忽然緊起來了，他先開到巴沙，沒有等和順部隊開來，又一直前進，在下田房地方，就遇到了敵兵，給他們竹筒一淋，因此仍舊回到河口。和順聽到明堂部隊敗退了，知道移兵思牙的計劃，不能實行，於是也率領部下向河口退來。這時革命軍已割據着各日的形勢，等他們集中河口，想擴大支那的時候，清軍龍濟光、王正廷都派兵已經趕到河口守禦着，兩方戰了幾天，革命軍又退至馬角寨，晚上又輪戰軍偷襲，更不能支持，因此都逃往中法租界。佔領了雲南的革命軍根據地河口，從此也失去了。雲南革命的軍事計劃，到這時也宣告失敗。失敗軍官，孫先生住在河口成立機關部，包圍雲南地黨，到這天河口失敗，已連連六次，孫先生除部下革命歷史計算起來，這一次已是第八次的失敗了。這中間所經歷的艱辛，和孫先生內心的苦悶，決不是筆墨所可形容的，雲南這樣的苦運，八五種或更苦更苦，切切望望必形而論。

第三十六章 革命重心的新加坡

這一次河口失敗以後的情形，確是本糟了！黃明堂等本想假道安南，開往廣西邊境，但許多兵士，拿到了餉的就賭博起來了，有些把餉賣給安南人，軍紀維持不成樣子。法國總督知道這亂子，就嚴重的警告道：「照你們這樣做法，簡直不是擺你們的政府，是要擺我們的安南了。」一面命令他們的警兵勒逼繳械，明堂等當然不能答應，於是竟和法兵開戰起來了。這很奇怪，他們沒有戰勝滿清的軍隊，却把法軍攪得疲於奔命，因為他們原來都是游勇出身，出沒無常，於是把戰線從寶勝、老街，一直延長到太原、左州，使法軍無法兼顧。這樣相持了很久，法國總督無法應付，就請了一個當地土豪出來調解，兩方戰事才算停止，但革命軍的鎗械，到底還是繳下來。餘下二百多人，由安南政府發給旅費，照例的又送到新加坡來。孫先生接到這個報告，知道事情壞了，但依然極力設法安排他們，一面去電安南總督詢問真相，並且說凡是在安南有職業的革命黨人，不應該也當作軍人，一律要他們出境，這總是在防止他們繼續的擾及在安南的其他同志。安南總督就答應道：「這二百多人，是最後一批的人了，以後再不會有了。於是一面向新加坡總督署交涉，要他們仍照上一回交保的手續，使這許多人安全登岸。這一切都辦理妥當，所以這二百多人一到埠頭，孫先生已派人拿價值五萬元的契約作擔保品，將他們照從前一樣的保出。保出了，他們也穿了一式的服裝，列隊遊行，興高采烈，慷慨激昂，幾乎忘掉這裏是八家的殖民地。孫先生又因為上一回送來的四百人，已經把陳楚楠的住宅佔滿了，於是又借了振南街張振東的二間房子，編為第二宿舍。從這時起，這六百多人的每天伙食和其他費用，數目是很大的，都由各華僑同志分擔，孫先生雖劃分配，也非常辛苦。不久，漢民也從安南秘密地離開而到新加坡來了，克強却早已到日本去了。漢民來後，孫先生就得了個助手。後來孫先生因為這六百多人，坐食無事，而許多華僑同志的負擔已經很重，這不是長久之計。因此和張永福商量，集資三千元，利用他裝厝港一千畝的山地，開辦一個中興石山公司，以便容納這許多同志。一面派漢民到各地去勸募股本，一面派張永福和林

義順極端籌備。永福深恐緩不濟急，竟非帶備極端籌備先發出此本他既籌備，就是這準備的進行，則則勝利了。

我們如果把 孫先生的歷史，劃分時代起來，從紀元前五年到四年（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是革命運動最艱苦的時期，如黃岡起義到鎮南關佔領，孫先生沒有一天不是在艱苦的生活中，四面八方愁悶悶着，使他無一線曙光可見。但從鎮南關失敗出來，一直到現在，孫先生的革命生活，更陷入苦悶的境地了，因為幾年來慘澹經營的最便利的根據地，既然完全失去，又非短期內所能恢復的，同時更因實際運動的進展而引起的黨務糾紛和反對派的進逼，也在這時期開展起來，更使 孫先生苦於應付，要不是像他那樣具有沉毅的魄力，堅定的意志，準確的識見，恐怕早就灰心了！現在我們把這時期 孫先生所遭逢的事實，分幾方面來說：

我們首先要說的就是前年 孫先生離開東京時所引起的糾紛，到這時章炳麟等又揚起已熄的殘灰，燃燒起來了；東京同志間的笑話也很多，像汪公權離職歸方賄賂，充作滿清政府的偵探，陷害同志張恭、陳賡怡等，因此給王金發在上海把他鎗殺。劉光漢也向總方自首，並想暗殺 孫先生和其他同志來立功。章炳麟並沒有跑到滿清政府，但也托劉光漢向總方要求二萬元準備回印度去。可是他們兩人不多時又發生意見，劉光漢就把章炳麟這種秘密向克強等宣佈了，這樣兒戲似的鬧得很久。但章炳麟一方面還是想把民報當他的萬世一系，這時候，忽然派陶成章到新加坡來向 孫先生要求撥款三千元爲印刷費，並要求增加維持費。孫先生正忙着招呼鎮南關和河口失敗退來的六百多同志，天天在籌款，天天在困難中，那裏還有方法來張羅這樣一筆巨款？在這焦急中，只得把自己的手錶和其他東西，要成章去變賣，以救燃眉之急。但是 孫先生這樣的苦心，竟不能獲得成章的諒解。他原是光復會的重要份子，到這時就拋棄了同盟會的面目，在南洋掛起了光復會的招牌，把同盟會的同志如許雪秋、陳若生等都拉了進去。章炳麟在東京，不待說，當然要反對 孫先生了。這時民報因爲發表了一篇反對滿清政府的聯美政策的文章，給清使館要求日本政府把它封閉，還說改革會有力的預備，要在二十四期以後暫停停版了！

東京時報刊了，孫先生革命的宣傳上，祇是失了一個機關，因為這時新加坡的中興日報，已經很有基礎，很可代替民報鼓吹革命了。這中興日報是孫年（孫君）在廣州時新加坡陳永福、梅義廣等籌設創辦的，出版時孫先生適在安南，但一切進行辦法，也有很多指導。不久，民報社的同志都因停辦而到新加坡來，於是都加入中興日報工作，革命的決心，就漸漸地有移向新加坡來的趨勢。然而，另一方面反對黨的進逼革命黨，也移轉鋒芒到這裏來了。那時新加坡中興日報對立的還有安南南洋總匯報。這報紙最初也是由林義順等創立的，但會一度停辦。現在許雪秋等因貧困咸章的煽惑，反對同盟會，竟喪心瘋狂而又約了保皇黨劉朱子佩來加股合辦，於是原有舊的門徒聚集中，徐勳、伍憲子、袁善民、陳有叔等都陸續來了，現將這報紙，向孫先生一派的革命黨大鼓攻擊，變成了純粹的保皇黨的機關報，兩方面鬥爭的情形，和當年東京民報與橫濱新報的筆戰，有同樣的熱鬧。

我們從過去事實中可以看出革命派與保皇黨理論上的鬥爭，革命派因為立場的穩定，總是獲得最後勝利的。過去，新民報報何民報執權的，是承認清廷就是中國政府，所以非難種族革命，承認中國人民沒有政治能力，所以反對民權的政治革命，但這些論點，都經民報嚴厲駁斥無完時，他們早已沒有答覆的餘地了。現在他們就掉轉方向，集中在中國革命可以召瓜分的問題，大發議論，想從國際方面來說明中國革命的危機，於是這一次新加坡空襲的陣綫，就依着這目標而開展了。關於這問題，孫先生前年（甲辰年）一九〇四年）在美國時，早有一篇中國問題之真解決，說得非常透切，精確和淺顯在民報上也根據了這個論點，做過很長的文章，向保皇黨和一般國民解釋。然而已成破釜之末的保皇黨，為要支撐門面，還是把這個問題來弄難革命黨。這是大巧了，在保皇黨正得勁的馬中國革命可以引起瓜分大禍的時候，素稱近東病夫的土耳其也掀起了革命的風潮。這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以安弗爾（Anver）為領袖的少年土耳其黨（Young Turk Party）在陸薩尼加（Gallipoli）起事，廢黜土皇亞伯都哈密德第二（Abdul Hamid II）而奪取政權，並且進而欲收回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所決定的波斯尼亞（Bosnia）奧黑爾哥羅那（Mitrovina）二州的主權，同時，在塞爾維亞國角逐下的非

這說，人類與今天，決不是由於天活而得來的。最後，孫先生又說：

「時勢者，人事變遷之總名，而名曰：Circumstance 日本人譯之為運之說狀，而向蘇則曰：Necessity，二者固截然不同也。平實又引赫胥黎之天演論以自飾，……而不知天演二學之原文為 Evolution，此字有數義，兵式操演之演，亦名曰 Evolution。譯者乃海軍學生出身，（按指嚴復）慣於操演之事，先入為主，故譯 Evolution 為天演。而不實今欲文其錯，並加以天演自然四字為一名辭，以辯其人事與天然為不錯，其實 Evolution 在赫胥黎之書，應譯為進化乃合，譯為天演則不合；以進化一學，有天然進化，人事進化之別也，若曰天然天演，人事天演，則不合也；因人事進化與天然進化，有相因的，亦有相反也。……」

這樣論辯，好像和革命理論的本身，沒有什麼關係，其實也可看出兩派立脚點不同的所在：孫先生一種勇往邁進的精神，不安於命定而富於創造性的氣魄，很明顯的活躍於字裏行間。然而，保皇派竟誤解了天演學說，希冀由其渺的主宰去支配他們的命運，這是多麼僵法而缺乏革命性，當然要處處和革命黨衝突了。因此，孫先生這樣的教訓了他們一頓，竟引起了他們老羞成怒，拋棄了紳士的面目，在報章上破口罵孫先生是海盜。這是太侮辱了！同時也顯出他們的窮途極相，因為理論上的失敗，而出之於無理的咒罵，真是無聊極了。孫先生為要保全自己的尊嚴，非常氣憤，親到亞命及忌烈希律師事務所，延請鵝安氏律師，向法院起訴，要索賠償名譽損失。保皇報知道了很害怕，立刻派人向孫先生道歉，孫先生本來包容大度，目的是在要借這偏袒，來減殺保皇報的氣焰，現在他們自知理屈，也就不再追究了。許多同志，看見孫先生有這樣大度的態度，都非常感動。

孫先生這時除在中興日報宣傳革命主義外，更為準備的青年學生專門辦了一種馬來音日報，叫做 Chaha

Mata Hari 孫先生親為其名曰揭明日報，派為提摩太主持報務。因為那時的華僑學生，認識本國字的很少，這種特殊報紙的發行，是極需要的。出版後，銷場很廣，青年華僑信仰革命主義的，日見增多；此後他們

對於國內一切改革運動贊助的熱忱，都是受了這報紙的影響。這也是孫先生一種苦心孤詣的表示。

孫先生在星加坡這樣的努力宣傳，努力聯絡，本嫌根可以促進革命的運動。但保皇派的活動不停止，以及由同盟會退出來的老復會一派的搗亂不消滅，處處可以牽制孫先生一切工作的進行，這是很可憂慮的。因此孫先生力排萬難，振起了革命的精神，除了文字的宣傳外，更努力於黨的組織工作，把新加坡同盟會分會，擴充而為南洋支部，使各埠分會都受支部管轄，以便指揮一切，派漢民為支部部長，積極進行。孫先生自己親身到各埠去聯絡華僑，籌劃款項。計自十一月二日從新加坡出發到芙蓉(Sembi Lan)，吉隆坡(Kuala Lumpur)，巴羅，更由巴羅到庇能(Penang)所到的地方，華僑同志，都非常歡迎，但他們的團體組織，却都十分散漫，於是孫先生不憚煩瑣，都一一加以指導，因此華僑傾向革命黨的，如風起雲湧。各埠分會組織，也日見嚴密。

十二月，又偕漢民、毅生、何克夫等數人到暹羅去，引起了幾百華僑的熱烈歡迎，在中華會所開歡迎大會，孫先生演說革命主義，非常熱鬧。但第二天安南政府就出來干涉，限孫先生一星期內出境，並在此時期，不許再談政治問題。原來安南政府還沒有忘掉去年的事情，他們依然不許孫先生在他們的境內活動。駐暹美國公使對於這件事，却很為孫先生抱不平，他仗義和當地官廳交涉，於是孫先生的居留時間延長了幾天，因此得以秘密的組織同盟會分會，然後仍安然的回到新加坡。

這次孫先生手訂南洋支部的辦法，有很多特殊的地方，也可看出這時革命黨組織進步的趨勢；第一是同志聯絡的嚴密，如通信辦法的規定：一、各團體至少每二個月互相通信一次；二、各團體通訊地址有更換時，須即通知南洋支部；三、以後如續有新立團體，即由南洋支部發信通知，各處接信後，即向新立的團體道賀，並且加以勉勵。孫先生更在這通告後面加着這樣幾句道：「以上三條，望留心照辦，以團結同志之精神，廣通各處之情誼，是所至囑。」可見這辦法的重要了。第二是用軍隊編制來組織同志：以八人為一排，內舉排長一人，共八人；以三排為一列，外自舉列長一人，共二十五人；以四列為一隊，外自舉隊長一人。共一百零一

入。以明隊為百餘人，界百餘營長二人，兵四百零五人。以各列兵、隊長、營長等人員為營長之代表人。孫先生在這傳上也說明這個辦法的重要在及謀效用。為注意，組織實業為營長，列為非一條，為極緊要，有此則會員必憤憤，乃能密切，團結乃能堅固，不致如散沙。會中有事，由職員傳佈於各營長或各隊長，各營傳於其所屬之隊長或列長，則一人不通，報固與知，則列長不過報三個排長；排長則報七人知，如此上天易做。若收月費，收會費，會員交於排長，排長交列長，不列交與理財員，亦事值而致大也。若不行此法，則每日每人多至一千或數千，則無人能通，會員，而分會機關之職員，亦無從通知各人之住址行蹤也。故必當設法列，一則長其其所交好之七人不為難，二則長設三個排長職員，由這而隊而列，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節節腦筋相連，這話也。這新穎而靈妙的辦法，在德和親往的區分部，越黨部，縣黨部和省黨部中間的連繫和指揮，有同樣的妙用，這不過揭那辭是一種極的組織，還沒有用到總的方面求能了，然即孫先生這時對於黨的組織的注重，也可想見一斑了。

孫先生這時在新加坡活動，滿清政府非常注意，密令粵督張人駿派人到新加坡來，企圖暗殺孫先生。這刺客就在胡德律一一一號，附近橋坊（雲史）家內，天天偵察。孫先生的行動，準備下手。楊折是滿清政府駐新的副領事，他和陳楚楠、張永福以及中與前報編輯田桐、梓琴等都很熟悉。他知道滿清政府對於滿清政府這個陰謀，很不贊成，因此密告田桐，請孫先生預為防備，並且回這個刺客說，明種種利害，刺客大為感動，竟放棄原案計劃，掉頭而去。孫先生從此安然無事。

我們對於孫先生這時期的活動，已經說得很多了，但革命的進行，是走曲線的，我們在這裏決不能把孫先生這時期的活動，描寫得機械發現。那時，同盟會的會務，雖是漸漸地發展，但陶成章等的光復會勢力依然布於蘇屬東印度一帶，當時孫先生派汪精衛、杜亞泉等到文島（即日島也）去籌款時，就舉動於中，百般破壞，使精衛毫無功而回。他那時是血氣方剛，思想純樸的青年，受了這股電的打擊，氣憤極了，就決心要去擊打滿清政府的重慶，以謀此舉。於是請着孫先生，說病的回到香港。孫先生知道了，就向他苦勸，要

得成威全團體，做一個振興破敗的大鏡。萬不可就做一塵悲壯的鬼鏡。克強這時期到新加坡，知道精衛有兩個計劃，也和孫先生同名去勸陳。陳氏也還不肯贊成他這種辦法。後來孫先生又去電香港，自由要他假精衛的辦法到後，竟把精衛留。但精衛的決心已下了，勢難挽回，他到了香港，知道要給許多同志所阻止，於是就秘密的到日本去，準備實行暗殺滿清政府的重要人物。一年以後，他就造了一件轟轟烈烈的謀刺袁世凱大案，這也是由於這時期探探的經過而發生的。

總之，從河口失敗以後，袁世凱革命運動已經沉寂下去了，然而孫先生在南洋所活動的，沒有一時一刻不想在復革命軍的起義，同時，國道活動而避逃的種種困苦，也決不是一般人所能知道的。那時可以給孫先生多少安慰的，就是這一年清帝后崩繼死亡，新加坡酒類學通告各商店休業一天，以誌哀感，革命黨員所開設的商店，却都一笑置之。沒有理會。孫先生因此賭運年額，大起搖動，造成兩黨黨衝突的專怪。新加坡因或可無法應付了。孫先生以中國革命黨領袖名義，張貼告示，制止黨人。孫先生在旅途中，在一封給郵局如等的信，說到這件事：

「（此）亦一奇事，想保黨及諸奴兒之，轉為駭然。英政府既認弟為有在星管束團體之力，則吾人勢力多有可藉此而謀擴充者，請行勿勿，未及發揮，豈可將來利用耳。」

這確是兩黨史上未有的奇例，也是孫先生在這時期中的二件奇事。

在清帝后死亡的喪禮期中，國內為丁爾復舉行的運動，是一幕壯烈的悲劇。孫先生以兩黨學識於女座，一母道，一黨道，嚴厲等以過激黨派於運動中，時時等情都集結的失敗。兩黨運動，打了一場運動的取命空戰。我們相信，這兩件事，給孫先生也有不少與奮。

第三十七章 內 閣

紀元前三年己酉（一九〇九年）三月十七日 孫先生寫信給譚如、心持、赤覽三同志說：

「弟定於十九號離星往歐洲一遊，此行以對歐外交爲兩大注重問題，英法荷等國各種外交，俱必於彼祖國政府運動，方能得力。至於財政問題，即前日借款要件，前途僅往共商，爲日已久，不能復緩也。弟行後，仍望公等以熱力鼓吹同志，增進團體爲一日千里之象。南洋支那弟託訪漢民君料理，各事均可如常通知商辦。……」

我們從這信裏可以知道 孫先生快要離開新加坡到歐洲去了。孫先生這次重遊歐洲的任務，在信上已經隱約的說出。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知道這次 孫先生離去新加坡有幾種重要原因：第一是受了河口敗兵的痛擊。河口和鎮南關退來的軍人，份子本來是很複雜的，孫先生爲使他們安心的居留和解決生活問題起見，派永福、義順等親辦石山公司，把他們都收容了進去，此外，又介紹到吉隆坡、怡保、吡叻、文島各埠礦山，工廠，或農場去做工，使各安生業。但有一部份人，還是常常妨害地方治安，後來竟因搶掠嫌疑案，給新加坡警察拘去了二十一人，並且還牽連到和 孫先生早年相共的尤烈，他這時正在做醫生，經 孫先生多方設法，才得釋放。但清領事館就借題發揮，要求英國人趁此干涉革命運動，於是 孫先生的活動，受了很大阻礙，後來竟因此把南洋支部，遷到底館去；第二，這時 孫先生一面注重黨務，一面還是不忘情於軍事的運動，河內方面有一部份軍火，可以買到，祇須對經手的法國洋行付第一批款一千五百元，同時在法國可以借到一千萬元。但這借款問題，必須 孫先生親到法國去商量，就像信上所說的。第三，南洋事實上已成爲中國革命的重心地，但許多殖民地政府，對於革命黨的活動，常常加以干涉；他們這種政策，當然一乘其祖國政府的命令，所以 孫先生爲要黨人在海外活動便利起見，必須親自到各國去做一番外交的工作，這也是 孫先生決心離開新加

被的重要原因。

這是我們可以想像的，一箇抱有偉大雄辯的革命領袖，決不會永遠的蟄居在一箇地方，何況更具備這許多複雜的重要原因，所以孫先生又毅然要到歐洲去了。

在孫先生未去前，關於新加坡方面的事情，除支部已派漢民維持外，還有最使他不能放心而必須安插好的，就是中興日報。因為那時中興日報雖是在文字上和保皇黨爭戰的結果，獲得大多數華僑的同情，因此銷路日廣，但事實上，它也不啻成爲國內同志亡命的藏身地，像關仁甫等從河口失敗後，都來寄寓，所以開支很大，幾乎有不能維持的趨勢，張永福因此不肯負責。孫先生恐怕自己走了，這報紙也隨着關門，所以預先規劃了一個妥善辦法，一面派林義順繼續負責，一面改組爲股份公司，向新加坡政府去註冊，使報館基礎，可以確立。同時，又把股票向華僑推銷，以募集現金，充實資本。孫先生維護革命宣傳機關的苦心，真是無微不至了。

這些事情得了相當的解決辦法。孫先生原定三月十九日走的，現在是可以動身了，然而，革命領袖本來是常在窮困中過生活的，他怎樣會有一筆閒着的款子，來等待着旅行時的使用？孫先生那時原定等待暹羅同志的匯款到後，才能動身，但承任款子的那位同志，因爲經營的米穀生意，忽然失敗了，一下子不能把款子送來，這就延擱了孫先生的行期。後來孫先生又派漢民到仰光去籌劃。但這時和熊成基在安徽起事的洪承點等，因爲失敗了，也來找孫先生，孫先生爲要招呼他們，開支更龐大起來，幾乎到絕糧的境地，這樣一來，更使孫先生不能馬上動身了。

直到五月十九日，他才動身到歐洲去。

孫先生一到歐洲，就在法蘭斯開始關於借款的活動。這次借款，本來是由前安南總督賴美的介紹，和一個資本家接洽。這資本家投資，應當先得政府的許可，他原以爲着前總督賴美（Christophean）一定會同意的，所以早已和孫先生商議條件。可是不幸當孫先生到法蘭斯時，法蘭斯內閣突然改組，內閣總理已換了白里安

種種計畫，目的是在誹謗孫先生，破壞中國革命的勢力，應該一致反對。因此不多時，許多同志都明白他們的毒計，甚至有人說炳燾是瘋癲，是神經病。對於孫先生的人格，卻獲得更堅確的信仰，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孫先生的光明偉大，愈歷挫折愈能發現，在這大事業中更顯明了。

孫先生寫給吳給稚暉的信，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我們摘錄在下面：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獲利爲言。而不知我之經營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時固無留學生爲我吹噓也。而乙未廣州之舉失敗，中國舉國之人，無不以我爲大逆不道，爲亂臣賊子，爲匪徒悍盜；當時，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辭也。今日風氣漸開，學界之士，以革命爲大光榮之事業，而陶輩始妒人之得名。然我之初意，祇在赴大義，行宗旨，而與共事之同志，亦無不如此，不期今日乃有以名而始談革命者，此故固屬風氣之開，而亦道德之退化也。」

「以我爲獲利，而不知我於未革命以前，在社會上所處之經濟界中，固優勝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則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圖之快樂，我無不得之，革命獲利云胡哉？且當日圖廣州之革命，以資財贊助者，固無幾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資數千，檀香山人出資數千，合共不過萬餘耳。而數年之經營，數省之聯絡，及於羊城失事時，所發現之寶跡，已非萬金所能辦者也，則人人皆知也。其餘之財，何自來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經營接濟，所費不下十餘萬元，所得助者，祇香港李君出二萬餘元，及一日本義俠出五千元，其餘則我一人之籌獲而來也。自此吾一人之財力已盡，而緩急皆賴家兄之接濟，而妻子俯仰，亦家兄任之。是從事革命十餘年以來，所費資財，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國久及日本人之助者，前後統共不過四五萬元耳。若謂我以十餘年之時間，而借革命以擷取他人國五萬之資，則我前此以賣藥行醫，每舉所得亦不止萬餘元，此樹博學人人所共知共見也，而其德之專業投機取利者，猶過於此也。若爲圖利計，我豈肯樂於革命而致失我謀生之地位，未幾盡有之資財，折我兄已立之優厚耶？（兩年前家兄在檀已報窮破產，其更樂以資助革命運動之用，揮霍已盡，則以乾產作抵借資，測期無償，爲債主拍賣其業。今遷居香港，

寄人籬下，以耕種爲活。而近因租價未完，又將爲地主所逐。乃陶更隱以在九龍建洋樓，夫妻兄弟爲地主，實業家者，非戰艦軍革命以耗析之。則建洋樓，亦尋常事，陶等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從事革命事業，關於一人得失之結果也。

「自庚子以後，中國內外人心思想日開，革命風潮日漲，忽而萍鄉之舉起，人心大爲歡迎。時我在日本，財力甚豐，頃刻不離，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許助五萬金，始從粵派人進遷鄂湘消息，而萍鄉軍已以無糧而散矣。此不過乘一傳言之變而起，初未謀定而動，故勳，他方同志多不及助，是以不交也。……自潮州、惠州、欽廉、鎮南、河口五省五路起而各費，統共所用將近二十萬元。此款則半爲南洋各地同志所出，爲革命軍初次向南洋籌款者。今計財：由潮州同荷屬所籌者約三萬餘元；向英屬所籌者萬餘元，共約四萬元，向安南東京及暹羅籌者約五六萬元。我手得於上述之兩處五萬元，得於日本人萬四千元，河內欠債萬餘元，此各項之開支，皆有數目，皆有經手，除梁秀春自行騙去五千，及累去船棧費數萬，又一人騙去千餘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錢，皆無耗枉費，自我一人於此兩年之內，除住食旅費之外，幾無一錢之花費，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見也。而此時對之同，或名下之錢，撥於公用者一萬四千元，家人衣食及首飾之撥入公用者，亦千數百元。此我獲利之實跡，固可昭示於天下也。」

我們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孫先生偉大的光明磊落的態度，同時爲了革命而犧牲個人的利益，家屬的利益，這就犧牲而犧牲，也是足以照耀千古的。所以章陶的誹謗，結果並沒有損害孫先生毫末，卻反映出他們的私心，和破壞革命而惡毒陰謀。但章炳麟毫無悔禍之心，他依然在東京狂言攻擊，孫先生知道章炳麟蓄心破壞革命，已無悔地可留，不得已，把某同志所寫的煩瑣與劉光漢同謀通奸的筆跡，在各報發表，以證明炳麟之非。那時孫先生又寫信告訴種種說：「際此胡氛黑暗，黨有內鬪，誠爲至艱苦之時代，即爲我人當努力進取之時代也。倘有少數人毅力不屈，奮勇向前支撐，行通此厄運，則以後必有反動之佳境來也。靜觀美國華僑之決心，自保無瓦解，大有趨向革命之勢；惟所阻礙者即各埠先覺之士，皆受陶誣，一時不免疑竇，故不能驟

得彼等之協助耳。彼此惡潮一過，則人心必能再合，此邦尚有華僑六七萬人，可引導而從革命者，當有一半，於此亦不無可爲也。……爲今之計，欲從新以蓄養革命黨之勢力，舍此必無他法矣。」

孫先生對這次內閣起潮的悲痛，從這幾句話中，可以想像得知。因此革命黨人一面感動着 孫先生的偉大人格，一面憂慮革命前途的危機，從此激起了更壯烈的革命運動。

第三十八章 革命運動的復興

從紀元前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年）到紀元前三年己酉（一九〇九年）一年中，在革命黨方面，因爲幾年來的挫折，和內部的糾紛，表面上的活躍是沉寂了。同時，在滿清政府方面，僞立憲的進行，並不因帝后廢弒而中止，保皇黨也已經一變而爲立憲黨。如政聞社之類，結合國內氣味相投的人，要求滿清政府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滿清政府也爲了緩和革命空氣，從空洞的預備立憲，而有戊申年八月二十七日憲法大綱的頒佈。立憲黨人大家都復興高采烈的組織議會，請願同志會，奔走呼號，似乎都已感領偉大的革命風潮立刻就要爆發，所以兼啓超很得意的說：「數年前革命之說徧天下，自預備立憲之詔既頒，乃如湯沃雪。夫一詔則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則民氣不期而自騰也。」（國風報梁啓超爲國會問題敬告政府諸公）孫先生就在這所謂如湯沃雪的時期中，奔走於南洋、歐洲、美洲，度着最艱辛的「國生涯」。但這種平靖，僅僅是表面的。孫先生雖是遠處海外，內地的革命佈置，還是繼續的進行，孫先生的同志仍然努力的秉承了命令，毫不鬆懈的奮鬥前進。因此在 孫先生到美洲後不久，廣州新軍起義的消息就傳來了，接着更有精衛、黃復生謀刺袁世凱的壯舉，革命的聲勢，從此格外的張大，造成了空前的偉業。我們應該把這時期的孫先生的革命運動復興的時期，現在先把廣州新軍起義的經過，說一個大概。）

廣州新軍的聯絡，是遠在孫先生離去新加坡的那年。因為許多同志鑑於過去黃埔黨、生粉黨的失敗，是在兩黨混合的革命軍，太缺乏訓練，所以佔據了總盤，經不起敵人的攻打，就不能固守而潰散。因此大家專注意於新軍的聯絡，因為新軍不特有訓練，有事議，並且他們的救國思想，也並非會黨游勇所可比擬，要他們做革命軍的主力，當然更堅實而有力。孫先生也非常贊成這個提議，所以漢民、克強在孫先生遊歐美期間，就積極進行廣州新軍的聯絡工作，不久他們就在香港設立南方統籌機關，派張谷山、胡毅生等到廣州新軍營中去活動。新軍同志姚雨平、張葉村、劉古香等，早具革命思想，曾經分途運動陸軍學兵營，和陸軍速成學堂的學生，很有成效，尤其是陸軍速成學堂的學生，最爲活動，因此給學校當局把姚、張、劉等開除了。但他們並不因此畏縮，在廣州更秘密的集合了朱執信、張伯倫、鄒魯、姚登樓、吳雨倉等聯絡進行。同時新軍方面的革命種子早已根深蒂固的確立了，各防營官長，都是由陸軍速成學堂第一二班，及虎門講武堂畢業的充任；新軍頭目，是由學兵營畢業的充任，他們都曾經過姚、張、劉等黨人的宣傳，所以都抱有革命思想。更巧的，當時粵吏又設立機範學兵營，在惠州、嘉應州和北江方面，廣徵新兵，黨人認爲絕好機會，於是有很多人屈身應徵，畢業以後，都充作新軍排長。這樣，新軍上下差不多都有黨人和表同情於革命黨的份子散佈了。加着趙聲這時剛調任新軍標統，更從酒攤倡，於是新軍的革命思想，愈見有蓬蓬勃勃的氣概了。

香港機關部看到新軍的聯絡，已經很成熟，於是決定準備起義。這一次起義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倪啟典，他原名秉章，因為和熊成基在安慶起事失敗，才化名逃到廣州來。機關部同志因為他熱心勇敢，堅忍誠實，就委以運動新軍之責，由趙聲從中主持一切。東江、西江、湘梅等處，則有雨平、葉村及陳炳煥負責進行。姚典革命精神，甚和衆贊賞，力薦趙、莫紀彭、黃俠毅等，在廣州城內天寶里、寄園、清亦源、和南關水邊坊、高第街等處，設立機關，新軍加緊的很多。同時較生、韓信運動兩番各屬民軍，也已經成熟。葉先生在廣州籌備的份子，也由趙聲派到香港。於是決定紀元前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年）五月上旬起義。

這一次久捲後的革命運動，經過長期的籌備，本來便可以大規模的起事。但不料在十二月，各目兵加緊的籌畫，給一標三營隊官羅爾廣擊到了，他就報告協統張齊培，齊培又報告到廣東總督莫榮新，這就把事情弄壞了。因為他們幾營軍中有革命黨，非常危險，於是用火底抽油計，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秘密地把總督子彈都送到齊培及齊去。莫莫知道事勢不佳，便籌商如何，祇有等待機警開機後，再定辦法。

可是事勢的變遷，比來因此而止，在子彈運去後的第二天，就是十二月三十日，這一天晚上，有二標新軍五六人，爲了一件小事和巡警衝突，結果雙方毆打起來，巡警把新軍拘去了二人，於是激起了新軍的憤怒，第二天庚戌正月初一日，各持木棒，把第五警局都打毀了，並且打傷巡警很多，以報復昨天的恥辱。袁樹勳恐怕事情擴大，立刻下令把大東門，小東門關起來，一面派兵彈壓，這風潮才算平靜下去。然而革命的熱潮，却就借着這原因而爆發起來了。

這次鬧事的，祇是第二標，其餘第一第三標，還沒有預聞。那時廣州新軍共分三標，第一二標駐燕塘，第三標駐北校場。第一標共有步兵三營，砲兵二營，輔重及工程各一營，每營三百餘人，步兵營兵紮一處，好像一個品字形，砲工輔則紮一處，但各營的距離都不十分遠。這已經過了一種四年訓練，紀律極嚴，但黨人最多。協統齊培及總統劉雨沛因爲前次親視革命黨盟誓，早有戒心，現在又看見軍營交關，深怕鬧出亂子，因此把初二初三兩日假期，改爲運動會，這是他們的深謀遠慮。但到了初二這一天，兵士還是請求放假，沒有得到允許，就喧鬧起來，步兵二百餘人都擁擁出營，各官長無法制止。他們出去了不到幾分鐘，又奔回來大嚷大鬧的說：「警兵大隊來攻營了，我們應該出來抵抗！」這個非常的警報，把全營都驚動了，於是大家都聚起來，到軍械房去拿軍械。雨沛急得極力阻止，並且說這是撒謊，沒有這回事。但是沒有方法可以阻住他們。齊培急得從後門逃走，坐了馬車進城。雨沛還想阻止，結果在騷動中，撞傷了頭部，就不敢再出來了。各兵把軍械拿出了以後，因爲板機和子彈都已經搬去，於是都到砲工輔各營去尋覓軍械；在路上，看見各營正把板機用馬車運到城裏去，就截住奪去，分向各營運。又分一隊到北校場，佔領砲局後小山和橫枝黃等處。

「你不是由某某介紹入革命黨的嗎？現在跟大隊人馬來，爲什麼不乘機離呢？」

「我立刻回去報告，請他們一齊歸附好了。」李景濂狡詐的回答。

李景濂急濺回來了，就聽取他的報告，但李景濂却這樣的報告道：

「誰說這一個是新軍精華，其實指揮帶兵的都是革命黨人，現在聲勢浩大的來進攻省城，他們的目標，一定是很大的，我們不能小視他們，應該立刻把他們勸滅才是。」

這個斬釘截鐵的報告，更使李準作戰的心堅決起來，於是立刻派吳宗禹率所部滿佈牛王廟、貓兒岡、三陂一帶，以步隊在前面遮蔽着，砲隊藏在後面，一時槍砲齊發，這無計劃的新軍，雖是奮勇前進，但到底不能抵禦清軍的大砲，映典就是做了第一砲的犧牲者。因此新軍喪失了主腦，更紛亂的不堪一戰。相持數小時，彈盡無援，傷亡枕藉，祇得退回燕塘。

清軍又乘勝追到沙河，到晚上吳宗禹就率所部駐紮在那邊。新軍同志王占魁還是想絕處逢生，化裝到吳軍營中去偵探，並且乘機運動各軍反正。但是結果給他們察破了，就被擄斬首。後來新軍一標步隊營忽然起火，新軍就用聲東擊西的方法，向吳軍進撲，然而經不起吳軍的反攻，又潰敗了。初四日，新軍已潰不成軍了，奔向石牌、東圃、白雲山一帶退守，清軍又四出搜剿，這天午刻，更把一標內二營燒去，使新軍無法設匿，這真是慘無人道了，於是籌劃很久的新軍起義，到這時又完全失敗了！

廣州新軍的失敗在孫先生革命運動中算是第九次了。發動消息傳來的時候，正當孫先生到三藩市的一星期後。孫先生很興奮的繼續募款，因為欲各屬會黨同時響應，非有充分的款子不可，但當時波士頓方面預定的款子，遲遲不來，使孫先生非常焦急。到十三日，失敗的報告來了，孫先生覺得很痛惜，因為這次籌款，所差的只有五千元，要是把這五千元匯去，使東江、西江、湖梅、南番、各屬的會黨起而響應，也許有些辦法，祇少不至於這樣很快的失敗。這是當時孫先生還在美洲的想法，還沒有知道這一回失敗的根本原因。

是在幾個新軍爲了一件小事情所激起的，以後幾種新的計劃的起事，當然一切沒有方法得繼續的應付，而歸于失敗了。

但是對於革命抱樂觀態度的孫先生，始終是認爲前途有希望的，有把握的。當接到新軍失敗的報告後，知道失敗的祇是第一標，其餘二標三標還是安然無恙，將來一定能夠有捲土重來的機會，因此還是積極的宣傳和籌款。美洲僑胞也都非常興奮，在孫先生領導之下，奮鬥前進。當時由李綺庭等組織宣傳隊，李是男、李相眉等創立革命學校，機關報的鼓吹，也更見活躍，於是革命思想，傳遍了美洲的僑胞。三藩市同志也於三月廿日成立同盟會分會，並就在這天舉行廣州新軍追悼會，這也是一個很有意味的舉動，使每個同志都留下一個極深刻的印象。明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美洲華僑協助餉的特別踴躍，其實就是這時孫先生預先活動的二個成績的表現。

孫先生在這期間，爲要繼續新軍起義，積極籌款起見，曾經想過一個很巧妙的經商計劃，就是欲把馬來半島華僑所產的錫，向美國各大市場傾銷。因爲南洋的錫向來是由倫敦商人包辦的，美國是最需要錫的市場，如果由華僑直接販運美國，在買主可以省去一筆經紀的費用，在華僑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這是一舉數得的辦法。孫先生把這個計劃告訴南洋同志鄭澤如，請他協助，想自己在美洲因爲經商的關係，可以多逗留一些時候，一面聯絡同志，一面憑藉這個企業來籌款。但一個不尋常的報告又傳來了！就是三月七日精衛在北京失事的消息。

精衛這個短兵突擊的計劃，早已蓄之有素，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他自前年到日本，就與黃復生、喻培倫、曾醒、方君瑛、陳璧君等組織一小暗殺團，秘密的試驗炸彈。同時又把民報恢復出版，却因此引起章炳麟、補成章的格外反對，並且誹謗及於孫先生，這是使他更痛心的一點。他爲了籌劃暗殺工作，曾經秘密的往來於香港日本，但始終沒有與同志通信，這是他的苦心孤詣，想避免同志的勸阻，和外界的洩漏消息。但反對派却藉此造謠了，說他已和孫先生分道揚鑣了。因此他更堅決的要實現他的抱負。廣州新軍起義以前，香港機

「那同志本來公推他留駐襄辦一切，但他已經和黃復生等約定要到北京實行他們的計劃，所以沒有答應，並且悄悄地到了北京。這是去年年底的事情。孫先生爲了他這行動，已經勸過好幾回，要他爲了維持團體，暫時不要進行這件事，他也沒有回答，直到這次出發北上了，才寫了幾封信，一封給黃復生，並附有致南洋同志書，要他等事情發生了，才發表在新加坡中興報；一封就是給孫先生，把他因憤於黨內糾紛，而欲以革命事實表現的心理，說得很懇切，他說：

「蓋此時團體潰裂已甚，維持之法，非口舌所以彌縫，非手段足以挽回，要在吾輩努力之實行也。……則灰心者復歸於無，懷疑者復歸於信，此非臆測之言，前事可徵也。丁未春夏之間，太炎還在東京所以排擊破壞無所不至矣，泊聞漢粵軍起，東京同志雖與奔走，未嘗以太炎等之言而有所介於中，師太炎等亦自息其謀。惟太炎等最後之手段，無過於發佈誣說之函，前時國有人彌縫其間，此等最後之手段忍而未發。今則不然，彼等最後之手段已出矣，其排擊破壞之能力，當無有更甚於此者矣。然則今後吾輩復有事實之進行著於天下，則彼等惶惶之不暇，更有何法以惑人。弟等之爲此事，目的在於破敵，而非在於靖內變也。所以靖內變之道，亦不外於此。」

孫先生接到了精衛這封信，知道他的計劃已完全決定，再不能挽回了，祇有聽他一試。他到了北京，就租覆生等假裝開設守真照相館，日夜研究方法和地點。最後決定在十剎海旁甘水橋附近放放炸藥，因爲這裏距離攝政王府最近，可以一舉而炸毀。但不幸當他們在夜間配置安放的時候，給警察破獲了，於是精衛的計劃，全盤失敗，結果給滿清以府捕去。這個壯烈的消息傳出以後，許多同志都非常感動。孫先生尤其是有說不出的傷感和悲痛的情緒。精衛在給漢民信中有這樣幾句話：「僞立憲之劇，日演於舞台，炫人觀聽，而革命行動寂然無聞，……國人將愈信立憲足以頭革命之風潮，……愈堅其信仰立憲之志。」他這一擊，雖沒有成功，但確實的是在保皇黨所謂如湯沃雪中的一個晴天霹靂，他們幾個人的行動，和廣州數千新軍的舉義，在革命史上實有同樣的重要意義。國內的革命形勢已經隨着而變了，孫先生覺得在美朝無久居的必要，因此又渡

是國軍方來了。

第三十九章 庇能會議

孫先生這一次東歸，目的地似乎是在日本，想從日本再設法到和祖國接近的地方，可以指揮一切。這是孫先生早就懷着的一個意思，所以在到美國後不久，即在芝加哥去訪問董野長知的一個親戚，叫做大塚太郎，聽聽日本政府對於中國革命黨的態度，以為重返日本的準備。這一次決心離開美國，就想到要去日本，這當然是意料中的事了。但爲了行程上的必要，卻先到檀香山。

三月二十二日，孫先生從三藩市動身，二十八日就到檀香山。這裏是孫先生兒時舊游之地，也是與中國發軔的地方，雖是很多時候，沒有來到這裏，但許多同志依然沒有忘掉對於他們領袖的信仰和感情，所以孫先生一到了，就表示熱烈歡迎。彷彿和七年前一樣，檀香山的同志和僑胞，仍在荷佛爾街華人戲院中間盛大開歡迎會，到會的有二千多人，甚是熱鬧極了。孫先生每天晚上，都在自由報報館樓上，開會聯盟，每次開會的總是在百人以上，甚至本來是保皇派人，也都歸化革命，可知當時的盛況了。後來又到茂芋、希爐各埠去，各埠僑胞也都先後加盟，於是同盟會在檀香山也規模畢具。

孫先生在檀香山本來想有三個月的逗留，但不久接到精衛和復生被滿清政府判處永遠監禁的消息，非常着急，嘆着道：「我們從此喪失了一文一武二個人才了！」爲要設法營救，和發動實際運動起見，就急急的到日本去。

六月十五日（陰歷五月初九日）孫先生到日本。但孫先生此行，並不像他所預料的有什麼成就，祇是驚濤的上岸，這許多同盟會同志也不敢完全通知。住了兩個星期的光景，就給滿清政府代理駐日公使吳振麟所

據悉，他和日本政府幾次交涉，要他們拒絕。孫先生居留，日本政府起先沒有接受他的請求，但經不起他的催逼，終於示意。孫先生，於是。孫先生又到新加坡來了。

這的確不是。孫先生所願意的，離去新加坡已有一年多了，卻又回到這裏來。那時新加坡南洋支部早已搬遷此處去。孫先生在張永福別墅住了幾天，就和眷屬一起到底龍，住在柑仔園四百零四號，但不久，孫先生的家庭，就遭逢了一件最不幸的事變，就是慈祥的楊太夫人忽然病故了！楊太夫人生於清道光八年六月十三日，病歿這天也是六月十三日（陰歷），享壽八十三歲，這也是一個異聞。孫先生因為奔走國事，和太夫人在家庭團聚的時候很少，十三歲時曾侍奉太夫人到檀香山，從此使。孫先生能夠看到世界的偉觀，確立了大志。三十歲時回到檀香山，又和太夫人暨德彰公同居數月，但不久。孫先生又到美洲去。在每次分別時，孫先生一面依戀膝下，一面想到革命的責任，這種孀孀家園之間的內心痛苦，我們不難想像而知。然而不幸，當孫先生這次回到南洋來不到幾天，這位偉大的革命領袖的慈母，竟不及看到他兒子的成功而逝世了！孫先生真是何等悲痛？

但不久，更有一個不幸的事實，韓彰公在九龍，爲了欠繳地租，給地主驅逐出來了！他爲幫助自己兄弟革命而致於破產，已夠受了一切痛苦，現在更被人家壓迫而驅逐，是怎樣的難受？然而他毫無怨言，就一直到底龍來和。孫先生共謀革命大事，這種骨肉的至情，和對於國事的熱忱，兼而有之，實在是難能可貴，我們可以說有。孫先生才有韓彰公，同樣的，有德彰公才有。孫先生，革命志士，萃於一家，也是一個千古佳話。

這些不幸的變故，固然使。孫先生傷心，但並不因此阻撓他對於革命事業進取的決心。不多時，趙聲、克強、漢民等都應召而至，於是產生了在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個庇能會議，決定轟轟烈烈的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革命計劃，而完成了。孫先生偉大的抱負。但這時距離廣州新軍失敗，才有半年的光景，當時剛志和的勇氣，並不像。孫先生一樣的奮發有爲。孫先生追述當時情形，有這樣的語：

「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卻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南來者實繁有徒，招持安插，兵力已罄。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衆有憂色，詢及籌來計劃，莫不踴躍太息，相視無言。」

這確是最艱苦的時期了，因此孫先生向各同志再三安慰，說一敗何足礙？他從前失敗，幾爲舉世所棄，此起現在來，困難的情形超過了百倍。現在我們雖窮，但革命的風潮已經很旺盛，華僑的思想大爲開通了，從今以後，只怕我們沒有計劃，沒有勇氣，革命運動不是不能再起的。大家聽了孫先生的話，都非常感動，認爲現在時機迫切，應該立刻起來。孫先生看見各同志的意念都已動了，於是在決醒園召集會議，到會的有費克強、趙聲、胡漢民、德彰公、和庇能代表吳世榮、黃金慶、熊玉珊、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鄧澤如等。大家開始討論關於革命的計劃，克強以爲廣州黨人元氣大損，很不容易再起事，因此主張從緬甸入雲南，聯絡雲南軍隊來舉義，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意見，因爲他曾經參加河口起義，對於雲南軍事的經營，還沒有忘懷，便孫先生別有見解，主張還是在廣州起事，理由是：

「現在因新軍之失敗，一般清吏，自以爲吾黨必不敢輕於再試，可以高枕無憂，防範必疏。至於新軍之失敗，雖屬不幸，然因此影響於軍界最鉅。吾黨同志，果能鼓其勇氣，乘此良機，重謀大舉，則克復廣州，易如反掌。如廣州已得，吾黨既有此絕好之根據地，以後發展更不難着着進行矣。且此次再舉，亦遠非前此歷次之失敗可比，因籌者多未有充分之籌備，每於倉卒起事所致。今既有先事之計劃，當然較有把握，可操勝算。但何志疑慮莫決者，乃在於餉械之無着，不知現在因吾黨歷次之舉義，與海外同志竭力之宣傳，革命精神，早已飄漫南洋羣島中，祇怕吾人無勇氣，無方法。如避免居留地政府之干涉，以致貽誤事機，今吾人則以教育義捐之名目出之，可保無慮也。」

這一番響亮的議論，把大家都說得心悅誠服，趙聲於是進一步提出一個具體意見說：

「如果要在廣州再起，必須立刻派人拿數千元回國，以便接濟某方面的同志，免得他們散去。然後再設法

集合，設立機關，指揮一切。我們也應當繼續回到香港，與各方接洽，積極進行，這樣，目的就簡單費五千。如事有可成，更非數十萬不可。」

「關於款項，我一定有方法可以籌足的。」孫先生很有把握的說。

於是決定在廣州起義，以新軍為主幹。但鑒於從前運動軍隊或民軍，難於擇一發難，因此決定從同志中擇出百人爲先鋒，任發難之責，以領導軍隊及民軍。廣州一得，以克強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因爲他曾在湖南辦學與會，黨羽很多。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因爲他曾任南京新軍統領，和新軍感情很厚。這二是很周密計劃，準備傾全黨的人力財力以赴之。關於款項問題，決議先定十萬元，英屬、荷屬各籌五萬元，暹羅安南三萬元，美洲未計，如果能照預定籌募，本來十萬元是不成問題的。

隔了幾天，孫先生在打銅街一百二十號庇能閱春報社，重開秘密會議，各同志都踴躍赴會。於是孫先生依照原定計劃，開始進行籌款，先向各同志作極謙遜的演說道：

「余每次會晤同志諸君，別無他故，輒以勸諸同志捐鈔爲事，諸同志雖始終熱心黨務，竭力勤助，或不以命爲多事，第余以吾黨屢起屢滅，深自不安，故對諸同志甚覺抱歉。惟念際此列強環伺，滿廷昏庸之秋，苟不及早圖之，將恐國亡無日。時機之迫切，大有朝不保夕之概。且吾黨春初廣州新軍之失敗，雖屬不幸之事，然革命種子，早已藉此而佈滿於南北軍界。因新軍中不乏深明世界潮流之同志，皆極踴躍贊成吾黨之主義，在今日表面上視之，固爲滿廷之軍隊，若於實際察之，誠無異吾黨之勁旅，一待時機成熟，當然割戈相向，而爲吾黨效力。是以諸同志咸認爲絕好良機，光復大業，在此一舉，固將盡傾吾黨人才物力以赴之也。」

「吾適聞所云每晤同志諸君，輒以勸捐爲事，雖余亦極不願對同志諸君每有新求，但念此等責任，除我同志之同志外，又將向誰人求之？是以難欲避免，實不可得。蓋海外同志捐錢，國內同志捐命，共肩救國之責是也。總而言之，捐款之義務，諸同志實無旁貸，此應請同志諸君原諒予之苦衷，仍當踴躍輸將，以助成此最後之一着者也。設天不能演，吾黨此舉復遭失敗，則予當無下次再擾諸同志，再向諸同志捐錢矣。倘或仍體生好

，亦無面目見江東父老矣。是則此後之未竟革命事業，亦惟有賴之同志諸君一肩担起矣。總之，吾黨無論如險阻，破釜沉舟，成敗利鈍，實在此一舉，而予言亦盡於此。」（一五）

孫先生說到這裏，不覺聲淚俱下，大家聽了，大爲感動，於是雖處於經濟極困難的地位，也都互相勉勵，竭力捐款，當場籌得八千餘元，孫先生的精神感人之深有如此。

其他同志也分頭積極進行，如澤如任英屬籌款之責，克強任荷屬籌款之責。漢民也在新加坡籌款，但經過十天的奔走，還沒有滿一萬元，因爲許多同志雖都傾囊贊助，但以量力爲止，要他們破家爲國，到底是很困難。他因爲這數目距離孫先生的預算，相差太遠，非常焦急，就約澤如到新加坡共商進行，他二人研究結果，認爲新加坡同盟會，本不乏熱心之士，現在深閉固拒，也許有不瞭解這一次起事計劃的意義，於是昨晚請園開會，同志相繼演說，漢民也懇切的說：這次孫先生決定大舉計劃，實漢族存亡所關，現在內地同志均竭力籌備，待機而動，希望海外同志，格外竭力資助，以底成功。澤如也說，他在這十天內遍歷十餘埠，大家都非常踴躍，新加坡同志，不可讓人專美。這幾苦口婆心的說了一番，才激起了他們的熱情，由沈聯芳首先捐出一千元，其餘同志也就量力認捐，得三千餘元。不久，克強和澤如在地羅羅會面，克強因爲荷屬的款項不可靠，而英屬的成績，也只有一萬元，現在事勢已十分迫切，如果英屬不能籌足預定的數目，恐將全局瓦解，他就不願回香港去，惟有決心實行個人犧牲主義，步精衛後塵了。他這樣說着，兩眼的熱淚就皎皎地落下。澤如勸他不必如此，還是到各地去繼續籌劃。自十二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先後籌到四萬左右。克強以所差不遠，於是初八日由新加坡回到香港。

經過了這幾難困苦的精募，才有這一筆第一批的款，孫先生本想遍遊南洋英荷各屬，從事進一步的宣傳，但因爲在清風閣演說革命，給保皇黨人譁登當地報紙，觸動英國政府的憤怒，於是又限令出境。因此孫先生早於十一月初六日離開庇能了。

這一次孫先生在開國前最後的遠行了，但當時荷屬則拒絕不許前往，日本及安南暹羅亦先後有出境之

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立足之地，於是孫先生只好又向千里遙絕的美洲去了。

第四十章 三月二十九日

十二月十日，孫先生經過哥倫坡（Colombo），一直西行到美洲。這一次孫先生原定計劃是先到英國，辦理特別外交問題，但後來因為預計南洋十萬元籌款，恐怕一時不能足數，有誤大事，因此雖是變更了他過去航行的慣例，就是不橫渡太平洋而過地中海，經過歐洲；但到了哥倫坡，停泊幾小時以後，又繼續前進到美洲去了。

美洲華僑不久以前，在孫先生宣傳勸導之下，對於革命的熱誠，特別顯著。並且當孫先生未出發前，也曾幾次致函勸募款項說：「此十萬元不過一安全冒險之問題，非了不起之問題也。今內地同志已有決死之心，亦何暇計其安危，但念海外同志，必不忍內地同志獨出冒險，而不一援手，以拯之於安全之地位也。故欲各盡所能，以相有濟。」美洲同志讀了這封信，都很感動，已由陳耀垣、馮自由、黃芸蘇等負責開始募勸，各同志都很踴躍輸捐。

孫先生於紀元前一年（一九一一年）一月二日到溫哥華，黨人約拱門人士及其他團體，都到碼頭上熱烈歡迎。第二日，致公堂開台演戲（拱門稱舉行加盟儀式曰演戲），孫先生擔任主盟，並演講拱門歷史及宗旨，華僑入圍者三百餘人。又在華人大戲院，逐日演講革命之利害得失是非等種種問題，每日前往聽講的都在千人以上。孫先生看到這情形，知道人心可用，於是提議創設革命救國籌勸局，溫哥華致公堂首捐港銀一萬元，這成績比南洋進步多了。

溫哥華、維多利亞、溫尼辟，已先後四開會，長江各省及閩、粵、日本等國，亦已紛紛趕來，於是成立

統籌部，由克強總籌負統籌全責。他們因為工作正在開展，籌款項也極迫切，一再向孫先生請示。孫先生因此又到域多利籌款。這次籌款又變了一個新方式，向一般散仔（拱門稱普通會員曰散仔）宣傳變產救國。因為拱門會員，大都為勞工，如果向每一個人去勸募，不但曠費時日，並且無法應付急需。域多利致公堂會所，是由各個會員捐資建築的，因此提出這個變賣助餉的辦法。孫先生在拱門歡迎宴上，就提出這意見，並且大聲疾呼的告訴他們，反清復漢的機會已經到了，這正是我們捨私從公，為國盡責的最好機會。各散仔大為感動，於是召集全體大會，一致通過把會所樓房向銀行押抵香港銀三萬元，充作革命軍餉。這是一件驚人的事情，各埠致公堂聽到這消息，都很振奮。不久，都郎杜致公堂也跟着變賣他們的會所，得香港幣一萬元。加拿大籌款的成績，到這時可算十分圓滿。熱望着發動革命的香港同志，得着孫先生在海外不斷地鼓勵和源源地接濟鉅款，在歷史上最有名的一次革命運動，就逐漸展開了。

克強等在香組組織籌機關以後，其他分機關和各省機關，也先後成立，即於一月初六日派派人風籌款二千元到湖南湖北，聯絡居正、孫武等，籌劃湖北的軍事，這是預先播下了以後武漢起義的一顆極重要的種子。陳英士、鄒贊臣等也在上海設立辦事機關。方君瑛、會殿等在香港、桂林一帶活動，促成在廣西的軍人如方濤、劉建藩、何敏甫等參加這次革命戰爭。

廣州的秘密機關，也開始暗中設立，為了租賃房屋必須有眷屬同層，許多熱情的女同志，就慨然冒充了他們的妻眷和女傭僕媼，大門上因此公然標明「某公館」，他們在這舉措之下，種種地展開了很多工作。有時還要假名委練，許多軍械就在這層抬担挑的一件件禮物中暗藏著，裝運了軍營，一批批送進省城來了。

關於軍事的進行，克強等遵照孫先生在庇能（檳榔嶼）的指示，以軍界為主方，由陸軍平等擔任聯絡軍防營的工作，新軍下級軍官的聯絡，由陸軍速成學校的畢業生擔任，但防營自籌籌清鄉以後，不常駐在廣州，因此仍以新軍為主幹。可是新軍自去年果賊失敗以後，滿清官吏對他們監視得非常嚴密，所有子彈，僅夠操演時的需用。孫先生早已料到這一點，因此在庇能會議時，主張成立五百個敢死先鋒隊，先在城內聚斂，佔領軍械局。

奪取槍械，免得臨時發生問題。現在克強等爲了實際的需要，敢死隊的組織，把預定的名額擴充到八百人，派鄭明德運動督署衛隊，葉挺芬運動督署護勇，敢死隊的組織，非常嚴密，是這次起義的基本武力。

民軍方面，早經朱執信和胡毅生聯絡就緒；各地方也都派定負責同志，如番禺有李福林等；南海有陸領等；三水有陸蘭清等；順德有譚義等。惠州位於省城上游，形勢最爲重要，也派羅漢揚等主持一切。至於海軍、警察和其他各方面，也有嚴密的聯絡。

各方面的部署，已經相當就緒，於是三月十日統籌部在香港德馬地三十五號機關部內，舉行發難會議，議決分爲十路進攻，白克強、趙聲、徐繼揚、陳炯明、銜兩平等分頭率領各省及華僑同志所組織的八百敢死隊，向總督署、參帥行臺、督憲公所、軍械局等目標進攻。並佔領南大門，小北門及龍王廟高垣等重要地方。關於砲台和電信局的破壞，也派定同志負責。此外，又派放火委員，在蘇界各重要地方，租了九個房子，準備臨時放火，擾亂民心。另伏一隊於珠江光星爲據守南門的應援隊。

機關部正在這極熱烈的討論發難計劃，在同一時間，溫生才在廣州，乘駐防將軍孚琦到燕塘參觀飛機的時候，突然把他斃殺了，頓時引起了一個嚴重的局面。當時克強等籌議發難的計劃爲要消除阻力，本來也想先實行暗殺，第一個目標是水師提督李準，因爲這是滿清將領中最臭名的一個，其次便是孚琦。統籌部原派馮慎微擔任這個工作，他因爲膽子小，不敢去，又改派盧性正擔任，盧正在廣州佈置，還沒有什麼就緒，溫生才却早已舉起手槍向這第二標打擊了。他事前沒有和統籌部取得聯絡，在整個的發難計劃上，不免受影響，但他的革命精神，最值得敬佩的。

孫先生對於溫生才，也曾一再稱道，對他這次經過說得很詳細。孫先生說：從前溫生才在南洋做生意，有一次聽了我講話之後，便不做生意，回到廣州。當時駐防廣州的清兵，每年在瘦狗嶺會操一次。溫生才有一天在東門外，遇見滿洲將軍孚琦在瘦狗嶺會操回來（按係赴燕塘看飛機演習），他看見了孚琦的轎，便問是誰？旁人說是滿洲將軍孚琦，他便攔住孚琦的轎，用手槍把孚琦打死。溫生才因爲要排滿，殺了滿人孚琦，目的

已經達到，便非常的高興。所以巡警把槍拿到了之後，他還是大笑，並說我的本事，只能夠拚一個漢人，現在達到了目的，萬事都已完結，你們要怎麼樣便怎麼樣。」（民國十三年二月二十三對湘軍演說）。在另一次演講中，孫先生又很肯定的說：「像這樣視死如歸的原因，便是由於溫生才信道篤，所以舍身成仁。」（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歡宴各將領演說）我們在另一方面說，也可看出孫先覺人格的感召力的偉大。在每次革命運動中，許多仁人志士的捨身赴義，犧牲奮鬥，沒有一個不是受了孫先覺大人格的感召而來的，像溫生才應了一次誘話，就奮起殺敵，便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李琦被溫生才槍殺以後，省城和香港更緊張起來，葉清官更格外戒備，偵騎四出，按戶盤查，旗界方面，更特別緊張，黨人租用的放火機關，已經有幾處沒清吏發現嫌疑，因此搬動了四處，當發難言議時，原定發難時間是三月十五日，現在情形變了，非等到省會戒嚴鬆弛，決難下手。

在這期間，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使發難的時間，不能不延遲的，一是款項，一是軍械。款項方面，原定美洲之款，還沒有到齊，荷屬亦僅匯來一部份，這兩方面的款子，必須在二十日以後，才可全部送來。關於軍械的籌劃，原來也分爲日本、安南、暹羅和香港等數路，派定負責同志，分別購運。那時也沒有全數運到，並且更有誤事的同志，如派定担任日本運鎗的梅蘇來，就是一個。二孫先生曾經說起這件事情，很爲痛心，他說：「那位買鎗的同志，在日本把槍買好了，已經運到船上，正在長崎開船的時候，忽然接到黃克強的一封信，說香港戒嚴，要他小心。他沿途便把那些鎗枝，三枝一次，五枝一次，祕密的運到船邊，投入海內。到香灣之後，黃克強問他買的槍呢？他說：「你要我過細，香港是戒嚴的，所以我不得到香港來來，在路上便已經投入海內了。」（民國十二年十二月歡宴各將領演說）。這個周蘇來願命重於願責任，全無革命黨的人格，耽誤了這次革命事業，真是可恨。

但事情的曲折，還不僅止此。當時起義的計劃，是以新軍爲骨幹，備備這時有兩標新軍將於四月初旬退伍的確息，這樣一來，發難的時期，至遲亦祇至三月底，否則就要全部失敗。在另一方面，區黨黨人在南洋活動籌

款，不免透露了風聲，那些效忠滿清政府的漢奸——保皇黨，早已密佈專電張鳴岐，囑咐滿清政府亦電令粵東嚴防，這又是使發難不能急切進行的一種困難。黨人在這緩急兩難的形勢下，策劃革命的工作，艱苦的情形，可以想見。

廣州機關部的同志，經過幾次籌劃，便決定了二十八日為發難的時期。二十五日，克強從香港趕來，準備主持大計。他因為預計日本和安南兩方面一批軍械，二十八日才能到達，到後尚須分配，於是主張展緩一日，改定二十九日為發難時期。這是不能遷延的一天了，因為各路的決死隊，已齊集廣州，若過於遷緩，非但四月初有新軍退伍，即機關亦將敗露，經費支持，也有困難，在緩急兩難之間，是最適當的一天了。

發難的時期，已經決定。其他留在香港的黨人，原定二十七二十八兩日全部趕來，克強因為風聲過緊，要他們暫時不來，已經到省的同志，也暫時解散，以避軍目，並且也有回港的。二十六日晚上，漢民在香港接到克強這樣一個電報：「省城疫發，兒女勿回家」。就是要他們不要馬上連省的隱語，大家看了都相顧失色。有的同志，阻抑不住革命的情緒，還是自動的跑到廣州來。

二十七日，張鳴岐突然把巡防二營，調回了省城，以三哨助守龍王廟高地。接着又一個緊張的消息，就是新軍二標士兵的槍械，已被張鳴岐沒收去了。滿清官吏這樣有計劃的戒備，很使黨人懷疑有走漏機密的可能。當時有人疑心陳鏡波已經充當了敵人的偵探，因此都很氣憤，主張改期。陳炯明及趙璋的代表宋玉琳就這樣主張。但也有主張維持原定計劃的，不免意見紛歧。克強看到各部所為如此，非常痛心。他決定一個人去和宋玉琳死拚，以謝孫先生和海外同志。一面立刻命令各部退却，免被搜捕，於是趙璋所率領的一部份同志，先回香港，其他各部陸續退出省城的有三百多人。克強平機關部要把這許多同志遣散了以後，正在百成交集，繞室待命的時候，林時爽喻瑜忽然匆匆的走進來，他們說：「剛才得到警察界中的四川同志報告：滿清官吏立刻要搜查戶口了，形勢非常緊迫，萬不可改期，應該先發制人，以圖自救。」克強聽了這個緊急報告，非常興奮，立刻下了決心，準備集合三四千太攻襲督署，陳庶艾電香港同志說：「摩痛有疼，須臾遲來。」這就是要港

中同志帶槍枝，全到省城發難的隱語。

二十八日，張鳴岐又加派軍警守防軍械局，並分頭搜查黨人，有疑處秘密機關，已被破壞，十幾個黨人，也已被捕去。到二十九日，形勢更緊張，謝恩里的總糧台也被破壞。克強一連接到這許多情報，非常着急。粵軍總司令部、湖南的同志、安南華僑同志，已經從早上起齊集在小東門克強的寓所，聽候命令；下午三時，將近的一個機關，也被圍搜，並且捕去了八個黨人。克強知道事情已到最後緊急的關頭，立刻準備行動。正在這待發的時分，朱執信因為別的事情到這裏，他看到這情形，就把他的長衫下襟剪去，也加入戰鬥隊。一位黨友當日請克強先生派人，也正從香港趕來，看見克強正在籌備彈藥，他將香港的情形報告以後，主張要趁一天動手，克強急得頓足說：

「老先生！請你不要擾亂我的軍心！」譚老先生聽了克強這機警決的話，也很感動，就向克強要一枝槍。
「先生！你年老了！我們的後事，還要人來辦理，這是敢死隊，你不能參加的。」克強很婉轉的拒絕他。
「你們敢死，難道我就怕死嗎？」譚老先生不肯示弱，他氣憤的說。克強無法應付，祇得給了他兩枝槍，他却認爛槍機，碎的一聲響起來；克強就把槍奪回來，說道：

「先生，不行！不行！」譚老先生道才沒有話說，祇得把槍交回克強。

發難的時候就到了，從前議定的十路進攻計劃，現在因為敵情的變化，和許多同志有的回到香港，有的在廣州的也已分散了一部份，因此臨時變更，改四為四路：第一路仍由黃克強擔任進攻兩廣總督署，所部為四川、福建、花縣、華僑及其他黨員；分作二隊，一攻督署衛隊，由林文率領，一攻督署正門，由何克夫率領。第二路：姚雨平擔任，攻以目標偽為飛來寺軍械局及小北門。第三路：陳炯明擔任，攻警察教練所。第四路：胡毅生以二十餘人攻南門。

克強一切籌備好了，就對衆演說，極力鼓勵他們，當晚發給機符號完畢的時候，剛好是五時三十分；各黨英身的同志，就在螺角高鳴中，一起發動了。

在各路革命軍中，以克強那一路戰鬥最爲劇烈和勇敢。他率領了杜文、何克夫等一百多人，由小東營出發，攜着槍械和炸彈，直攻總督署。所有阻擋的營兵和衛隊，殺的殺，逃的逃了。兩廣總督張鳴岐，聽見砲聲就驚掉了；克強衝到後堂，找不到一個人，在張鳴岐房間裏，祇見衣架上，還掛着他的長衫，水煙筒還是濕的，他便放了一把火，把總督署燒起來。他剛走出總督署，就和李準的大軍相遇，給官兵圍住了，死傷了好些人；克強也給流彈打斷了兩隻指頭；但他還是再猛的搏戰着，終於突出重圍，沒有受到傷害。又臨時分登三路進攻，第一路令徐維揚率同志數十人，出小北門，準備和靳軍接應；第二路令川岡及南洋同志數十人，進攻督練公所。第三路由他自己率領徐維揚、羅仲雅、朱執信等十人出大南門，準備和防營接應。

克強和方聲洞等，戰至雙門底；就與防營相遇。防營哨官溫帶雄等，本來已經和黨人聯絡好了，準備到水師行台去攻打李準，但沒有到達水師行台以前，暫時不帶符號，以免阻礙。聲洞不曉得這個内幕，他看見防營的士兵，都沒有佩帶符號，便發鎗把溫帶雄殺死，防營士兵，也還槍擊，聲洞不幸殉難！克強且戰且前，他回頭來一看，沒有見到一個人，就擁進了一家洋貨店，還是從門內出兩槍左右射擊，打中了防營士兵七八人。等到防營退散，他才知道自己是負傷了。革命軍和防營的接應，因此失敗了！

川岡同志攻督練公所的一路，在蓮塘街口奮勇接戰，起先也打了勝仗，清兵死傷的很多。至夜九時，轉戰大石街，終因勢寡無援，出小北門，又與旗兵警察相戰，堅持二時，以夜深彈盡，先後潰敗。

在小北門接應新軍的一路，走不到多遠，就見敵軍分批過來，因此在德宜街口就發生衝突，巷戰於蓮塘街口。敵軍居高臨下，佔了有利形勢，革命軍即由蓮塘街轉入大石街的機關部，攀登屋頂，向觀音山射擊。轉戰至小北門高陽里口，又遇見了一隊的防營趕來，他們就在一家米店裏，把米袋做了堡壘，奮勇抵抗，相持一日夜。張鳴岐見黨人強頑不屈，竟下令燒街；黨人不得已，才越牆而走，這一路又完全失敗。

經營五月，集全黨力量，在廣州轟轟烈烈的起義，到這時又宣告失敗，這是孫先生革命的第十次失敗，也即是最後的一次失敗。

孫先生失敗後的第二天三十日，剛剛到達芝加哥，當天的美國報紙，已經把這個消息發表了出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孫先生非常着急，立刻發電香港慰問，並探聽消息。這電文說：「抵芝加哥開敗，同志如何？何以善後？」但孫先生的內心，還是不斷地關注在廣州、香港的各同志身上，他自發電以後，因為不能立刻得到回音，始終放心不下，雖然天天到處演講開會，在和藹的面容上，却不能透露了他的憂愁。

到四月四日，香港的覆電，在孫先生急切的盼望中，終於到了。孫先生急忙找梅喬林翻譯，這電文的首句是：

「克伯展歸。」孫先生看了，立刻現出愉快的笑容。並且高聲的說：

「天下事尚可爲也。」許多同志在旁邊聽了，莫明其妙，就請求講解。

「克者黃克強，伯者趙百先，展者胡展堂也。我所慮者，同人盡還不測耳，今得安全，我心慰矣。」說罷，又叫梅喬林繼續譯下去，這電報的全文是：

「克伯展歸，克夫（何克夫），克武（譚克武），執信（朱執信），力戰出險，佛山起，毅（胡毅生）或在彼。死者姓名，後報。」

孫先生所憂慮的同志安全問題，到這時才放心。這次壯烈犧牲的同志，有林文、林尹民、方聲洞等七十餘人，克強、執信等，幾經奮鬥，才得安然脫險。事後，張鳴岐下令嚴禁，凡是沒有髮辮的人，概行殺戮，以洩私憤。對於死難的屍首，更十分蔑視，暴殄曠野，無人收葬。後來有一個叫做潘達微的，也是革命黨的志士，他用善堂的名義，把這些爲國捐軀的烈士的屍體，收葬在城外的黃花園。因爲屍首共有七十二具，後人就叫他叫做「黃花園七十二烈士。」

孫先生對於這次失敗，一點沒有灰心，且認爲有很重大的意義和價值，在失敗後不久，他寫信給庇能鄧澤如說：「事雖失敗，而其爲影響宗全世界及海外華僑，實非常之大。由此所得之效果，亦不可勝量。以區區十餘萬，而做出如此驚天動地之事，使吾黨之聲勢，飛騰千丈，亦甚偉矣。弟敢決此次失敗之困，必定生出他

日成功之果也。這個肯定的預言，不久果然實現。在以後黃花崗烈士事略序文中，更有具體的說明：

「漢清末造，革命黨人，歷艱難險巖，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躡割者屢。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爲最。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文藝之人心，乃大興奮。怨仙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對於七十二烈士的奮鬥犧牲，更不斷地贊頌崇敬。民國十三年在嶺南大學黃花崗紀念會時說：「七十二烈士在當時立了這麼志氣呢？我們雖然不能立刻知道他們的志氣。但是他們由於失敗，便斷頭流血，犧牲性命，由此便可以知道他們的志氣，最少有限度，是不惜身家性命，不管權利幸福，要做一件失敗的事。……他們在專制政體之下，昏天黑地之中，存心想爲四萬萬人服務。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達到目的，想到無可如何之時，便以死來感動四萬萬萬人；爲四萬萬人來服務，做革命事業。在七十二烈士雖然失敗，但是他們死得其所，在我們後死的人看來，還可以說是成功。」

但對於當時誤事的那些同志，始終表示痛惜。孫先生說：「當他們沒有起事之先，計劃是很周全的。如果完全實行，很可以成功。後來實行的時候，因爲同志做事不好，所以失敗。同志做事不好的很多，譬如有一位同志，由黃克強派到日本去買一百枝駁槍，假如廣州的同志，得到這些槍，是很可以成功的。後來他們起事，打倒制軍衙門之內，各處都已成功，最後失敗的原因，全是由於武器不足。」（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歡迎各將領演說）這是革命修養和人格高下的表現，在孫先生每一次革命運動中，總是有一二個誤事老同志發見，他們實在應該愧對許多成仁取義的先烈！

孫先生在芝加哥大約逗留了一個月光景，又回到三藩市。那時主要的工作，是籌募死難同志的救卹經費和籌備捲土重來的計劃。四月五日，孫先生又接到漢民的電報：「卹死救亡，善後費重，奈何？」因此，又展開了熱烈的募款運動。美洲、華僑，受了這次廣州壯烈犧牲的感召，都慷慨踴躍捐輸。到了三藩市以後，情形更

好，當時孫先生寫信給鄧澤如說：「金山致公總堂，雖係洪門，以反清復明爲宗旨，然向多老朽頑固，無進取之氣，故嘗與吾黨之少年勇進之輩，積不相容。數月之前，猶反對同盟會之籌餉，美國華僑十居八九，爲洪門之徒，致公總堂一反對籌餉，則雖熱心革命者，亦不敢前。故以美國華僑之數，所集不過萬餘港銀，遠不如加拿大少數華僑之捐款。乃至羊城一役之後，見吾黨志士，捨身赴義，英勇絕倫，則頑固老朽之輩，亦因而感奮。今致公總堂，已發起籌餉，現已設立籌餉局，以資資助，想不久必能大收效果也。」那時三藩市致公堂和同盟會，由於孫先生的號召，已經聯成一氣。籌餉局因對外關係，又名國民救濟局（Kwok min Charity Bureau）。

克強自三月二十九日失敗以後，決欲實行個人主義，和李準、張鳴岐等拚命，以振士氣。他丁再來電，向孫先生請示。孫先生恐怕他再演革命的悲劇，極力勸阻。並且指示他可以組織暗殺機關，另派黨員担任。當籌餉局成立以後，孫先生就提議先匯款萬元給克強，充作設立暗殺機關的經費。兩個月以後，李沛基在廣州刺死清將軍鳳山，就由這個暗殺機關發動的。

三月二十九日的革命，不但促進籌餉工作的順利，並且也影響到國際的觀感，使孫先生的外交工作，更易着手。孫先生這次重遊歐美，另一任務，本來是要辦理外交，他現在就把握了這個機會，向各國當局說明中國革命的宗旨，以取得同情。這一切交涉的經過，在寫給鄧澤如的一封信中，也有提到：「又經羊城一役之後，外交亦易入手。弟曾着人直說美國政府，皆大表同情。今已使人往英，以說彼中權要，想必能得當。法國政府，則向已有通情者也。如是吾黨今日，可決英、美、法三國政府，必樂觀吾黨之成事。則再興之日，必無藉端干涉之舉，且必能力阻他國之干涉也。」這是很重要的一着，武昌起義以後，沒有引起各國的干涉，臨時政府很順利的成立，就是孫先生這時努力外交工作所得的結果。

孫先生半生經營的革命事業，經過長時期的艱難奮鬥，到這時已經快到收穫的階段了，但他們的私生活，更陷於窘境。他的家親，自前年遷居庇能以後，每月生活費用一百元，由庇能同志集資供給。但兩位女分子的款

書，和家人的醫藥費用，就無法籌措。並且不久，這集資的辦法也沒有實行，因為孫先生覺得長貧難艱，這不是一個根本辦法。但除此以外，也沒有更妥當的辦法，因此常常接到家中告急的信件。在三藩市寫給凱澤如的信中，也提起這件事，他要求凱澤如向庇能以外的各埠，再約十個到二十個同志，每月每人担任五元或十元，協助家費，以減輕庇能同志的負擔。孫先生私人生活的艱苦，於此可以想見。

系於民國三十四年冬

購於文化服務社 價為壹仟元

附吾於閣中讀書

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九	一七	塚土	塚土
一二	九	丁未	乙未
二二	三	聖經	小書
二二	八	聖教	禮教
八七	五	弄到不知	弄到你不知
八九	一〇	華文	革命
九九	一三	光生	先生
一〇七	四	躬望	盼望
一〇九	一三	入把	入
一一〇	一四	就他	就聖包
一一〇	一八	坪	坪
一一二	八	則日	則日
一二三	三	祇毀	毀毀
一二四	九	讓與	讓與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七一	一五	但件劃黨	件劃
一七一	一六	的起義，早	起義，實際上早
一七二	三	與齊	與齊
一七七	二	規則	規則
一八五	一	很好的	很巧的
一八六	三	很好的	很巧的
一八七	九	五翔	王翔
一八九	二	節省	節省
一九〇	八	又功虧一簣的	又是功虧一簣
一九三	二	陳湧，	陳湧波
一九四	八	連遭	連遭
一九五	二	先候	靜候
一九八	二〇	四千密達	四千密達

勘 誤 表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

孫中山先生傳

版權
所有

每部

精裝
平裝

國幣

元

(外埠另加包裝郵寄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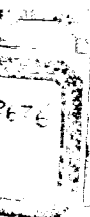
著者 高良佐

發行人 黃大白

發行所 近芬書屋

總經售 聯友出版社

成都半邊橋街大號



111051

